

滨海遥远的过去

[苏]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著

滨海遥远的过去

(滨海边疆区古代史与中古史纲要)

[苏]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著
莫润先 田大畏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ДАЛЕКОЕ ПРОШЛОЕ ПРИМОРЬЯ
Примо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59

内部发行

滨海遥远的过去
(滨海边疆区古代史与中古史纲要)
〔苏〕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著
莫润先 田大畏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10

1982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02 千
印数 1—6,300 册	印张 12 3/4
定价：1.8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阿·巴·奥克拉德尼科夫(1908—)，是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历史、语文与哲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的考古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奥克拉德尼科夫以介绍最新考古发现的名义，写了不少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文章，矢口否认老沙皇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原本是中国的领土，否认那片广大地区和我国内地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强调“远东各民族有着渊源极其久远的自成一体的文化”。

《滨海遥远的过去》一书，出版于1959年，是苏联公开反华以前的著作。书中所说的“滨海地区”，指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方，即老沙皇强占的那片土地的东部，现在主要归苏联滨海边疆区管辖。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这本书中，尽管散布了一些错误观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未否认“滨海地区”同我国东北乃至黄河流域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所以，本书在详细介绍当地考古发现的同时，大量引用中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并对当地和我国内地的考古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本书开头就说：“远东居民古代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取决于他们同邻近的亚洲大陆各地和各国的联系。”接着又进一步强调，“远东诸部落首先同中国（它在许多世纪中曾经有过远东高度的农业文明）以及满洲、朝鲜和东亚各岛屿有过各种各样的联系”。

关于旧石器时代，本书着重介绍了年代约当一万五千至一万

年前的奥西诺夫卡文化，并同我国东北的顾乡屯遗址，以及新疆、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发现对比，认为在“邻近的东北、辽东和朝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应当有过与奥西诺夫卡文化有亲缘关系的远古文化”。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滨海新石器时代和阿穆尔河（指黑龙江）沿岸新石器时代一样，与邻近的中国北方首先是与东北的同期文化有许多相同点。这说明远东古代部落很早以来就同东亚的其他民族有着亲属关系，并同他们发生文化联系。”书中详细介绍了黑龙江下游的捷丘贺遗址，又引述辽宁锦西县沙锅屯遗址的材料，认为“沙锅屯洞穴对于研究滨海及阿穆尔河沿岸新石器时代居民同东北新石器时代发生联系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而“沙锅屯洞穴又证明东北新石器时代同仰韶文化有联系”。谈到南部沿海格拉德卡亚河口等地的发现，书中根据“板岩磨制石刀”等遗物与山东龙山文化类似的情形，认为当地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就“同中国山东地区以至更南部的沿海部落发生了联系”。

本书第四章“贝丘时代文化”，叙述公元前第三千年末至第一千年初的情况，有一节专门讨论“文化联系与古代中国的作用”。作者非常明确地说：“滨海主要的、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无疑是溯源于邻近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是东亚最古老、最强大的农业中心。”又说：“东方畜牧部落中冶金业和铸造工艺在很早时期就达到了繁荣阶段，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同西方部落的接触，不如说是取决于同中国的联系。”该节从石器、骨器、陶器和居住建筑等方面，讨论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殷代文化对滨海地区的影响，分析了单砣子、城子崖等遗址的情况；反复强调：“在千百年中，中国的先进部落对远近四邻有着进步的影响。”“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是强大的文化中心，其影响遍及四面八方。”作者甚至说：“古代中国居民及其北方邻人的这一切新的文化因素，其发

源地恰恰是中国，而不是北方。”“周打败殷以后，中国同亚洲北方部落及东方部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讲到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由石器向金属器过渡”的时期，书中详细介绍了夹皮沟河谷等遗址。作者指出：“这个多层居址的上面几层中，发现了铁器残件，包括中国北方农人今天仍然使用的那种铧或锄。”书中又将夹皮沟河谷等地所出陶器，与辽东地区的战国随葬陶器对比，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因而“应当有直接的亲属关系”。由此说明，“从辽东到滨海及阿穆尔河地区，……所有这些部落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周秦以至汉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当地更快地达到较高的文化和经济水平”。

“关于远东诸部落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千年代的历史，可以从中国的文献里得到比较详细的了解。随着远东居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发展，中国文献的报导也愈益充分而丰富。”这是作者当时并不回避的客观情况。本书对于有文献资料可寻的历史阶段，大量引述我国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例如：《国语·鲁语下》关于武王克商后，“肃慎氏贡楛矢石砮”，以表臣服于周的记载；《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关于两汉魏晋时期的挹娄（有时仍被称作肃慎），从属于中原王朝，屡次遣使入贡，以及挹娄社会经济和生活习俗等方面的记载。书中并且推断，夹皮沟河居址的上层，“应当归属于中国文献中所说的肃慎时期”，先基纳帽居址的中层，“才应归属于挹娄时期”。至于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已经进入真正的铁器时代的那些古代遗址，“都应当归属于勿吉或早期靺鞨部落”。

根据历史文献，南北朝时期挹娄改称勿吉，先后臣服于北魏、东魏、北齐等朝，曾多次遣使进献。隋唐时期，勿吉转音为靺鞨，分作七部。书中叙述了这些有关的记载，特别提到唐朝政府在黑龙

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一整套行政机构的史实。唐玄宗任命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为勃利州刺史、黑水州都督，又任命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为忽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渤海称国并自立年号后，势力日渐强大，但其统治者仍接受唐朝封爵，保持臣属关系，借以提高自己在当地的威望。仅大钦茂一代，就曾向唐朝遣使达二十八次之多。书中强调，“渤海的国家机构完全仿效当时中国封建国家的制度”，“渤海文化基本上是从中国吸取的”。同时，书中还具体介绍了渤海都城的平面布局、建筑结构、鸱尾和瓦当纹饰，以及其他各种遗物的特点，明确指出它们同唐代文物一致的情形。

随后，本书又根据中国史料，详细叙述契丹和女真在我国北方先后建立辽、金王朝的历史，以及辽金时期“滨海”地区的物质文化。末了讲到明朝永乐年间在黑龙江口设置奴儿干都司，亦失哈奉命多次前往巡视，亦失哈在当地建立的永宁寺和两块碑记，以至清朝由宁古塔将军和盛京将军接受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部落的贡赋，等等。

但与此同时，书中也还流露出不少明显的错误观点。这主要是故意把汉族和我国少数民族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少数民族都不能算中国人，硬说“渤海对中国皇帝的依附，从来没有超出形式上的册封”，“契丹人(辽)和女真人(金)的历史”，“本来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史”，拒不承认我国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已经有效地管辖着黑龙江下游和“滨海”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作者还片面夸大当地民族文化发展的独特性。他说：“阿穆尔河下游……的艺术风格具有最纯粹的、自成一体的性质”，“考古发掘表明，这种风格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而否定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在全书的末尾，作者大肆宣扬所谓“十七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历史功绩，说什么“正是俄罗斯人迎接了把这片富饶的、被历史遗忘了

的疆土从千百年的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任务”。这些违背历史真实的叙述是完全背弃列宁关于沙俄侵华的光辉论断的。

顺便指出，奥克拉德尼科夫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许多错误之处。例如，他把秦始皇铸锤镰金人说成铸佛像，把周公辅成王说成周朝有个名叫公辅的人称了王，把作为《三国志》组成部分的《魏志》与《三国志》并列，把李谨行为积石道经略大使说成李氏修筑一条石路并妄加议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尽管如此，本书作为我国东北边疆考古研究的一份资料，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作者在书中引用的我国历史文献资料，译者都核对过原文，凡是用错这类材料的地方，已在译注中指出。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远东考古学遗存研究简史	(7)
第二章 人类的早期遗迹	(34)
第三章 滨海的新石器时代	(60)
第四章 贝丘时代文化	(107)
第五章 由石器向金属器的过渡(公元前 七至二世纪)	(192)
第六章 靺鞨部落和渤海国	(224)
第七章 女真国时代	(269)
作者、著作译名对照表	(385)
杂志、期刊译名对照表	(394)

引 言

远东的疆域，北起楚科奇半岛海岸，南达朝鲜边界；东濒白令海峡，西抵科累马河。

我国远东的过去，远东不同部落、不同语言的居民的历史道路，自古以来就受到俄罗斯和国外学者的注意。使人感兴趣的，首先是研究这部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怎样在当地的条件下以特有的方式反映出来，看到几千年来，远东居民怎样在这里创造并发展了他们独特的文化。

远东诸民族的历史道路的特点及其文化的特异性，在许多方面，是由作为这些民族的生活条件和背景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

苏联远东的海岸，濒临两个大洋和三个大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和日本海；在远东的土地上，奔流着亚洲最大河流之一——阿穆尔河。^①

这里，东西伯利亚的北方景观同满洲、朝鲜的南部景观“相交错”。远东的北陲，是北极的荒漠和冻土带；南部则茂密地生长着满洲类型的喜暖植物。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然界——南方和北方，在阿穆尔河沿岸和乌苏里大森林中都能见到。在这里，满洲的胡桃同雪松、冷杉共生，青竹与白桦并茂，葡萄攀藤于云杉。在老虎刚刚走过的地方，竟可以看到北方森林中生活的驼鹿。

这种兼有南北特点的自然环境不能不在远东古代居民的生活中留下痕迹。

地理条件的多样性、大自然的富饶，这一切自古以来就促进了

^① 即黑龙江。——译者

远东古代居民特殊的多种经济和各种文化的发展。

远东居民古代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取决于他们同邻近的亚洲大陆各地和各国的联系。

远东诸部落首先同中国（它在许多世纪中曾经有过远东高度的农业文明）以及满洲、朝鲜和东亚各岛屿有过各种各样的联系。他们同亚洲中部（旧大陆最发达的游牧文化的故乡）即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也曾有过交往，并经由这一带同西藏接触。他们还同北方地区海洋上和森林中的渔猎人、同冻土带和森林冻土带的养鹿人互相往来，这对于远东的历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北方部落曾进入南方，南方部落也入居北方；他们的文化互相影响。

这一切都不能不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影响到历史发展的速度，并且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经历和居民成分，影响到远东诸部落部族的互相关系。

因此，远东的民族史与文化史就显得相当复杂。它不仅关系到亚洲（包括北亚、东亚）民族史的重大问题，甚至也牵涉到美洲大陆民族史的重大问题。

我国远东地区首先是与通古斯-满洲诸民族的经历密切相关的。这些民族现在分布于从萨哈林岛^①到科累马河、从太平洋到叶尼塞河之间的地带；他们所起到的显著作用并非局限在北亚和东亚的政治史与民族史上。正如许多学者所见，通古斯-满洲诸民族的故乡，或在现今东北，或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地区。北亚诸部落的另一个民族大集团（不少研究者把它作为整个北亚广大地域远古居民的苗裔）是亚洲东北部的古亚细亚人。其中基里亚克人至今仍住在阿穆尔河流域；其他的古亚细亚部落（楚克奇人、科

^① 即库页岛。——译者

里亚克人、尤卡吉尔人)则与他们相邻,住在北方的白令海峡地区。

同远东上古史关系至为密切的,还有一个阿依努人(айны)的问题,这是太平洋地区民族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人类最早定居美洲大陆的问题也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

正是在这里,沿太平洋海岸,朝白令海峡和阿拉斯加的方向,或者是经过阿留申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曾经有过远古时代的通行路线,美洲的最初居民当是沿着这些路线来到美洲的;他们是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至少是其中主要的一支。

有根据认为,这种同我国远东有某种关联的亚洲—原始美洲的联系,在较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也仍然有过;这可以从北美诸部落同西伯利亚东北部古亚细亚人文化上的相似点得到证明。根据这一点,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古亚细亚人甚至被人称为“美洲人种”。当然,决不能因此而断言科里亚克人、楚克奇人和伊特里门-堪察加人必定是从美洲来到西伯利亚的,但美洲大陆和北亚居民之间的古代相互联系却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很自然的。

学者们对远东历史之所以产生兴趣,远东古迹之所以具有意义,还由于早在公元头一千年,即大约十二个世纪之前,这里便出现了阶级社会、地方国家组织和高度文化;而在邻近的西伯利亚东部和北部,当时却仍然是前阶级社会,保留着原始公社制度。

在远东各地区的历史上,苏联的滨海是至关重要和最有意义的地区之一。

正是在滨海边疆区境内,最强烈地反映出我国远东的自然、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切特征。

在远东的南部,从石器时代开始,便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

渤海人和女真人的国家就是在这里产生和发展的,它们在整个远东的文化史与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滨海史上阶级社会和国家出现以前的各阶段，即后来渤海人和女真人赖以勃兴的历史基础，对于我国远东史学家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综述滨海这一长期过程的概况，并主要根据考古资料，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来阐明滨海居民的历史道路。

本书的对象，不仅是史学专家和考古学家，而且包括对远东的过去，对我国这一片最为遥远的美好的边疆的历史命运感兴趣的读者，以及对这一地区从内心感到关切的每一个苏联人。

第一章 远东考古学 遗存研究简史

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的开发，促进了俄国的科学首先是地理学的发展。随着这个广袤地域的地理研究的开展，人们逐渐了解到西伯利亚为数众多的部落和民族，了解到他们的历史命运。

关于这一片在“石带”^①之外的遥远而朦胧的地域，早在最初的报道中便描述过西伯利亚古代居民遗留下来的城市废墟和墓葬。

远在三百年前的十七世纪，俄国人便注意到西伯利亚的古迹古物，其中就有远东的考古遗存。

最有意义的一个发现是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杰出的俄国学者谢苗·乌斯季诺维奇·列麦佐夫的活动有关。

1701年1月1日，列麦佐夫在托博尔斯克完成了一部使之名垂青史的地理学巨著——《西伯利亚地图集》。

在这本地图集的大量资料中，有一条稀罕的、内容费解的标注。在《西伯利亚城市与地域》这幅综合图上，在阿穆尔河入海处标着：“马其顿·亚历山大王到此，藏以兵器，并留钟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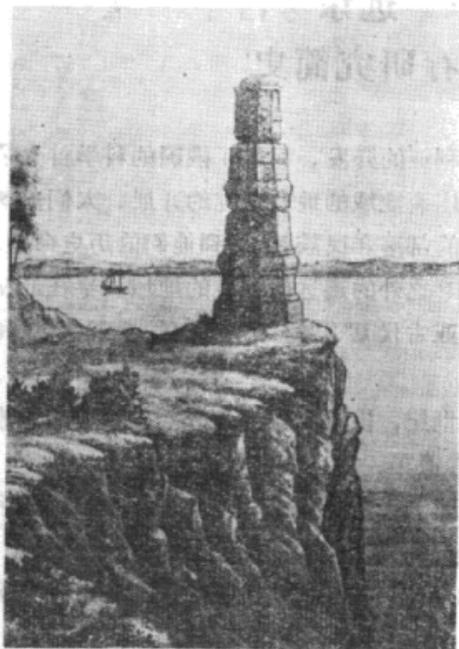
标注附近，标出一座带望楼的城廓，并绘有一物，显然就是标注里所说的那口钟。

原来这条标注说的是著名的特林石崖。1655年冬至1656年，俄国哥萨克人到过特林。他们在这里见到了一座古寺的废墟，发现几块刻有四种文字的石碑。二十年后，他们把这一发现告诉了

^① 指乌拉尔山。——译者

十七世纪著名的俄国旅行家和外交家 H. 斯帕法里。

后者写道：“二十年前，我国哥萨克人曾在阿穆尔河畔及河口与中国人交战。据他们所称，自阿穆尔河口上溯二日之遥，在一处



图一 特林石崖上的石柱。
(Г. М. 俄尔米金绘)

象是从悬岩上开掘出来的地方，发现中国钟一口，钟重二十一普特^①有奇。又发现中国碑文三处。异邦人告知我哥萨克人，古时中国某王曾几度自中国经海道至阿穆尔河，留下文字及钟，作为标志，以资纪念。”¹

这样，我国勇敢的新土地发现者们，十七世纪中叶到达大洋沿岸的头一批俄国人，便在远东考古学的历史上写下了第一页。

出色的特林文物尽管如此强烈而深厚地引起了十七世纪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和十九世纪前半叶旅行家们的兴趣，然而到了后来，它们却在另一些同样动人的、但为数更多、为时更早的我国远东古代遗存面前显得逊色了。

这些遗存的发现，是一批俄罗斯旅行家和学者的功绩。他们

1 H. Г. 斯帕法里：《亚洲与中国》，喀山，1910年，第68—69页。

① 1普特=16.38公斤。——译者

是开发远东的先锋,当时是在缔结璦琿条约之后,远东刚刚完全地并入了俄国。

早在描述乌苏里边疆区的第一篇记述(1861年出版)中,理查德·马克便提到了乌苏里江河口卡扎克维切沃镇附近克尔马崖上的古代城堡遗迹。

另一处,在诺罗河河口,他聚精会神地观看了风景如画的峡谷出口处,从而第一个发现了岩画,并作了详细描述。

旅行家和研究者的这些考察,不久便引起了人们对远东考古学的特殊兴趣。起初是有系统地搜集有关远东古迹古物的资料,试图把它们当作一种史料,来复原边疆的过去,了解当地居民的历史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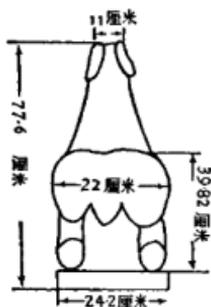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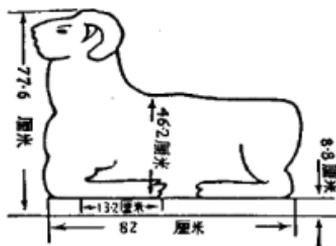
在滨海边疆区的第一批研究者中,特别专心于研究古代遗存的,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出色的西伯利亚旅行家、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И. А. 洛巴金。

早在1864年,他在《东西伯利亚滨海州绥芬河以东南部地区概况》一书中便谈到这个地区的历史。洛巴金写道:“绥芬河绕过该地区的西北角,继而急剧南折。在该河两侧,特别是左侧,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土城遗迹,连绵不断达数俄里^①。土墙高不过三俄丈,现已蔓草丛生;墙外环有堑壕。城周最大的不超过三俄里,呈四边形,有的四角内凹。土城内发现有岗丘、沟壑、经过打凿的石块、陶片、瓦片及其它定居遗迹。而最精美的古代作品是我在两个城寨之间发现的石雕。在一个冢形小岗(可能就是封土堆)上,平放着一个石头雕凿的乌龟,长达二俄尺。龟背上凿有长方形的沟槽。龟甲和龟头仍保留清晰。距这件雕像不远,有一块长方形石板,上面刻有一物,似盾,以二兽支撑。

^① 1 俄里=1.06 公里; 1 俄丈=2.134 公尺; 1 俄尺=0.71 公尺; 1 俄寸=4.4 厘米。——译者

“距这些遗存约一俄里半，还有四只石虎，分置于方形场地的四角。此外，据说周围还有其它石雕。附近房子里的中国人把这些废墟称为凤丹城^①的遗迹，他们说，从前这里曾住过几个郡王。”²¹

这是我国科学文献中有关现今乌苏里斯克城^②地区的滨海中古史出色遗存的头一批资料。



图二 乌苏里斯克城的绵羊雕像图。

И. А. 洛巴金绘(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库藏)。

И. А. 洛巴金继续在远东从事研究时，在其巨型专著手稿中著录了各种考古遗存共四十九项，涉及地区包括滨海、乌苏里江流域、阿穆尔河沿岸和萨哈林岛。²

他不仅描述了滨海的考古遗存，而且把人物动物的石雕图录也附入了手稿，包括石龟和原来驮在龟背上的石碑。И. А. 洛巴金还绘制了柱础等建筑细部。这是考古遗迹的第一批图录，画得非常精细。图上标明了雕像和其它遗存的尺寸，准确地表达了最重要的细部。这些图录使我们能够了解到已佚失或残毁的遗存，

因而显得特别珍贵。例如，洛巴金的图里有一幅雕像绘有头部，但

1 И. А. 洛巴金：《东西伯利亚滨海州绥芬河以东南部地区概况》，载《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 VII 期，1864 年，第 182—184 页。

2 И. А. 洛巴金：“阿穆尔地区四十九个古代遗址的若干资料”，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即今苏联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者)档案(列宁格勒)，第 34 号，1869 年。

① 疑是下文提到的博尔丹城的讹称。——译者

② 即双城子。——译者

原件的头部后来却被打落而遗失了。

原来,1887年这些石雕“长期被用来支承木房的梁架……因而头部被打去,躯体劈成两半”¹。И. А. 洛巴金的图录一部分后来由Ф. Ф. 布谢和Л. А. 克罗波特金采用,载于著名的滨海古代遗存汇编中。洛巴金的作品虽然只是手稿,但至今仍有价值。

滨海的古代遗存也引起了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兴趣。在“从小养成的强烈的旅行嗜好”的驱使下,1868年他来到阿穆尔河沿岸,随后又到了乌苏里江河谷、兴凯湖畔和太平洋岸。他在尼科尔斯克村附近,看见了使之惊奇的两座土城遗址和一些“经过加工的石头”即古代雕像,并作了报道。

普尔热瓦尔斯基写道:“我陷入深深的沉思,沿着土垣信步而行。只见城内灌木丛生,野草繁茂,农户的牛群宁静地在吃草。我油然忆起著名的阿拉伯神话:传说某人每隔五百年重游旧地一次,但每次景观不同,或城市,或海洋,或森林,或山峦,交替出现;而每问其所以,却都回答说古来如此。”²

象普尔热瓦尔斯基、洛巴金、马克那样兴致勃勃地研究滨海古代遗存的,在60—70年代还有著名的俄国亚洲部分研究者M. И. 维纽科夫、天文学家加莫夫、矿业工程师H. 阿诺索夫、И. 克罗波特金、A. 布季谢夫、И. 格利麦尔先、И. 鲍戈柳勃斯基和其他许多学者。

不仅如此,由于杰出的俄国东方学家、中国史及其邻国史的研究者И. 比丘林、И. 卡法罗夫和B. 戈尔斯基等人的著作相继问世,人们对于滨海和整个远东古代遗存的兴趣从一开始便得到了赞助,并日见加强。

1 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列宁格勒),第50号,1887年。

2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1867—1869年在乌苏里边疆区的旅行》,莫斯科,1937年,第66—67页。

早在1828年，便出现了И.比丘林的极有价值的著作《蒙古札记》，书中收集的广泛资料不仅叙述蒙古人本身的历史，而且涉及到他们同相邻各国和各民族的关系。一年以后，出版了比丘林的另一篇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成吉思汗早期四汗史》，内容包括《元史》和《通鉴纲目》中有关蒙古王朝史的部分译文。《早期四汗史》中也收入了有关蒙古人同女真人的关系、金帝国的衰亡等珍贵的远东史料。

同年，1829年，《准噶尔与东土耳其斯坦的古代与现代状况》问世；1833年，《纪元前2282年至纪元1227年西藏与库库淖尔史》出版；过了几年，即1842年，《中华帝国统计资料》出版；最后于1851年出版我国东方学史名著《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资料汇编》选载了中国编年史中有关远东诸民族（包括滨海古代居民）的材料。

远东研究者们从比丘林的资料中不仅头一次知道了古代居住在滨海的肃慎、挹娄、勿吉和靺鞨的名称，而且开始了解到他们的具体历史事实和生活方式的特点。中国史家以其典型的简洁文笔，同时却又形象而鲜明地描述了滨海和阿穆尔河流域古代民族（从汉帝国的同时代人挹娄开始）的经济、习俗、信仰、社会制度以及同汉族的关系。

《资料汇编》出版以后，我们了解到，根据中国史料，大约从公元前第二千年末开始，至少从西汉即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远东诸民族的历史便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则更为明晰，当时在这里出现了渤海人和女真人自己的国家统一体。远东诸民族同中国许多世纪中的文化和政治联系也都弄清楚了。

此外，远东诸民族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同亚洲中部和东西伯利亚诸邻族的关系也更为清楚了。

比丘林的其它著作还阐述了成吉思汗世界性的蒙古帝国的兴

起给远东诸民族带来的严峻时期。

然而,《资料汇编》是И.比丘林的最后著作,成了他的毕生功绩的终结。1853年,他逝世了。比丘林死后,我国科学文献中留下了远东历史上没有填补起来的一大段空白,即从十世纪渤海的衰亡到女真国的覆灭这一时期。十三世纪至俄国人首次出现于远东的十七、十八世纪这一时期也未予研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随着强盛的唐帝国(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鼎盛时代)的衰落,中国即四分五裂,丧失了往昔对邻族的影响。用B.И.瓦西利耶夫的话来说,当时中国“甚至不能得到那里的情报。北方被占有中国一部分领土的两个国家挡住了,一个是多少伸入蒙古而以鄂尔多斯为主要中心的夏王国,另一个是在其东面直达大洋的契丹王国”。

比丘林也没有研究契丹人(辽)和女真人(金)的历史,因为这本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史,而是其他民族的历史,尽管这些民族的编年史是中国人写的,并保存在他们的历史文献中。

1852年出现了B.戈尔斯基的著作《满洲朝廷的开端与初期业绩》。在这部著作中,他的确为我国科学文献首次提供了一个满洲古代史与中古史的概况,叙述了这一地区的各个部落,以及从周代开始他们同中国的关系。

但戈尔斯基的著作只是一般的概述,是努尔哈赤奠立的满洲王朝史的简单的导论。

B.И.瓦西利耶夫承担了填补这个空白的任务。他研究了“中亚东部”的历史,即十一十二世纪的满洲、蒙古和中国北部的历史。他决心要阐明满洲人历史上最艰苦时期的生活,其年代范围从蒙古人摧毁女真帝国和宋帝国时起,到十七世纪清朝统治下的新满洲国家形成为止。

瓦西利耶夫与亚金夫·比丘林不同,他不是逐字直译中国人写的契丹、女真朝代的本纪和志传,而是在自己著作的正文之外附

以私人著作的译文,包括中国人孟珙^①(成吉思汗崛起的同时代人与目击者)撰写的《蒙鞑备忘录》,宋代作家宇文懋昭的《金志》(作者在1234年金帝国灭亡时还著有《大金国志》),以及《辽志》和《契丹国志》。

B. II. 瓦西利耶夫为选择、综合和评价浩瀚的中国史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方面的全部工作似乎都没有包括在他的著作内,但同时却又溶化于经过认真推敲的字里行间。

《中亚东部的历史与古迹》首次清楚而详细地描述了契丹人和女真人,叙述了十一十三世纪辽国和金国的历史,也谈到了他们同中国人的关系。

B. II. 瓦西利耶夫在一部专著中还阐明了过去未研究过的元明两代的满人历史¹。但是,对于那些后来并入俄国,而在过去曾是女真国的部分国土并以某种方式纳入契丹势力范围的东亚地区,瓦西利耶夫却没有专门谈及它们的历史。

然而对俄国科学来说,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因此,对滨海中世纪的专门研究便受到了俄国的第三个杰出的中国学家帕拉季·卡法罗夫的注意;用 H. 维谢洛夫斯基的话来说,他是“欧洲人中最伟大的中国学家”²。

卡法罗夫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不仅以中国史料为基础,而且也以朝鲜、日本史料为根据,来阐明滨海的历史。他试图大量利用滨海本地的考古遗存,分析滨海的历史地理,确定古代设防居址和城邑的位置,查明它们的名称及历史上、族系上的归属问题。他认为钱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考古遗存的断代依据,而且有助于弄清各民族各国家具体历史事件的进程、经济状况和互相

^① 据王国维著《蒙鞑备忘录笺证》跋,《蒙鞑备忘录》的作者是赵珙。——译者

¹ B. II. 瓦西利耶夫:《元明两代满族资料》,圣彼得堡,1863年。

² H. H. 维谢洛夫斯基:《卡法罗夫掌院对马可波罗华北之行的注释》前言,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38卷,1902年,圣彼得堡,1905年,第3页。

关系。

1870—1872年，И. 卡法罗夫受俄国地理学会的委派来到滨海，以便就地了解这个地区的古代遗存，并把它们同中国编年史联系起来。

1870年9月，帕拉季·卡法罗夫总结自己的考察收获时写道，他仍然住在“……附近有大量古迹的尼科尔斯克村，与朝鲜人的几个村落为邻……。现在，根据文献史料对照实地情况，我敢肯定，分布在南乌苏里边疆区的古代遗存，主要属于渤海王朝统治满洲时期”。

接着他写道：“在绥芬河左侧的河滩上，有古傅尔丹城遗址，我认为该城是渤海时兴建的。渤海以后，这一带发生过高丽同女真（已在中国建立金朝）之间的冲突；他们都留下了屯兵遗址，而且都在绥芬河畔。河对岸（右岸）有一个山顶阵地，周围环有土墙（洛巴金和格利麦尔先两先生都作过报道）；这是公元十二世纪初高丽人抵御女真人的最前哨。”И. 卡法罗夫补充道：“这里的中国人称这座山为城子山。山上石弹丸俯拾即是，重量从数俄磅^①至数普特。高丽人早已知道使用抛石机。”高丽人无法抵御女真人，只好撤除现今琿春以北的全部堡垒。南乌苏里边疆区随即陷于入主中国的女真朝廷金朝政权之下。按卡法罗夫的见解，“女真人居住地”遗址是“一座巨大的古城”，其位置恰在被推断为渤海的傅尔丹城的所在地附近，在绥芬河左岸。“这里可以找到大量的钱币，上面铸有曾被女真人俘虏并拘禁在满洲腹地的那个宋朝君主的年号，据此可以推测古代的五国城就在附近……。我有根据断定，史书中的双城即系现今的双城（尼科尔斯克村附近的城和居住遗址），意即两城。”

在蒙古人统治中国和满洲时期，“投靠蒙古人的高丽移民曾在

^① 1 俄磅=409.51 克。——译者

这里居住。我认为绥芬河两岸的耕地遗迹应属这一时期。这里的确可以见到许多高丽古钱，还挖掘出一件高丽铍。我还认为蛮子的名称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满洲，蒙古人称南面的中国人为蛮子；在中国本土以外，中国人一般也都被称为蛮子。忽必烈侵犯日本失利后，对日本人怀着畏惧心理，曾派遣几支屯田军队进驻高丽和满洲，以提防日本人入侵。这些屯田军队在中国、朝鲜的史书中被称为蛮军，意即由蛮子编成的军队。”

除尼科尔斯克外，卡法罗夫还到过其它地方，进行新的考察，包括民族学和考古学两方面的考察。П. 卡法罗夫早在 1870 年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时，便在东达斯(Дундас)湾发现了一处沿海城堡遗迹。

1871 年，卡法罗夫访问了奥利加湾的诺夫哥罗德哨所（在这里认识了鞑子），调查了纳霍德卡湾，参观了滨海著名的苏昌古城（苏城）。

卡法罗夫在文献中找到了一些资料，表明苏城是唐代（即女真人的）沃沮的居住地^②。

除中世纪遗存外，卡法罗夫还特别注意寻找“先渤海时期”的遗存，包括石器。

但是，卡法罗夫设想将这种以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综合研究为基础来查明南乌苏里边疆区古代史的浩大工作进行到底，未能如愿以偿。他从海道返回彼得堡后，便逝世了，他所搜集的大量资料，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的编年史和历史著作，都逸失一空。他自己的日记（或称《纪行》）也不知去向，仅在帕诺夫、勃腊伊洛夫斯基和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的著作中留下了几条简短的摘录。

继 П. 卡法罗夫的工作之后，滨海考古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事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参见《辽海丛书》所载曹廷杰：《西伯利亚偏纪要》，第 6 页。——译者

件、是 M. И. 扬科夫斯基发现并研究了具有石器时代工具的贝丘遗址(这也是 П. 卡法罗夫极感兴趣的滨海远古文化遗迹)。M. И. 扬科夫斯基是个有干劲有学问的人,他头一个抱着科学研究的目
的,在滨海发掘了贝丘遗址。

扬科夫斯基在有关 1880 年发掘的贝丘遗址及其出土物的简报中,不仅非常清楚地描述了这些发现物,而且就阿穆尔湾岸上贝丘遗址的居民生活方式,提出了宝贵的见解。他最先提出了一系列总括性的问题,如贝丘时代的经济形态、居址的性质、贝丘文化的年代,以及它同其它地区的文化的关系。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摆在考古学家面前。

按他的观点,滨海贝丘遗址同丹麦炊爨遗迹外表上的相似性,特别明显地反映了原始文化规律的一致性。处在原始阶段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不管相距多么遥远,“不管是太平洋还是大西洋,文化发展的同一水平必定会产生相同的习惯,形成相同的生活方式”。

阿穆尔湾的贝丘遗址自 M. И. 扬科夫斯基开始研究后,迅即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1882 年,著名的动物学家、考古学家 И. С. 波利亚科夫到了滨海。

通过对贝丘遗址的考察并同中世纪的文化遗迹相比较,他得出结论说,南乌苏里边疆区过去曾有几个大居址,其居民处于“文化发展的低级阶段”。他们是一个在大陆上早已灭绝的原始“部落,无论哪个编年史(诸如中国编年史)都没有记载,但却在贝丘之间留下了生活遗迹,包括骨骼和工具”。“中国人和满洲人在这里的影响,城寨的遗迹,只是该地区历史上的最后一页。”

但是,无论在萨哈林岛,还是在滨海,石器时代的遗迹总是同现代动物的骨骼,而不是同古生动物的骨骼共存。只有萨哈林岛石器时代居址的野猪骨是一个例外,这种动物现在在岛上已完全绝迹。同时,И. С. 波利亚科夫看到,他在远东古代居址所发现的

骨制品同萨哈林岛土人(基里亚克人和阿依努人)的工具具有许多相同点。

И. С. 波利亚科夫认为, 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广阔天地需要作具有重大价值的进一步研究”¹。

八十年代发生了远东研究史上的一桩重要事件, 它对滨海的考古研究具有重大意义。1884年, 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科学研究中心——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滨海的大行家Ф. Ф. 布谢当选为协会主席, 他对该地区的研究和农垦事业做了许多工作。

布谢不仅自己致力于该地区的历史与考古研究, 同时还能在协会周围团结一批有志于研究滨海古代遗存的人。因此, 在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的活动中, 考古工作立刻居于显著地位, 而且具有非偶然的、系统的性质。

当时的工作内容已包括对各种类型的古代墓地和居址的田野研究和科学发掘, 而且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1885年, Ф. Ф. 布谢发掘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小土岗。

第一个发掘对象是置有乌龟石雕的土岗。协会给考古委员会的报告说: “在(尼科尔斯克)村子范围内的建筑工地附近, 发现一座用粗粒花岗岩凿成的乌龟石雕, 它的体积很大, 重约六百普特, 放在一座显然是人工堆成的、坡度平缓的小土岗上。这个地方不久就要铲平。(乌龟)背甲上有一个四边形的槽沟, 根据中国的同类遗存可以推断, 这大概是承受有铭石碑的槽沟。在这种情况下, 布谢先生把石龟移至花园, 为此掘了一道沟, 沟道的开头部分向上高起, 以便把雪橇拉到石龟脚下。掘沟的过程和发现物的位置都

1 И. С. 波利亚科夫: 《库页岛、南乌苏里边疆区和日本考察报告》, 载《科学院院报》, 第XVIII卷, 第6期, 圣彼得堡, 1884年, 第16、18—20页。

作了详细记录,不过很少有价值的资料,只发现一些砖块、瓦片、陶制的屋簷装饰(其中一件是龙的塑象)和几块带植物浮雕的瓦当。留下来的沟壁部分由于泥土冻结,当时无法发掘。为了防止失窃,发掘将在本年夏季结束。此外,还有几个情况相同的土岗,所以也准备进行调查。古城已移交步兵旅和炮兵连经管,城内的许多古物都在挖掘营房地基时就被毁掉了。不过这座古城现在也还有许多住所遗迹,有的住所非常宽敞。²¹

同年,1885年,布谢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B. II. 马尔加里托夫在锡迭米河河口附近,开始对过去M. И. 扬科夫斯基和И. С. 波利亚科夫研究过的贝丘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他的发掘提供了很能说明问题的大量资料,都有文字记录,随后于1887年由马尔加里托夫在其专著中发表。这是阐述滨海古代遗存的头一部著作²。

次年,即1886年,Ф. Ф. 布谢同Г. Д. 马尔科夫在苏昌河河谷研究了两座古冢。

1887年,布谢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地区,特别是在勒富河、刀毕河和乌拉河的河谷,研究了古代遗存。1888年,他在协会里作了研究报告(随即载入学会第一卷会刊)。Ф. Ф. 布谢不仅叙述了他所掌握的事实,而且根据当时的考古资料和比丘林、卡法罗夫及地方上的几个中国学家所介绍的中国史料,头一次试图将滨海历史分成几个大的阶段。

按他的结论,滨海古代史的第一个阶段是南乌苏里边疆区的“原始人”时期,即该地区的“远古土著人”时期。布谢认为,奥西诺夫卡河畔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村附近、勒富河畔伊凡诺夫卡村附

1 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列宁格勒),考古学委员会档案,第50号,1887年。

2 阿穆尔湾海岸锡迭米河河口附近的炊爨遗迹,载《海参崴》报,1885年,第12期。

近和乌苏里江支流霍拉河左岸等地由地穴式的住所组成的遗址，以及同一个伊凡诺夫卡村附近的几处洞穴，都是滨海的这些原始居民的活动遗迹。

根据中国史料，布谢在中古史中划出两个鼎盛时期。¹第一个时期从公元668年^①出现渤海王国开始，当时在滨海，即在古代挹娄的地域内存在过城邑（如现今的尼科尔斯克有傅尔丹城），发展着高度的文化。然后，在金代，出现了新的文化高峰，这时头一次使用了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汉文。当时这里还仿照中国的形式，建立了国家机构。由于成吉思汗蒙古国家的兴起，这个地区遭到了破坏。彻底的毁灭则是在满清朝廷统治中国时期。这种荒芜状态历时二百四十六年，即一直延续到俄国人来到南乌苏里边疆区之前。²

1893年，Ф. Ф. 布谢和B. П. 马尔加里托夫在滨海不少地区进行了发掘，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新土地的开垦和建筑工程的展开，使珍贵的考古遗存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经过两个月的发掘，获得了很有价值的成果。

在尼科尔斯克村及其附近，发掘了两座土岗，岗顶上都有乌龟雕像。头一座土岗上有一石碑，碑上刻有纪念完颜郡王的铭文，“发掘时根本没有见到陵墓”，却发现了碑亭的瓦片。

第二座土岗位于林德戈利姆磨坊的院子里。“最初发现的是猪骨、禽骨和一具马或骡的完整骨架；往下则见狗骨；最后发现一处石砌坟墓，长约七英尺半，高三英尺半（均系外沿尺寸），盖已碎裂。墓内填满泥土；出土有人骨人牙（有火烧痕迹）、几件铁镞和某

1 B. П. 马尔加里托夫：《阿穆尔湾海岸锡迭米河河口附近的炊爨遗迹》，阿穆尔边疆区学会出版，1887年。

2 Ф. Ф. 布谢：《勒富河、刀毕河和乌拉河河谷的古代遗迹》，载《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学会通报》，第1卷，海参崴，1888年，第44—98页。

① 渤海高王祚荣元年为698年，见《旧唐书·渤海传》。——译者

种谷物。Φ. 布谢认为, 该墓曾被挖掘, 因为在土岗的地表下发现一根带有螺纹和螺帽的管子, 无疑是现代物件。在上述头一座土岗北面还有六座小土岗, 我们便又选择了两座进行发掘。其中一座出有铁钉和一具木棺。棺板没有钉合。棺内发现炭和烧剩的骨殖(与泥土相混); 另有陶罐两件, 其一完整, 内盛块状物, 另一件已破碎。²¹

此外, 在苏凡河右岸菲克的农场上也发掘了几座岗丘。其中一部分是墓冢, 但看来曾被严重盗掘, 因为墓内仅发现混乱的人骨。另两座则出有古代住所的遗迹。

“这里出有: 钵一件, 系朝鲜结构; 钵一件; 陶质小圆柱体数件, 中国人称之为网坠; 另有几件小型器物。进一步的发掘表明, 这是一所住人的房子, 内有三个相连的取暖‘火炕’。另一座土岗出土石臼一件、碎碗片一块、钱币一枚、各种铁器数件(锤、凿等)、炉灶一座、铁渣若干。”

在蒙古街河谷也有几座古代土岗, 其中一座已发掘。干沟子湾的发掘结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这里在舍维列夫的土地上, 即在克拉斯内伊崖限, 发现了“古城”遗迹。

1893年, 还在苏昌发掘了中世纪的遗存, 从而发现了几座古代墓葬。同年, 在勒富河河谷伊凡诺夫卡村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面貌的古代遗存——“原先的地穴式住所遗迹”。布谢发掘了三个椭圆形大穴(中央深约一俄丈)和几排排列整齐的小圆穴(径长约二俄丈, 中央深约一英尺)。二者无疑都是住所。发掘大穴时, 在三英尺半深处发现灶址一处、石矛头、刮削器各数件、木炭若干; 上部则散见有陶片。也出有烧透的骨骼。小穴中表土层下即见木炭, 往下则有陶片, 二英尺半深处还有烧火遗迹; 三块承碗的石头, 其间有木炭。这里还发现许多破陶罐, 看来是压碎的, 罐内盛有谷

1 <远东>, 1893年, 第93期。

物……。这个地区还有两个洞穴，其中一个只出有黑曜石片。另一个则是未曾有人居住的自然洞穴。

1889年，著名的俄国旅行家 A. B. 叶利谢耶夫医生到了滨海，他是陪同农垦移民到远东来的。在边疆的旅行中，他调查了许多地方的考古遗存，进行了一系列极有意义的考察。

叶利谢耶夫在卡缅-雷鲍洛夫附近发现了一件陶纺轮和几件燧石器，后者酷似“圣阿舍利型的石刀”（显然不是石刀，而是阿舍利型手斧）¹。他认为奥西诺夫卡河畔的地穴式住所也是属于石器时代的。叶利谢耶夫发掘了一个“奥西诺夫卡类型”的地穴式住所，发现了“无疑是古代火堆的遗迹”。至于青铜时代，据他说，在南乌苏里边疆区没有任何痕迹。当地的部族直接跨入了铁器时代。

1895年，H. 阿里夫坦调查了乌苏里江及其支流比金河的谷地。在这里他观察并记录了 P. 马克作过简要报道的岩画²。

1908年，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对该会多年来组织的考察和发掘进行了总结。这些工作的资料由 Л. А. 克罗波特金编入《阿穆尔边疆区的古代遗存》一书，这本著作采用了 Ф. Ф. 布谢关于勒富河、刀毕河和乌拉河河谷古代遗存的一篇论文的资料。该书出版时 Ф. Ф. 布谢已死了一年，但 Л. А. 克罗波特金仍然把他列为作者。书中收集了远东全境考古遗存的资料，包括下述地区：1. 从图们江口至绥芬河口；2. 绥芬河河谷；3. 从绥芬河口至苏昌河；4. 从苏昌河至捷丘贺河；5. 兴凯湖地区；6. 刀毕河流域；7. 乌

1 A. B. 叶利谢耶夫：《远东纪行》，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XXXVI 卷，1890 年，第 361—364 页。

2 H. 阿里夫坦：《记乌苏里江和比金河沿岸的岩画》，载《阿穆尔地区通报》，哈巴罗夫斯克，1895 年，第 66 期。

H. 阿里夫坦：《记乌苏里江和比金河沿岸的岩画》，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地区分会著作集》，第 II 卷，哈巴罗夫斯克，1895 年。

H. 阿里夫坦：《东西伯利亚步兵第二旅五个狩猎队踏察乌苏里边疆区概况》，载《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地区分会著作集》，第 II 卷，哈巴罗夫斯克，1895 年。

拉河流域;8. 乌苏里江流域;9. 阿穆尔河流域;10. 萨哈林岛。

滨海遗存共九十六项,乌苏里江流域的古城、地穴式住所遗址、土堆和岩画的发现地共二十三处。

Л. А. 克罗波特金的综合性论著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书中附有滨海南部和西南部的头一幅考古地图,图中按照正文开列和描述的次序,标明了九十六处遗存。

为了充分评价这部著作的意义,必须注意到,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尔后几十年内,俄国亚洲部分的其它地区,没有一个有过类似的古迹汇编和考古地图。

二十世纪初,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开始了方志学活动。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旅行中总是兴致勃勃地关心乌苏里边疆区和滨海的早期历史遗存,以及传说和故事。在阿尔谢尼耶夫没有发表的日记中,载有古城和其它考古遗存的地形资料。

阿尔谢尼耶夫继承着洛巴金、布谢和克罗波特金开始的远东古迹古物的登记工作,据他说,他著录了二百二十八项遗存。

这些遗存基本上都是令人瞩目的中世纪遗迹,有古城、城堡,以及古代金属制品、钱币和陶器的零星发现地。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在一些古代城堡内也作过几次规模不大的发掘。

在乌苏里边疆区的旅行中,В. К. 阿尔谢尼耶夫还不止一次地看见过石器时代的遗迹。

1921年,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拨款一百卢布,以发掘康拉德的农场附近的居址,并委派В. К. 阿尔谢尼耶夫主持工作。1921年10月,阿尔谢尼耶夫带着四名助手,来到沙磧半岛。

通过对发掘地点的观察,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古代居址,由十六个含有贝壳堆的地穴组成。居址被一道大沟所破坏,农场的主人们曾亲眼看到沟壑迅速扩大,毁掉古代地穴的遗迹。В. К. 阿

尔谢尼耶夫以一英寸:七十五俄丈的比例,绘制了大沟和发掘地点的平面图,然后采集资料,并在三个地穴的范围内开掘探坑。其中A、B两穴的探坑出土大量贝壳、哺乳动物和禽类及鱼类的骨骼、陶片和残石器。发现一件几乎完整的陶罐,“可惜在取出时打碎了”;还有一件陶油灯,长柄已折损,据阿尔谢尼耶夫所说,器形类似朝鲜北部的古代油灯。B. K. 阿尔谢尼耶夫在发掘报告中指出,沙磧半岛的出土资料同马尔加里托夫、扬科夫斯基在锡迭米河河口附近发现的相似,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¹

B. K. 阿尔谢尼耶夫还发表了三篇著作,提出了滨海远古史上的若干总括性问题。在《东西伯利亚的冰川时期与原始居民》一篇中,他试图从冰川时期末开始,勾划出欧亚大陆历史的大致轮廓。²

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第二篇著作论述了滨海的远古历史。这一篇的标题是《乌苏里边疆区上古史研究资料》。³它特别注意到H. 阿里夫坦根据狩猎队员的记录(他们在1894年调查了乌苏里江右岸支流伊曼河和比金河)于1895年首次发表的当地古代传说。传说里讲的是大约五百年前苏昌统治者宽永王的故事。^④

B. K. 阿尔谢尼耶夫认为,传说里讲的事件在滨海的古代遗存中应能找到印证。他说,宽永的侄子居住过的双城子是确有其地的。这就是现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地方的“双城”。

1 B. K. 阿尔谢尼耶夫:《1921年B. K. 阿尔谢尼耶夫在沙磧半岛的考古发掘》,手稿藏《地理学会滨海分会档案》,第1—16页;又见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列宁格勒)。

2 B. K. 阿尔谢尼耶夫:《东西伯利亚的冰川时期与原始居民》,载《阿尔谢尼耶夫全集》,第V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48年,第113—136页。

3 B. K.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边疆区上古史研究资料》,载《阿尔谢尼耶夫全集》,第IV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47年,第271—312页。

④ 关于宽永王的记载,参见《辽海丛书》所载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第22页。——译者。

B. K. 阿尔谢尼耶夫的第三篇著作篇幅不大，专门总结滨海古代遗存的研究工作，这是他在俄国东方学家协会一次公开会议（1916年7月，哈尔滨）上所作报告的复述。他简短地评述了从滨海远古史开始到努尔哈赤征渥集地域为止的滨海考古遗存研究工作。他在报告中把乌苏里边疆区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

他写道：“乌苏里边疆区的历史包括六个时期：

1. 原始人时代——石器时代；
2. 文明的满洲诸部落同本地的古代居民在公元七世纪以前的斗争；
3. 八—十二世纪的渤海王国；
4. 1386年以前的金帝国；
5. 十九世纪以前的荒芜时期；
6. 中国庶民（蛮子）的生活与俄国人的最初出现。”

按阿尔谢尼耶夫的说法，滨海根本没有青铜时代。石器之后接着就出现了铁器，但二者长期并用，直到荒芜时期。

石器不是按照制作的特征，而是根据其共存遗物来断代的。

接着，作者扼要地描述了滨海的考古遗存：1. 贝丘及其附近的地穴（住所遗迹）；2. 山地用石块铺砌的小穴和地穴；3. 阶地形的城堡，可能是属于十二—十三世纪古代土著居民同满洲人斗争时期的古城；4. 山岗上或河谷内修建的城堡，可能也应断为十二—十三世纪；5. 古井；6. 古耕地；7. 古道；8. 长土墙，显然是作边界用的；9. 古矿场；10. 岩画，他提到了四处（阿穆尔河畔二处，乌苏里江畔一处，还有一处是奥耳加湾附近马克鲁申诺洞旁边的铭刻）。¹

1913—1916年地方实科中学的教师 A. 3. 费多罗夫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及其周围进行了考古调查。他在克拉斯诺亚罗

1 B. K. 阿尔谢尼耶夫：《乌苏里边疆区与满洲的古代遗存》，载《阿尔谢尼耶夫全集》，第IV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47年，第313—318页。

夫山参观时(那时山上有一座砖厂),便注意到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的古代遗存。

费多罗夫说,他一走上山岗,就突然看到了一座筑在山上的大古城。这正是过去不少研究者曾经提到的,特别是Л. А. 克罗波特金描述得尤其细致的那座古城。

费多罗夫写道:“这突然展现在我面前的图画,使我顿时为之惊叹。山脚下左面,绥芬河银光闪闪,慢慢地转向南方流去。右面,人工垒筑的土墙沿着广阔溪谷的斜坡蜿蜒伸展。它以粗壮的线条勾划出古城的轮廓,完全依着地形的起伏环绕着山坡。这土墙有三重:第一重在山脚下,第二重几乎横贯山坡中央,第三重又略靠上方。”

费多罗夫说,这一幅壮丽的景色,使他头一次感到,那普遍流行的一种想法,认为南乌苏里边疆区从来没有被文化触动过,而一直是一片森林僻壤,是多么不真实呀。不久,费多罗夫遇见了B. K. 阿尔谢尼耶夫,参加了他所组织的哈巴罗夫斯克^①郊区的考古参观。

他从哈巴罗夫斯克回来后,阅读了布谢和克罗波特金关于阿穆尔边疆区古代遗存的文章,从而对该区的考古研究有了明确的方向:致力于调查和保护面临着破坏危险的滨海古代遗存,即远东考古研究史上著名的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古迹。费多罗夫吸收师范学校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参加工作。他还促使军事机关的人员对这件事也发生了兴趣,在这个机关的辖区内有着极古老极重要的考古遗存。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地理学会南乌苏里边疆区分会的支持下,费多罗夫研究、描述并测绘了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城地区的古代城堡建筑。他在城内和郊区收集了各种考古资料,最后,对古城进行了系统的科学发掘。1916年,费多罗夫在驻

^① 即伯力。——译者

防军花园附近的广场上进行发掘，发现了古代建筑里用一种富有特征性的砖块（呈深灰色或“蓝色”，质地坚实）镶砌墙面的遗迹，以及瓦房顶的残余。建筑物只留下房基，屋内清晰地保存着炕的烟道。发掘表明，这里至少有两个文化层，显然是属于古城历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晚期，可以根据中国钱币来断代。钱币共发现三十五枚，其中十四枚是在发掘地上发现的。大部分钱币属于九—十二世纪，当时古城正处于繁盛时期。还有一些纹饰精致的薄瓷片看来也应归属这一时期。但是也有比较早的唐代钱币，显然是下层的出土物，共三枚。A. 3. 费多罗夫的发掘进行得非常仔细。他绘制了房基的平面图和探沟壁的剖面图，探沟里取出的泥土都过了筛，以便不致遗漏哪怕是最小的物件。

在 A. B. 格列宾希科夫的主编下，1916 年费多罗夫在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城出版了《关于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城及其近郊的古代遗存》的小册子，这是滨海考古学上的一件大事。这本册子的开头是一段概述历史的导言，然后详细地描述了该城内外所有古城的遗迹，以及古道和当作碑座的乌龟石雕。附在小册子里的考古地图标明了全部最重要的古代遗存。这幅地图使我们能够了解到目前已经消失在迅速扩大的城市新建筑之下的各种古迹，它是滨海境内这个最重要的古代政治文化中心唯一的考古地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A. И. 拉津以充沛的精力和巨大的热情，调查并发掘了贝丘遗址，从而在远古史的研究工作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拉津按其专业是个动物学家，但他成功地把单纯的考古学研究同生物学研究结合起来，为了解滨海远古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方式做了大量工作。

拉津根据他亲自发现的古代贝丘断定，同阿穆尔湾地区一样，乌苏里湾沿岸也广泛地分布着这类遗存。

A. И. 拉津在总结调查和发掘结果时，详细地描述了他所获得

的丰富资料：陶器、石器、骨器以及动物遗骸——海洋软体动物的甲壳、鱼骨和哺乳动物的骨骼。他发展了扬科夫斯基和马尔加里托夫的观点，对贝丘遗址居民的文化和生活作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总括性结论。

拉津的著作清楚地说明，无论阿穆尔湾还是乌苏里湾沿岸，贝丘遗址的居民都有统一的文化。

继A. И. 拉津之后，还有一些人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的贝丘遗址作过研究，其中之一是Л. Н. 伊凡尼耶夫，他特别注意巴萨尔金半岛的贝丘。

除考古研究本身以外，必须特别提到东方学家和中国学家（尤其是远东地方上的这类学者）的工作，他们继比丘林、卡法罗夫、瓦西利耶夫之后，根据中国的文字史料，并部分地根据朝鲜、日本和满洲的文字史料，研究了滨海的历史。这就是ДМ. 波兹德涅耶夫、M. Г. 舍维列夫、H. B. 克尤涅尔、A. B. 格列宾希科夫、З. М. 马特维耶夫和B. A. 帕诺夫的著作。

波兹德涅耶夫收集并摘要发表了日本各种史书中有关滨海和满洲诸民族的资料，包括肃慎、挹娄、沃沮、靺鞨、渤海和女真的资料。这些资料基本上引自中国史书；但也有一部分是日本人自己撰写的，因而有其独到之处¹。不过波兹德涅耶夫往往指出日本史书的这类资料在年代上的错误，即延长使用东亚部落名称的年代。例如他写道，肃慎的名称在日本历史中一直存在到公元七世纪。

B. A. 帕诺夫也收集并发表了有关日本奈良时代的统治者同渤海发生联系的有趣资料。² И. 卡法罗夫曾写道，他掌握有关于日本天皇同渤海人书信往来的材料，大概也是指这种资料。

1 ДМ. 波兹德涅耶夫：《日本北部的历史及其同亚洲大陆、俄国之关系的研究资料》，第2卷，第1册，同满洲诸民族的关系及松前部族史资料，东京，1909年。

2 B. A. 帕诺夫：《日本与渤海王国交往的文书》，载《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1912年，第2、4、8、9、11期。

对于研究滨海古代史与中古史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满人历史与文化的著名研究者 A. B. 格列宾希科夫的著作。

A. B. 格列宾希科夫非常熟悉东方的史料，早在 1912 年 1 月 10 日在东方研究所里所作的导论性讲演中，他就阐述了满洲及其邻近的我国远东各地区的历史概况。

讲演的第二部分专门论述这个地区的考古学。他大致评论了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最重要的考古工作，论述了考古遗存的主要类型及其分布状况。

作为这一著作的续篇，十年以后，A. B. 格列宾希科夫发表了关于南乌苏里边疆区和满洲出土古钱的专题论著。这部著作头一次尽量完整地将发现的古钱作为极重要的滨海中古史研究资料加以登记、鉴别和运用。他的论著的基础是 A. 3. 费多罗夫在发掘中收集的钱币。

1915 年，A. B. 格列宾希科夫在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博物馆建馆二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宣读了《关于阿穆尔边疆区历史的考古学研究》的报告，他以中国史料为依据，更加详细地从头论述了滨海及阿穆尔河沿岸诸民族的历史，分别谈到了各个部落的行政区划和分布状况。

在这次庆祝会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社会活动家和最老的居民之一、东方学家 B. A. 帕诺夫也发了言。他坚决地愤激地谴责了殖民国家中的种族主义倾向：“那些从他们自己的国家来到殖民地的统治阶级分子总是企图把肤色区分作为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人为的准则。”

帕诺夫呼吁社会舆论起来革除这种“有害的、残忍的余孽”，并指出了历史科学在这一事业中的特殊作用。他说，历史研究应当为一个总目标服务，即扩大“外来居民”的眼界，“增进对部族的了解并发扬人道精神”。B. A. 帕诺夫谈到远东历史时特别提到“在

上千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中，中国在这里不断开展的大量文化工作……。中国在中亚的这种上千年的历史使命，使人们对这个民族——过去的文明播种者产生深厚的敬意。”

布谢、阿尔谢尼耶夫、费多罗夫和帕诺夫的著作，以及后来诸如3. H. 马特维耶夫的《渤海》、《远东地区的历史》(概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具体体现了这些观点。马特维耶夫的第一部著作收集了关于渤海文化和历史材料，是有关这方面资料最完整的汇编。他的第二篇论文以先前的全部文献为基础，综述了自远古以来的远东历史。

由此可见，滨海远古史的研究同邻近的阿穆尔河沿岸一样，有着长期的、有趣的历史。这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着重要的成就和传统。这些成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中古时代的研究上，研究者们除了根据考古材料外，还以文字史料，主要是中国的史料为依据，从而在他们的论著中描绘了相当丰富而复杂的滨海历史情景。

然而，研究者们收集的有关滨海早期历史材料，多数都象无用的货物一样堆在博物馆里或完全佚失了。П. 卡法罗夫的珍贵手稿也遭到了这样的命运。B. K. 阿尔谢尼耶夫关于滨海古代遗存的综论性手稿也不可理解地不知去向了。Ф. Ф. 布谢的资料档案(当时的人誉之为样板)同样下落不明。

至于那些已经发表的材料和论著，虽然也能使人了解滨海早期历史的一般情景，但毕竟有着令人遗憾的巨大空白。例如中世纪以前的遗存，直到不久以前只知道阿穆尔湾和乌苏里湾沿岸的贝丘，而且就连这些遗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贝丘文化的年代以及同邻近各地古代文化的关系都没有确切查明。

不仅如此，“贝丘时代”以前的全部历史也是混沌模糊的。甚至不知道这里是否存在过其它更为古老的文化。

在中古时代的研究领域中也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还需要做

很多工作。这首先是关于远东中世纪的国家组织和文化的出现问题，特别是这里的头一个国家组织——渤海王国产生的前提和主要条件，关于当地居民和中国、朝鲜进步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关于渤海人的社会结构的性质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文字史料还是考古资料都必需给予进一步研究。然而，那些专门叙述渤海史的中国历史著作没有译成俄文，而滨海境内渤海时期的遗迹过去又一直没有能够从中世纪的全部考古遗存中准确地区分出来。

至于女真人，目前了解得比较清楚的仅仅是根据中国钱币和女真钱币来断代的个别女真时代遗存。但即使这些为数不多的女真历史遗存也研究得过于肤浅，因而无法比较深刻而完整地了解当时的滨海，以及它同邻近各国首先是同中国、朝鲜和蒙古的关系。

关于随后一个时期，即从金帝国的覆灭开始至俄国人来到滨海为止，则几乎一无所知。

当然，必需有几十年坚忍不拔的精神进行系统研究，才能填补这些空白。

朝着这一方向而迈出最初几步的，是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远东考古队的工作，它从1953年开始研究滨海的古代遗存。

1953年，考古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调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区、兴凯湖地区、麦河河口、乌苏里斯克城、奥西诺夫卡村和伊凡诺夫卡村地区、格拉德卡亚河河谷、捷丘贺河河口和其它地区。

与地质学家合作，调查了分布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与朝鲜海岸之间的一系列岛屿，包括富鲁格利姆岛。

1954年，除了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从斯列谦斯克到布拉戈维申斯克^①）以及萨哈林岛开展工作外，还在格拉德卡亚河河口

^① 即海兰泡。——译者

和乌苏里斯克城地区进行了发掘。

1955年，在奥西诺夫卡村、捷丘贺河河口和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的古城进行了发掘；并对一系列其它地区作了调查，包括苏昌河沿岸。在萨哈林岛也开展了发掘与调查工作。

1956—1957年，继续在克拉斯诺亚罗夫山、格拉德卡亚河沿岸进行发掘，并开始在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先基纳帽以及沙磧半岛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在兴凯湖附近、济木河沿岸、哈桑地区和乌苏里斯克城附近的夹皮沟河河谷开展了调查工作，从而新发现了一些对滨海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遗存。萨哈林岛上的工作照旧继续进行。

上述工作的成果一部分已反映在有关苏联历史与考古的综合性著作和科学普及读物中，如《苏联历史纲要》、《古代文化探踪》集刊、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的《世界民族志》丛书、A. Л. 蒙盖特的《苏联考古学》、《世界通史》(第一卷)和不少论文。¹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1953年滨海的考古研究》，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第8期，1955年，第3—12页。

Г. С. 加涅申、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关于滨海的若干考古遗存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意义》，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质与矿物资料》，《全苏地质学会资料》，新辑，地质与化石，第1期，莫斯科，1956年，第50—57页。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远东的考古学研究——在史学部会议上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上关于1953年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报告提纲》，莫斯科，1954年。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1954年在远东的考古工作——在苏联科学院史学部会议、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和民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总结1954年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工作的报告提纲》，莫斯科，1955年。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1955年在安加拉河河谷和远东的考古学研究——在史学部会议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上总结1955年考古学研究的报告提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B. E. 拉里切夫：《滨海的古代文化遗存》，载《苏维埃滨海》，第17期，1954年。

B. B. 托马舍夫斯基：《探索遥远的过去——一个考古学家的笔记》，载《远东》，第4期，1956年。

H. H. 扎别林娜：《远东考古队在乌苏里斯克市内的发掘(1954年)》，载《苏维埃滨海》，第19期，1955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积极参加了考古队的工作，并在不久前设立了专门的历史、民族学与考古学部。

研究滨海的地质学家们现在比过去更多地注意到考古遗存。Г. С. 加涅申及其助手的著作，以及 В. Ф. 彼特隆关于滨海南部沿河台地的年代(日本海沿岸出土的石器)的论文，都是例子。很明显，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这种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Н. В. 克尤涅尔继比丘林之后搜集并发表了有关远东诸民族的中国资料；我国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 Л. Я. 施坦恩别尔格、Н. Н. 切鲍克萨罗夫、С. В. 伊凡诺夫、Г. Ф. 捷别茨、М. Г. 列文等等发表了关于远东诸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论著，所有这些著作对于充实滨海的古代史和中古史也都是极其重要的。

必须特别提到 Л. Н. 伊凡尼耶夫编辑并于 1953 年出版的最完整的苏联远东考古文献汇编(1750—1950年)。这个汇编大大减轻了滨海考古学研究人员的工作。

最近我们看到了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如 А. Г. 马利亚夫金的书即载有中文本《金史》的节译。远东历史的研究者们还拥有满文版《金史》的全部译文(北京布道团的学生 Г. 罗左夫译)。这部译文由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手稿库收藏，直到现在在文献中还没有被采用过。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们已有可能填补某些重大的空白，比以前更清楚地了解滨海的过去，一直追溯到人类最初人居滨海的历史。

第二章 人类的早期遗迹

原始人的历史完全属于地球史上最后一个地质年代即第四纪的历史范畴，它以这一时代地球在气候、动物界、植物界方面以及地貌本身(地壳的形状、大陆和海洋的轮廓)的巨大变化为背景而向前发展。

最古的原始人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经历了严寒时代(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现代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地域)的初期。他们的后代，即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人类，则完全已生活在冰川时期的条件下。

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地中海到海拉尔和鄂尔多斯，人们以猎取野牛、野马、驯鹿、猛犸和西伯利亚披毛犀为生活基础，辅之以采集。在有蹄类动物季节性转移的主要通道和它们泅渡河流的地方，狩猎是最顺利的，因而在那里就出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长期居住的冬季遗址，一种特殊的狩猎营地。这是由不少坚固的住所组成的真正的村落。人们为了建筑住所，往往挖掘不大的坑穴，然后在周围竖起猛犸的腿骨和长牙，以支撑木房架。屋顶也是以木料作基架，再用驯鹿角构成轻巧的网覆盖其上。整个住所结构和外观上都酷似十七——十八世纪定居的楚克奇人和爱斯基摩人适于北极条件的冬季住所。

当时的衣著，根据布列齐旧石器时代住所出土的妇女雕像判断，其式样也与现代爱斯基摩人和楚克奇人的冬衣相似。这是一种“不透气的”衣服，带有风帽，不开前襟，穿时从头上套下。这种衣服很能抵御北极冻土带的狂风。

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极狩猎人的这种古代文化同楚克奇人、爱斯基摩人的现代民族学文化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前者形成了在意境上与后者的艺术相似的、以写实为基础的丰富艺术。那些逼真的动物造像和往往表现裸体妇女的人形雕像，便是这种艺术的典型作品。

在这远古的时代，当欧亚冰川沿岸各地存在北极狩猎文化的时候，在亚洲现今戈壁沙漠以南和以东的各个地区，在我国远东，在日本海沿岸，情况又怎样呢？

不言而喻，远东居民的文化从远古开始就与西伯利亚和欧洲的文化不同，它是沿着某种独特的道路发展过来的。可是究竟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具有哪些特点呢？自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需在远东发现远古人类的居址。

然而在一段漫长的时期里，尽管经过极其仔细寻找，除已经含有磨制石器的人类遗迹之外，在滨海境内再没有发现更早的东西。

只是经过长期的努力，才终于在滨海发现古代人类的这样一些活动遗迹：它们的本身面貌及其出土条件都表明，摆在我们面前的正是滨海最古老的文化遗存。

头一个最出色的遗存是在滨海内陆部分乌苏里斯克城地区的奥西诺夫卡村附近，在流入勒富河的奥西诺夫卡溪的谷地发现的。起初，在公路路基的碎石堆里发现了一个好象硅质板岩的浅绿色小石片。如果一个不懂石器及其制作技术的人看到这个小小的、乍看起来毫不引人注目的石块，他大概看不出这块石头有什么意义，也不会把它从地上拣起来。同我们一道的地质系学生正是这样，当时他们还友好地拿“容易轻信的考古学家”开心呢！但是拣到第一块石片过后又发现了较大的一块，接着又找到更大的一块，而且这次是经过人手仔细加工的器物，过去考古学家在滨海从来没有见过，这时，就连那些学生也动摇了。这是一种类似砍砸器的

东西，不过它既特别又原始，无疑同新石器时代通常的砍伐石器，同远东常见的斧和砬有重大区别。首先，这种石器的加工技术同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根本不同，它仅仅是打制的，根本没有磨制的痕迹。它的形制近似考古学文献中描述的远古人类的石器，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所谓手斧。

相似之处首先在于，这种器物同旧石器时代早期手斧一样，用整块河卵石作成，只有粗略打击的加工痕迹，打去的石片很宽。它的整个形状也与手斧部分相似——轮廓为椭圆形。一端是锐利的刃部；另一端厚实，保留着河卵石的光滑表面，显然是把手的部分。从把的形状判断，这种器物是握在手里使用的。众所周知，在欧洲、非洲和南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印度），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正是这样使用砍砸器的，所以才定名为手斧。

但是，这种石器的细部同真正的舍利期和阿舍利期手斧却有很大区别。显然，它不仅属于另一个时代，而且属于另一个文化和民族的范畴。在这种经过古代人类加工的石头上，可以看到某种自成一体的、地方性的、非常独特的传统。

总之很清楚，研究者们已经掌握到滨海远古史上重大发现的线索。只是需要找到修路的碎石的采石场（即混有石器的碎石的开采地点）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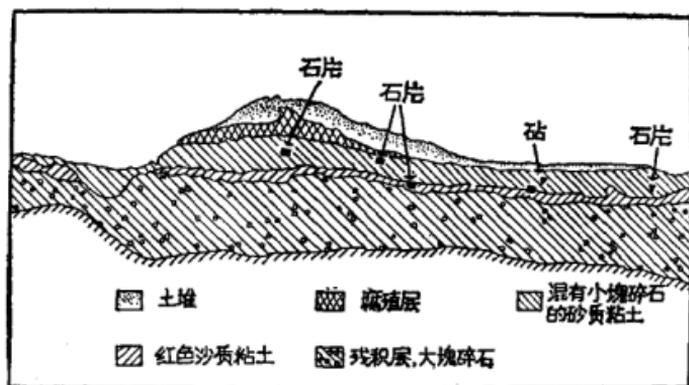
要找的采石场果然找到了。它是在奥西诺夫卡溪附近距奥西诺夫卡村一公里半的花岗岩高岗上发现的。采石场的陡壁上又露出一件砍砸器，它同第一次发现的完全相同，形制粗糙，用整块河卵石打成。在石壁脚下和采石场底部的不同部位，还发现了二十多件石制品，多数是加工石器时从河卵石上打下的石片。

发掘表明，奥西诺夫卡出土物的出色之处是它们的层位。它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最初印象，即发现的石器当是极其古老而原始的。

发掘还表明，奥西诺夫卡发现地是考古学上罕见的发现地之一，因而格外珍贵而重要，能够据以确定多层遗址诸古代文化的相对年代，因为在这种遗址中，各个文化阶段的更替顺序看得非常清楚。

在奥西诺夫卡，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在一起。上层是较薄的表土层。表土层里和紧接表土层下，埋着铁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迹。再往深处是一层浅黄灰色的砂质粘土。土层里距地表二十五——三十厘米处发现大量的新石器时代陶片和石器，包括磨制石器。在熟土的底部是一层清晰可辨的红褐色地层，它压在由于奥西诺夫卡山的花岗岩不断风化剥落而形成的残积碎石层之上。类似公路上发现的那种手斧形石器就是埋在这较薄的红褐色地层里。

由此可见，在奥西诺夫卡山的下文化层遗留下石器等活动遗迹的人们，早在山上还没有沙质粘土和现代表土层的远古时代就来到这里。他们直接居住在光秃秃的、略经风化的花岗岩上。



图三 奥西诺夫卡文化层剖面图。

但是，奥西诺夫卡山的远古居民，即下文化层的人类，究竟什么时候来到山上？这个迄今所知滨海最古老的石器时代遗存，同第四纪地球地质史上的上述时代更替有什么关系？

关于这一点，可以根据Г. С. 加涅申的考察结果来判断，他从地质学上初步解释了奥西诺夫卡出土物的地层。我们知道，奥西诺夫卡的地层代表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期即铁器时代早期的遗迹，整个属于地质学上的现代，因为它埋在表土层里和紧接表土层下。其年令不超过一千五百至二千年。

含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上层沙质粘土无疑是在温带森林地形的条件下形成的，因为只有这种地形才能产生灰化土壤。

但与下文化层出土物相关的土壤，即棕褐色或红色粘土，却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

这种粘土沉积时代的特征是自然条件适于深度风化和粘土层的形成。这是气候潮湿而相当温暖的时期。¹

根据压在奥西诺夫卡下层即红褐色地层之上的沙质粘土和碎石坡积层的特点判断，在古代人类生活时期，自然条件发生了日益深刻的变化。

在这种沉积层的形成时期，气候比较寒冷。当时在海拔约二千米的滨海高山上，当有不大的冰河；而在邻近的平原和锡霍特岭山前地带，气候日趋严寒，自然风化不断加强，从而形成了大块碎石和大石块的坡积裾。

1 Г. С. 加涅申、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关于滨海的若干考古遗存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意义》，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质与矿物资料》，《全苏地质学会资料》，新辑，地质与矿物，第1期，莫斯科，1956年，第50—57页。

随后,新石器时代的人来到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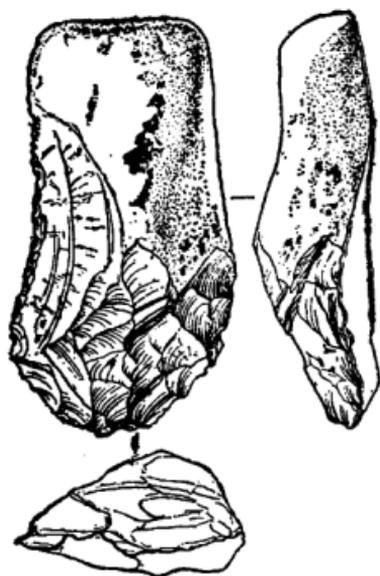
因此,奥西诺夫卡下层应当属于先冰期或间冰期;而新石器时代地层则属于后冰期,其自然环境是温带的气候和森林的地形,这种地形大概同现代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图三)。

由此可见,奥西诺夫卡出土物反映了非常古老的石器时代文化(迄今所知滨海最古老的文化),说明了这个文化的人们所具有的某些生活特征。

1955年的发掘表明,在这远古的时期,这里曾有一个古代居址。人们在居址上加工石块,制作独特的石器,我们有幸在公路上发现的即是一个标本。在发掘揭开的地面上,散布着用河卵石打制的半成品、上述形制的完整手斧,以及从河卵石坯打下的石片和薄石片。它们“一窝一窝地”分布在同一水平上。其中一“窝”出土物显然与加工石块制作石器的古代打石场遗址有关。在采石场的断壁上发现一块坚实的石英砾石,它的表面有几处初步加工痕迹。这是古代匠人的石砧,制作石器的石块就是在这块石砧上打击的。石砧的光滑表面有明显的击痕和缺口,这是由于两石碰击或由于用来加工的石块的边缘被用力地挤压在石砧上而形成的。石砧附近有人工打出的河卵石石片,稍远处则有一整窝部分加工的河卵石坯。古代匠人不知为什么在紧张劳动中突然停了下来。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现在才能够窥见滨海远古居民的日常生活,想象他们的劳动情况。

下层的另一堆发现物也可能是这种打石场或“劳动场地”的遗迹。

奥西诺夫卡下层的出土物中以大型器物最为丰富,石器形态最明显。这些器物一般用整块或劈开的河卵石制成,经过大致对称的打击。头一个典型标本就是我们在公路上拣到的并把我们将到奥西诺夫卡溪边采石场的那一件。这种器物可以分成两组。第



图四 用劈开的河卵石制成的砍砸器。
奥西诺夫卡。

一组最大,且极厚重,有的一端留有原来的光滑表面,当作一种把,便于抓握时顶在手心里;另一端总是经过仔细打击,变成锐利而宽大的、通常作椭圆弧突起的刃部(图四)。有时刃的边缘还经过第二道细工修整。这些器物的一面常比另一面突起,而且突起的一面几乎都是由布满石片疤痕的两个狭长侧面形成的。这些疤痕作平行分布,使人想起大致呈棱柱体形状的石核。同时,平整的一面又好像专为打取石片而准备的石核台面,而整个

器形便显得更象石核。

但是,如上所述,这种通体作扁桃形或椭圆形的石器,往往酷似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古老的手斧,尤其象见于东亚和东南亚并在考古学文献中称为砍砸器的那种粗陋的砍砸工具。

第二组石器大而厚重,也是用劈开的河卵石制成,特点是侧面突起一个宽大的刃部。这是粗陋的刮削器或刮削器形工具。

也有用厚大的石片制成、边缘经过修整的大型石刀和刮削器。修整的方法富于特征性,很象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刮削器和尖状器的修整法(一般认为它与莫斯特期的所谓“反向打击修整法”相似)。这些刮削器和石刀的刃部陡直而厚实,与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椭圆形刮削器的刃部相象(图五)。



图五 刮削器形工具。
奥西诺夫卡。



图六 奥西诺夫卡出土的石器：
1——尖状器；2——石核；
3——刮削器；4——短刮器。

下层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石核；只发现一件，大致呈棱柱体形状。但是有相当多石片看来可以归属于下层，它们是从真正的棱柱形石核打下来的，背面有二、三道长条的棱。这些石片及其棱部的轮廓相当规整。但同晚期的即新石器时代的棱柱形石片不同，即尺寸较大，棱角也毕竟不那么规整。

有一件典型的短刮器就是用这种石片制成的，石片的一端（即与圆突状的把手相对的一端）带有横的窄刃。下层还有一件形制非常特别的尖状器，可惜已残缺。它的一面很平整，保留着硅质板岩原来的光滑表面，仅在边缘作过修整。另一面则是从横向密密打去宽石片而弄平的（图六）。

奥西诺夫卡下层的石器大致就是这样。

起初，奥西诺夫卡居址下层是唯一这样的遗存。但同年在切尔尼戈夫卡村地区“山庄”村附近调查中世纪古城时，又在这个兴凯湖沿岸地区即乌苏里江上游发现了类似奥西诺夫卡出土物的扁桃形手斧型工具。发现地大大高出周围的低地。

1955年，在麦河河口附近也单独发现一件加工成石核形状的大砾石。

1956年有二起新发现。这回已不是偶然发现的器物，而是居址的遗迹。

其中一个居址在绥芬河河谷乌苏里斯克城范围内所谓伊利尤什金山岗的山坳。这里的文化遗迹与奥西诺夫卡不同，是从被破坏的熟土层里冲刷出来的。但其石器形制和制作技术同后者相似，显然证明这些遗迹也是非常古老的。

例如，这里发现一件精心打制的弧刃扁桃形石器，乍看起来很像阿舍利晚期形制的典型手斧。还有一件石器也是用整块河卵石打成，类似石核形砍砸器，刃厚而陡，几乎形成一个垂直面。此外，这些石器是在地势颇高的山坳发现的，这种自然条件也证明它们属于远古时代。山岗屹立在周围的地段和绥芬河谷地上，从这里可以远眺山脚下的乌苏里斯克城、绥芬河和对岸的克拉斯诺亚罗夫山。

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在伊利尤什金山上水流冲刷较少的地方，发现了同奥西诺夫卡一样的地层叠压现象：上层是黑土层；较深处是浅黄色的沙质粘土；下面也是红褐土层，直接压在严重风化的花岗岩上。古老形制的石器无疑是同这下层相关的。

1956年在穆河河口附近，即在兴凯湖边离阿斯特拉罕卡村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奥西诺夫卡类型的居住遗址。这里，在辽阔的穆河河谷，伸展着一望无垠的低洼草原，即著名的南乌苏里边

疆区草原，H. M. 普尔热瓦夫斯基曾经描述过这个百鸟王国。草原上耸起一道台地形的山坡，上面有一个供应修路石料的大采石场。同奥西诺夫卡一样，采石场的石壁上也有类似的古代人类遗迹：石片、薄石片和一块石砧。这里也发现了与奥西诺夫卡及伊利尤什金山完全相同的地层交替现象：上层是黑色腐殖土，较深处是含灰化土的沙质粘土，再往下是红褐土层。红褐层里出土一件没有被扰动过的典型的奥西诺夫卡型薄石片；而在上面却只有较晚期的即新石器时代类型的器物。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到，A. B. 叶利谢耶夫曾经提及他在兴凯湖边卡缅-雷鲍洛夫附近发现了“圣阿舍利型的石刀”，即近似阿舍利型手斧的工具，这个发现与穆河口附近的出土物联系起来看，是值得注意的。叶利谢耶夫发现的石器很可能与1953—1956年在奥西诺夫卡、“山庄”村及伊利尤什金山出土的手斧形工具完全相同。

1957年，Э. B. 沙夫库诺夫在阿穆尔河畔库马雷村地区也发现一些石器，与奥西诺夫卡居址下层出土的非常相似。其中有一件用整块河卵石制成的手斧形大石器。它的一端经过细致的两面打击，形成突出的刃部；另一端保留着卵石上自然形成的光滑表面，用作把手。由此可见，奥西诺夫卡文化也分布在阿穆尔河中游。预计在中国境内的东北，也应当有它的遗迹。在朝鲜也可能发现这种文化。

这样，滨海内陆部分（乌苏里斯克城地区，兴凯湖附近，阿穆尔河畔）的上述出土物便使我们头一次了解到过去不知道的我国远东上古居民极其古老而独特的文化。显然，要在其它地区的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与之完全相同的东西，非但是困难的，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奥西诺夫卡下层出土的别致的扁桃形工具同阿舍利手斧相似。但这种相似性毕竟是最一般的、大体

上的。

奥西诺夫卡出土的石核形砍伐工具近似东南亚的砍砸器，但也只是部分地、相对地近似而已。

无论是扁桃形的手斧，还是石核形的砍砸器，它们的总貌都很古朴，乍看起来竟然可以归到更加远古的时代，归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甚至早期。

然而，从某些狭长的石核形工具上打取薄石片的特征，却表明这里当时存在着更为发达的石器制作技术。

这些古朴而费解的物件很象用大致规整的石片打成的石器，后者不可能早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至少在西伯利亚和蒙古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才能经常见到这样的石片石器。

由此可见，对比其它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奥西诺夫卡下层出土物的年代当是旧石器时代末期，遗留下这些石器的古代人类是一万——一万五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他们同西伯利亚和蒙古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或许还要早些。

这个结论还可以从上文提到的那些说明奥西诺夫卡下层属于远古时代的地质学资料得到证实。

以上就是奥西诺夫卡文化的年代问题以及它同北亚诸文化的关系问题最可取的答案。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列岛最近发现的石器时代遗迹。

众所周知，日本列岛非常广泛地分布着大量的、鲜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按年代可以分为几个组。最早的遗存以尖底容器为特征。稍晚出现了新型的陶器，典型器物是外表布有所谓“绳纹”的平底器，即绳文陶器。

绳文文化从一开始便属于已经完全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有磨制的斧形砍伐器，两面修整的新石器时代典型燧石镞和黑曜石镞，

以及代表这个时期的其它工具。¹

但是,过去在日本列岛一直没有发现更早的、可以根据考古学和地质学-古生物学资料来断定其确切年代的人类遗迹。因此,日本新石器时代丰富文化的起源也没有搞清楚。学者们不知道日本列岛的远古居民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沿着什么路线进入这些岛屿的。

近来,人类最初入居日本列岛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和欧洲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注意²。因此,现在获得了许多极有意义的发现和地质学的考察结果,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但同时也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首先是与关东地区所谓“红土”有关的石器的研究工作。根据地质学的考察断定,日本中部本州岛东京附近关东平原地区的第四纪沉积通常有下列地层(从上至下): 1. 饱含腐殖质的现代黑色土壤层; 2. 红色粘土沉积层——火山灰形成的关东红土; 3. 沙或沙砾,往往含有大陆起源的陆地动物骨骼,证明同亚洲大陆的联系。在北海道发现有猛犸骨骼。

绳文文化遗迹通常见于黑色腐殖层或直接压在它下面。它们往往同贝壳层联系在一起,但这种贝壳层的形成一般都可以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这些文化遗迹年代较早;分析姥山出土的炭素表明,这个居址的出土物属于绳文文化末期,年代为公元前第三千年。

在沙或沙砾层里,没有发现任何人类活动遗迹。但这种遗迹

1 A. II. 奥克拉德尼科夫:《论日本列岛的远古居民及其文化》,载《苏联民族学》,第4期,1946年,第11—13页。

G. J. 格罗奥特:《日本史前学》,纽约,1951年(这部篇幅浩大的专题综合论著,是最完整地介绍日本远古文化的西文文献,书中载有大量的文献目录)。

2 J. 马林格:《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载《人类》,第53期,1953年。

J. 爱德华·里德:《日本陶器前文化的再认识》,载《亚洲艺术》,第15期,1954年。

K. K. 比尔兹利:《史前的日本——考古资料的研究》,载《远东季刊》,第XIV卷,第3期,1955年。

却见于关东“红土”的上部；有些地质学家认为，红土的年代极为古老。大部分研究者主张把它断为更新世晚期(更新世末期)。这支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地是伊势崎市附近群马县权现山。有一位日本研究者正以巨大的热情在那里研究日本远古人类遗迹问题，他在建筑施工中从粘土沉积层的三个不同深处收集到一些用安山岩和燧石等类石材制成的器物，这些石器外貌都很古朴。

J. 马林格曾经详细描述过这些出土物的一部分，他得出结论说，不同深度的出土物彼此略有区别。最低处即第一层(权现山 I) 出有类似勒瓦娄哇型的石片、长刮器(side scraper) 和巴芝丹型的尖头手斧(Handaxe)。

稍高处即第二层(权现山 II) 出有厚重的“却别尔”(choppers, chopping tool)型砍砸器、刮削器形工具，以及克拉克当型、类似勒瓦娄哇型和莫斯特型的石片。马林格把它们同爪哇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巴芝丹型石器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有许多共同点。

但它们同巴芝丹器物还是有重大区别。例如，马林格写道，权现山的出土物制作比较细致，体积也小得多，当可证明它们不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而是属于较晚时期。

他主张把这些出土物断为更新世晚期，并认为它们可能是属于先冰期，当时日本列岛同大陆之间曾有陆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即由此进入这些地方¹。

J. 马林格指出，日本列岛陶器以前的古文化的器物同印度支那、印尼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的所谓和平文化的器物(以

1 J. 马林格：《日本权现山发现的梨状工具及日本旧石器问题》，载《人类学》，第 51 卷，1956 年。

J. 马林格：《日本中部旧石器类型的石核与打片技术》，载《亚洲艺术》，第 XIX 卷，第 2 期，1956 年。

J. 马林格：《日本中部发现的早期和平类型的若干石器》，载《人类》，第 LVII 卷，1957 年。

单面打制的砍砸器为特征)之间具有相同之处,这一点非常重要。日本陶器前时代的石器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同和平文化有联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

这些同关东“红土”相关的远古石器也可能与滨海奥西诺夫卡类型的出土物有联系。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滨海,这些器物都早于新石器时代。它们的形状都是同样别致而古朴;最大的特点是含有厚重的砍砸器,类似东南亚的手斧和“却别尔”。因此,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入居日本列岛如果不是从滨海本地出发,那就是从邻近的东北、辽东和朝鲜出发。这些邻近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应当有过与奥西诺夫卡文化有亲缘关系的远古文化。为了把这些出土物放在整个亚洲远古文化的背景上来加以缜密研究,不能不谈谈较南部的东亚各地区。

可惜关于亚洲东南部,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即从黄河下游到长江口以至往印度支那方向)的远古文化,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还很少,而中国沿海地区由于邻近滨海,因而应是最有可能提供滨海远古史的有关资料的。

然而,关于这片广大地域的远古文化的资料(如周口店山顶洞和广西几个洞穴的出土物),特别是印度支那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资料,即使为数不多,却也表明这里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自古就不同于亚洲北极地区,不同于西伯利亚和蒙古北部¹。

这里的基本生产活动不是猎取大的厚皮动物和驯鹿,而是猎取小动物和从事采集。例如周口店山顶洞除小动物骨骼外,还出

1 裴文中:《广西洞穴内之中石器时代文化》,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 XIV 卷,1935 年。

裴文中:《中国旧石器文化》,载《人类》,费城,1937 年。

裴文中:《周口店山顶洞的石器》,载《中国古生物志》新丁种,第 9 号,1939 年。

莫维乌斯 H. Z. Jr.:《南亚东亚的早期人类和更新世地层》,载《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第 19 卷,第 3 期,1944 年。

有相当多的贝壳。

因此，在东南亚也未曾有过旧石器时代北方猎人所拥有的那种独特的武器和物质文化。

那时，为了采集食用植物，挖掘植物的根，捕捉小动物，用简单的木棍就完全够了。用木棍作狩猎武器，只消在火上稍稍烧尖，或用粗陋的石块砍尖。

东亚古代部落也没有那种由坚固的、以动物骨骼和泥土构筑的半地穴式住所所组成的长期居址。他们没有这种需要，因为这里不象北极那样严寒。游动的猎人和采集者只需要临时住所。

直到不久以前，这种古代文化的某些特点还残存在南太平洋一些孤独的岛屿上(如锡兰)或南亚无法通行的热带密林里最落后的部落中。

这些部落由几个不大的人群组成，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他们过着游动的生活，短期地停留在适当的地方，往往是洞穴，这是在热带的霖雨和酷暑下现成而可靠的栖身之所。

显然，奥西诺夫卡山的远古居民应当也是这样生活的，他们在山上没有遗留任何明显的固定住所遗迹。应该认为，他们只需要用树枝和草搭成供短期居住的简单的窝棚或敞棚。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支那和广西，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曾广泛流行粗糙的、未经砥磨而只是打制的石砍砸器，它们同奥西诺夫卡文化发现地的同类器物部分相似，尽管在器形和制作技术上还有差别。

柬埔寨和平文化的最早遗存正是以这种器物最为典型。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在东南亚存在着一条采集和游猎部落的文化链条，独特的奥西诺夫卡文化便是其中最北面的一环。它的性质不是北方文化，而是南方文化。不过它有一些器物(如棱柱型的刀形薄石片)同西伯利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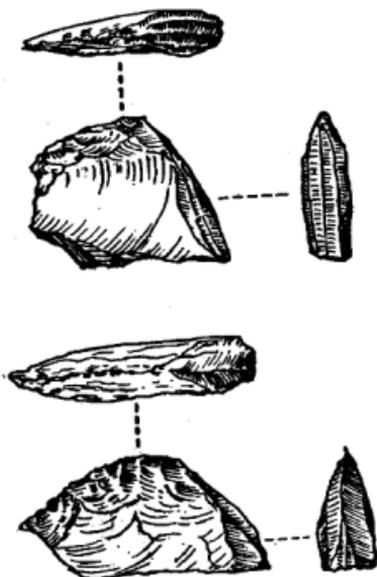
器物相似，说明它同居住在邻近的蒙古和东西伯利亚的北方部落也有某种联系。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化已经是相当发达了。但是必须想到，它的生活和技术传统的典型特点（最明显地表现在以整块河卵石制作的大型砍砸器的特殊形制上）可以追溯到东南亚居民的远古时代，溯源于他们的远古文化。至少缅甸和印度支那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就是这样用整块河卵石制作“却别尔”的。周口店的中国人也是用整块河卵石粗糙地打制砍砸器。

这些技术传统出现得很早，但无疑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在印度支那就是这样，几千年中都稳定地保持着同一基础的石器制造方法，使用着相似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形工具。在滨海也应是这样。

为了研究滨海远古居民同其它地区的联系，也不能避而不谈这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发现，这个发现地位于什米托夫卡河的支流季格罗瓦亚河岸上，在纳杰日坚斯卡亚车站附近，距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六十公里。

季格罗瓦亚河畔这一发现的出色之处在于，它再一次把我们引到远东的范围以外，使我们可以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远东上古居民的历史当与其它地区（包括邻近的和比较遥远的地区）的历史存在某种联系。



图七 新疆和东北出土的石核形工具
（“石核刮削器”）。

根据这个发现,可以探讨一个问题,即在较晚时期,在旧石器时代之末和新石器时代之初,滨海居民的文化一方面同亚洲中部即蒙古、西藏和新疆的文化有联系,另一方面又同北美的文化有联系。因此我们想谈得详细一点。

在季格罗瓦亚河畔,起初只发现一块厚重的石块,是从火成岩(可能是闪长岩)上打下来的,随后又发现了石片和两件小型石器。第一件是残石刀或尖状器。另一件单从质料来看就是惹人注目的,这是火山玻璃——黑曜石。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器形:这是一件两用工具,就象两种专门的器物即两种不同类型的工具结合在一起。它的一边比较锐利,有几道平行的细疤痕,这是棱柱形石核的特点。但这些疤痕实在太细,不可能是由于打取刀形薄片而留下来的侧棱面,因为体积太小的石片未必有什么用处。不仅如此,这些疤痕使这件工具上形成了一个细高的“小鼻”。这正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特别是奥瑞纳文化)中常见的多棱面石核形切割器的疤痕和刃部所具有的特征。

但是,这个器物另一边的形状却与常见的旧石器时代多面体形切割器有很大区别。它经过精致的压削修整,做成弧形刃部的样子。从这个特点和通体形状看来,这件工具近似西伯利亚大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所谓“石核刮削器”。

很可能这种工具一边用作切割器或刮削器。经过修整的另一边则可能是当作一种别致的刀来使用的。

不管这种器物有何用途,显然它是石核形工具的一种非常特别而有代表性的形制。因此,关于它的分布问题就很值得注意。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经常看到形制与此完全相同的器物。安竹思领导的考察队员曾在戈壁发现几件,由纳尔逊作过描述¹。1949

1 N. C. 纳尔逊:《戈壁滩的史前考古》,载《美洲博物馆简报》,第222期,纽约,1926年。

年，我在苏联科学院和蒙古科学委员会联合组织的蒙古历史民族学考察队工作时，也在克鲁伦河畔和戈壁发现了这种器物。

斯文赫定领导的中瑞考察团在内蒙古工作时，也曾发现这类工具，例如Φ. 贝格曼的采集品，曾由J. 马林格作过详细报道¹。

这种器物在西面的新疆(吐鲁番绿洲七角井子附近)也有，同样是采集品。这是中国学者杨钟健及其同事、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和中国、蒙古石器时代研究者德日进发现的²。1954年，我在阿穆尔河上游布拉戈维申斯克上水处也遇见过同样的石器。

在东北，B. 波诺索夫在研究哈尔滨市郊顾乡屯的旧石器时代居址时曾在大约八米深的地层里发现一件这种类型的石器，它同披毛犀、猛犸的骨骼距离很近，埋在“黑沙”沉积层里，这种黑沙通常都是沉积在满洲平原的深洼地里³。

纳尔逊在描述蒙古的这类发现物时，头一个注意到了这个有趣的事实，即这种多面体切割器在阿拉斯加石器时代的远古居址中，即在费尔班克斯城附近的居址中曾有发现，它们同细薄的刀形石片、短刮器以及纳尔逊视为与戈壁发现物相似的其它器物共存。据此，纳尔逊认为，费尔班克斯城附近的出土物是石器时代人类最初入居北美的证据⁴。他得出结论说，这些器物证明原始人从亚洲中部即现今戈壁沙漠出发，经过白令海峡，起初迁移到阿拉斯加，接着又继续向美洲大陆腹地迁徙。

继纳尔逊之后，对这些别致的石器的分布状况感兴趣的是德

1 J. 马林格：《蒙古史前期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第39册，斯德哥尔摩，1950年。

2 德日进、杨钟健：《中国西部及蒙古新疆几个新石器(或旧石器)之发见》，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XII卷，1933年，第83—104页。

3 B. B. 波诺索夫：《顾乡屯出土的石器》，载《哈尔滨科学研究所通报》，第I卷，第3期，1937年，第3—11页。

4 N. C. 纳尔逊：《论亚美二洲的文化关系》，载《美洲的古代》，第2卷，1937年。

日进。他根据自己在中国土耳其斯坦^①的发现，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在世界上可能分布着一个亚北极带的文化地盾或文化层。为了证明这个想法，德日进绘制了一幅地图，标出了吐鲁番、阿拉斯加和哈尔滨市郊的发现物¹。但即使从他的地图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类发现物不见于欧洲和北亚森林带等真正的亚北极。这些器物都是同亚洲中部相关的，它的中心是戈壁和与之邻接的远东各地区。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德日进的全世界亚北极带文化层的假说还不及纳尔逊的观点来得正确。

然而，费尔班克斯与戈壁之间，当时毕竟隔着一片辽阔的空白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根本没有出过这样的器物。纳尔逊的想法因而悬在空中，仍然是纯属猜想。

这个大胆设想的头一个直接证据是，恰恰在那些缺乏物证的地方，即在白令海峡与戈壁之间的东北亚各地区、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发现了多面体形的切割器。白令海峡两侧即楚科奇半岛和美洲大陆北部的新发现则进一步确证了这一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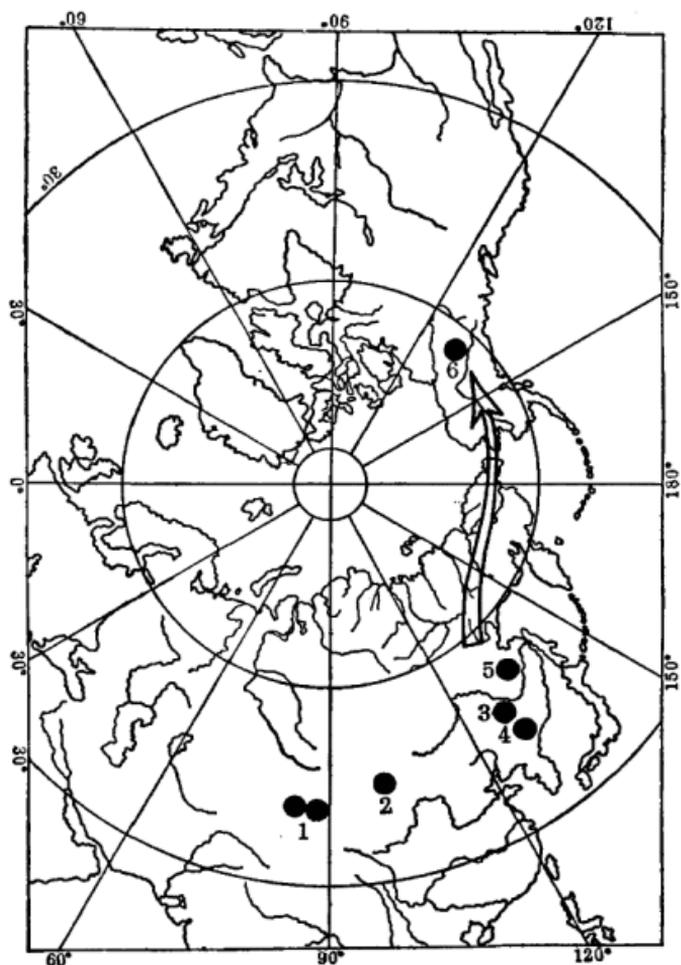
近年来在楚科奇半岛各地，包括亚基季基维耶姆河畔、别拉亚河流域奇罗沃耶湖边，甚至在埃利格特亨湖边，即在东北亚的一些最荒僻的地方，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面貌的大陆古代文化遗迹。²

这些发现物表明，这里早就居住过猎取驯鹿的古代猎人，捕鱼业在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也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有弓，还有投掷的矛或标枪。此外，古代猎人也配备大刀或狩猎匕首。他们无疑还有许多其它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从石刮削器到陶器。应当认为，他们也使用磨制石器。

① 指我国新疆省。——译者

1 德日进：《新石器时代黎明期亚美二洲人类文化之关系》，载《中国地质学会志》，第XIX卷，第3期，1939—40年。

2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论人类之最初人居楚科奇半岛腹地》，载《全苏地理学会通报》，第4期，1953年。



图八 石核形工具即“石核刮削器”分布图。
(根据德日进资料,并予增补)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埃利格特亨湖边遗址的居民熟练地掌握了从棱柱形石核上打取刀形石片的技术。他们同样善于运用极其细致的压削修整法。

这些北亚古代猎人独特的生活一方面应是近似美洲大陆极北地区中部的猎取驯鹿的游猎人和渔人即爱斯基摩人-卡里布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根据古老的传说，古尤卡吉尔人的生活方式大致也是这样的，同样游猎驯鹿，从事捕鱼。他们直到不久以前还分布在亚洲最北部一望无际的土地上，东起阿纳德尔河，西面至少达于勒拿河。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在美洲北极各地区，甚至在格陵兰，分布着所谓古爱斯基摩或古代的前爱斯基摩文化和遗址，其特点是含有一整套独特的“燧石工具”。

从美洲大陆北极地区新的发现物看来，这个古代文化同东北亚大陆地区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文化有许多相同点。

这种相同点不仅表现在美、亚两洲极北部的大陆猎人和渔人的经济发展总方向和生活方式上（这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自然条件），而且反映在一系列其它文化特点上。

第一，美洲亚洲的大陆文化中广泛流行从棱柱型石核上打取规整的刀形石片的高度技术。

第二，大量存在经过修整的各种石器，如矛头、刀、刮削器。

第三，两个大陆文化都有带切割刃口的石器。

第四，存在相似的陶器，首先是饰有典型的棋盘乳钉纹或假编织纹（用表面刻有线网的拍子拍成）的圜底器和尖底器。这种纹饰有时在爱斯基摩人海岸文化的较早期的居址里可以看到，但那是从其前驱的北极带和亚北极带游猎人和渔人的大陆文化中保留下来的个别传统的表现¹。

1 温德尔·奥斯瓦特：《阿拉斯加陶器的分类与历史的复原》，载《美洲的古代》，第XXI卷，第1期，1955年，第32—43页。

温德尔·奥斯瓦特：《北亚与阿拉斯加陶器的关系》，载《西南人类学杂志》，第9卷，1953年。

那些别致的石核工具(有的称为多面体形切割器,有的称为石核刮削器)都同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即亚、美极北部广泛流行从棱柱形石核上打取刀形石片的技术密切相关。关于这些石核工具,上面在介绍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季格罗瓦河畔的发现物时已经谈到。

这样,往昔纳尔逊的猜想根据新的事实看来变成一个十分可能而大有希望的假说:西伯利亚和亚洲中部石器时代诸部落通过我国远东同美洲及其远古居民发生联系。

现在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提出一个观点:从顾乡屯的出土物看来,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就有某种文化因素从亚洲中部出发,经过东北或阿穆尔河流域到达大彼得湾海岸。可能亚洲中部各部落的人也到了这里,他们带来了自己习惯了的技术方法和石器等劳动工具。

同时,这些技术方法和文化特点很可能是经过阿穆尔河下游而远传北方,直到白令海峡,继而越过海峡传入阿拉斯加。

跨越大陆的石器时代移民们可能还在亚洲东北方就同其他部落发生了接触;这些部落是从西向东、从南向北迁移的,他们从贝加尔湖沿岸和雅库特出发,最后在严寒而荒僻的东北亚土地上居住下来。

在新石器时代把亚洲极北部同北极及美洲亚北极带联成一体的古代大陆渔猎文化,最有可能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这方面,出色的是民族学家们的研究工作,他们早就断定,在沿海猎人(猎取海象和海豹)文化出现以前,美洲大陆极北部各部落的文化中便已存在“冬季渔猎人(猎取野驯鹿)的文化”。在新大陆北极地带,这支文化最鲜明的代表是爱斯基摩人-卡里布人,他们游猎野驯鹿(卡里布),并在小河和湖里从事捕鱼,一如楚科奇半岛的新石器时代部落。

新石器时代初期是石器时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时期，它是从石器时代的较早阶段转入较晚期的、成熟而鼎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过渡时期，当时我国远东地区发生了些什么事件呢？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滨海的另一个石器时代遗址，这一次是在日本海海岸附近大柞树河畔。该遗址发现于1953年，地质学家B. Ф. 彼特伦曾作过报道¹。

这里的石器制作材料几乎只有矽华和火山玻璃。偶尔也用玉髓、矽质板岩和发亮的松脂黑曜石。石片和粗陋的薄石片许多都有用损的凹口和砸口，说明它们不是下脚料，而是当作粗陋的切割器和刮削器来使用的。

大柞树河畔收集到的石器成品为数不多。

出土物中有一件石核形器，其形制、体积和制作技术都同奥西诺夫卡出土的砍砸器非常相似。它的一面打去了一些长大的石片而显得平整，另一面也是从纵向打去一些石片，形成一个突面。这件器物侧面的大致轮廓象一个楔，刃锐而突，一面已砸损，可能是用坏的。这里还出土两件石尖状器，其一完整，轮廓呈规整的桂叶形；另一件已残。两件都是精细地从两面打去宽大石片，酷似贝加尔湖沿岸和外贝加尔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居址（如常见于文献的安加拉河畔伊尔库次克附近上勒拿山遗址）所出的桂叶形石尖状器。

但是，在远东阿穆尔河沿岸哈巴罗夫斯克地区，还有更其相似的现象。这是整整一群古代遗址，绵亘在阿穆尔河高峻的左岸上，从过去的朝鲜村落奥西波夫卡开始，直到哈巴罗夫斯克郊区为止。

在阿穆尔河岸高耸的古代台地黄色沙质粘土里，发现了用河

¹ B. Ф. 彼特伦：《关于滨海南部沿河阶地的年代问题（日本海沿岸发现的石器）》，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质与化石资料》，莫斯科，1956年，第58—73页。

卵石(已烧坏)垒成的灶和人们遗失或丢弃的石器。有时还发现一种加工石料、制作石器的“劳动场地”。这些地方一堆一堆地埋着石片、打制过的石块和薄片,从几十块到几百块。这些古代灶址和打石场的附近都没有陶器残余。当时还不会制陶,而且还没有这种需要,因为这些遗址的居民为寻找食物而辗转于阿穆尔河沿岸,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易碎的陶器即使有也没有什么用处。

他们也不会磨制石器。打石场上留下来的石器都是打制的,所用的方法完全是旧石器时代的典型技术。

这些遗址里散布的同类石器彼此都非常相似。

首先是叶状刀身形器,轮廓呈扁桃形,两面以惊人的技巧使用“索留特累”修整法细密整平。个别几件可能用作最好的战斗匕首和割切猎获物的猎刀。用这种工具很容易剥取兽皮、肢解动物躯体。其它的刀身形器较厚,完全适于用作矛头。其中最小的可能用作轻便标枪的矛头。

同这类刀身形器共出的有一种令人费解的斧形器或磷形器,它的形制乍一看来有点象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手斧。

当然,手斧的作用部分是在锐利的一端,而阿穆尔河沿岸的这种工具的作用部分却在相对的另一端,它的最大特点是刃部有一个凹槽,说明它是用来加工木料的。

这些工具的出色之处同叶状刀身形器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尺寸,但从大型器到小件总是一个式样,都有同样的典型特征。

这些遗址的居民还拥有其它不同类型的工具:用砂质板岩石片和薄片制作的刮削器、沿边修整的薄片刀和体积不大的尖状器。

总的来说,这些居址尽管出土物相当丰富,毕竟呈现出非常一致甚至单调的情景。在我们眼前老是几套同一式样而只是大小不同的工具和一模一样的石灶。这里既没有结构复杂的住所,也没

有骨堆和其它生活用品。

但是，这些似乎显得单调的、没有多少意思的文化遗迹，却有着很大的意义。

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出土物表明，当时远东居民已经大大超过了旧石器时代即真正古旧的石器时代的人类。这可以从新型石器的出现得到证明。

当地的部落这时已有了矛，桂叶形的矛头以高度技巧细致修整而成。诚然，当时还不知道弓箭，但狩猎的装备毕竟比从前可靠得多了。

但最主要的新现象是，在加工过的石头堆里，在石片和石器半成品中，往往可以看到修整精致的厚实的斧子，其轮廓规整，有弧刃和尖斧背。当然，不足的是没有砥磨，但这样打制的石斧已经可以用来加工木料。

东亚大河河谷的古代居民们使用石斧，可以广泛得多地利用森林和水里的丰富资源，更加顺利地从事建筑，不仅架搭躲雨避寒的栖身所，而且也制作各种狩猎用具，以及渔栅、渔篓等捕鱼器具。

石斧的出现对东亚历史应当还有其它一些同样重要的效果。

看来，当时人类在亚洲大陆沿海边区已经分布得相当广泛了。

很明显，随着由简单地采集海水冲来的可食软体动物和水草过渡到在辽阔的海面上捕鱼，当地居民比从前更为充分地开发着海域。沿海渔人和猎人驾着用石斧砍成的笨拙木舟从一个海湾转到另一个海湾，然后进入邻近的岛屿，其中许多可能本来还是阍无人迹的荒岛。

这样，在沿海部落的生活中便展开了一个漫长的新时期——他们历史上的海洋时期。

由此可见，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开始了向崭新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过渡，决定了尔后历史发展的前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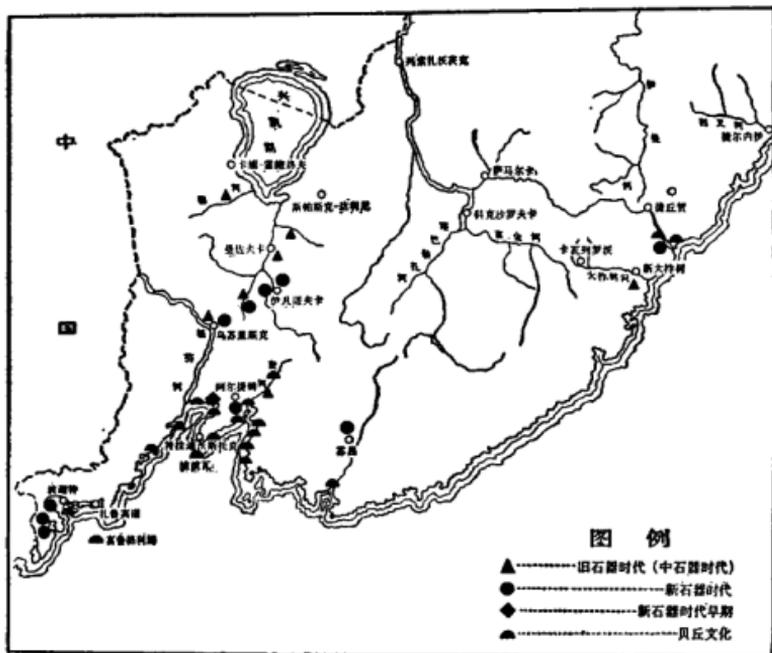
当然，亚洲这些地区的居民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还非常稀疏，各个单独的居民点之间横着没有人烟的广大土地。人类还受到南方处女地狂暴的自然界的压抑。他们很小的临时住地在大片密林中简直显不出形迹。但生活中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变化很快就到来了。

远东居民运用着前人的成果，很快就向前迈进了。他们学会了磨制石器，达到了当时的高度技巧。他们有了弓箭。制陶业得到广泛流行。最主要的是，这些部落中新的经济部门——捕鱼业日甚一日地发展起来，成为他们的生活和全部文化的基础。

第三章 滨海的新石器时代

我们已经知道，奥西诺夫卡山下层等滨海远古遗址的居民还处在旧石器时代的阶段。他们不会磨制石器，不知道弓箭，不会制造陶器。

滨海的下一个文化历史阶段以充分发达而成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存为代表，它们具有这种文化的三个典型特征，即完善的陶器、弓箭和磨制石器。



图九 滨海石器时代遗存分布图。

这些遗存在滨海南部分布于靠近朝鲜的沿海一带和内陆部分的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及兴凯湖边；北部则远达捷丘贺河流域并向阿穆尔河下游方向伸展(图九)。

尽管它们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但居住在这片广袤地域内的各个部落集团在习俗和生活方式上自然有其自身的、区别于其他部落的特点。

这些特点也表现在居址里保存下来的文化遗迹上，特别是在陶器的形制和纹饰上。

滨海新石器时代部落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群：第一群是南方部落集团；第二群是中部部落集团，在兴凯湖和乌苏里斯克城地区，即乌苏里江上游；第三群是北方部落集团。

北方的新石器时代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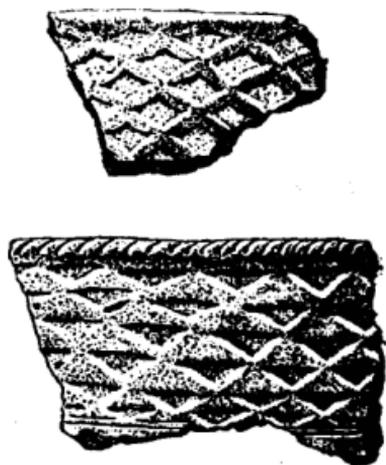
关于滨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从北方，从北方部落文化开始来作一概述。这些部落当时居住在日本海沿岸（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往阿穆尔河河口和鞑靼海峡方向）寒冷而荒僻的多山地区。关于新石器时代当地部落的生活，可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约六百公里出色的捷丘贺湾居址的发掘中得到了解。

这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发现于捷丘贺河河口附近风景如画的岬角上；岬角的脚下，捷丘贺河的支流从两边流过：一边是莫纳斯特尔卡溪；另一边是姆拉莫尔纳亚溪。这座岬角高出海面约二十米，是古代侵蚀阶地的顶部，下面是花岗岩的基底。岬角的两面都很陡峭，所以曾是防御突然袭击的好地方。

已经断定，新石器时代的人早就居住在这里。岬角上的遗址有两层。第一个文化层最早，同黄色沙质粘土相连，这土层分布在被风化的花岗岩上面，文化层里发现相当多的石器和陶片。

这个古代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成分是陶器。容器以泥条盘筑法

作成。器形为小平底,有的可能是尖底。口沿外表饰有带纹,是四边凹陷的菱形印纹。



图十 捷丘贺河河口居址下层出土的陶器。

但是,这些菱形决不是真正的菱形纹,而只是一种富有特色的复杂纹饰的底子。纹饰本身是突起于凹陷的底子上并交错成编织物形状的扁平带子,凡是研究过阿穆尔河部族(基里亚克人、乌里奇人、果尔特-那乃人)纹饰的人都很熟悉这种花纹(图十)。

捷丘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居民已经掌握了制造石器的各种主要方法,而且

这些技术都已非常发达,这正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

他们能够制造大型石器,其方法是:先把河卵石打成粗坯,有时加以所谓琢制,继而先后在粗细不同的砂岩石板上磨制。小型石器则采用压削法以火山凝灰岩和砂质板岩制成,这种方法往往达到高度完善的修整质量,几乎可以同首饰相媲美。磨制石砭的形状是一面突起,另一面平整。它们同两面修整的石刀和石镞共出。石镞一般作长三角形,两个后锋长短不齐,这两个特点都同贝加尔湖沿岸出土的最早期的石镞相似。石器中还有刮削器和两面细致修整的长条形薄片,用作木、骨匕首或刀的嵌刃。

后来,在这个早期猎人住地上出现了新的大型居址(图十一)。这里保存着二十个住所的遗迹,有的面积达一百平方米。揭开其中一所,发现在长方形地穴的两侧分布有贮食窖穴,中央则有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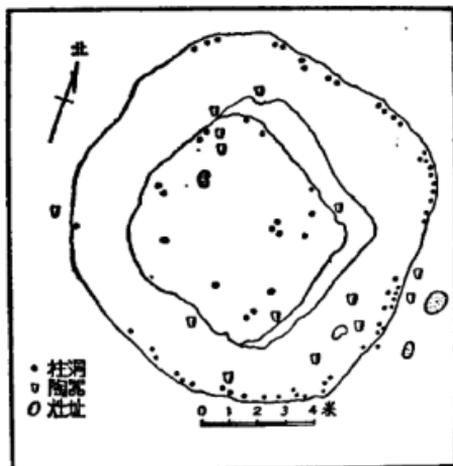


图十一 捷丘贺河口新石器时代居址平面图。

不大的灶。

附近的另一住所却与此不同。发掘前地表上是一个大坑，坑壁相当陡，只略向中央倾斜。但揭去居住面上的表土层和土层，我们却看到了最有趣的情景（图十二）。

居住面是平整的，轮廓近方形，面积约三十六平方米。居住面上



图十二 捷丘贺第二号住所平面图。

方两面有台阶，是一种特别的长凳，宽达一米。再往上沿土坑四壁还有一层台阶，宽二——二米半。这一层台阶高出方形的居住面不下六十——八十厘米。它的边缘有一圈非常明显的小坑掘入黄色沙质粘土，坑内填有较黑的泥土。这些小坑排列得相当均匀，彼此间隔不大，坑内曾竖埋木柱或木杆，作为住所墙壁的支柱。紧挨这一圈小坑的外围清晰可见挖掘房基时挖出来的陡壁。

根据坑沿的轮廓和柱洞的排列判断，房子的外沿轮廓近似方形，但四角略圆。

在方形居住面的边沿，也有一排柱子的痕迹。这些柱子可能是从里面支撑房顶的。因此整个来说，这是一个半地穴。显然，它的墙壁是以不甚粗大的立柱和横架其上的半圆木或木杆构成的，立柱上再架房顶。

总的说来，第二座住所复原起来应该同第一座一样，也是公社的典型住所，只是另一种类型而已。它的中央有一个灶址，四边的地面比灶址高出两阶。阶上有遗址居民遗存的石器，其中有精细磨制的石砬。

在一处出土一堆石镞，在其它几处有几堆制作石器时剩下的燧石片。到处散见板岩磨制的石砬，多系早期形制，即截面形状不对称，仅一面突起；但也有截面椭圆的。

在地穴的台阶上发现有平底陶器的残件。其中几件原先是完好地放着的，住所被废弃后，这些容器也就倒下被泥土压碎了。这样，陶器被压成几十片，但仍然保持原来的形状，在泥土里埋了几千年。

器形很简单：小底，器壁作漏斗形敞开，下部稍外倾，是一特点。有的器壁上部稍大，多少形成鼓腹。近口沿处常微敛，仿佛收缩成颈。口沿上有一周绳子形状的附加堆纹。器壁一般为素面，有时则在外表施以篦点纹，与阿穆尔河早期陶器的纵行之字纹相

似。

在一件容器上还有一种曲线划纹，好象新石器时代早期阿穆尔河典型纹饰螺旋纹的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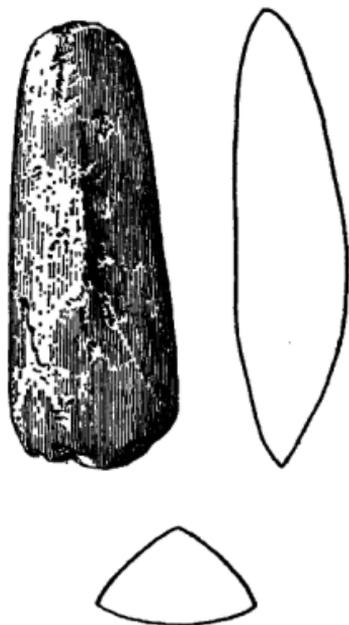
除当作炊器和可能当作贮器使用的大型容器外，还有小型容器，也是平底深腹，有明显的颈。这些小件很可能是儿童玩具。

捷丘贺山上发掘的第一座住所显然是日常生活的场所。这里有几个贮食窖穴和炊用的灶。

邻近的第二座房子则有另一种用途。根据民族学上的类似现象判断，在房子里唯一的中心灶周围的宽大台阶是地铺。这是住所居民坐的地方和劳动场所。他们在这里制作石器，包括石标枪头或鱼镖头；制造这些尖头器的匠人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即灶的东面。地铺上还曾经置放完整的陶器。看来这个房子最有可能类似民族学家在十八——十九世纪北亚和美洲不同的落后部落中作过仔细研究的所谓男性房子或会议场所（爱斯基摩人的“卡日姆”，楚克奇人的“瓦利卡尔”）。

遗址居民以捕鱼和狩猎为生活基础。

这个结论是通过研究两个住所的出土石器而得出的。关于狩猎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矛头或猎人的石刀得到证明。这种石刀和矛头有一个特点，即锋部与较细的铤之间有肩。住所里还出有各式各样的经过修整的燧石镰。除凹底三角形的常见形制外，还有



图十三 磨制石碾。捷丘贺。



图十四 石镞。捷丘贺。

不齐的燕尾形后锋(图十四)。

古代渔猎人手头不可缺少的是一整套以砂质岩石制成的各种小型工具,即不同形状的切割器和刮削器(图十五)。这些工具往往仅以长而薄的石片为粗坯。但从来不用从棱柱形石核上打取真正的刀形石片。居址里几百件燧石器中没有一块这样的石核,也没有一块背部有规整的平行棱角线的刀形石片。

小型工具中以刮削器和刮削器形工具最多,均以宽扁石片制成,一边或两边加以修整。看来这是切割用的工具,是加工兽皮、木料和其它材料的一种粗陋的石刀。

特别突出的是一套富有特征性而且形制非常固定的细而薄的石器,它的一边或相对的两边有经过仔细修整的长凹口。这种工具显然是当作加工木料的刮削器使用的。它适于刨刮圆木杆,如

近似三角形但侧边陡然隆起的阔叶镞,以及上窄下宽作截菱形和平底三角形的扁桃状阔叶镞。有些石镞下部近凹底处稍向内敛,形如束腰,但收缩深度不及所谓美洲式的石镞。同下层一样,上层也有类似贝加尔湖沿岸最早形制的石镞,即三角形底部深向内凹,形成长短不

刮削矛杆或箭杆。另有一种厚大的石刀,经两面修整,往往有稍稍收敛的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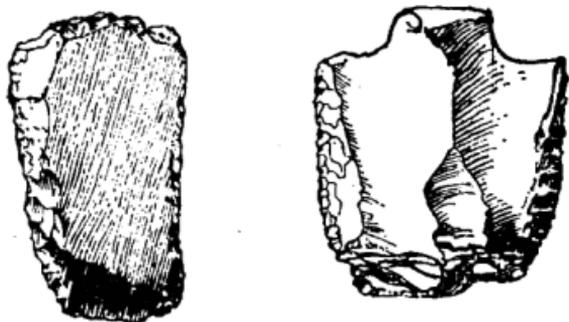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种厚重的刮削器,轮廓为梯形,突刃。表面一般经修整打平,有较浅的击痕。这种工具的用途显然与十九世纪爱斯基摩人中同样形状的厚重刮削器一样。把它装在坚实的短柄上,用以刮去兽皮的内膜和毛,并把兽皮弄软以制作衣服。

然而渔猎在这里并不是唯一的生产活动。

虽然捷丘贺山岬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部落还不知道金属,仍然是石器时代的人,但反映巨大进步的新型经济部门毕竟已初露端倪。



图十五 石刀。捷丘贺。



图十六 刮削器。捷丘贺。

这可以从发现的磨棒得到证明,它们同蒙古戈壁南部赛音山达附近和沙刺木伦河畔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相同。二者形

制都很特别：弧背；磨面宽大，打成向一侧倾斜的特殊形状(图十七)。捷丘贺出土的一件磨盘，好象扁平的大“盘子”，磨面稍凹陷，背面略外突。



图十七 磨棒。捷丘贺。

在这突起的一面发现有精心打凿的小槽沟，组成复杂的框饰。框饰角端的槽沟弯弯曲曲，仿佛形成一种图画，它的轮廓有点象小舟的图案画。

在这样的磨盘上当然可以用石磨棒碾压可食的根、坚果和浆果。例如 2 号地穴住所的灶里就保存着炭化的远东雪松籽。但也有可能当时捷丘贺遗址的居民已经有了农业，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

由于植物的栽培和利用，可能还出现了纺织业。这可以拿纺锤和容器底部精致的织物的印痕为证。纺锤或作双圆锥形；或作圆饼形，一面有管状的“颈”。

也有艺术标本。除容器纹饰外，还有一件用燧石细致地压削出来的鸟、一件用玉髓制作的人像，二者都很简略。

类似上述燧石雕像的作品，距离这里最近的是堪察加半岛塔里亚湾的发现物，它们同捷丘贺出土的人像几乎完全相同，不过体积较大，制作材料是黑曜石¹。

1 Д.Н.列夫：《在堪察加新发现的考古遗存》，载《苏联民族学》，第 4—5 期，1935 年，第 217—224 页。

施内尔：《远东岛屿世界的史前遗存》，载《远东古物馆馆刊》，第 4 期，斯德哥尔摩，1932 年。

这种简略的燧石雕像，其性质和含意很可能与日本列岛新石器时代大量的陶制小型塑像相同。那些塑像绝大多数是女像，其中有的特别突出妇女的第一性征¹。

日本新石器时代的塑像无疑与母系氏族固有的女性始祖崇拜相关。捷丘贺住所和堪察加半岛塔里亚湾出土的雕像很可能也有这种含意。

饰物有管珠和野猪獠牙形状的弧形坠子。后者是玉器的仿制品，以半透明的戈壁玉髓制成。这种玉髓也是碧绿如玉的石材。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与其他的新石器时代部落相距很远，尽管从大陆腹地经过锡霍特岭的山脉和谷地、穿越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而到达太平洋沿岸的道路艰难险阻，但滨海北部的居民决不是完全孤立而闭塞的。这方面的

证据首先是，有些器物显然是在某些别的地方，往往是非常遥远的地方制造的，然后从一手转到另一手、从一部落转到另一部落而传到滨海，传入太平洋沿岸的古代部落。自然，从远方传来的器物应是为数不多，但它们毕竟是极有价值的物证，说明当时存在这种逐步传递的交换和文化联系，首先是同中国、日本、朝鲜居民的交



图十八 石料制品。

1——勾玉型的饰物；2. 用玉髓制作的人像；3. 石鸟；4. 用砂岩制成的箭杆磨光器。

1 参见 N. G. 芒罗：《史前日本》，横浜，1911 年，第 123—135 页。

换和联系。

例如，在滨海北部捷丘贺居址的出土物中，可以看到一些异域出产的，即从更加遥远的亚洲北部和西部地区传来的现成器物。

这类器物就是用非常坚实而美丽的石材——白玉磨制的小砭。

众所周知，玉是一种稀有矿物。苏联亚洲部分仅在萨彦岭地区伊尔库次克附近的别拉亚河、基多伊河沿岸有玉产地，那里既有碧玉，也有白玉¹。

但是，即使在贝加尔湖沿岸本地，白玉砭也是非常罕见的。那里有大量的碧玉砭和碧玉斧。大型的白玉磨制工具一般都有浅黄色的斑晶和疵瑕，最常见于勒拿河上中游（雅库特）及其东面的外贝加尔地区（赤塔州）。捷丘贺的这种工具很可能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不仅如此，捷丘贺出土的白玉砭的形制同贝加尔湖沿岸基多伊期的制品极其相似，即截面呈扁椭圆形。

滨海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文化还有一些因素证明他们同其他部落和地区有着更为持久而深刻的联系。其原因当是这些部落长期为邻，甚至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分析这些联系，不仅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滨海石器时代的文化，而且可以比较深刻地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比较清楚地认识远东古代居民的实际历史命运。

首先，可以这样来解释滨海北方古代文化同阿穆尔河下游新石器时代部落文化的联系。它们有大致相同的容器形制和口沿上凸起的网状编织纹宽带这种典型纹饰。篦点纹也同阿穆尔河类型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第二册（格拉茨科沃时期），《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43期，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年，第174—189页。

非常相似，这种纹饰很可能是用有齿的轮子压印的。螺旋纹不见于我们所知的滨海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存，在捷丘贺的陶器上则发现一例，但在阿穆尔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捷丘贺一样，阿穆尔河下游也常有附加堆纹，有点象绞紧的绳子勒在容器的口沿上。

同阿穆尔河沿岸的联系也可以在滨海北方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找到痕迹。这主要是经过修整的石镞，以及一面突起的磨制石砭。

阿穆尔河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捷丘贺出土的那种野猪獠牙状的弧形石坠。

此外，滨海新石器时代和阿穆尔河沿岸新石器时代一样，与邻近的中国北方，首先是与东北的同期文化有许多相同点。这说明远东古代部落很早以来就同东亚的其他民族有着亲属关系，并同他们发生文化联系。

在东北，例如出色的沙锅屯墓穴即出有与阿穆尔河的器形和纹饰相似的容器。沙锅屯洞穴以及东北新石器时代的其它遗存也有类似我国远东燧石制品的镞、刀和刮削器。

有趣的是，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涉及到更加遥远的地区，直到日本列岛。

例如，陶器底部叶脉形状的刻画，就表明滨海北方的新石器时代部落同日本部落存在联系¹。

在日本，这种图画出现于绳文文化中期，随后得以广泛流行。最常见于弥生陶器。这种形状的印痕和图画在本州铁器时代早期的所谓冈原竖穴文化中也曾发现²。

1 N.G. 芒罗：《史前日本》，横滨，1911年，第269页，图166。

2 霍华德·A. 麦科德：《本洲北部考古研究》，第2册，《冈原地穴式住房文化》，载《美洲的古代》，第XXI卷，第2期，1955年，第151—155页。

除日本列岛、朝鲜和我国远东外，任何地区都没有树叶印痕或模拟树叶脉的图画。如上所述，这种特别的习惯是亚洲两个相邻地区古代陶器的共同特点。

南方的新石器时代部落

现在我们放下北方的捷丘贺居址，来谈谈滨海的最南端。在这沿海一带，我们发现了另一种独特的文化，它在许多方面与北方文化有显著区别。

关于这支文化及其属有者南方沿海部落的生活，可以从一系列居址的资料得到了解，这些居址分布在日本海沿岸，北起麦河河口，南抵图们江口。其中最早期居址出土资料非常贫乏，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例如，在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右岸丘陵的制高点，在分属不同时期的两层较晚期的居址上方，发现了白色和浅黄色砂质板岩石片，以及新石器时代类型的工具粗坯和石镞。

沿该河上溯，我们又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同样的石片和素面的陶器，这些陶器不同于较晚期居址的出土品。

上述发现表明，遗留下这些遗迹的人们所使用的陶器与其直接后代使用的不同，他们也不是用黑曜石，而是完全或几乎完全地采用砂质岩石来制作小型石器。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沙磧半岛地区和迭-弗里兹海岬上，也发现了这种类型的居住遗址。

这里同样没有黑曜石制品，而代之以砂质板岩或黑曜砾石。迭-弗里兹海岬的大型器仅发现一把扁平形石刀的残件，石刀两面以“索留特累修整法”精细加工。陶器是素面的，仅口沿上有一圈附加堆纹。

从出土物数量不多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人数不多的、不时游

动的渔猎人群的遗址。

此外无法再说什么，因为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极其有限。不过对滨海历史来说，存在这种遗址的事实本身就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该地区沿海一带另一群居址的资料，却展现出远为丰富多采而又迥然不同的图画。

这一群沿海居址分布在麦河河口和格拉德卡亚河河口之间，北起乌苏里湾，南达图们江口。其中最早期的当是八道梁子河河口附近基洛夫斯基村旁边的居址。

这个居址的出土物首先是大量的石器制作废料——石片和打碎的河卵石。根据这些废料判断，这里同滨海的其它新石器时代居址一样，制作小型工具广泛采用黑曜石和坚实的白色或浅黄色砂质板岩。

大型工具以质地坚实、分量较重的火成绿岩制成。这种石料还用来制作石镞和刮削器。这个遗址居民的最典型器物是石砭。器形都是一面突起，即截面不对称，突刃，上部微敛成背。还有板岩石刀。其中一件石刀形制特别，作Γ字形，竟然象斯堪的纳维亚所出的新石器时代北极地带的特殊石刀。

同样形状的板岩磨制石刀在滨海其它地方也曾发现。其中有一些与其说象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刀，不如说类似中国“黑陶”文化或龙山文化的典型石刀。刀身宽大，呈不等边的三角形，把在侧面，与刀身之间有段。这种异常别致的石刀形制非常特殊，它说明新石器时代末期我国古代沿海部落同中国山东地区以至更南部的沿海部落发生了联系。

显然，这种早在公元前第三千年至第二千年即已开始的中国与滨海古代部落之间的联系，促使他们在公元前第一千年初，即在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转入贝丘文化的过渡时期，发生了进一步的接触。

陶器残件中有些陶片饰有细致而美观的印纹。但同时却发现另一种迥然不同的纹样，即从上到下完全布满或几乎完全布满器表的垂直的平行之字形划纹。

这些容器形制非常简单：敞口，直壁，下部内敛，小平底。通体象一个截头的圆锥体，截面即系器底，所以这些容器可以称为截锥体形。

在滨海极南部，属于这一群居址的还有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克拉斯基诺村和扎伊萨诺夫卡村附近的 I 号居址，它的发掘规模最大，出土资料也最丰富。

早在 1953 年，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居址，接着在 1954 和 1956 年由远东考古队派出分队进行发掘。居址座落在格拉德卡亚河流入考察队湾的河口右岸。该河在这里流过低洼的宽阔谷地。右岸高出河床约十五米，河岸的底层是板岩，上面部分地覆盖着疏松的第四纪沉积层，形成较窄的山脊。岩石重叠的山脊伸展到南部的湾岸上便变成北低南高的小山岬。它的表面平坦，形成一块小平；在朝海湾的方向，这块小平被附近克拉斯基诺村和扎伊萨诺夫卡村建筑施工的采石场的剥离面所切断，形成峭壁。这里的古代居址只保存下极少遗迹，因为其余的都被采石场破坏了。

发掘出几堆破陶片，当是遗址居民从主要生活场所的小坪（为采石场所毁）上扔下来的。看来这是古代遗址居民的一种垃圾堆，因为陶片杂乱无序，而且这里坡度很陡，不能住人。当时的人可能住在鸟窝一般的柱架茅舍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特别的细节：在主要文化层上面，沿断崖边缘有一层范围不大却很明显的锐角形板岩碎块，显然是由于山坡本生岩的风化和剥落而形成的。原来岩石重叠的山脊在小坪边缘突出一个尖棱，后来山脊逐渐剥落，掉下这些石块。因此，日常生活的抛弃物件起初是堆在这岩石嶙峋的山脊上的，后来山脊

的岩石散落下滑，盖住了新石器时代人丢弃的破陶罐和其它用具的堆积的很大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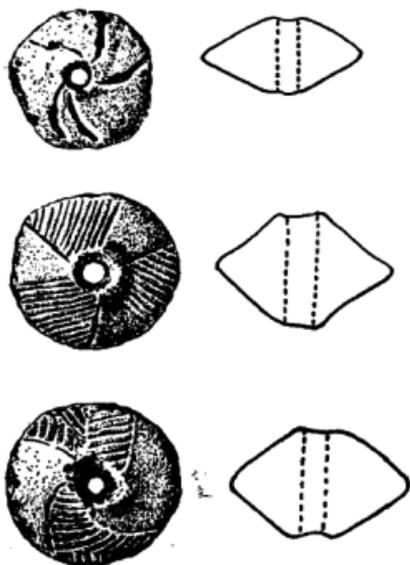
但在居址比较平坦的地段毕竟发现几堆大石块，堆成椭圆形或圆形，这是从前的灶。它们与奥西诺夫卡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灶址部分相似。这些石灶可能与某种窝棚类型的住所或简便的一般地面建筑有关，遗址居民至少在夏天住在这里。

在居址的文化层里发现大量的典型器物：石器、陶纺轮、陶片，甚至还有几件几乎完整的陶器。

从这些遗迹看来，格拉德卡亚河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居民同八道梁子河畔基洛夫斯基村附近遗址的居民一样，用黑曜石制作小型工具，大型石器则基本上以绿石板岩制成。

与基洛夫斯基村附近居址的大型砍伐器不同的是，这里出土的这类工具绝大多数都不是单面突起的，而是对称的，截面作椭圆形。因此，这不是磷，而是斧。

石刀和石镞大部分以黑曜石为材料。石刀用宽而薄的黑曜石片制成，一边或两边经过加工，一般是从背面修整，但也有背面和破裂面都加以修整的。有的石刀轮廓呈三角形，象莫斯特期的尖状器。这种石刀通常是以富有特征性的所谓鳞状修整法加工的，即在加工的石片上压削出几排宽扁的鱼鳞状石片(图二十)。



图十九 纺轮。格拉德卡亚I。



图二十 黑曜石制作的“莫斯特形”石刀。格拉德卡亚Ⅰ。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几乎完全没有通常的刮削器，而在北方的新石器时代居址中，这种刮削器是大量出土的。

黑曜石镞经两面修整，轮廓一般作长三角形，两侧稍外突。其中许多石镞底部内凹。有的还具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带有长短不齐的、不对称的后锋。

特别突出的是一种阔叶短镞，底部也有大凹口和不对称的后锋。

有各种形状的尖状器：有的在把手与尖头之间有明显的肩，有的肩部浑圆，通体近菱形(图二十一)。

格拉德卡亚河居址的陶器种类很多，但容器的器形和纹饰彼此却非常相近。

这些容器只能分成三大组。第一组是深腹“桶形”器，直壁，自底至口逐渐敞开。有的直口；有的微敛口而略侈唇(图二十二)。

有些容器上部非常敞大，是这一组陶器的一种特殊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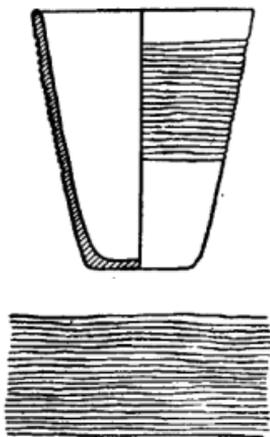
第二组容器是浅腹的钵，有的器底外沿稍外鼓。这些陶钵很象中亚现代的大碗。口沿一般为直口，有的略内敛(图二十三)。还有几件鼓腹容器，通体侧观象两头截断的卵形。

容器纹饰原则上非常一致。均系宽带纹，饰于浅腹钵的上部，深腹器则饰在口沿稍下方，约占容器高度的三分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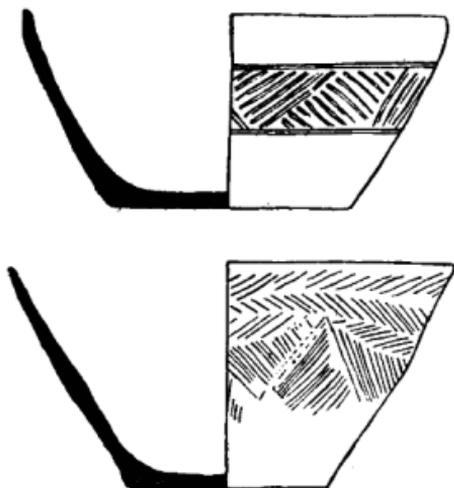
浅腹钵的饰带一般由下列纹样组成：1.平行的斜线划纹组成



图二十一 黑曜石器：1、3、5、7、8——刀；2、4、6——石核；
9、10、11——钻。格拉德卡亚I。



图二十二 容器。格拉德卡亚I。



图二十三 钵。格拉德卡亚I。

的三角纹，三角形的顶角向上与向下相交替；2.平行的纵列大之字纹；3.横列的几排斜线印纹。

深腹器饰带的母题基本上与大碗形的浅腹钵相同。多系纵行之字形划纹，次为平行的弦纹，以及平行的指甲纹。

第三组容器的特点是轮廓比较复杂，纹饰比较繁缛。器形为小底，大鼓腹，上部收敛成颈。唇均微侈。中部一般有折线几何纹^①的饰带。它的典型特征是折线几何形的条纹较窄，内填倾斜的压印篦纹。这种条纹经这样填充起来，并以素面的、往往磨光的器壁为衬底，整个容器便显得特别美观，给人以庄重的感觉(图二十四、二十五)。

这些容器尽管器形有所不同，但它们却作为一整套过渡的形

^① 折线几何纹(Меандр)是一种带纹，其特点是以类似回纹、卐字纹或锯齿纹等纹样为母题。这些纹饰母题的线条都是棱角分明的折线，姑且以此定其译名，以区别于其他的几何形纹饰。——译者

制彼此联系在一起，不用特别费力就可以把它们排成一个进化的序列。

这一序列从大碗形浅腹钵开始，然后依次过渡到敞口深腹器、直壁深腹器和上部微敛的深腹器，进而发展到轮廓曲折的、乍看象安德罗诺沃陶罐的容器。从敞口深腹器还演变到敛口深腹器。

以上是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居址典型器物群的主要特点。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器物同更早的遗存(如八道梁子河畔基洛夫斯基村附近的居址)有许多共同点，然而这个遗址的居民的物质文化却已经在许多方面大大向前发展了，尽管它的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

他们的经济基础即主要生活来源也应当与过去相同。和他们的直接前驱一样，仍然以狩猎和捕鱼为生。

关于这一点，就连从遗址的地形也可以得到部分证明。这个古代遗址位于海边，靠近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因此，居民们可以在河上和考察队湾从事捕鱼，采集“海洋的礼物”——可食的软体



图二十四 罐与钵。格拉德卡亚I。

动物、水草、海参和螃蟹，并猎取附近的各种鸟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居址出土的大型石器中还有一件典型的船形磨盘，它的略现粗糙的磨面是很有代表性的。

因此，有可能这里同捷丘贺一样，原始的农业已经萌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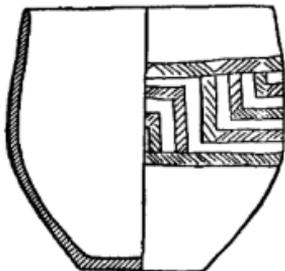
由此可见，滨海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在这个阶段已向新的经济形态即真正的生产性经济前进了一步。

滨海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也不是同其他部落相隔绝的，但

他们同南方即东亚的文化联系更甚于同北方的来往。

首先是同朝鲜新石器时代部落的联系。不言而喻，这些联系完全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滨海南部地理上靠近朝鲜，仅以图们江与之相隔。所以很显然这里存在过亲属文化和部落。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联系，下面简要地谈谈朝鲜的新石器时代，以及它同滨海南部新石器时代的关系。

关于朝鲜新石器时代，出土物最为丰富的一个居址是釜山府牧之岛（绝影岛）东三洞贝丘遗址。朝鲜新石器时代一般分为早、



图二十五 折线几何纹容器。
格拉德卡亚 I。

晚两期，前者与日本列岛绳文文化同期，后者接近于弥生文化。早期文化分为三组。第一组在朝鲜东北部，介于东北与苏联滨海之间。第二组在朝鲜西部沿海地区，以黄海道为中心。第三组在朝鲜南端釜山附近，东三洞居址即属此组¹。在釜山附近曾发现许多遗址，其中最重要的是东三洞贝丘遗址。在东三洞的发掘中，除

可食软体动物的甲壳外，还大量出土石器，包括黑曜石器：磨制的砍砸器、斧型器、半月形石刀、石坠，石镞、矛头和锯齿刃嵌入器。嵌入器以黑曜石制成，经两面压削修整，可能是嵌成石镰用的。

蚌器有“厨刀”和手镯。骨器有尖状器、刮刀、小钩、鱼叉、骨管珠。还有以野猪獠牙制成的饰物。

¹ 横山将三郎：《釜山府绝影岛东三洞贝塚调查报告》（《史前学杂志》5卷4号），东京，1933年。

东三洞的出土资料以陶器最为丰富。这些容器均系手制，不用陶轮。与滨海出土物不同的是，除平底器外，这里还有许多圆底器和尖底器。没有圈足器。但往往发现器底边缘加厚，象是萌发的圈足。

同格拉德卡亚河畔一样，这里有时也发现带耳的容器。有些陶器表面涂一层红色的赭石颜料。容器的装饰手法和纹样同滨海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同，虽然朝鲜南部的陶器总的来说纹饰比较丰富而多样，器形比较复杂，特别是口沿。

但两地的陶器毕竟有许多相同点。这些容器一般是截锥形小底深腹器，以之字形划纹为典型纹饰。

不仅如此，朝鲜的新石器时代纹饰在整体结构上也同滨海南部的纹饰相似，这是几排“杉针形”的带纹，每一排分成几段，彼此以尖角相对，从而构成纵行的菱形空白或图案。此外，东三洞新石器时代容器的其它一些纹饰，也与滨海南部相似。这些都是带纹，其母题有指甲纹、三角形印纹、由平行划线组成的三角形（顶角向上与向下相交替）和内填斜线的三角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东三洞存在复杂的折线几何纹，它以磨光的素面为衬底，以划线为轮廓，内填斜篦纹或划纹。这同滨海南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折线几何纹完全相同。

朝鲜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器也同滨海南部新石器时代有许多相同点，如斧、镰和各种小型的黑曜石制品。

这一切都明显地证明，朝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滨海南部相似。

亚洲的大陆文化无疑早就影响到日本。这些地区的古代文化很可能有过交互的影响。因此，日本的新石器时代也同滨海南部及朝鲜的新石器时代有许多共同点。

显然，滨海南部、朝鲜和日本的居民很早以来就有密切的联

系,并且可能是亲属部落。

滨海内陆部分的新石器时代居民

在滨海的南端同北部的山地和大森林之间,有一片兴凯湖沿岸平原,它的四周山峦环抱,境内则为绥芬河谷地和乌苏里江上游地区的河流所分割。

这片平原邻接很早以来就存在古文化巨大中心的东北。平原上到处都有中世纪高度文化留下来的大量而丰富的遗迹和农业、手工业遗迹。这是远东古代民族的必争之地。

无怪乎在兴凯湖沿岸和现今乌苏里斯克城附近,我们发现了前面谈过的滨海上古人类遗迹,以及随后的一系列富有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关于这些遗存的相互关系的全貌,尽管目前还有许多不清楚和费解的地方,但它仍能反映出各个部落各种文化的复杂关系和相互更替。

在乌苏里斯克城与兴凯湖地区,奥西诺夫卡山第二(由上往下计算)文化层即灰黄色灰化砂质粘土层中的出土物是最早的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

这里没有发现半地穴的任何遗迹。住所当是帐篷式或窝棚式的地面建筑,这可以从一处用花岗石仔细堆垒的圆形灶址得到说明。灶石的缝隙里、灶石上及其近旁有大量陶片和一些石器。

遗址居民使用的容器相当大,口沿附近饰有一圈宽带纹。带纹的成分是均匀分布成“棋盘”状的清晰的几何形印纹。最常见的印纹呈菱形,印窝或为平底,或在中央突起一个乳钉。这种纹饰特别美观而惹眼。偶尔也有分布均匀的扁椭圆形印窝。其中最好的标本便形成编织纹。

容器口沿上发现有斜线划纹,不过一般仍是素面的,只是稍微做得细致些。口沿与带纹之间往往留出一条狭窄的空白。

这些容器纹饰略有不同，它不是以印窝，而是以完全相同的直线条沟槽组成的纵向带纹。从清晰的线条和均匀的分布看来，作成这种带纹的工具可能是带方角齿的大篦子或带齿的轮子。还有一种印纹形状和它相似，但不是以篦子或轮子为工具，而是用有齿的小棒（即拍子）沿着未干的器表向后拉，忽深忽浅地向下压而作成的。

这种纹饰很象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特别是格拉兹科沃时期）常见的篦纹。它一直分布到中国长城；中国北部和蒙古所谓“细石器”文化的新石器时代居址，即出有这种纹饰的陶片¹。

目前还不知道奥西诺夫卡容器的通体形状。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它的形状非常简单。上部为直壁，没有弧度和折肩。下部内敛。器底可能是小平底，甚至是尖底。可惜没有发现器底陶片，所以不能确断。

奥西诺夫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居民有各种各样的石器。他们用质地较软容易打磨的绿岩磨制石斧。

石斧的典型特征是突刃，截面对称。

截面作椭圆形，有时两端较尖，形成扁桃形。

无论大型的斧，还是长仅六——七厘米、用以仔细加工容器和其他木器的小型工具都是这种形状。

小型石器有时也用绿岩制成，但多用黑曜石、矽质板岩或火山凝灰岩。这首先是镞或标枪头，均系新石器时代的典型形制，两面经细致压削修整。其轮廓作长椭圆形。下部三分之一的器身较

1 参见《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内蒙古·长城地带》，东京·京都，1935年，图版一五——12、13、14、19、21、22（巴音-诺尔、强垣-苏木和东苏尼特等地附近沙丘采集品）。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内蒙古上古史新资料》（评马林格著《蒙古史前期研究》），载《古代史通报》，第4期，1951年。

宽，上部收敛成尖锋。还有一种“梭鲁特”形制的尖状器残件，体宽而扁，呈树叶形，也是下部三分之一的器身加宽。这种工具可以是



图二十六 石器：1——小型石锤，
2、3、4——尖状器。奥西诺夫卡。

战斗使用的矛头，也可以是男人剥取兽皮肢解兽体的刀或匕首：视把的长短而异。

奥西诺夫卡中层的文化遗迹属于滨海内陆部分的一个古代部落。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可以从遗址靠近小河的位置得到了解。遗址居民可以在河里捕鱼。当时河面比现在宽阔得多，水量也大得多。

但是从出土的石锤、矛头和刀身（图二十六）看来，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同等的甚至更大的意义。

没有发现畜骨。也没有农业遗迹。但除狩猎外，采集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取得

必需的食用植物，如浆果、可食的根、野葡萄、雪松籽、榛籽，总之采集丰富的沿海自然界提供的一切可食植物。在这方面，沿海自然界比西伯利亚大森林远为富饶。

总的来说，奥西诺夫卡新石器时代遗址居民的文化在许多方面近似北方捷丘贺部落的文化。尤其是以“编织”纹装饰陶器的手法，以及除黑曜石外大量使用矽质岩石制作小型工具的习惯，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相似性（图二十七、二十八）。

显然,这个文化的发展水平同北方部落的文化相似,并与之有亲属关系。

但同一个乌苏里斯克地区,却另有两处遗存出土迥然不同的新资料。其中一处是先基纳帽遗址。这是一座岩石嶙峋的山岗,一个天然的要塞,它矗立在绥芬河宽阔的低洼谷地上,从远处即可望见。

这里发现的遗迹当属于人类生活的三个历史时期。

最早的文化遗迹是燧石和黑曜石的箭头和石片,以及磨制石砭和尖状器。砭是在先基纳帽发现的,它的特点是体积很大,但不象滨海新石器时代居址中常见的那样厚,而是扁的,作梯形,截面形状似一个透镜。



饰物有一件残白玉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陶器。发现圆筒形或小底直壁敞口作漏斗形的容器残片。器壁外表布满了非常眼熟的杉针纹,即以多齿大篦或有齿小轮作成的篦纹,类似阿穆尔河沿岸和东北的新石器时代居址出土的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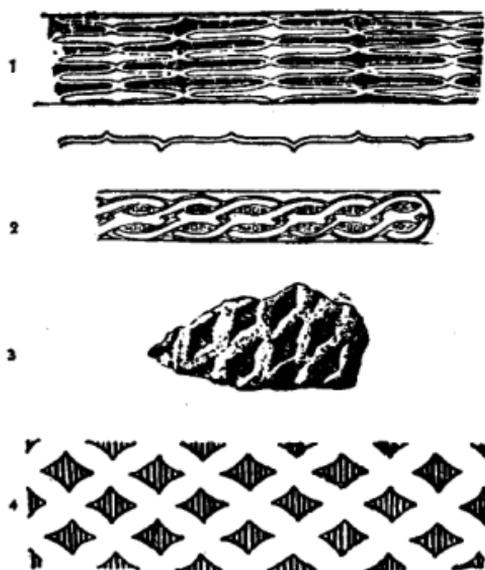


有一块陶片非常别致,它的纹饰类似阿穆尔河下游容器上以曲线划纹为轮廓、以篦纹为衬底的素面图案。



先基纳帽出土的这块陶片上所保存下来的就是这种图案的一部分。还有几件残磨棒应当也是这一层的,它们同捷丘贺居址、邻近的东北牡丹江流域某些新石器时代居址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音山达地区出土的磨棒完全相同。这些磨棒比较细窄,呈半月形,以磨面向一边倾斜为特点。

图二十七 阿穆尔河沿岸纹饰。
1—现代; 2,3—新石器时代(苏丘岛容器)。



图二十八 阿穆尔河沿岸纹饰。
1,2——现代；3,4——新石器时代。

种激烈的祸事，可能是不同起源、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即内陆部落同沿海部落之间发生了冲突。

这可以从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夹皮沟河谷年代较晚的出土物得到证明。关于这些出土物，我们以后再谈。

由此可见，由于兴凯湖沿岸地处滨海北方同滨海南方、东北低平原同阿穆尔河沿岸之间，因而这个地区存在不同起源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起初以表明当地居民同滨海北方相联系的遗迹为主，接着是同东北和阿穆尔河沿岸的联系，最后则是同南方沿海文化的联系。

甚至可以推断，新石器时代末期，兴凯湖地区原先的文化和居民已为新的（即南方的，更确切地说是沿海起源的）文化和居民所取代。

据此可以推断，在新石器时代，这里起初是一个与北方部落即“捷丘贺人”有亲属关系的居址；后来，仍是在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另一群部落，他们同东北和阿穆尔河下游的居民存在亲属关系。

不仅如此，尔后不久，新石器时代的兴凯湖沿岸地区看来又发生了某

滨海新石器时代部落的生活和文化

据上所述，滨海的三个文化区即南区、中区和北区各有特点，并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与某些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联系。例如，南方部落群的文化同朝鲜、东北和日本列岛的部落最为接近。北方居民则与阿穆尔河下游民族有较多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同东西伯利亚的部落相接触。但三个文化区也有许多相同点，使它们联成一体。

我们已经看到，远东古代居民同全世界其他部落一样，逐渐学会了磨制精致的石斧、石砬和石刀。他们有了弓箭，从而减轻了原始猎人的许多生活重负。制陶业广泛盛行，虽不复杂，但在生活中却是非常重要的。

远东新石器时代在上述一切方面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显著区别于其它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首先是不同于邻近的东西伯利亚广大森林地带当时的文化。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新石器时代远东诸文化的特点，必须把它们同东西伯利亚的新石器时代作一比较。经过这一番比较，便明显地看出，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同时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两个独立的文化区。

仅就生活来源而论，新石器时代的东西伯利亚部落即与远东部落显著不同。

东西伯利亚森林部落的生活来源几千年中都是猎取驼鹿、麂、马鹿和其它森林带动物¹。

远东部落无疑很早以来也一直从事森林野兽的狩猎。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8 期，1950 年。

在迄今所知的没有贝丘的滨海早期居址里，可惜连兽骨也没有保存下来。其原因当是这些居址气候潮湿，使兽骨全部破坏，消失得无踪无影。

只是由于炭化，才在捷丘贺居址里保存下某种鹿角器的一个残块。因此，现在无法肯定新石器时代滨海居民猎取的是什么野兽。

不过捷丘贺居址、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和奥西诺夫卡大量出土的各种形状的矽质岩和黑曜石箭头，表明狩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诸部落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设想，同较晚时期一样，主要的狩猎对象是鹿和野猪，这些动物能够提供肉食和缝制衣服的材料。

每年到一定时节，鱼类便开始从海洋涌入远东的河流。何况在这些鱼产丰富的河川里，鱼群本来就挤得几乎容纳不下。在堪察加、阿穆尔河流域、萨哈林岛，以及整个滨海边疆区为数众多的大小河道，情况都是这样，一到产卵期，鱼类便游入江河溪涧的最上游。

因此，无怪乎在当地居民特别是海洋和大河沿岸的居民中，捕鱼早就是最重要的谋生手段和基本的生活来源。

整个物质文化都表明了这一点，包括用鱼皮制作衣服，所以中国人称当地部族为“鱼皮鞑子”。

渔业的主导作用也反映在神话里，如关于鱼的儿子、关于人鱼婚配的神话，以及渔人世界特有的其他许多民间创作。渔人的意志和愿望总是在有关捕鱼的概念里打转。

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在远东从很早的时候起，即从新石器时代的最初阶段起，便表现出来了。

阿穆尔河沿岸的大型石器中往往有一种用火成岩石制成的穿孔棒槌，据老年的乌里奇人和基里亚克人解释，它的用途是打死网

住或钓到的大鱼——鲑鱼和鲟鱼。否则，渔人坐在易碎的小舟上就无法对付它们。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发达期的最初阶段，这里就不仅经常打捞小鱼，而且也往往捕获大鱼。

关于渔业的头等意义，还可以从新石器时代居址的地形得到证明。这些居址多在富产河鱼和海鱼的河口和大海湾附近。例如在捷丘贺河、格拉德卡亚河和八道梁子河的河口，都有出土物非常丰富的大居址。渔业及与之相关的采集业、海上捕兽业的发展，使滨海和邻近各地（北起堪察加，南达朝鲜及琉球群岛）居民的生活现在完全改观了。

由于食物比从前更有保障，人口便急剧增加。人类比过去更广泛更充分地开拓了大河河谷、沿海大陆和太平洋群岛。在这些地方，古代遗址和贝丘简直密如蛛网。1930年以前仅日本列岛便发现一万零八百七十六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六百十七个贝丘、三十个有文化遗迹的山洞和八十六处新石器时代墓地。在阿穆尔河沿岸、堪察加半岛、萨哈林岛、东北南部和朝鲜，也发现同样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同时，居址的性质也有了根本的变化。渔人和海上捕兽人不用在森林里奔波。他们停留在最利于撒网捕鱼的地方，身边带着贮备的干鱼，无需特别为食物操心便可以在这里过冬。他们只要专心致志地充分利用鱼类的产卵期，紧张而机智地度过捕鱼的“大忙季节”。

小型的住地为大型的村落所取代，出现了真正的石器时代村庄，每个村子住有几十人、几百人，甚至有可能住下整整一个部落，而不只是一个氏族。

随着生活的定居，住所也有了变化。在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域内，森林猎人依旧使用简便的、帐篷式的地面住所，上面盖以兽皮或桦树皮，类似北美印第安人现代的半球形房子（вигвам）或通

古斯-鄂温克人的圆锥形帐篷(чум)。

在远东的渔人中，搭有小型炉灶的临时性简易建筑（类似窝棚或遮篷）已为坚固的半地穴住所所取代。他们还建造特别的仓、晾鱼架子和干栏式的夏季住所。

我们已经从捷丘贺河河口的发掘资料中了解到这种聚落和住所。阿穆尔河下游的遗存也说明了这一点。

1934年在阿穆尔河河谷的苏丘岛上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半地穴住所。屋基是一个又大又深的竖穴，沿穴壁掘有许多柱洞。房顶以几根中心立柱支承，房顶上覆以泥土。住所内留有许多磨制石斧和石砭、燧石刀、刮削器、打死大鱼的棒槌，还有更多的陶片，有的几乎是完整的陶器，纹饰繁缛。这种情况说明，地穴住所的居民在这里不止住一冬一年。

关于阿穆尔河沿岸这类住所的古老年代，单从住所里填满泥土的现象就可以证明；也正是由于泥土堆到与地表齐平，所以很难发现。苏丘岛还有一些年代稍晚的大村落，住所是宽大的地穴，象蜂巢一样簇拥在一起。个别地穴非常宽敞，形如弹坑，深达四米，周长约九十米。

这种由半地穴式的宽大住所互相衔接而成的大遗址，在萨哈林岛和堪察加半岛也早有发现。

直到不久以前，阿穆尔河沿岸及其相邻地区还保存着这种半地穴式的古代住所。

据 Л. Я. 施坦恩别尔格说，在基里亚克语中，“进屋”的概念用“下去”一词表达，“出来”则说“上来”（直译应为“钻进去”、“钻出来”）。在过熊节的那几天，“几千年前的远古遗俗又活跃起来了，人们虔诚地严格遵循往昔的礼制，重新把冒烟的孔当成门户使用。他们带着熊皮和熊肉，顺着专门安装的杆子从烟孔里下到帐篷式的住所，再通过冒烟孔把所有礼器和准备用熊棺安葬的熊骨从住

所里取出来¹⁾。

虽然基里亚克人习惯上早就不用屋顶上的冒烟孔来代替门户,但那些形式古老的冬季住所即所谓“托雷夫”(Торыф),直到不久以前还保存着石器时代住所的外貌。

建造这种住所时,先在地上掘出一个大穴,穴壁加以夯实,有时还贴上一层木料。穴内埋四根立柱,柱上架四根椽;然后以密密排列的细圆木椽搭在穴壁和椽上,并以干草和泥土先后覆盖加固——这样便盖成四角攒尖式的屋顶,尖端则留出一个冒烟的孔。门道在最避风的一面,象隧道一样向住所内倾斜而下。每逢晚秋寒冬时节,基里亚克人帐篷形的土房便盖上一层白雪,犹如一座小雪丘,仅尖顶因冒烟而略显黑色²⁾。

根据 В. И. 约赫利松的详细描述,在沿海定居的科里亚克人中,古老的半地穴式住所也是这种形式。这些住所大小不一,随居住人数而定。早期房子很大,晚期的则往往是小屋。约赫利松在科里亚克人中进行调查时,这样的房子共一百一十所。最大的住二十一人,分属两家。一般的住六到十三人。另有一所住十五人,长十五米(不计门道),宽十二米,高七米。

科里亚克人修建房子,先在地上掘一个一米半深的圆坑。继而在坑内筑起不等边的八角形墙壁:每个角上埋一根立柱;各立柱间竖埋两重细圆木或劈开的木杆,夹层填以干草;八根角柱的顶端均砍有缺口,上置簷椽,内重细圆木的上端即顶在簷椽的凹槽里——这样墙壁便筑成了。再在地基中央埋下支撑屋顶的四根立柱,均匀分布成方形。大房子的这种立柱直径达三十厘米,高五——七米以上。柱顶置椽四根,形成方框。然后把椽子斜架在椽

1 Л. И. 施捷恩别格:《基里亚克人》,载文集《基里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阿依努人的研究与资料》,哈巴罗夫斯克,1933年,第17页。

2 Л. И. 什连克:《论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第2卷,民族学部分,上半部:《生活的主要条件和现象》,圣彼得堡,1899年,第12页。

上和墙上，盖成屋顶的四个坡面。剩下的四个三角形空档用木杆搭盖。墙壁里和屋顶上塞入或铺以干草，并以挖掘房基时取出的泥土覆盖其上。为了更牢固地支撑屋顶的重压，另在中央立柱形成的方形边线上埋三根立柱（靠门的一边不埋）以为辅助。

科里亚克人冬季房子的特点是屋顶有一种漏斗形的结构，以防止暴风雪时大雪埋住门口。房子外面埋有木柱，支撑着这个漏斗形结构的边缘。冬天，人们顺一根圆木从烟孔进入房子，圆木砍有脚窝，当作梯子。夏天则撤去木梯，并敷以油脂，为之唸咒，使邪恶的鬼魂不致顺梯而下。这种圆木梯是一种家庭保护神，所以顶端刻成人面形状。

房内有一土台正对门道，这是坐的地方，也是客铺。台上铺木板，再覆以鹿皮或海豹皮。土台上方靠墙壁处存放家具。

土台右侧是男主人的位置，左侧是其兄弟、亲属和邻居的位置。立柱后面是睡觉的地方，铺有树枝、干草和兽皮，并以木杆同中央隔开。铺上挂兽皮帐子，白天则用绳子吊在上方。睡觉时头向房子中央。屋内墙角及主客铺位之间的空地是堆放东西的地方。鱼网、狗套、狩猎装备、鞋靴、滑雪板、碗碟及其它生活用具置放于此。

靠近门口距圆木梯五十厘米处安灶。灶用两块长石板作成。每天生火二、三次，一般朝夕两次。室温达二十度；房内烟雾腾腾，人站着就要熏眼，虽然开着门道通风。

房子门道形如走廊，开有几个面向海的门。冬天，门道用作堆栈，夏天则径直敞开。这样不仅出入方便，而且按照科里亚克人的信仰，可以让海兽登门作客。如果在海上捕兽已告一段落的冬季也敞开门道，那么次年夏天海兽便要避开这所房子，房内住户打猎也就不会吉利¹。

1 W. 约赫利森：《科里亚克人》，第2部，《物质文化与社会组织——杰塞普北太平洋考察队的收获》，载《美国民族史博物馆通报》，纽约，1908年，第453—461页。

亚洲东北部其他沿海部落（包括十七——十八世纪阿依努人和堪察加人）的半地穴式冬季住所也具有类似的结构。С. 克拉舍宁尼科夫¹和Г. 斯捷列尔描写过当时堪察加人的住所。这些住所建造时都是先掘地穴，然后在穴内筑墙，再盖上四角攒尖式的土房顶。大多有两个门：冬天以烟孔为户，夏天则使用隧道式的门道。住所上部被冬雪盖住，宛如一座圆顶的小山丘²。

四、五千年前远东的新石器时代住所应当也是这种式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科里亚克人、阿依努人和居住这种房子的其他部落中，住所的墙壁用一、两重竖埋在地上的木杆构成。捷丘贺山岬和阿穆尔河苏丘岛上的新石器时代住所也是这样构筑墙壁的。

可见阿依努人、科里亚克人和远东北部的其他部族保存了新石器时代的建筑的传统，也可能保留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特点。

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定居生活方式还表现在许多生活细节上，这些细节虽则微小，却很能说明问题。

例如，阿穆尔河沿岸及其相邻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容器都做成适合于放在平地上，也可能是放在地穴式住所的吊板上。所以这些容器都是平底器，没有邻近的西伯利亚森林猎人使用的那种圆底器和尖底器。同时，容器体积很大，其容量比西伯利亚的圆底罐大得多。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地穴的容器有的高达四十——五十厘米，日本列岛出土的竟有高达一米的。这可能不是炊器，而是真正的陶仓。此外，阿穆尔河沿岸不仅出有用作炊器、布满烟熏痕迹的结实的粗陶罐碎块，而且往往发现份量较轻、质地疏松的红

1 С. 克拉舍宁尼科夫：《堪察加见闻》，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第374页。

2 Л. И. 什连克：《论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第2卷，民族学部分，上半部：《生活的主要条件和现象》，圣彼得堡，1899年，第11—12页。

W. 约赫利松：《东北亚和西北美诸部落古代与现代地下住所》，《俄国人类学会年鉴》，第II卷，1905—1907年，第16—56页。

底螺旋纹黑彩陶片。

再如制作衣服和用具，新石器时代的森林猎人用兽皮和桦树皮，而沿河和沿海的渔人则广泛利用植物纤维，这种区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直到不久以前，远东不少部落还用原始的方法从事编织和纺织，这对通古斯人和原始森林中的其他狩猎部落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阿穆尔河沿岸的那乃族及其邻人（乌里奇人、基里亚克人）过去曾辛勤地采集村子附近大量生长的野苧麻，用它的纤维织网，更早时候还用来织布做衣¹。他们现在也能灵巧地编织草席和各种形状的篮子，往往还以奇妙的彩色花纹装饰这些制品。阿依努人古时不仅广泛使用草席或草篮，而且所有衣服都是用植物纤维织物缝制的。直到现在，他们还把从前主要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服装——长袍称为“阿土施”(артуш)，意即“纤维”或“柞树织物”。

在堪察加半岛，到克拉舍宁尼科夫所处的时代，伊里门特人还广泛利用植物纤维从事编织和纺织。他们常用苧麻织网，用别的草织席编篮。据克拉舍宁尼科夫报导，“海滨有草，其形似麦，秆高色白……土人以此织席，用作地毯、帘帷。佳毯梳鲸须以织纹饰，状如棋盘或其它图形。又以草织箕，若吾人昔之蓑笠，里平外茸，雨着其上乃顺毛而滴”²。

这种席子和植物纤维织物的印痕往往见于日本列岛新石器时代容器的器壁；而在科列卡瓦泥炭田里，甚至完好地保存着几块席片和几件完整的编织容器——篮子。

此外，大量出土的陶纺轮（有的用破陶片做成）也证明新石器时代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盛行纺织业。有些纺轮也有可能是当作

1 Л. И. 什连克，同前书，第93页。

И. А. 洛巴金：《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果尔特的民族学研究》，载《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学会通报》，第XVII卷，符拉迪沃斯托克，1922年，第146页。

2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同前书，第237页。

织机的部件——坠子来使用的。

长期的定居还促使人们的社会联系日趋密切。建造面积宽敞的新石器时代住所，只有人数众多而且非常团结的集体才能做到。值得注意的是，据公元初年中国人的记述，在距离阿穆尔河不远的马韩国，住所的主要形式是半地穴式房屋。

在阿依努人中，古老的半地穴式冬季住所也是以全氏族的人力集体修建的。至十九世纪末，由于氏族公社的解体，这种住所便绝迹了。这样一所帐篷式的半地穴住所，单凭一家人的力量是无法建造的。

但是，这些由集体的力量建筑起来的宽大住所不是分属各个家庭，而是统归公社所有。

阿依努人的帐篷式住所每个都住有几个家庭，每家各自安灶。Л. Я. 施捷恩别格在萨哈林岛上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地穴同日本列岛一样，每一所都有几个灶，显然分别属于各个亲属家庭。

这种以血缘关系和公社经济为基础的同氏族人的密切联系，也反映在村子的布局上，尤以数十个住所簇拥于一处的现象显得最为明显。这些住所紧密相连，的确就象“一个家庭”，一个由许多细胞形成的巨大机体。

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机体，如我们所知，是母系氏族。

在民族学材料中，母系氏族的残余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要了解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间接表明女性享有崇高地位，表明她们在氏族公社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考古学资料。在日本列岛全境，特别是往往在其东北部，发现一种特异的人形陶塑。

截至1929年，各地发现的人形塑像达八百件以上（四百二十四个居址）。一般为两手下垂的人像，特别细致地表现出衣著细部和可能是文身的模样。有的大眼突出，有的头饰繁复。均系居址

出土，绝不见于墓葬。

许多塑像明显表现甚至过份地突出女子性征。男像较少。

大量制作雕像是当地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其雕工精致，衣着复杂，又只见于住所，表明它们在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塑像的含义同西方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的类似雕像一样，而且同欧洲和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女像相似。在日本列岛新石器时代居址的雕像中，可以见到母系氏族时代神话中的“女王”和“女性始祖”的形象。

在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境内，目前还没有发现陶制的女像，但却有石雕人像，其含义当与陶像相似。其中一件用白色半透明玉髓精致修整而成，与捷丘贺河河口的石器共出。在堪察加半岛，这种经过修整的雕像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附近塔里亚湾的一处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居址里也曾有发现，其造形虽属简略，却分明表现人体立像。

女性始祖崇拜和祈求多育的观念一般总是同祝贺生育的礼俗及成丁礼相联系的。

远东的新石器时代部落无疑也有这类礼俗。在邻近的日本列岛，新石器时代墓地的男性骨架往往在骨盆部位有祖形坠子；居址里则经常发现称为“石棒”的石祖，同样证明盛行祈求多育的礼俗。

滨海地区也出了一件形象逼真的祖，证明当地部落中流行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和对男性生殖力的尊敬。这件祖收藏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博物馆里。

为了全面而清晰地了解整个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文化，必须谈谈有关他们经济生活的一个头等重要的事实。

远东新石器时代部落经济生活方式的上述进步因素最初都是在渔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新出现的经济部门——农业很早就为

这些进步因素增加了新的基础，并以强大的动力促进它们继续发展。

滨海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证明，当时的滨海居民确已有了农业，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

滨海主要的新石器时代居址都出有磨棒，偶尔还有磨盘。早期磨棒形制独特——窄而厚，弓背；磨面均向一侧倾斜。这种磨棒在捷丘贺上下两层均有发现。不过下层出土的器形比较粗陋。在先基纳帽也曾发现这种弓形磨棒。

上文说过，捷丘贺居址上层还出土一件出色的大磨盘，其磨面略显粗糙，背面边缘饰有阴纹。

格拉德卡亚河畔 1 号居址还出土一件比较进步的船形磨盘。

根据过去 Ф. Ф. 布谢在伊凡诺夫卡的发现可以证明，这些工具确实不仅用来碾压野生可食植物的籽粒、果实和根，而且用以加工粮食。

布谢在发掘一个小型的地穴式住所时，在一俄尺深处发现一个用三块石头支锅的灶或“生火遗迹”。据他说，在同一深度又发现几件被石块压碎的大罐，罐里残存着“炭化物”¹。布谢在 1893 年发表的发掘报告写道，容器里的炭化物是“谷粒”²。地穴北部出有“黑曜石刮削器”。布谢说，这个地穴式住所是由于火灾而毁坏的，因为发现有红烧土、烧焦的立柱和屋架。谷粒也因此以炭化状态保存下来。在近旁的几个大地穴里，发现有灶址、石矛头、黑曜石刮削器和容器的把。

新石器时代滨海的农业是从哪里、沿着什么路线传来的呢？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东亚农业的故乡是中国。处在萌芽状态的农业很早就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传入邻近的东北辽河和松花江流

1 全苏地理学会滨海分会档案中所藏布谢手稿。

2 《远东》，1893 年。

域，并由此传入滨海。因此，无怪乎东北和滨海都出有完全相同的捷丘贺型弓形磨棒和较晚期的船形磨盘。

由此可见，滨海新石器时代部落的经济和文化是一直向前发展的。他们已经从攫取自然界现成产品的原始经济即从狩猎和采集向着可食植物的栽培即萌芽状态的农业过渡，可能也向着初期形态的畜牧业过渡。

他们还创造了相当发达而独特的文化。总之对当时来说，他们是能很干的、日益兴旺的部落。

最后，关于滨海的新石器时代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谈，这对于这些遗存的历史研究，对于了解它们在滨海上古史上的地位，都具有头等意义。在复杂纷繁而又非常零碎的滨海新石器时代图画上，还缺乏确切的、能够说明各个文化绝对年代的断代材料。

关于这些文化存在的时间和滨海新石器时代的上下限，我们没有一套明确的标志。但决不能因此就不去探讨滨海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断代问题。如上所述，滨海新石器时代同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许多联系和相似之处，这就为我们进行这种探讨提供了资料。

因此，根据这些共同点，对照邻近地域内经过深入研究的遗存，我们便可以大致断定滨海新石器时代的年代。

在这方面，头等最重要的当然是关于滨海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互有联系的事实。上面谈过的滨海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相互联系虽然为数不多，但却非常重要。

典型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存是出有仰韶彩陶的遗存。在东北的南部，同仰韶遗存的年代相当的是沙锅屯洞穴墓葬这个出色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沙锅屯洞穴对于研究滨海及阿穆尔河沿岸新石器时代居民同东北新石器时代发生联系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形制相同的容器，以及钻、镞等石器，都证明有过这种联系。同时，沙锅屯洞穴又证明东北新石器时代同仰韶文化有联系，因为洞内发

现了与甘肃、河南的陶器完全相同的彩陶片。因此需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洞穴。

沙锅屯洞穴位于满洲西南，在京沈铁路上，距辽东湾不远。

在灌木丛生的山坡上一个狭小的山洞里，发掘揭露了几层文化层。最底层含有人类短期居住遗迹，出有几块彩陶片和之字纹陶片。洞里的发现物几乎都集中在自下而上数第二层。这一层最厚，被炭粒染成漆黑，而且与其它几层不同，即堆满了人骨。与人骨一起，出有大量陶片、石器和骨器，特别是饰物。这显然是葬人的洞穴。洞内保存了四十多个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死者的遗骨。人骨散乱无序，而且都被压碎。其中许多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只有一个头骨多少比较完整；头骨内有啮齿类动物的牙和小骨骼，人的指骨和其它骨骼，还有几颗石珠，均与含炭泥土混在一起。

研究者们一心想解释这个奇异的发现，便推测这个洞是食人肉者的住所，甚至说从前这里的居民受到食人者的侵袭，当场被打死吃掉。

但是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有可能人骨是埋在灰层里，因火葬而被烧焦的。这样才能够理解所有骨骼都被压碎的缘故。只是不清楚尸体焚化的地点。很可能就在洞里，因为埋有人骨的灰层很厚。不过也有可能先在洞外焚化死者，然后把骨殖和柴火灰烬抛入公共墓葬。

也只有这样才容易理解新石器时代通常的随葬品与人骨共存的现象；这些随葬品包括劳动工具、陶器，以及死者衣服（火葬时被烧毁）上的饰物和护身符。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属于某个特定类型的墓葬遗存，即集体墓穴，看来是某个氏族公社的许多成员的埋葬地。

洞里发现的随葬品有陶片、四件不大的磨制石斧、镞、刮削器、钻、针和针盒，以及个人饰物如大理石管珠、球形纽扣、大理石璜、

贝壳瓔、模拟“猫”(虎)的大理石小雕像。用矽质岩石制作的钻和刮削器，特别是以后锋不对称为特征的两面修整的石镞，都同东北、林西、蒙古人民共和国、滨海、阿穆尔河沿岸以及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此外，大理石瓔和截面作规整的扁椭圆形的磨制石斧也近似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基多伊期的遗存。

洞中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两组，二者在形制、胎质和纹饰上都有显著区别。第一组有一种截锥形的粗陶器，只有附加堆纹。它同东北、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新石器时代典型的平底器相似。

第二组有一些彩陶片，彩绘富于特征性，即在红色衬底上施以黑色的曲线花纹。这类陶片同其余的陶片迥然不同，而与甘肃、河南仰韶文化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非常一致，说明原来的容器或是从那里运来的，或是由不知怎样来到这里的石器时代中国陶匠制造的¹。

由此可见，东北、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与中国北部的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同一时期并行发展的。仰韶文化的繁荣期以仰韶等地居址和半山墓地所出的螺旋纹彩陶等典型遗存为代表，这支文化的年代未必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或末期。因为这些遗存早于城子崖文化和根据安阳的光辉发现而得知的商殷文化，安阳是公元前十四世纪盘庚建立的最后一个殷都的所在地。

根据中国典籍的传统说法，商殷朝始于公元前十八世纪。即使按照较晚的断代，商朝的建立也决不会晚于公元前十六世纪。

因此，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公元前第三千年至第二千年中叶，

¹ 安特生：《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古生物志》丁种第一号第一册，北京，1923年。

正当中国和日本的新石器时代达到极盛时期，我国远东的阿穆尔河下游和滨海南北各地也最后形成了与之同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上所述，这些文化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在同邻人发生各种联系的条件形成的。

这个一般性的结论还有一个证据，即远东文化与日本列岛的绳文文化相似。根据这种相似性，滨海新石器时代发达期的年代也应大致断为公元前第三——第二千年。

这个断代的根据是日本姥山贝丘遗址（格罗奥特断为绳文文化晚期）所出木炭的放射性碳素分析的结果。姥山的这些木头标本与堀之内式的陶器共存；根据放射性碳素的分析，其年代约为公元前二千五百年。

我国远东新石器时代部落究竟是哪些民族呢？他们同后来亚洲东部各地居民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当然，目前不能确切断定石器时代的人同现代部落和民族的关系。二者在时间上距离太远了；在这段时间中，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事件，甚至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灾难。

但是研究者们毕竟在这方面掌握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事实，需要在这里简单地用上几句。

首先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纹饰。亚洲民族文化的研究者们早就注意到，有两种根本不同的纹饰在阿穆尔河流域相汇合。

早在十九世纪，著名的旅行家和西伯利亚民族研究者 A. Ф. 米登多夫就指出，阿穆尔河沿岸有两个迥然不同的文化民族区。

例如阿穆尔河边有一支通古斯语系的涅吉达利策人，他们已经接受了阿穆尔河流域定居部落的物质文化。尽管他们的语言是米登多夫非常熟悉的通古斯语，但他一到他们那里，就立刻感到仿佛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民族中。那些服装的式样、服装上的花纹和金属饰物的特点，都表明它们统统“起源于另一种服饰的中心，

从属于另一种风尚”¹。

十九世纪上半叶另一位杰出的阿穆尔河沿岸民族研究者Л. И. 什连克也曾指出这一点。在基里亚克人和其他的阿穆尔河沿岸渔业部落的纹饰中，他所看到的不是西伯利亚大森林通古斯诸部落特有的那种单调而简朴的圆形、三角形和四边形几何纹，而是“线条错综复杂的宽带纹、奇妙交织的阿拉伯式花纹和华丽的涡纹”²。

在落后的森林部落中，在这些生活简单而原始的渔猎人中，竟然有出人意料地华丽繁缛的阿穆尔河纹饰，这不能不使研究者们感到惊奇。

有些学者竭力想解释这种发达的纹饰同原始生活方式不相称的现象，便认为它仅仅是中国纹饰的反映，是中国的高度文明对阿穆尔河沿岸部落发生文化影响的结果。例如Б. 劳费尔就断言，“愈接近中国文化中心的民族，其艺术发展水平也愈高”³。

但是，早在劳费尔以前五十年，专论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头一部经典著作的作者Л. И. 什连克便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写道：“奇妙的是，在阿穆尔边疆区，与中国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正是他们决定着纹饰的发展趋向）的距离愈远，人们对纹饰的兴趣和纹饰的发展不是愈弱，而是愈强，终于在最边远地方的基里亚克人中达到了最高的水平。”⁴

的确，恰恰在阿穆尔河下游，在远离直接接触中国文化的地区，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艺术风格具有最纯粹的、自成一体的性质。同时，这里的艺术风格到处都是完整而稳定的，以致十九世纪

1 А. Ф. 米登多夫：《西伯利亚北部与东部游记》，第 II 册，第 6 节，圣彼得堡，1878 年。

2 Л. И. 什连克，同前书，第 89 页。

3 Б. 劳费尔：《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载《美国民族史博物馆通报》，第 VII 卷，1902 年。

4 Л. И. 什连克，同前书，第 90 页。

未劳费尔搜集品同五十年前什连克收集的标本完全相同。

考古发掘表明，这种风格早在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存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苏丘岛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地穴式住所里发现了纹饰繁缛精致的陶器。大型容器的外表往往布有之字形印纹，以它为衬底，上面又做出线条流畅宽大、刻划很深的大型螺旋纹和分布其间的三角纹。

有些容器不仅用刻线，而且用彩绘表现复杂的螺旋纹。在挂有深红色陶衣的光亮器表上，刻出很深的带纹，再填以深黑色的颜料。

不久前有些地方保存的那乃人和基里亚克人的古老建筑，也是以这样的彩色螺旋纹为装饰，显得非常华丽。除螺旋纹的各种变体外，阿穆尔河沿岸部落的以宽带纹交织而成的菱形格网纹也达到了高度水平。如上所述，在滨海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母题的纹饰，虽然有的比较简单，但有的也很复杂（图二十七、二十八）。

同十九世纪即什连克和米登多夫的时代一样，新石器时代的远东部落与邻近的北亚狩猎部落的艺术也是根本不同的。

在叶尼塞河、安加拉河、勒拿河沿岸、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跟这些地区后来的通古斯部落相同，也是以简单的直线几何纹占优势，并有之字纹、三角纹和平行带纹；直线几何纹的特点是长的横线与短的纵线垂直相交。

可见当时同现在一样，艺术传统迥然不同的两个特殊领域在阿穆尔河沿岸相汇合，一个是东西伯利亚狩猎部落的领域，一个是远东渔人和农人的领域。

东西伯利亚文化同远东文化的上述渊源上的不同，还可以从民间创作即传说和故事中得到证明，这些作品对当地民族实际上

起着文字史料的作用。

远东部落民间创作中有一些题材对北方阿穆尔河流域寒冷的自然条件来说是很不寻常的。

当人们向果尔特-那乃人问及哈巴罗夫斯克附近萨卡奇-阿梁村边阿穆尔河畔岩画的起源时，他们回答说，这些岩画是太古时代刻划的，那时天上的太阳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因而气候酷热，岩石象石蜡一样熔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上面对刻画。

另一种说法是，萨卡奇-阿梁的岩画不是画的，而是各种生物留在烤软的岩石上的印痕¹。萨满说，当时“大地象开水一样沸腾，山脉象阿穆尔河，阿穆尔河也象山脉”。由于气候酷热，所有生物都几乎无法生存，甚至鱼类也不断死亡。

直到第一个萨满卜出需要杀掉两个多余的太阳，这种状况才告结束。他杀掉了两个边上的太阳，“留下中间的一个……滚开的洪水凝成了山，滚开的山变成了河。此后日子才好过了，子孙也好养活了”。远古神话里的生物在萨卡奇-阿梁的花岗岩上印下的痕迹冷却下来，成为那个时代和头一个萨满的丰功伟绩的纪念碑。

在遥远的北方，太阳总是朋友，而不是敌人，然而却产生了这样的传说，真是难以想象。

在靠近赤道的南方，情况则完全不同，热带的骄阳至今还烤炙着大地，就象果尔特人神话里的三个太阳那样无情。

据普卢塔赫说，埃及的神话是以月亮同太阳的对立为中心的：“月亮以滋润的光线促进动物繁殖、植物生长；但她的敌人蒂风即太阳，却以其摧毁一切的火焰烧死所有生物，以其酷热使大部分土地不能居住。”赤道非洲的人也把太阳视为共同敌人，怀着恐惧心理看着日出。

墨西哥的神话中说，从前的人向人形的太阳射箭，以减弱他的

1 Л. Я. 施捷恩别格，同前书，第 455 页。

热度，因为那时热得使地上的万物都面临着化为灰烬的危险。这就是说，他们的做法同果尔特人神话里的第一个萨满相同。

这个传说在玻里尼西亚部落的神话里同样广泛地流传着。随着他们分居到太平洋各群岛上，可能这个传说也在岛屿上传开了。

古代中国也有这样的传说。据 C.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说，“古时尧帝有一天发现天上有十个相同的太阳，便授命有名的射官夷羿射击九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太阳，把它们打下苍穹；夷羿遵照尧帝的旨意，用箭消灭了真太阳的竞争者，射死了九隻变为太阳的乌鸦；据说这场神奇的射击的目击者还能看到乌鸦羽毛纷纷落下的情景”¹。

由此可见，几千年间住在阿穆尔河以北的是亚北极带森林猎人的后代，他们的文化最鲜明地表现在贝加尔湖沿岸新石器时代墓地和遗址的出土物上。住在阿穆尔河以南的则是拥有南方文化的另一群部落。他们的后代至今还保存着繁缛的“螺旋纹一带纹”的装饰和石器时代传说的片断。这就是所谓阿穆尔河的古亚细亚人——尼夫赫人（基里亚克人）、乌德人和一部分那乃人。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远东的古代居民及其文化不是无踪无影地消失了，而是在滨海北部和阿穆尔河流域保存到现代。

但是，不能设想滨海和阿穆尔河沿岸四、五千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是同一居民的文化风平浪静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历史上无疑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复杂的悲惨事件。

例如，科米萨罗沃村附近哈林斯卡亚山谷古代居址（兴凯湖地区兴都河^①流域）的出土物就反映出远东历史上充满风暴的一页。三千年前，在这寒冷荒僻的深山里两个峡谷之间的一座山岗顶上，

1 C.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圣彼得堡，1892年，第27页。

① 兴都河（Сингухэ），音译，疑为石头河（Ситухэ）之讹称。——译者

曾有一个大村落。半地穴式的住所排列成行，各排相距很近。发掘揭露了五个住所。沿穴壁都有明显的台阶；居住面边缘有一圈柱洞。

在三个地穴的中央发现了灶坑；另两个地穴的灶则是用石块堆成的。住所内出有大磨盘、磨棒和石镰刀；另有一件石犁头，与朝鲜新石器时代居址出土的相似。这些出土物证明，住所居民主要从事农业。

遗址居民的文化总貌表明，他们是滨海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直接后裔。他们的住所布局和结构上都同捷丘贺湾地区新石器时代居址的住所相似；陶器也相一致。但这个居址的某些器物则表明居址的年代较晚。如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青铜矛头和青铜钮扣的石料仿制品，都属于这一类。

住所里一眼就可看到大量完整的陶器，器形和尺寸都比较复杂，从小型的陶钵到大型的陶仓都有；后者当是贮食的容器。

那些被泥土压碎的容器，完整的和损坏的斧、刀、磨盘和磨棒，以及动物（熊、虎）的简略雕像和圆形的玉髓小卵石，都杂乱无序地放着，仿佛是被人突然抛弃的。其中动物雕像和玉髓卵石很可能是儿童的玩具或护身符。

总之，住所内部的情况使人觉得这个古代遗址遭到了突然的灾难。有可能哈林斯卡亚山是滨海境内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被敌人赶出去时的最后避难地之一。

很难说那些新来的人是谁，他们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在肃慎的地域内。但是我们握有一定的考古资料和某些文字史料，这些材料不仅可以部分地说明哈林斯卡亚山谷古代遗址居民的遭遇，而且可以说明公元前第一千年初这里所发生的事件的性质。在这些资料中，具有头等意义的就是考古学文献中称为“贝丘”的大量而特殊的滨海考古遗存。

第四章 贝丘时代文化

公元前第三——第二千年，远东居民的新石器文化已经达到了当时的高度水平。

阿穆尔河沿岸和滨海的古代部落，已经善于磨制石器，使用弓箭，并在纺织和木、骨加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住的是大型的居址，即由许多集体住所组成的完整村落。他们的社会结构无疑是充分发达的母系氏族制。

但是，远东部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水平上。他们的生活逐渐地、不断地向前发展。所谓贝丘的出土物便是明显的证据。

在大陆沿海和太平洋众多的岛屿上，从印度支那到阿穆尔河口，到处都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在这些贝丘里，除贝壳和鱼骨外，还埋藏着磨制石斧和其它石、骨制品，以及陶器的碎片。

我们已经知道，滨海境内的贝丘最初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现的，И. А. 洛巴金的手稿已有记载。稍晚，М. Я. 扬科夫斯基、В. П. 马尔加里托夫和其他研究者对贝丘作过发掘。

研究者们对这个原始文化总的印象非常强烈。他们从滨海的贝丘一下子就联想到北欧著名的贝壳堆积即丹麦的炊爨遗迹，在这些遗迹所属的时代，在波罗的海沿岸居住着采集海里可食软体动物，还不知道磨制石器的原始人。

在当时，人们还觉得火地岛的居民与滨海贝丘遗址的部落在民族学的特征方面也很近似。查理士·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火地岛的居民奥恩人、阿拉科鲁符人和

雅甘人。

达尔文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头一次看到火地岛的一小群土人聚集在荒僻的、岩石嶙峋的海岸上时，我是多么惊奇，因为我那时立刻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原来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

他说，火地岛人以软体动物为主要食物。他们经常游动，但定期返回原来的地方，这可以从往往数以吨计的旧贝壳堆得到证明。

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海潮一退，他们就得起来采集岩石上的软体动物；妇女们不是潜入水中捕捉海胆，就是耐心地坐在独木舟上，用没有钩子但装有鱼饵的钓丝，不时地以急速的动作钓起小鱼。如果打死了海豹或在海里发现了鲸鱼的腐尸，那就算是遇上过节了；除了这些难吃的食物外，还添上少量无味的浆果和蘑菇。

“这些人完全赤身裸体，装饰粗俗，披头散发，满嘴唾沫，脸上带着凶恶、惊奇和怀疑的表情。他们几乎完全不懂艺术；象野兽那样，依靠捕获的野物过活。他们根本没有法规，对于不属于他们小部落的一切，概不留情。”¹

但是，1953年对滨海贝丘所作的缜密研究，却揭示出这种文化的崭新面貌。发掘结果表明，滨海古代居民即“贝丘遗址的人”及其文化除了贝壳堆积之外，与1832年12月查理士·达尔文在火地岛海岸所见的蒙昧情景毫无共同之处²。

1 Ch. 达尔文：《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莫斯科，1953年，第252—254页。

译注：奥氏的叙述和引文，与周邦立的中文译本《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9月）大意虽同，但文字颇有出入，这或许是版本不同所致（周译本是按照1876年、1906年和1930年的三种英文本翻译的）。我们这里按奥氏的叙述和引文来翻译，并参考周译中文本。

2 A. И. 奥克拉德尼科夫：《远东各民族文化的渊源》，载文集《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古代文化遗迹》，莫斯科，1954年，第248页。

贝丘遗址的分布及其性质

滨海的贝丘最初是在锡迭米河河口附近和考察队湾附近发现的。迄今所知,从苏朝边境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都有这种类型的贝丘。

在这类遗存中,最有代表性的、大量的、研究得最为透彻的贝丘集中在阿穆尔湾和乌苏里湾沿岸这个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南起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北迄麦河河口。日本海的某些岛屿上也有几处。

例如,分布在从克拉斯基诺通往波谢特的公路桥附近的格拉德卡亚河两岸、锡迭米河河口的扬科夫斯基半岛、沙磧半岛、绥芬河河口附近的塔弗里昌卡村一带、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巴萨尔金山岬、以及麦河河口附近由 A. П. 拉津作过发掘和详细报导的发现地,均属此类。关于在此以北的贝丘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但类似贝丘出土物的石器和陶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不少地方却屡有发现,包括捷丘贺湾在内。

由此可见,“贝丘文化”几乎分布于现今滨海边疆区从格拉德卡亚河至阿穆尔河河口的整个沿海地带,至少包括了它的大部分。

我们无需赘述所有这些为数众多的发现地,根据贝丘的资料,概括地谈谈滨海古代居民的生活和文化就足够了。

早在十九世纪末,由于 M. И. 扬科夫斯基和 B. П. 马尔加里托夫的最初研究,人们对滨海的贝丘便已经有所了解¹。

1880年, M. И. 扬科夫斯基发掘了一个贝丘。随后在同一地区,在扬科夫斯基发掘地点北面,即扬科夫斯基半岛北端从列比

1 M. И. 扬科夫斯基:《阿穆尔湾沿岸发现的炊器遗迹和石器》,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 XV 卷,第 2—3 期,1881 年,第 92—93 页。

B. П. 马尔加里托夫,同前书,第 1—6 页。

亚日耶湖通往大海的小河沿岸，B. П. 马尔加里托夫研究了几个贝丘。这些贝丘所在地的平均海拔约为十二俄丈，约合二十四米。

贝丘“看来毫无规则地沿小河分布着，有的几乎就在岸边，有的距岸稍远。贝丘的周长约十——十五米，中央厚〇·五——一米。贝丘上现已覆盖着一层〇·五——〇·七五俄尺厚的黑土；贝丘下压着板结的沙质粘土”¹。

这个描写的准确程度大体与我们的资料相符，不过需要补充一点，即贝丘的规模往往要大得多。

在扬科夫斯基半岛，南距马尔加里托夫所绘地图上标有星号的1880年发掘地点不远，在一个独立的石头岗子附近，有一座低矮的小山岬；就在这山岬的嘴子上，还发现有大量的贝壳堆积，它们连成一片，面积达数百平方米²。

在砂磧半岛的山岬以北，沿高峻陡峭的海岸上，也发现了很厚的贝壳堆，几乎长达一公里。有些地方仿佛形成连绵不断的沿岸护堤。这里的贝壳层又厚又长，年轻的地貌学家乍看上去会以为这是半岛上的一部分海沉积。

在贝丘里及其附近，除贝壳外，还杂乱无序地分布着许多陶片，陶纺轮，石、骨制品，以及兽类、鱼类和鸟类的骨骼。这些人类活动遗迹证明，贝丘是在古代人长期居住的地点形成的，所以它同人类的居住遗址联系在一起。

然而贝丘决不能反映当时居址的全部特征。很明显，那时候人们既不是居住在现在这样的贝丘上面，更不是生活在贝丘里面。贝丘仅仅是住所附近堆积起来的抛弃物。

关于贝丘时代居址的性质，可以根据砂磧半岛上的出色的居址来加以判断。早在1921年，B. K. 阿尔谢尼耶夫便抱着科学研

1 B. П. 马尔加里托夫，同前书，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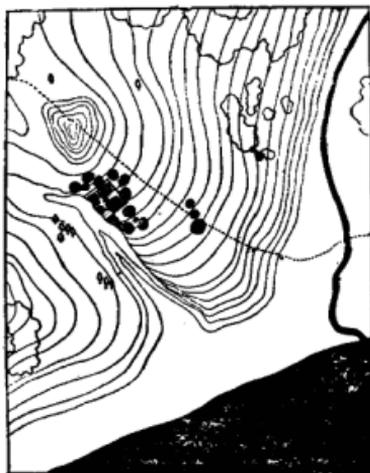
2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1953年滨海的考古研究〉，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第8期，1955年。第8—10页。

究的目的,在这里进行了头一次专门的发掘。

这个古代村落位于一处干燥的高地上,距海岸不远,约一百五十——二百米,附近有一条清彻的泉水。它的西面被一条大沟所截断,东面则有一块小洼地¹。

B. K. 阿尔谢尼耶夫观察了发掘地的地形,发现这道深沟的陡坡上露出了文化遗迹,被深沟截断的古代海滨阶地高约二十五米。沟的深度为五——六米。沟壁上露出很长一道贝壳层,最厚处为一——一米半。贝壳连成一片,几乎不掺泥土。贝壳层里散见大量陶片、鱼骨、兽骨;也有磨制石斧和窄叶的板岩镞。

阶地上发现约十个凹坑,是古代住所的地基遗迹。坑内泥土充塞,轮廓模糊不清,但多数还能辨认,平面呈方角形。坑穴的面积为 10×10 米或与此相近。平均深度大约为 0.5 米。据1921年B. K. 阿尔谢尼耶夫记载,坑穴四边围有土墙,但我们没有发现。显然这些土墙后来塌平了。也没有发现坑穴的出口处的痕迹。各穴的排列并不大象B. K. 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那样条理井然,而是“鸟窝”一样杂乱无序。它们同贝壳堆无疑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沟壁的露头上可以明显看出,有些坑穴也填有贝壳(图二十九)。



图二十九 砂磧半岛贝丘时代居址平面图。

1 B. K. 阿尔谢尼耶夫,同前书。

1953年，远东考古队队员调查了这些地点，拍摄了沟壁上露头的和埋在古代地穴里的贝壳层照片。随后两年，这条大沟的边缘破坏得更加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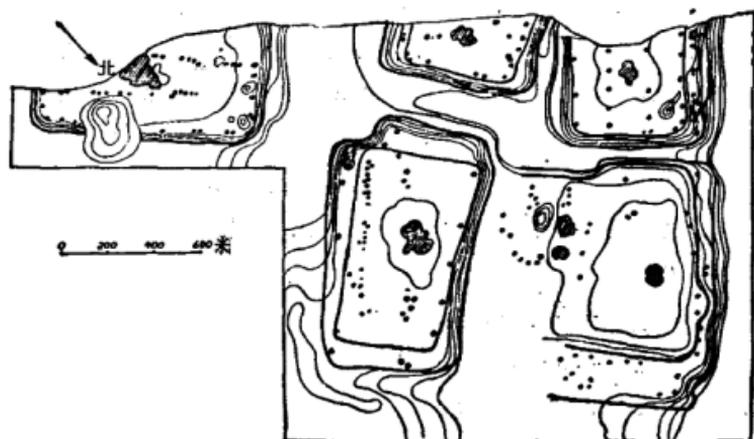


1956年，沟壁上露出一件基本完整的容器立在贝壳堆里。地穴里的贝壳、陶片、鱼骨、兽骨和该遗址古代居民的其它生活遗迹，也露出在沟坡上（图三十）。

1956年，在这里的发掘揭露了三个一半或多半被大沟破坏的地穴，并在附近发掘了两个没有受到冲刷因而保存完整的地穴。

鉴于这是远东考古学研究史上头一次对贝丘遗址进行大面积的、有系统的发掘，其目的又是弄清住所的结构，查明这个古代遗址的一般生活情景，所以需要比较详细地谈谈发掘的结果。

清理沟缘断面的结果表明，住所的房基是在白色和黄色的沙层和小卵石层里掘出来的。在这浅色的带状底子上，明显地衬托出古代地穴的深黑色坑底边线和坑沿轮廓。有两个住所，坑里填满了贝壳；其余的则充塞着熟土，没有贝壳。



图三十一 砂磧半島古代住所分布平面图。1956年发掘。

1号住所(距海最近者)沿对角线塌掉一半。清理断面时发现自表土层至住所的居住面填满了贝壳,所以地表一点也没有凹陷。住所东部有一条探沟,是过去阿尔谢尼耶夫开的;这次发掘时,探沟已经塌陷成椭圆形的坑穴,深约一米,坑沿上有几堆从探沟里抛出的泥土。坑里和土堆上都长满了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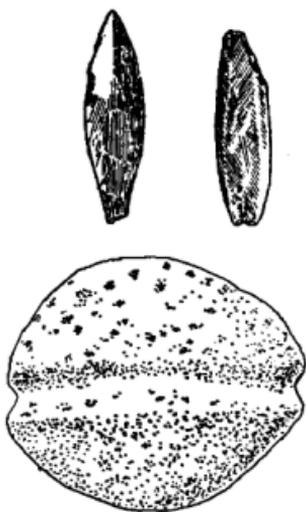
贝壳填塞层的厚度一般约为一·六米。中央立着上面提到的那件基本完整的大容器,此器无底,一半露在断面外。填塞层本身又分为几个不同性质的夹层,它们叠压在一起,厚薄很不均匀。

直接压在表土层下面的是腐殖层,里面混杂有小块的碎贝壳。这一层的最厚处达四十厘米,形成一个坑穴;继而延伸为较薄的、平整的地层,厚约十八厘米。腐殖层以下是大块碎贝壳层,混杂泥土较少,厚度为四十——八十厘米。再往下是贝壳板结层,不含泥土,纯粹由完整的牡蛎壳形成。这几层贝壳下面是鱼类遗骨层,含有几种大鱼的鳃、鳍和鳞。再往深处便到了居住面,它的表面盖着一层黄灰色粘性物质,可能是杂有木灰和烧焦的小贝壳的粘土。

发掘整个地穴时所见的地层迭压情况也是这样。布满地穴的贝壳层下压着一层杂有灰、炭的鱼骨和鱼鳞，厚二——三厘米。往下即居住面上，铺着一层掺有灰、炭和小块碎贝壳的粘土，厚度为十厘米。

地穴的堆积中发现大量资料，有陶纺轮、陶片，还有骨制品和板岩制品，包括石镞、网坠和磨盘。其中网坠与其它地穴出土的略有不同。

虽然边沿的三个住所都几乎塌陷了一半，但根据保存下来的灶址和柱洞的分布情况，可以相当准确地断定它们的面积，因为除四号住所外，所有地穴的灶址几乎都在正中。



图三十二 板岩箭头和网坠。
砂磧半岛。

例如，一号住所清理穴底堆积后，可以看出其平面呈基本规整的长方形，以较短的一边对着海面，面积为 20×11.6 米，自坑沿至底部深约一百四十——一百六十厘米。因此，住所面积为二百三十二平方米。穴壁在发掘时已略有塌陷，但原先是垂直的或基本垂直的。

住所居住面中央发现两个灶址，均作椭圆形，面积各为 1.75×1 米。清理时灶址已经破坏，散成一大片，占据面积 3×2.2 米。灶旁有两个坑连在一起。在灶址部位和坑里发现有木炭（因年代久远而成了炭末）、烧过的贝壳和烧裂的陶器的碎片。灶的近旁和北面不远处发现两件破陶器。

在灶址附近，发现大量器物，它们反映了住所居民的生活特点。计有板岩镞数枚；细骨针三枚，制作精致，带有针眼；碧玉管珠

二颗；卵状石网坠二件。近旁有骨制小型鱼权三件。另有陶片一堆，分属四件容器。

居住面上有几排清晰的深暗色柱洞，有明显的排列规则。第一排立柱靠近地穴四壁，各距穴壁约半米，间距为一·五——二米。另两排纵列于住所中线两侧，仿佛形成一条宽约三米的柱廊。这里的立柱间距较密，排列也不大整齐，其中有几根可能是后来修缮时支上去的。立柱直径为五至十厘米不等。

二号住所在一号住所距海较远的一边外侧十二米处，一部分也塌入了沟内。住所内填满了碎贝壳和泥土。贝壳堆里出有石器、骨器、陶片、兽骨和鱼骨。例如，有一处出土凝灰岩磨棒一件（发现时磨面向上，背面有五个小窝）、凝灰岩小圆石一个、骨鱼权一件、折线几何纹陶片一块、其它陶片和动物骨骼各若干。

在这堆发现物附近，出土破陶钵一件、陶片一堆。较深处发现骨器一堆，兽角一块，以及板岩箭头和鸟骨；旁边还有一件石斧，刃残。

这里还出有鱼骨一堆、骨针一件、板岩箭头一件，以及骨制的工具和压碎的陶片。在地穴边缘距居住面八厘米高处，发现一堆灰烬痕迹，周围有一圈深褐色泥土。泥土里出有动物骨骼，其中有猪下颚骨一块，小贝壳若干；另有素面残陶罐一件。此外，地穴里还发现有二个不完整的猪头骨。

清理住所时，发现其平面也是长方形的。所存面积为 12×12 米。如果这个住所与邻近的三号、五号住所相平行，即与大沟相直交，那么它的长度也应当不下二十米。地穴的深度为四十厘米。

居住面的边线可以相当清晰地清理出来，但坑沿却保存得比较模糊。地穴北边清理出一排明显的柱洞，间距约一米半。南壁附近也保存下几个柱洞。灶址只保存一处。这是一堆灰、炭，位在中央，近椭圆形。灶上发现破陶器一件，另一件在灶旁。灶址附近

有板岩刀一件，呈富于特征性的半月形，有孔。住所北部出小珠一粒，板岩箭头一件。南部出鱼钩一件，以骨料刻成。

三号住所也被沟壑破坏，位于二号住所近旁。

这个住所不象一、二号住所那样填满了贝壳和泥土，而是留下一个半米深的洼坑。坑内填有腐殖土，混杂有小块卵石和细沙，所以呈灰色。地穴中央自表土层至穴底也发现有这种性质的填土，但颜色漆黑。填土中出有几块陶片。在东南部坑沿附近，有一层浅黄色粘土，从断面上看得非常清楚。西北部的坑沿就在地表下，上面只盖着一层很薄的表土；坑沿的东南部则在十厘米厚的表土层下。地穴没有塌陷的部分长度为十四米。穴室填土中除少数陶片外，发现残磨盘一件，纺轮三件。这些纺轮呈扁平形，其中一件在穿孔周围饰有一圈小圆孔，另两件则饰以之字形划纹。在混杂砾石的黑色腐殖土中，有一件压碎的陶罐，在它的上方发现一件小型磨制石砬。在二十厘米深处出土一堆板结的贝壳和一件压碎的倒置容器。这些贝壳中也有兽类和鱼类的骨骼。除此以外，穴室里再没有发现贝壳。

这个住所与大沟相交成直角。平面也是长方形。东北部坑沿至底部深一米，中央深半米。

住所宽度按保存完整的东北壁计算为十三米；其长度根据灶的位置判断，几乎与此相等。沿穴壁有明显的台阶，宽〇·七——一米。

台阶脚下排列着柱洞；同一号住所一样，中间也有平行的两排柱洞，只是这两排与沟沿垂直相交。

中央立柱排列都很整齐，两排相距三·二米。各排立柱间距为一米。

在住所两边的台阶上，各有一排柱洞。它们排列紊乱，数量很多。其原因可能是住所的墙壁经过改建，或是墙壁具有某种我们

不清楚的特殊结构。

灶的形状从灰、炭堆的轮廓看来，近似椭圆形。它的位置在住所正中。

除东面台阶上和住所南角的填土中散见的几块陶片、一小堆贝壳和两件破陶器外，在整个居住面上都毫无发现。

因此可以断定，住所使用的时间不长，而且保持得很干净。

四号住所距大沟较远的一排，与西南面三号住所隔一坑沿。

经开掘探沟查明，在黄色陆成土的居住面上压着一层掺有深褐色泥沙的细砾石，泥沙在坑沿附近堆至与现在的地表相接，并向地穴中央显著凹陷。清理这一层时，间或发现深色的长条状腐殖质的轮廓，宽约五厘米，这可能是墙壁和房顶的朽木杆。较高处有一层油性腐殖质，与现代表土层相接。愈靠近地穴中央，表土层愈厚，达六十——八十厘米。表土层里发现少量洁净的黄沙。上述两层都出有大量陶片。接近居住面的地方有一件容器，已压成碎片，口沿朝下。尽管这个住所没有遭到大沟的破坏，它的平面很不清晰，结构也不大清楚。面积约为 20×19 米，深不过一米。

同前面几个住所一样，这里的居住面上也发现有灶址和柱洞。柱洞沿西壁和北壁分列成几行，排列多少显得比较整齐，行距约二米。此外，在住所南边和东边，即灶址附近，也发现有柱洞，但排列得很紊乱。

与其它住所不同的是，这里有三个灶。其中一个大致作圆形，直径一·二米，位于西北部，同西南边沿及东北边沿隔着相等的距离。

另两个灶靠近两个储放日用器物的坑穴，灶的直径分别为二米、一·七五米。居住面上西北边沿，发现破陶器二件、石斧一件。在三号、四号住所之间的坑沿上，出有板岩箭头三件，压在三号住所垒筑的房墙下面，可能是属于四号住所的。

在住所西北部居住面的洼坑里，发现一件豆的圈足，底部向上。

五号住所的地穴最深，也保存得最完好。它的东南面^①与四号住所相接，西南面与二号住所相接。

这个住所的填土厚达一·八米，其性质与前面几个住所相同。表土层下面第一层是油性腐殖质，厚约八十厘米。从这以下直到居住面都是一层灰色的夹沙细砾石。

填土中的内含物比前几间住所少。几乎不见陶片。最值得注意的发现物有：钻孔兽牙一颗，板岩箭头数件，板岩石刀一件。表土层下面压着一件楔形石斧，还有一些石网坠和砺石碎块。

住所的房基保存完整，轮廓相当清晰。平面也是长方形，短边朝向大沟。

地穴两头宽度不一，东北边较窄，西南边比它宽二米。

因此，在较宽的西南端，穴壁向外突出一块长约十一米，宽二米的地方。住所的门可能就在这里。

这样，地穴的最大长度便有二二·三米，宽度西南端为一三·二米，东北端为一·二米。

住所房基的总面积达二百七十平方米。居住面的中央稍向下陷，形成一个内接的长方形，其方向与房基不大一致。

沿三面穴壁有明显的台阶，宽达一·二——二·五米。东南面^②的台阶不大明显。这些台阶显然是铺位的遗迹。

沿西北壁有一排相当大的柱洞。这里有五个明显的柱洞，直径约十八——二十厘米。间距四米。沿西南壁有六个柱洞，间距二米。

沿东南壁有四个明显的柱洞。但原来的柱洞显然不止此数，

^① 从图三十看来，似应为西北面。——译者

只是其中一部分没有保存下来。这些柱洞沿穴壁排成一条直线。沿东北壁有三个柱洞。这里的柱洞看来也没有全部保存下来。

在住所房基中部，发现两排平行的柱洞，方向与房基的长轴线略有偏离。两排相距三米。柱洞间距平均为四十——五十厘米，有的达一·五——二米。有些地方三个柱洞聚成一组，各组间距二米。

另一排柱洞靠近东南边，好象分成二、三组，开始非常密集，然后逐渐稀少下来。

整个看来，这是住所内一道通常的、我们已经熟悉的宽阔长廊。

这道长廊大概是属于住所历史上某一阶段的，可能就是开始阶段，所以它的方向与住所的长轴线有所偏离。不过这个住所改建的历史还是没有弄清楚。

灶的位置在住所中部，但在正中。灶址是一层不厚的灰、炭，轮廓呈圆形，直径约一米半。灶的边沿有一堆陶片，属于同一个容器。

在住所东北部，有一堆杂乱的扁平石块。附近有一件石磨盘和一个磨棒的粗坯。旁边还有一件破陶器。距这堆器物不远，在住所的台阶上，又发现二件破陶罐和一件陶纺轮。住所北角出土一颗管珠。

主要出土物在东南壁附近的几组柱洞之间。这里出有板岩镞六件、板岩刀一件、磨盘一件、陶纺轮一件、石斧二件、鹿角一块、破陶器三件——一件在灶的边沿，另两件在西南面的台阶上。在这个台阶上还有一件板岩矛头。台阶脚下的居住面上，发现两颗管珠，一颗呈白色，另一颗为深绿色。

由此可见，砂磧半岛揭露的半地穴住所均作长方形。其中三个(三、四、五号)长边与海岸平行，与溪谷直交，即几乎作东西向。

另两个虽然部分塌入沟内，但显然作南北向，与小溪平行。

四号住所轮廓模糊，可能遭到了严重破坏。

住所的居住面平坦，许多穴壁都陡直而清晰。有的住所(三、四、五号)沿穴壁专门挖有台阶。如上所述，这些台阶可能是铺位。

居住面上，原先构筑墙壁和支撑屋顶的立柱留下了大量明显的柱洞。

柱洞的排列在边沿的两个住所中(一、三号)看得最清楚。这里的大量柱洞大多沿着穴壁。有的略倾斜，可见一部分木柱是倾斜的，从而组成四角攒尖式的结构。柱洞间距不等，平均一——二米。柱洞密集的地方，可能是后来改建和修缮住所时添加了立柱。

沿一、三号住所的长轴线分列两排柱洞，是宽阔的柱廊的遗迹。一号住所柱廊宽三·二米；三号住所的柱廊同五号住所一样，宽三米。

一、三号住所的柱廊中央发现有灶址，即一堆灰烬和炭屑。

所有住所都有灶。一般一个。四号住所有三个，不过这可能是不同时期的。

在地穴底部灶的周围和其它地方发现各种日用器物，有石、骨制品和残陶器。

陶片往往聚集成堆，属于原地打破或压碎的同一个人容器。石器中特别突出的是磨盘和磨棒，在一、三、五号住所中均有发现。

总的来说，砂磧半岛古代住所的特点就是这样。关于这些住所，下面我们还要反过来再谈。

A. И. 拉津在麦河的源头上从前的帕秋科夫农庄附近也曾经发现几个由几排地穴式住所组成的古代居址。他写道：“在帕秋科夫的农庄西南半公里处，行经一段泥泞的洼地时，看到一座小山岗象半岛那样伸入其中。山脊上自东向西排列着几排坑穴，当是从前的住所。这些坑穴分为两、三排，所占地面的宽度共三十米；其

中一排有十个地穴，绵亘约一百二十米。小山的南坡很陡，所以地穴都分布在山脊上和比较平缓的北坡。在地形最好的地方，有几个大穴，面积各为 8×10 米。一般地穴为 5×5 米，有的更小。现存穴壁较平缓。深度不超过个子较小的人体高度。²¹拉津在这里发现的地穴约二十个。其年代可能与他在附近(在帕秋科夫的农庄)发现的贝丘相同。

1953年，在格拉德卡亚河河口右岸，在堆着几个普通贝丘的一座山岗顶上，我们在旧探坑的断面上发现了在古代地穴很有代表性的台阶以及穴底。地穴的房基是在相当疏松的原生板岩上掘成的。厚厚的贝壳层填满了整个地穴，并把它严严实实盖住。贝壳堆里有陶片，其中一块是碗底下常见的圈足。

砂磧半岛类型的地穴当然是冬季住所。可以想见，到了夏天，地穴居民就搬入地面上的夏季住所。有可能他们为了避开夏季雨天的潮湿，还建造干栏式的遮棚，类似现代阿穆尔河沿岸部落中的和十八世纪斯捷列尔、克拉舍宁尼科夫在堪察加半岛所见的那种建筑。

这种夏季住所或许就在冬季村落的范围内，不过也有可能在其它地方存在过单独的夏季村落。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带有地穴遗迹的居址比较稀少。

贝丘时代滨海居民的物质文化

无论贝丘还是我们在砂磧半岛发掘的地穴，都出有丰富的实物资料：陶器、石骨工具、饰物、兽骨和鱼骨。

这些形形色色的资料目前都没有提供可靠的依据，来断定陶器和石器形制演变的年代序列。这方面首先是没有明确的地层

1 A. И. 拉津：《乌苏里湾沿岸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第164号。

资料。

唯一可以指出的是，在某些居址里，例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小乌利斯湾和格拉德卡亚河左岸的贝丘里，出有截面作圆形的磨制或“琢制”的石斫，它们与格拉德卡亚一号居址所出石斧的截面相似。在砂磧半岛一个地穴的填土中，发现一件类似的石斧，但已经被当作石槌使用，它显然是从更早的住所里遗留下来的。

乌利斯湾还出有一件形制更为古老的石斫，即截面作一面突起，类似新石器时代捷丘贺类型居址的出土品。

很可能出有这类石斧的居址属于贝丘遗址的最早阶段。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小乌利斯湾，除磨制的板岩尖状器外，还有一件打制的尖状器或石刀与石斧共存。此外，出土的砂质岩石片和薄石片也是用打制的方法制造石器的遗迹，这种打制技术是新石器时代居址的典型特征。

不少居址还出土其它一些器物，表明这个时期的文化同另一种更早的文化之间可能有继承关系。例如折线几何纹的陶片、形制与格拉德卡亚一号居址所出“桶形”器相似的容器，均属此类。¹

格拉德卡亚一号居址间或也出有近似贝丘出土品的磨制石镞。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别的、孤立的事例，表明某种古代传统还有其影响，不过在新文化因素和形制的浪潮下，这种传统已被掩盖住了。

总的来说，贝丘的出土物表现出某种完整性和稳定性；在几十个居址中，同一组器物一再重复出现，非常固定而单一。因此，研究这些出土物便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文化不是缓慢而逐渐演进的，而是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过某种深刻的、急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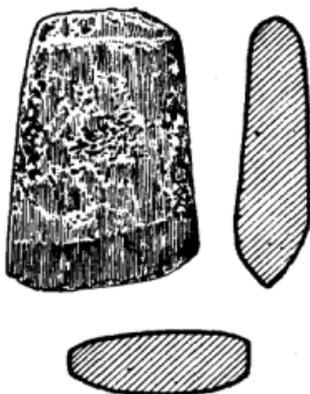
这种纯粹性和稳定性给了我们一个少有的机会，可以全面地、明确地了解贝丘时代居民的技术和经济生活，以及他们的其它生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同 110 页注 2，第 7—8 页。

活特点和滨海史上这些出土物所代表的整个文化历史阶段。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石制的劳动工具、武器和饰物,这些出土物既同较早的遗存有联系,同时又表明“贝丘文化”同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所区别。

贝丘遗址所出的石器在类型学上是很有代表性的。首先是磨制石砭或石斧,一般以砂质岩石制成,石材多呈黑色,少数为灰绿色。器形非常固定:作矩形或近梯形;背略圆;刃平直或略有弧突,两面修整对称,颇陡。器身扁平宽大,间或一面较鼓。侧棱窄而平,与宽面相交成直角。截面作矩形,近似贝加尔湖沿岸谢罗沃时期的砭,只是比例不同。后者较厚,宽面较窄。¹



图三十三 矩形截面的石砭。
砂砭半岛。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砭很少有保存完整的。一般都是刃部残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由于继续长期使用,作为某种粗活的工具,可能是当作石砧,所以下端往往变钝、劈损。

这类石砭有一种特殊的变体,即厚重的大型工具,自背以下逐渐变厚,直达刃部。这种砭可以定为一个单独的类型,虽然发现的数量不多。

在博物馆的藏品中,除这种厚重的石砭外,还有一种相当宽的扁平石砭。它的轮廓的特点是一般呈梯形,而不是矩形。刃部一面的角度比另一面为陡。砭的尺寸较小,为十——十五厘米。

第三类磨制石器是窄而厚的凿,截面作四边形;刃部平直,两

¹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同 87 页注 1,第 202 页,图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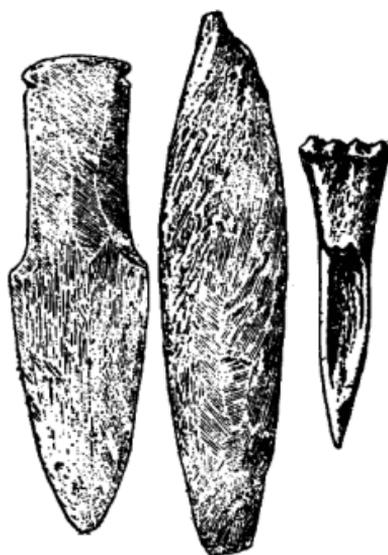
面都经过加工；长六、七厘米至十五厘米不等，宽一——一厘米半。

第四类石砭较小。刃部经过修整或打击加工，有的通体都经过这样的加工。许多石砭的刃部两面作对称内凹。弧背。长十至十二、十三厘米，最宽的五——六厘米。

作过发掘的贝丘遗址都出有石砭。此外，往往还偶然发现一种特殊的大型工具，细把，把与带刃的宽大器身之间有肩，应是石锄。

除上述磨制石斧和石砭以外，大量的板岩制品也是贝丘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

最普遍的是板岩尖状器，器身作树叶形，截面一般呈菱形，有



图三十四 板岩匕首和骨制尖状器。
砂磧半岛。

宽扁的铤。叶铤之间有肩，有的较平缓，有的角度颇大。长度平均为二十——三十厘米。这种工具很可能是猎人的刀或匕首。也可以装上长杆，作成矛、标枪或鱼叉。还有一种尺寸较大，器身作树叶形或长三角形，扁铤，肩的转角显得较陡。

在大型板岩匕首中，有一些比较特殊，虽然数量不多，却可自成一组。这些工具分明与金属匕首或尖状器相似。

这种以石材仿制金属制品的尖状器在苏联境内的其它地方都没有发现过。它的分布范围局限于滨海、阿穆尔河流域(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下)和邻近的东亚各地——东北、日本列岛和朝鲜半

島。¹

第三组板岩制品是较小的尖状器，无疑是箭头或标枪头。这些尖状器的尺寸变化很大，但轮廓却没有越出同一个基本形制的范围。器身甚薄，较窄，两面有明显的侧棱。两个边刃一般外鼓；上部有时大大加宽，底部则显著内敛并延长。有的轮廓作柳叶形，窄而特长。

第四组是树叶形的板岩尖状器，有的带有不大明显的肩，两个宽面对称突起。有的钻有双锥形的透孔，是一特点。孔一般有两个，在器物上部三分之一处，而且一个孔比另一孔稍高。

在板岩石刀中，有一种特别的器形，刀片宽而短，近矩形，四角一般修圆。刀刃在一条宽边上。中央有一、二个穿孔。

另一种板岩石刀长而薄，一端较尖，单刃，靠近背部中央有两个穿孔。未发现完整器物，所见者均已残缺，如捷丘贺湾居址出土的即是一件。但根据辽东魏子窝遗址所出的类似器物，可以断定其器形。魏子窝出土的刀，有一件长约五十厘米，刃薄而窄，把手部分颇厚。²

石器中还有各种石杵，用没有加工的椭圆形卵石作成，显然是制作石斧时当作石碓或石砧使用的，也可以当成砥石乃至磨棒。

这种磨棒一般都被大大磨损，中部有倾斜的深槽，而两端却仍然很厚。

最后，石器中还有网坠、滚网坠和海上捕鱼的钓竿坠。最简单而普遍的是通常的椭圆形扁卵石，两个长边打有缺口，以便系在网上。

另一种石坠是圆饼形或椭圆形的厚卵石，边沿巧妙地凿出了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同 45 页注 1，第 24 页。

芒罗，同前书，第 160—162 页。

2 《魏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之先史时代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东京·京都，1929 年。

绑绳子的大槽沟。这种石坠很可能是钓大海鱼的鱼竿上使用的。

滨海出土物中有两件珍贵的圆饼形石碓占有特殊地位。诚然，这种石碓不见于贝丘，但与之相关的居址却与贝丘遗址非常近似。

其中一件是1953年在波波瓦岛发现的。此器轮廓正圆，磨制精致，一面平整，一面鼓起。边缘锐利，正中钻有一个双锥形的透孔。在平整的一面，由于经常击砸，一部分边缘被劈损。制作材料是非晶形结构的灰绿色岩石，应是致密的细粒沙岩。直径十一厘米，孔径二·二厘米。其形制与南太平洋地区发现的古代石碓非常一致。¹日本列岛也出有完全相同的器物，其中一部分属于所谓绳文晚期的堀之内文化。²

另一件同样磨制精致，以致密的深色岩石制成，尺寸大致与前者相同，中央也有双锥形穿孔。一面平整，一面鼓起。与波波瓦岛的石碓不同的是边缘作波浪形，因为两面都磨出均匀分布的、深深的缺口，形成二十个明显的圆齿。直径十二厘米，孔径二·四厘米，厚一·七厘米。这一件是A. 3. 基里洛夫在麦河河口附近兹美纳亚山上发现的。日本³以及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⁴也出有类似形制的齿缘石碓。

贝丘遗址的石制饰物，远在1884年B. П. 马尔加里托夫在扬科夫斯基半岛发掘时就曾发现过。他记载了一件粘土质板岩的管珠，说是制作“特别精致”，但在文章所附的图版中却没有编入管珠

1 H. M. 米克卢霍-马克莱全集，第V卷，第356—357页，图104—107（新几内亚南部沿海地区出土的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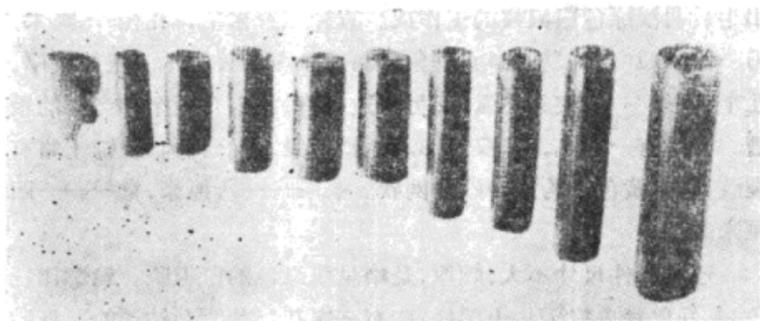
2 M. 拜林-阿尔丁：《甘肃齐家坪与罗汉堂遗址》，载《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8期，斯德哥尔摩，1946年。

J. G. 安特生：《河南的史前遗址》，载《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9期，1947年。

3 G. J. 格罗奥特，同前书，图版XLV, h。

4 同上，图版XL, a。

的图。¹



图三十五 贝丘遗址出土的管珠。

这件管珠的形状可以根据最近出土的管珠来加以判断，后者磨制精致，器形美观，作正圆柱体形。例如绥芬河河口塔夫里昌卡附近恰帕耶夫集体农庄和波波瓦岛等地出土的都是这种形制。制作材料是致密的、硬度较大的碧玉状岩石，呈深绿色，有的呈灰绿色。一般颜色单纯，色调均匀。但也有一些管珠保留着碧玉所特有的奇妙条纹，显得特别美观。

管珠的透管作正圆柱体形。钻透这样的管珠，用粗笨的砂质石钻是不可能的。滨海管珠的透管显然是用金刚石钻头钻出来的，即把小金刚石粒装在金属（红铜或青铜）杆上，作为钻孔工具。

在印度的信德^①，上古时代的首饰工场就是用这种方法制作管珠的。马凯曾在那里发现过这样的工场，并作过报导。²

少数圆柱体型管珠不是用碧玉状的绿石，而是用较软的石材即浅灰色的板岩制成的，板岩的表面由于严重风化而变成白色。另有一件用结实的粘土烧制而成。此外，还有一件形状象个小桶。

1 B. П. 马尔加里托夫，同前书，第 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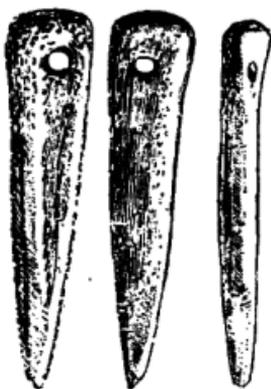
2 F. 马凯：《古代信德的制珠业》，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 57 卷，第 19 期，1937 年。

① 现属巴基斯坦。——译者

在绥芬河河口,发现三件玉饰。一件是璧,扁而薄,尺寸不大,用半透明浅绿色白浪纹的玉作成。直径二厘米半,孔径一厘米。另一件酷似“勾玉”型饰物,好象野猪獠牙或猛兽的爪。玉片较厚,近半月形。一边突起作弧形;另一边平直,棱上有两个相当深的横槽。上部有一穿孔,作双锥形。色泽青绿,近蔚蓝。坠饰上略有裂纹,呈棕黄色,构成奇妙的网状。长一——八厘米,宽一——四厘米。

还有一件尺寸不大,颇厚,是略呈浅绿色的白玉坠。轮廓作三角形,好象猛兽獠牙。上部较宽,有一穿孔,是两面钻透的。形制与上述那件同属一组,显然是“勾玉”型的饰物或护身符,仿照了比较原始的、用野兽獠牙做的护身符。

贝丘遗址的骨角器一般比较单调刻板。有一种尖状器,据马尔加里托夫所述,是用动物空心的长骨纵向锯切出来的,“多系一



图三十六 锥形骨尖状器
(撬贝壳用)。砂璜半岛。

端尖锐,似锥;另一端自凹面向凸面倾斜,成一角度”。有的“两端都很尖锐,或都磨出锐利的斜刃。此外,所有尖状器都在中部逐渐内凹,很可能是为了便于手指捏紧而作成的”。B. II. 马尔加里托夫认为这是“家庭日用”工具。¹

据 A. II. 拉津的描写,这是“用长骨制成的工具,形状象一种用斜截的方法做出尖头的粗制矛头”。其用途“很可能是加工木料的钻”²。其实这

些器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活动的鱼镖头,下面我们再作论述。

1 B. II. 马尔加里托夫,同前书,第3页,图11—16。

2 A. II. 拉津:《乌苏里湾沿岸的考古调查》。

另一种锥形尖状器同样用纵向劈开的骨骼做成，但部分地保存了顶端的髓，当成器把。B. II. 马尔加里托夫的搜集品中有一件锥形工具，制作材料是野猪的半个下颚骨，把很厚，锋部也很坚实。

文献中还载有一件圆形的骨矛头，作窄长三角形，钝的一端有一精致的孔（很可能是鱼镖头或磨光器之类）。¹

贝丘遗址骨器的典型特点就是野猪獠牙制品。“它们的锋部就是牙齿尖锐的珐琅质部分。下部（即靠近齿根部）做成一面倾斜，另一面有一横槽，便于捆在杆子一端的倾斜面上。”²

此外，还有复合的骨钩。A. II. 拉津曾发现几件，是两根骨骼拼合而成的，连接部分成一锐角。³

第三类发现物数量最多，对于了解文化特点特别珍贵，这就是陶片。

同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居址一样，这里的陶片也表明当时的陶器是手制的，不用陶轮。胎色一般橙红，有的深棕，近褐色。常见的器形类似从前的“桶”形罐，平底，器壁向上逐渐外敞。器底大部分很小，直径约六——八厘米，因而外沿稍宽，以便放得更稳。器壁上部三分之一通常稍鼓。唇微侈（图三十七）。



图三十七 容器。
砂磧半岛。

第二组容器形制较前者复杂。有明显的颈，直唇，大鼓腹，小平底。肩部往往附贴双耳，肩下常饰以带纹。耳上一般有横穿的孔。耳的形状、尺寸无一定规则。一般作半球形或扁椭圆形，均系直贴。贝丘遗址所出容器的一种很

1 A. II. 拉津：《乌苏里湾沿岸的考古调查》。

2 同上。

3 同上。



图三十八 容器。砂磧半岛。

折,口很小,只能伸入一只手掌。

第三组容器是大碗型的平底敞口浅腹碗,不仅有正圆形的,而且从椭圆形的器底判断,还有椭圆形的,近似中国汉代某些富特色的耳杯(图三十九)。



图三十九 碗。砂磧半岛。

第四组是圈足器。其中有的是不高的杯;有的体积不大,好象由下部细而短、上部宽大的两个锥体结合而成,因此可以称为双锥形容器。

也有圈足低矮而宽大的敞口大碗。有的圈足饰有一、二道凸弦纹。

应当单独谈谈 B. K. 阿尔谢尼耶夫在砂磧半岛发现的一件独一无二的器物。此器颇大，作筒形，器口象花瓶那样敞开。腹部以下收敛成七·五厘米高的细管。最大直径为十四厘米，通高二六·八厘米。很可能是灯（图版 III—2）^①。唯一与之大致相似的是关东地区曲轮内遗址出土的一件圈足器，其年代属于大森文化。¹ B. K. 阿尔谢尼耶夫在报告中说，他在砂磧半岛发现一个陶灯，类似古朝鲜制品，可能就是指这一件。

容器是露天烧制的，没有陶窑之类的专门设备。制作时往往磨光器表。工具是磨面窄小的光滑石块，在器表上留有平行横列痕迹。偶尔在遗址中发现过这种磨损的石块。

有的陶片外表有一层红色陶衣，整个陶器显得鲜艳夺目。着色的一面经过精细磨光。

必须指出，这种陶片通常是薄壁的。此外，研究这些陶片时还多次发现，原先的完整陶器具有特殊的形制。

有一块陶片，应是大碗的残片，下部有一道深弦纹，可能是仿照类似的金属器皿而压印的。

陶器中还有纺轮。B. П. 马尔加里托夫早就正确地谈过它的用途。他写道：“同陶罐一样，还有三个中央有孔的圆轮也是用粘土制成的。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网坠，但根据波利亚科夫对奥斯恰克人生活的研究，应是捻线用具。这种圆轮装在尖头木棒上，安在靠近木棒钝头的部位，与钝头的距离约为木棒全长的四分之一。这样便做成一个当作纺锤的工具，圆轮能增加纺锤的拉力和旋转的惯性。”² 纺轮有几种形制。一般下面平整，上面圆突。有的突面高而陡，象个截顶的圆锥体。有时较细的上部剖面呈两个侧边内

^① 当系指阿尔谢尼耶夫原著的图版。——译者

1 G. J. 格罗奥特，同前书，图版 XLVII, d.

2 B. П. 马尔加里托夫，同前书，第 3—4 页。

凹的形状,或与下部隔着一、二道阶梯状的沟槽。有一件中部带一道深槽。还有一种两面平整,象厚轮子。所有纺轮都有不大的圆柱体形空管。

很多纺轮都有纹饰。按作法有划纹和窝纹,同容器上的一样。按结构可分为两大组。第一组的纹饰以同心圆组成。第二组为辐射线纹,自中央向外散开。这种辐射线往往构成三角形,整个纹饰便成星形。也常见由复线或一束直线组成的辐射线,复线之间填以窝纹或横划纹。

至于贝丘遗址的容器纹饰,总的说来,无论在作法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富有特征性和单一性。但毕竟可以分成几个组。

首先是附加堆纹,有的宽而厚,明显突起于器表。这些附加堆纹几乎都有明显的棱角,但都是素面的,上面没有窝纹或划纹。作法上有一个出色的特点,即往往先在器表划出一道窄而深的沟槽,再在上面附贴堆纹。这显然是为了使堆纹在容器上贴得更牢。

也有弦纹,用尖头木棒在未干的泥坯上刻成。一般细而浅,间或也有较宽较深的。

通常还有各种窝纹,包括指甲形、圆窝形(用细尖状器戳成)、钉子形、长方形、椭圆形。这种窝纹一般不大,不单独使用。它从属于其它纹饰,是较复杂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容器装饰中比较特殊的一类是附加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纽,以及带孔的器耳。

按照纹饰的母题和结构,现有资料可以分为五组。

一、弦纹。通常数道,构成带纹;间或为一道。有的在同一块陶片上下各有几道,中间为空白。

这种纹饰最为普遍,是滨海贝丘陶器最有代表性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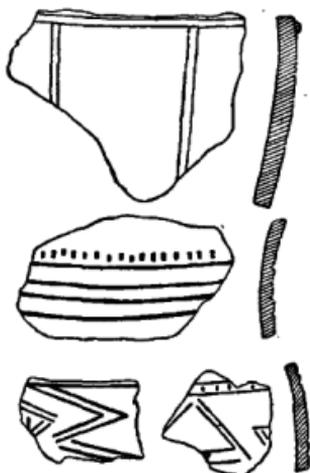
二、填以垂直或倾斜短划纹的复线弦纹。划纹有一定间隔,通常单线,间或双线,形成一个格子。这种纹饰有一个特殊的变体,

即平行的几道弦纹组成宽带纹，弦纹之间填以垂直或倾斜的短划纹，或填斜十字纹，有的则填以含有十字的菱形纹。

填有垂直或倾斜短划纹的宽带有时分为上下几层，每层各有几排宽带。

三、之字纹，所见极少。有的只是简单的之字形划线；也有纵列的之字纹，组成杉针纹的形状。后者或许是贝丘遗址最早期的纹饰，溯源于阿穆尔河沿岸以苏丘 I 型居址为代表的更早时代。

四、变态的折线几何纹。最简单的形式是象锯齿那样上下交错的方角折线。但也有真正的折线几何纹标本，线条折成钩子形状，象字母 Γ。甚至有双联的折线几何纹，由平行的两层折线几何纹组成。1953 年在塔夫里昌卡附近恰帕耶夫集体农庄的地里发现的一块容器口沿残片，就带有精致刻划的这种纹饰。还有一种折线几何纹是由虚线组成的。



图四十 贝丘遗址出土容器的纹饰。



图四十一 折线几何纹陶片。

五、几何图案的单独成分(菱形、三角形),彼此没有联系;或结构复杂的纹饰(特别是折线几何纹或之字纹)分解而成的片断。这类纹饰流行很广。

纹饰的总体结构是同器形相关联的,因为器形决定了各种纹饰母题的布局 and 施加纹饰的部位。纹饰部位一般都很有有限,器表的大部分仍然是素面的。

碟子形大碗的纹饰特点是在口沿面上(即里面)饰窄条纹。口沿一般圆而薄;有的较厚,类似边框,纹饰沿边框而列。最简单的是间隔均匀的斜划纹和分组排列的小窝纹(一般每组三个)。有两种比较复杂,各见一例,均系残片:一种是简化的折线几何纹,由清晰的小圆窝组成(扬科夫斯基半岛,1953年发掘);另一种在口沿近平列三道宽沟,并以几条细小的附加堆纹把它们分隔开来。在其它发现地点,例如砂磧半岛,还出有纹饰更为复杂的陶碗残片,即饰以折线几何纹形状的附加堆纹。普通形制的容器,纹饰一般都在上部,形成一道紧靠口沿、环绕器身的带纹。

这种纹饰大部分是附加堆纹,通常一条,间或二、三条。

第二种是弦纹,一般三条。

第三种以弦纹构成两道带纹,上面或下面增加一周窝纹;窝纹有的呈圆形,有的是椭圆形或是直立、稍微倾斜的指甲纹或近方格纹。

有时陶器纹饰不是以平行线组成的简单纹饰,而是以折线几何形的阳纹或阴纹组成的一周带纹。间或在下面再施一周,围绕在鼓腹上,这时与附加的纽或器耳相交而被隔断。

综上所述,贝丘遗址的居民还完全处于石器时代的水平。他们的基本生产劳动工具,是用骨料和石料制成的,具有纯粹新石器时代的基本性质。

但是这决不是说,这些人完全不知道金属。

滨海贝丘遗址的部落已经相当熟悉金属。这首先可以从他们的石器得到证明。如上所述，当地匠人用板岩制造镞、刀和匕首时，分明是往往力图以石材表现出材料完全不同的金属器物的形状。诚然，有时候这些石器的形状非常简单，不能更确切地断定它们同某个时期、某个类型的金属制品的关系。例如有一种带铤的尖状器，两面有脊，与古代金属矛头及匕首的脊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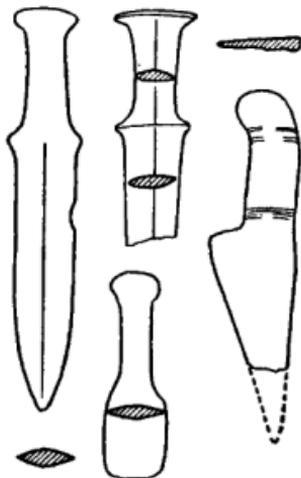
但滨海也出有一些匕首和尖状器，其器形往往与金属样品完全一致，充分利用了松软的石材所提供的可能性。

只要把滨海出土的板岩器物同金属制品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些当地的复制品所根据的样品。

起初，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末，滨海仿制的样品是殷代中国和公元前十四—十二世纪亚洲草原地区使用的卡拉苏克型弯刀和匕首。首先是两件大型器，仿照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和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标本。其中一把刀是1953年在波波瓦岛发现的，它同其它石器(斧、槌)和陶器共存。刀柄略弯曲，两面都有成对排列的深横槽，柄首圆突。柄与刀身之间有陡然突起的段。刀身颇厚，单刃，作斜三角形。尖端已残损。通体长约十九厘米，宽约五厘米。刀的全貌和柄部成对的横槽都同卡拉苏克刀的形制和纹饰相似。

其次是一件以曲柄为特征的板岩刀或匕首。柄首弯向一侧，刀身宽大，柄与刀身之间有颇陡的肩。在卡拉苏克弯刀中也有极其相似的形制。

第三件卡拉苏克器形的仿制品象一把小匕首。器身细长，颇厚，明显地突起一脊。直柄，与器身之



图四十二 板岩磨制的匕首。

间有平缓的肩；柄端作钉帽形，与某些卡拉苏克刀或匕首的柄端相似。全长一七·二厘米¹。

稍晚，在公元前第一千年初甚至更晚些，滨海部落开始模仿另一些青铜制品。这方面的证据是，在我们的馆藏中，有一套板岩匕首不象殷代和卡拉苏克的形制，而是近似较晚期的标本。其中大部分只保存了上半部，即柄部和部分器身。但这已足以说明它们同金属原件相似。这些匕首柄部相当宽，与器身之间有肩。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柄端有一个 T 字形的圆突，酷似南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发达期（特别是塔加尔时期）青铜匕首的柄顶和阿尔泰铁器时代早期铁制短剑或匕首的柄顶。

有三件出色的标本与这个时期的金属匕首特别相似。

第一件是 1933 年 Л. П. 索利斯基在巴拉巴什发现的，交给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这是一把板岩匕首，下端已残损。柄颇宽，截面为菱形。柄首较特别，顶端作成宽而扁的椭圆面。柄与剑身相隔一格手，棱线分明，两侧略似尖刺。自柄首以下两面有脊通贯匕首全身，与匕首的菱形截面相应。残长十七厘米。

另两件这种类型的板岩匕首是在绥芬河河口塔夫里昌卡附近恰帕耶夫集体农庄菜园里发现的。

其中一件最大，长三十厘米。器身长而宽大，柄短而扁平；二者之间两侧突起格手，形如短刺。柄首扁平，象字母 T。器身一面有脊。

另一件较小，形状与前者相同，仅柄首轮廓较圆。此外，中脊也较前者明显。全长二三·五厘米。

还有一件奥西诺夫卡河谷出土的板岩矛头也非常值得注意。矛头有粗壮的铤，截面作圆形，显然仿照了东欧和西伯利亚青铜时代较晚阶段的所谓塞伊马-图尔宾诺类型及其相似形制的矛头，以

¹ 滨海地志博物馆藏，第 788 号。

及殷代中国的矛头的筒(图四十三)。

最后,滨海境内偶尔还出有这种形状的金属器物。Л.Н.阿努钦早就描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出土的一件精美的青铜短剑。它的形状、尺寸和制作技术都属于东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典型器物之列。至少在美特利亚耶夫所藏的著名铜器中有一把形制非常近似的剑,C.В.吉谢列夫把这批铜器断为塔加尔文化初期。



滨海边疆区巴拉巴什地区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也很能说明问题¹。这是一件有釜铜斧,体长而厚,作楔形,用金黄色的青铜铸成。釜的截面呈不规整的矩形,近椭圆形。斧上有两个侧耳,中央自侧耳以下突起一脊。脊的上方靠近一侧有三个同心圆的阳纹,它的部位同东西伯利亚大森林类型铜斧上的圆圈有点相似。

图四十三 石矛头。
奥西诺夫卡。

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还保存着三件古代形制的青铜器:1.阔叶形有筒矛头一件,通体形状类似塞伊马和殷代矛头。2.细长的铍形有釜斧二件,其形制属于殷代时期东蒙和华北特有的远东有釜斧形工具群。这一群工具的特点也是通体细长,方釜,上端做成宽大平整的管接头或腰带形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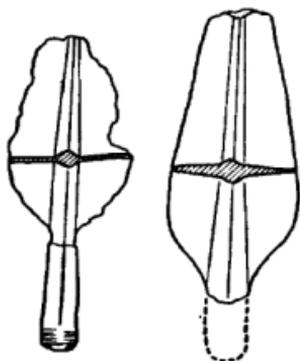
正如J.G.安特生所指出,器形与青铜有釜斧相似的有釜铁器,至今还为中国北部特别是河南、河北的木工所使用,称为“铍”³,铍上装有别致的曲柄。

1 滨海地志博物馆藏,4877号。1925年K.A.沃尔科夫赠。

2 《内蒙古·长城地带》,《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一册,东京·京都,1935年,插图2-c,3,4,27-3.6.8.9;图版1-4,5,8,9。参见安特生:《黄土的子孙——史前期中国之研究》一书发表的铍,第211页,插图100-2a、b,3a、b。

3 J.G.安特生,同前书,第209页,图99。

这种形状的青铜有釜斧，特别是其中最细的斧，也可能是木工的斧和凿。



图四十四 箭头：左——青铜制（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右——石制（捷丘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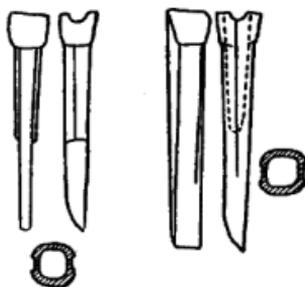
1956年，我们在绥芬河河口附近塔夫里昌卡地区，连同贝丘时代的各种石器和陶器一起发现了半个不大的红铜或青铜的镜。镜薄而平，一面磨光精致。另一面有一小纽，颇厚，象一环扣；大概为了加固起见，纽的周围略微突起一圈窄细的方框。这一面的周边也稍厚。直径五·七厘米（图四十六）。

同一类型的金属镜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均有发现。它们属于青铜时代最古朴的铜镜之列。中国的这种铜镜被断为殷代，西伯利亚的则属于米努辛斯克边疆区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和卡拉苏克时期。形制近似的镜也曾见于安加拉河沿岸，当可归属于贝加尔湖沿岸晚于格拉兹科沃期的施维拉期（与南西伯利亚的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同期）。

由此可见，塔夫里昌卡的这件铜镜是滨海出土的金属制品中最早的器物之一。

根据滨海所出的早期金属制品可以断定，滨海的部落最初是从两个地区得知金属的。

在青铜时代，从公元前第二千年开始，在贝加尔湖以东草原地带、外贝加尔地区、阿穆尔河上游、蒙古、以至于戈壁南部地区和鄂



图四十五 有釜青铜凿。
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

尔多斯,居住着人数众多的畜牧部落。他们饲养马、牛、羊。同时,应当是在中国农人的影响下,他们也从事农业,这可以从出土的三足陶器鬲和鼎得到证明。

从彩陶和黑陶时代开始,这种三足器便是古代中国农业文化的典型特点。同时,大量出土的石磨盘以及蒙古北部发现的一件青铜犁头(恰克图博物馆藏)都证明,在蒙古各草原地区,直到图拉河沿岸,也分布有农业文化。



图四十六 塔夫里昌卡出土的铜犁。

这些青铜时代的东方部落(他们留下了以花岗岩和板岩石板镶成墓穴的大量墓葬)同南西伯利亚部落、进而同中亚和东欧的斯基泰-塞人部族也曾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形制以及艺术风格都有许多相似之处。¹

在所有草原部落中,外贝加尔地区和蒙古的这些部落是远东居民的近邻。

同时,正是在他们的地域内,在鄂嫩河和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外贝加尔东部矿山里,蕴藏着有色金属矿床,包括锡矿;矿石开采和金属冶炼就是在这里进行的。²

1 Г.П.索斯诺夫斯基:《外贝加尔的石棺墓》,载《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原始文化史部著作集》,第1期,1941年。

С.В.吉谢列夫:《古代的蒙古》,载《苏联科学院通报》,历史与哲学部分,第IV卷,第4期,1947年。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伊伏尔加河的鹿石》,载《苏联考古学》,第XIX期,1954年;《布里亚特-蒙古地域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载《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史》,第1卷,乌兰-乌德,1951年,第36—45页;《公元前第一千年西伯利亚与远东诸部落》,载《苏联史纲·苏联境内的原始公社制与早期国家》,莫斯科,1956年,第403—407页。

2 Г.П.索斯诺夫斯基:《关于苏联东部地区的锡矿开采史》,载《资本主义前社会史问题》,第9—10期,1933年。

外贝加尔的矿藏也是东方草原的青铜文化在公元前第二千年后半叶开始产生并继续发展的基础。这支青铜文化对中国青铜冶炼业的发展有过很大影响。至少在安阳发掘出土的兽头柄首和马头柄首的铜刀表明了这种影响。

尤其靠近滨海的是东北和东蒙的畜牧部落。

在热河赤峰，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以大量的矽质岩细石器、大型的磨制工具和“漏斗形”的彩陶为特征，属于农业部落。随后，一种崭新的、各方面都完全不同的畜牧文化取代了它。这个第二期史前文化的遗存，包括居址和墓地，特别广泛地分布于热河及其相邻地区。它们属于已经处在青铜时代阶段的部落。

这些部落使用的青铜有釜斧在形制和纹饰上都同上部饰有平行凸弦纹的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有釜斧相似¹。根据出土的石范可以证明，这些铜斧是在当地铸造的。当时还用金属制造长而扁平的刀、红铜丝或青铜丝做成的简单饰物——螺旋形的鬃环、与股代箭头相似的有铤镞和一面隆起一面带鼻的钮扣。这种钮扣广泛分布于外贝加尔、南西伯利亚和东欧的草原地带。

在石器中有一种穿孔石斧，它的形制同西西伯利亚和欧洲的穿孔战斧—战铤极其相似，或许可以说明同西方有某种联系。

这个时期赤峰的居址和墓地中的陶器可以分为两组：磨光红陶和表面带有织物或“绳子”印痕的陶器。所有容器均系手制。其中有典型的鬲、有颈的“球形”器、豆和直壁的盘或钵。

这个文化的人们把死者葬在石棺墓里。这种墓穴同石板墓相似，即在土穴里用大石块镶砌四壁，上面再盖石板。男性骨架附近出有镞，女性骨架近旁则有串珠和鬃环等饰物。墓中出有陶器（包括鬲）和狗、鹿、猪、羊、牛的骨骼。在墓里没有发现马骨，但见于居

1 M. B. 格里亚兹诺夫：《米努辛斯克诸草原古代青铜器：1. 青铜铸》，载《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原始文化史部著作集》，第1卷，列宁格勒，1941年，图版III-1、3。

址的文化层中。¹

可见遗留下这些遗存的人们已饲养家畜，但同时也从事农业。

赤峰第二期史前文化可以根据卡拉苏克形制的空釜斧和中国殷代形制的镞来断代。因此可以断为公元前约十五——十世纪²。

关于滨海同这些亚洲草原地区的联系，如上所述，在滨海的石器中也得到了反映。

滨海金属的第二个来源是青铜时代的中国，开始是殷代，其后是周代。在殷代中国，红铜和青铜的冶铸术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水平，以至殷代工匠制作的艺术品，即礼器和金属雕像，都远远超过了当时欧洲铸工的杰出作品。

殷代工匠还能制造精致的、纹饰华丽而繁缛的青铜工具和兵器：大型的空釜斧、柄部有图案装饰的铜刀、铜镞、带筒的矛头，以及战车和马具的部件。

周代的红铜和青铜冶铸术沿着殷代的方向继续发展。

应当认为，东方畜牧部落中冶金业和铸造工艺在很早时期就达到了繁荣阶段，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们同西方部落的接触，不如说是取决于同中国的联系。

唯一可能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既然滨海介于草原地区和中国之间，同他们都有接触，为什么却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看来，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便于开采的铜矿产地。

1 《赤峰红山后——满洲因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六册，1938年。

2 顺便指出，桑志华在热河巴苏木托城地方还发现了一件典型的塞伊马型椭圆形空釜铜斧，其纹饰为两道平行凸弦纹组成的带纹（桑志华：《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所藏的新石器》，《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馆刊》，第14期，天津，1932年，图版110-1）。贝加尔湖以北戈烈梅卡村也出土一件塞伊马型铜斧（伊尔库次克博物馆藏）。

贝丘时代滨海居民的经济

贝丘对于了解滨海地区沿海部落的文化生活和生产活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这时沿海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同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文化遗迹的性质上，因为数量最多的遗迹就是海里可食软体动物的甲壳。

无怪乎正是在这时，在无数的海湾沿岸和海岬上，开始堆积起巨大的贝壳堆。根据大量的贝壳判断，当时人们经常地、大量地食用可食的软体动物，主要是牡蛎和贻贝。

虽然有大量的贝壳，但是，假如认为沿海部落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简单的采集，即以原始的方式拾拣可食软体动物，或者认为至少夏天是这样，那就错了。贝壳层之所以厚，决不是由于这里的居民是采集“海洋礼物”（即拾拣海潮冲来的海贝或偶然死亡的海兽的尸体）的原始人。

当然，捕捞这些可食的软体动物往往是在狂风巨浪把它们抛到岸上之后进行的。但贝丘遗址居民的这种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专门的、经过良好组织的、在当时来说相当复杂的一种特殊的海上捕捞作业。

这方面的证据，首先是发现的贝壳中，有一些贝壳是属于在大海深水里而不是靠近岸边生活的软体动物。

根据 А. И. 拉津的资料，象海螺（рожок волнистый）这类动物，生活在三十一—七十米的深水中，要有船才能打捞¹。关于贝丘遗址的人捕捞和食用海生软体动物的方法，可以根据 1924—1927 年 А. И. 拉津在研究贝丘时所作的考察作一判断。²

1 А. И. 拉津，同 128 页注 2。

2 参见 А. И. 拉津：《若干可食贝类的资料》，《若干可食贝类捕捞的地区和方法》。

А. И. 拉津的资料说明，大彼得湾最常见的可食贝类是蛤蜊(мактра)，或称萨哈林蛤(Сахалинская кубышка)，朝鲜语称为“贝海”(бякхай)，当地居民则把它叫做小白贝。

从蒙古街河河口到朝鲜边界，即无论是大彼得湾的东北部还是东南部，都有许多地方出产这种动物，见于水深一——四米以下的泥沙里。

朝鲜人和中国人捕捞蛤蜊采用两种方法，一种用采捕机，另一种用三齿叉。采捕机由两个用板条钉成的角锥形架子构成，这两个架子以横木条连接起来。下部的横木条最粗，装有几排大铁齿，这样便在架子底部形成○·七——○·八米宽、二米长的大耙。

把采捕机拉曳前进时，由于大铁齿有一定的弯曲度，所以能够插入几俄寸深的泥沙里。后面一个架子系有结实的网袋，承受由铁齿叉起来的海贝，泥沙则从网格里漏掉。捕捞海贝的朝鲜人对拉津说，用采捕机打捞软体动物是每年凉爽季节的活，因为春秋两季容易把软体动物晾干。采捕机用很长的缆绳系住，从小船上扔出去，再用轱辘绞上来。

另一种方法比较简单，即用五——七米长的轻便的细木杆做成三齿叉捕捞蛤蜊。木杆下端较粗，做成三棱形。棱上有槽，槽里用绳子捆上三个铁齿。每个铁齿长三十五厘米，下端尖锐，内边有齿。拉津写道：“用三齿叉捞贝是一种艺术，几乎整年都可以干。”

“从贝壳里刮出软体动物时使用双刃刀：把蛤蜊握在左手，背朝下，口朝内；把刀插入口内，向下一压，就把连住贝壳的背部贝肉切断了；然后把刀顺右边一扇贝壳一掀，即用另一边刀口把前面的贝肉也切断了；再把刀顺左边一扇贝壳一刮，刮到口边——这样把刀子连续转动一周，软体动物就同贝壳分离了。整个工序就是这么一套灵巧而熟练的动作，最多不超过两秒钟功夫……。”

这种捕捞蛤蜊和刮取贝肉的方法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这

些方法都很简单，贝丘文化的人完全有可能采用过。

根据拉津的资料，许多地方都有出产牡蛎的海滩。在考察队湾、诺夫哥罗德湾、斯拉维扬卡湾以及阿穆尔湾北部都有大量牡蛎。乌苏里湾也出产牡蛎，不过数量较少。

关于牡蛎对于贝丘时代滨海居民的重要意义，“可以根据原始人的贝丘一般都‘邻近’出产牡蛎的海滩来加以判断。这种情况未必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知道，史前人总是把居住地点选在利于渔猎的地方附近。对于以软体动物为食的人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在米诺诺索克湾的沙滩上，留有大量的贝壳堆积，长达七十俄丈。这些由牡蛎壳堆成的贝丘证明，在遥远的过去，附近曾有盛产牡蛎的海滩。列比亚日耶小滩（锡迭米湾）的情况应该也是这样，因为在那里的勃里涅拉海岬上发现有很多由牡蛎壳堆成的贝丘。”

据拉津的考察，“打捞牡蛎是夏天在船上干的活，主要工具是二、三米长的木头夹子。这种夹子有点弯曲，头上装有铁丝或打上铁钉，以便把软体动物夹得更牢。”

贻贝，即拉津所说的“黑贝”，“分布的广度与蛤蜊不相上下”。他列举了阿穆尔湾和乌苏里湾沿岸岩石嶙峋适于贻贝繁殖的许多地方。在淤泥里打捞贻贝用抓钩，在岩石嶙峋的地方可用装有三齿的钩竿，在退潮时的浅水处则干脆拿手去抠。

抓钩有两个四十厘米长的钩。两个钩的末端用一根铁条栓连在一起，还装有一个活动的铁丝圈子。

据拉津所述，“用抓钩打捞贻贝，有两个人在一起比较方便，因为如果没有风浪，一个人可以稍稍划动小船，另一个人则可以来回把抓钩扔出去又拉上来。抓钩在清彻的水底下慢慢地、平稳地拉动。只要抓住一个贻贝，打捞的人就能够从绳子的颤动感觉到抓钩走动不匀或拉力加重。这时得把抓钩慢慢地、小心地拉上来，才能抓牢成团的贻贝，并整个儿拉出水面。贻贝一拉出水面，荡桨的

人就拿一个抄网接住，把它们拉到船上，通常可以捞到十——十六个贻贝，它们的足丝连在一起。但也能碰上成普特重的贻贝群。这些贻贝群夹杂的淤泥里还有蠕虫、小蟹和其它动物。有时则碰上死贝。活的贻贝壳上往往大量寄生着咖啡色的海葵。”

三齿钩竿用一根轻便的长竿做成，竿子末端装有弯曲的三齿叉或有齿夹钳一类的适用装备，夹钳用绳子操纵。

打捞时船要下锚。同贻贝群一起还能拉上石头，有的石头相当大，贻贝的足丝连在石头上。

根据拉津的资料，弗兰格尔湾和纳霍德卡湾的人还捕捞海扇。斯特烈尔基湾的无名小湾富于这种海产。在阿勃列克湾、斯拉维扬卡湾等地也常有海扇。在浅水养殖场里，如果水深不到一米半——二米，由于海水太热，海扇无法生存，往往死亡。

捕捞海扇时使用单齿叉、双齿叉、抄网、镜、采捕机和绳子。

1919—1920年，有一批朝鲜潜水妇捕捞海扇、贻贝和海参。“她们水性很好，潜得很深，能在水下长时间停留，甚至在凉飕飕的秋天也是这样，所以朝鲜人把她们叫做‘母海豹’。”

据俄国的捕鱼人对拉津说，朝鲜人去捕捞海扇，得驾上一只小船，带上几个潜水妇。到了作业地点，就下锚停船，按潜水妇的人数放下浮桶。每个妇女都在自己的浮桶旁边捞海贝，捞到了就塞入挎包里，然后集中到挂在浮桶边的网袋里。

红螺一般生活在水深一·三——二·五米处，偶尔在较浅的地方也有。据拉津的观察，这种动物常见于考察队湾的巴拉诺夫斯基桥和扬奇贺海岬之间，在诺夫哥罗德湾也有。在克拉别村附近的几个牡蛎滩上则尤其多。

红螺分布区的北界是波谢特湾的西南部。

关于软体动物的捕捞业，A. И. 拉津写道：“在所有贝类中，红螺的捕捞方法是最原始的。这种腹足类的软体动物驮着一个厚厚

的螺旋形贝壳。贝壳象一个粗短的萝卜，上面布满了小疙瘩。口开得很大，呈红黄色，非常鲜艳。俄国小孩往往从船上跳入水中去捞红螺，作为游戏。

“几乎只有朝鲜妇女和小孩才把红螺捞来当成平日食物。中国男人间或也干这种活。

“上午，太阳已经老高了，一帮子朝鲜妇女和小孩不脱衣服就到齐胸的水里来回走动，用抄网或用手从淤泥里捞起红螺。不脱衣服会暖和些，也比较容易避免海蜇和虹刺人。

“每个人身边有一个浮动的木盆或脸盆，有时只带一个口袋，捞到的软体动物都放在那里，免得老往岸上送。几个小时以后，打捞的人把随身的木盆装满了，就回到岸上。他们把湿漉漉的衣服稍微拧干一下，就去洗干净捕捞上来的东西。

“把红螺放在平整的石头上，喇叭口朝下，拿一块圆石头轻轻敲砸，打破螺丝转，然后轻轻地从破洞里取出螺肉。人们只吃螺足，剩下的都扔掉。”

显然，滨海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居民即贝丘时代的人也是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方法捕捞可食的软体动物。

在滨海古代居民的生活中，渔业也应当具有同样的意义，甚至在实质上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炊爨遗迹”中，除贝壳外，还有鱼骨，不下八种鱼类：鳕鱼、比目鱼、鳊虎、海粘鲈、日本海鲈鱼、鲭鱼、鲱鱼、金枪鱼¹。M. И. 扬科夫斯基说他发现了小鲨鱼的脊骨。这些都是海鱼的遗骨；淡水鱼和回游鱼类的遗骨根本不见于大彼得湾沿岸的贝丘。

值得注意的是，据 A. 塔拉涅茨说，那时的主要捕捞对象之一“是鳕鱼，对这种鱼类现在在大彼得湾几乎已不作商业性的捕捞

1 A. 塔拉涅茨：《关于把委部落炊爨遗迹中发现的鱼骨》，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院报》，第 18 期，1936 年，第 125—130 页。

了。当时人们还捕捞金枪鱼和 *Lateolabrax*，对这两种鱼类现在也不进行经常性的捕捞²¹。

特别有意义的是发现了金枪鱼这种典型海鱼的遗骨。金枪鱼重达三百公斤，一般都是聚成大群，每群有五百——一千五百条。它们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时间和太平洋鲑鱼、西伯利亚鲑鱼、日本鲑鱼相同。

贝丘出土的鱼骨表明，“当时捕获的主要是适合于用大眼网（鳕鱼、比目鱼、鰕虎）和钩子（鳕鱼、金枪鱼）打捞的鱼类”²²。

关于捕捞海鱼的重要作用，还可以从古代居址的地形即贝丘分布上的一定规律得到证明。A. И. 拉津发现这些贝丘集中于海岸上某些特定的地点，他还发现了这些地点之间的联系。据他的观察，贝丘遗址都在相距不远（五、六公里至八公里）的海岬上。同时，它们的分布有一个特点，即相邻的几个遗址聚成一群，好象形成一个共同的体系，便于控制周围的地段，并以烟火为号，互通消息。

他针对麦河河口附近苏哈诺夫山的遗址写道：“人们不禁感到惊奇，东方的原始居民选择居住地点选得多好啊！这些地方的地势使相邻的几个住地能够彼此望见，每个地方还有一个中心地点。比方眼下这一带，1号哨所踞于制高点，就在苏哈诺夫山上。它占据着有利的战略位置，因而可以控制附近的所有遗址。哨所周围有四块大小不同的地段含有文化遗迹，每个地段都比附近一带高。古时这里应是管辖周围几个住地的某个官员居住的中心地点。这种布局使居民们能够加强住地的防御，因为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信号，迅速得到各种预报。白天，头一个发现情况的人可以在主要的1号地点点起冒浓烟的烽火，把某种事件通知各处。其他住地

1 A. 塔拉涅茨：《关于挹婁部落炊爨遗迹中发现的鱼骨》，载《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院报》，第18期，1936年，第125—130页。

2 同上。

一看到这个信号,便依次传递消息。这样,全体居民很快就知道了发生的事件。晚上则以火光代替烽烟。明亮的火焰更清晰地把消息通报远处。住地之间的联系想必就是这样。”¹

当时,居住在沿海某地的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各部分之间自然有可能存在这样的联系。但尤其可能的是,贝丘遗址的布局首先是取决于居民生产活动的要求。

这些居址一般分布在最利于捕鱼的港湾一带和大大伸入海面的海岬上,可以一眼望见辽阔的海洋。

对于海上渔人和猎人来说,居住地的这种分布是十分自然而合乎常规的,因为他们的全部生活都以一定的方式取决于海洋和海上捕捞业。

关于这一点,A. M. 拉津自己也写得非常肯定,他注意到了贝丘同鱼产丰富的、现在仍设有捕捞场的地方之间的联系。古代居址的这种分布“应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史前人需要有谋生的渔区,使生活比较有点保障”²。

可见象贝丘等类富于特征性的远东考古遗存,表明滨海沿岸各地居民的经济和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从前,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和内陆的渔猎并没有重大差别。而现在,沿海部落已开始全面开发海洋的自然财富。

同内陆的一般狩猎和利用内陆河流、湖泊、池塘的渔业比较起来,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少海洋的食物资源远为丰富多样,沿海部落的生活因而比森林地区的游动渔猎人更有保障。但是,为了利用这些取之不尽的丰富资源、获得“海洋的礼物”,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即拥有相应的海上作业装备。

总之,沿海居民要有特殊的技术文化,就象我们从民族学资料

1 A. M. 拉津,同前书。

2 同上。

中得知的太平洋南部毛利人和北部爱斯基摩人所拥有的技术文化那样。

诚然，这个完全处在石器时代阶段的文化，在缺乏头脑的观察者看来，很可能是非常原始而简单的。

然而，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度专门化的文化，甚至往往比同样处在新石器时代发展水平的内陆部落文化要高得多。

为了解这个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它比内陆居民的文化更为复杂的情况，必需注意到，除了在我们看来还很简单的捕捞可食软体动物的专门装备之外，在海上渔业的条件下，捕捞海鱼的特殊技术也应很早就得到了发展。这方面当然也需要大小鱼网，但它们的尺寸和结构都与内陆河流、湖泊和池塘中使用的有所区别。海里使用的钓竿也与内河内湖渔人的一般钓竿不同，钓丝要长得多、结实得多，坠子和浮标也要有另一种结构。例如毛利人古时的海上钓竿装有很长的钓丝¹。钓钩有各种各样的尺寸和形制。南太平洋海上渔人的鱼网和其它装备也是多种多样的，用以捕捞各种鱼类，包括鲨鱼²。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贝丘遗址居民的渔具的性质和种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当时遗留下来的残余来加以探讨。

我们已经看到，贝丘里发现最多的石器是石坠。其数量往往达几十几百件，例如在砂磧半岛的文化层里，更确切地说是在地穴式住所的填土中，这种卵石坠子简直不可胜数。

1 埃尔斯多姆·贝斯特：《毛里人》，卷2，《玻里尼西亚学会通报》，卷V，惠灵顿，1924年，第423页。

2 参见下列著作有关渔具和捕鱼方法的描写：

特·兰吉·海罗阿：《萨摩阿的物质文化》，《伯尼斯·P. 毕晓普博物馆馆刊》，第75期，檀香山，1930年，第418—517页。

特·兰吉·海罗阿：《毛里人的到来》，新西兰惠灵顿，1950年。

本特·阿内尔：《南太平洋渔业史研究》，载《乌普萨拉地区民族学研究》，第IX卷，乌普萨拉，1955年。

大部分石坠形制都很简单，是普通的椭圆形扁平卵石，两侧打有缺口。制作这种石坠，只要从岸边拾拣大小、形状合适的卵石，用石锤略加打击就行了。

这种石坠在阿穆尔河沿岸的许多新石器时代居址都有出土，在贝加尔地区的贝加尔湖、勒拿河和安加拉河沿岸也曾发现。这是内陆地区分布最广、形制最一般的新石器时代石坠。

在贝丘遗址出土的石坠中，经常发现一种用专门挑选的多孔的火山熔岩精心制作的石坠，它的形状较厚，腰部有一、二道横槽。

这样的石坠在内陆地区的考古遗存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极为稀少。但是它们同海上渔人的石坠完全相同。

这种石坠和钓竿是玻里尼西亚人和美兰尼西亚人等南太平洋渔人的典型工具。在北美也有这类工具¹。

大量的石坠证明：渔业有其重要作用，捕捞规模相当可观，鱼网的尺寸也应当很大。

内陆部落的鱼网或曳网一般比较笨重，用树皮或皮条编成，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直到不久以前，在雅库特极北部即日甘斯克地区和布隆地区的居民中，还存在用柳树皮编织的鱼网。这种鱼网又笨又重，只能在小塘里使用，不能用于海上捕捞。

海上鱼网必须比较轻便耐用。它的制作材料很可能是野生植物纤维，特别是苧麻。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贝丘遗址出有大量纺轮。这些纺轮证明，在当地居民中，用植物纤维纺线的加工业具有重大意义。完全有理由推测，用这种纺锤纺成的线首先是大量用来编织各种海上鱼网。

¹ 埃尔斯多姆·贝斯特，同前书，第 422 页插图及第 423 页；特·兰吉·海罗阿：《萨摩阿的物质文化》，第 369 页；本特·阿内尔，同前书，第 205 页插图 22 之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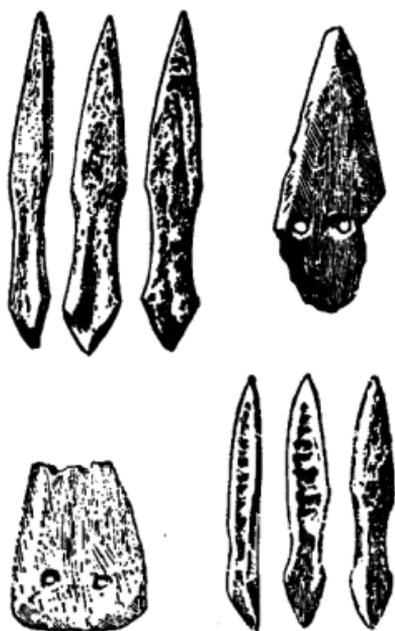
其次，我们也已经看到，贝丘遗址出土的骨器中存在鱼钩，有复合的，也有用整块骨料刻成的。这些鱼钩也应当是海洋深水钓竿上使用的。

在内陆和海洋的渔人和捕兽人中，除钓竿和鱼网外，鱼镖也一直在捕捞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考古研究，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部落就使用了侧面带齿的尖头鱼镖，这是内陆地区的一般形制。在贝丘遗址中，没有发现毫无疑问真正属于这种类型的鱼镖。

但是，决不能就此断言，贝丘时代的人根本不知道、完全没有使用过鱼镖。为了捕获大海鱼特别是海兽，当然要有鱼镖，但鱼镖的形状不一定是侧面带齿的简单棍棒。我们知道，最完善的鱼镖装有能转动的鱼镖尖头；在亚洲、美洲和格陵兰的北极地带海上捕兽者和狩猎者即爱斯基摩人中，有其最发达的形制。

然而在滨海贝丘出土的骨器中，目前也没有发现一件象爱斯基摩人使用的那种形制发达的能转动的鱼镖

头。这样的鱼镖头只见于邻近的东亚诸岛。例如日本北部的本州和北海道，出土一种带有倒刺、筒和穿绳孔眼的鱼镖头，这些工具制作精致，饰有刻线纹，与楚科奇半岛奥克维克时期的鱼镖纹饰



图四十七 骨制的鱼镖头和板岩制的鱼镖头尖锋。砂碛半岛。

及阿拉斯加尤皮塔克鱼镖纹饰非常近似。日本研究者把这些日本鱼镖断为新石器时代绳文文化末期¹。

可是，没有发现这种形制发达的能转动鱼镖并不等于滨海根本不曾有过这种类型的工具。

我们已经看到，在贝丘时期，坚硬锐利的黑曜石或燧石这些制作工具的主要石材，一下子就非常明显地被比较松软的板岩所取代。男子的狩猎刀、匕首和尖状器，包括器形别致、中间往往带一、二个穿孔的大尖状器，均以板岩制成。

在新的板岩尖状器出现以前使用的是与某些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其它尖状器。

这些旧式的尖状器以燧石加工修整而成，一般用于狩猎，偶尔也用来射击鱼类。从斯坦的纳维亚半岛到蒙古草原，内陆猎人的典型武器中都有这类工具。有时这种尖状器也可以在其它条件下使用，如捕猎大海鱼或海兽。例如在鄂霍次克海沿岸的新石器文化和十八——十九世纪科里亚克人的民族学文化中，把砂质岩石精心修整而成的三角形有铤尖状器当作鱼镖头上的尖锋来使用。可以说这些尖状器是万能工具，在各个经济部门中都有用处。

贝丘出土的板岩尖状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正是这种在上部即靠近前锋处有一、二个穿孔的尖状器，直到不久以前还经常见于北极地带海上捕兽人的一切沿海民族学文化中，而且都是用来装在能转动的鱼镖头上，没有别的用途。只要把滨海贝丘出土的这种尖状器同古爱斯基摩人或太平洋沿岸其他

1 八木英三郎：《东北地方人类学旅行——二》，载《人类学杂志》一五，第163号，1899年。

N. G. 芒罗：《史前日本》，第101页，图27—5。

鸟居龙藏：《千岛群岛阿依努人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载《东京帝国大学科学院杂志》，第42卷，第1期，1919年。

G. J. 格罗奥特，同前书，图10，绳文末期沼津遗址出土的鱼镖。

部落的鱼镖头作一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它们完全相同。这些尖状器显然是能转动的鱼镖头，更确切地说是鱼镖头上的“尖锋”。

在所有古老的文化中，只要有能转动的鱼标，就一定有这种板岩尖状器，因此可以反过来说，只要有这种尖状器，就一定会有能转动的鱼镖。

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滨海还没有出过爱斯基摩人使用的那种有穿、有筒（闭合或不闭合）、底部有倒刺的能转动的骨鱼镖头。

但制作这种鱼镖头完全可以不用骨料，而代之以坚硬的木材，所以没有保存下来，只留下了板岩尖状器——鱼镖头的尖锋。

至少在民族学上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南太平洋，无论是在美兰尼西亚还是在玻里尼西亚，能转动的鱼镖通体是用硬木做成的。这种鱼镖在玻里尼西亚见于马克萨斯群岛的居民中，在美兰尼西亚则见于新几内亚的托列斯海峡地区。¹

不久前安达曼人也使用木制的鱼镖头。有可能滨海古代居民使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鱼镖（尖锋以板岩制成）。

此外，如上所述，砂磧半岛的贝丘遗址出有八件骨制品，从器形看来，它们完全可能是早期形制的能转动的鱼镖头。

早在研究滨海贝丘的初期，就发现了这种骨器。头一个发现者和记述者是 B. П. 马尔加里托夫，他认为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具。A. И. 拉津则认为这是钻子，同样与事实相去很远。

只有大大扩充比较材料，以欧、亚、美三大洲北部沿海部落文化的历史为总的背景，才能弄清这些器物的真正用途。

这些器物长七·二——十三·五厘米，平均十厘米。其中一件以鹿角为材料，一面保存着鹿角里面的多孔结构，另一面则有鹿角外表特有的槽沟。其余的用劈开的动物长管骨制成。器形一律：

1 本特·阿内尔，同前书，第 66—68 页。

一面内凹成槽形,另一面突起;较长的一端是粗壮坚实的尖端。尖端与下部之间两侧显著内收,形成一种肩部。下部较宽,底部作三角形,象个马刺。从侧面看上去,这一端明显弯向一面,无一例外。为了弄清这些器物的用途,必须谈谈能转动的鱼镖头这种在旧大陆和新大陆(美洲)海上捕兽业中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工具的分类。

勒鲁瓦-古兰在论述太平洋沿岸北部地区考古学的著名著作中对能转动的鱼镖作了类型分析,划分出最为原始古朴的一组。按照他所采用的器物名称目录,“母”鱼镖头,即以筒装在木棍末端专门的突出部上面的鱼镖头,可以按不闭合的筒和闭合的筒分为两大类。前者比较古朴,其中有几件特别原始,都是用一块骨片制成的,每块骨片的大部分略弯曲。一面有槽。这个槽就是鱼镖头的筒,木棍安装在这里,并以皮条捆牢。

因此,这里无需特别的、闭合的筒,而代之以皮条捆绑。

这种鱼镖头和木棍没有安皮条的穿孔,只把皮条横缠、系牢就行了。

这些鱼镖的特点是下部明显弯曲,下端往往磨尖,形成一个别致的倒刺,有时甚至分成双齿。

勒鲁瓦-古兰把这种类型的鱼镖头称为A型¹。根据他的资料,A型的鱼镖头见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以及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²。他指出,在美洲,海德部落使用这种形式的钢鱼镖头,在哈得孙湾有一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留申群岛也有。北美西北海岸的鱼镖也是这种形状,但是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们是对使用的,即把两把鱼镖捆在一起,平整的一面向内,隆起的一面

1 安德烈·勒鲁瓦-古兰:《北太平洋的考古研究——亚美二洲太平洋沿岸民族关系研究资料》,巴黎,1946年,第356—361页。

2 格罗奥特所发表的绳文文化早期鱼镖,器形也很简单,但细部不同,见于本州极北部青森县王寺遗址下层。

朝外，其间装入石制或蚌制的尖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用这种鱼镖捕捞鲑鱼。类似的尖状器在佛莱塞河（不列颠哥伦比亚）沿岸的古代贝丘和华盛顿州（美国）的贝丘中也曾发现。勒鲁瓦-古兰把这种鱼镖列为C型。

我国滨海的上述原始的鱼镖头无疑与勒鲁瓦-古兰图表中的A型鱼镖相似。二者均以简单的骨片或角片制成；内面略有凹槽；下端（即与前锋相对的一端）稍向外弯曲，磨成倒刺；由于没有穿孔，所以两侧凹陷，以捆系木把。有可能滨海的鱼镖头间或也象C型鱼镖那样使用，即成对地捆在一起。¹

这样，乍看起来令人费解的板岩之取代黑曜石、磨制的尖状器之取代从前压削的尖状器，应当不只是单纯表明石器制作技术上的简单演变。这种取代归根结蒂应是远东沿海各地古代居民生产活动的基本方向发生变化的反映。

在贝丘遗址的居民中，并不是仅仅出现了新型的尖状器，而是产生了崭新的渔猎武器——捕捞大鱼和海兽的鱼镖。他们已经有了包括一整套鱼镖的复杂装备，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些鱼镖的出现，表明沿海各地的文化发展有了极大进步，表明从日本列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海上渔猎人有了极其重要的技术发明。

不管这种装备是滨海贝丘遗址的居民自己发明的还是从其他部落传来的，能转动的鱼镖出现本身就应当能够说明许多问题²。没有这样的装备，就不可能出现海上捕兽人的高度专门化的文化，这个文化在某些方面已远远超过了新石器时代内陆渔猎人的文化。

没有这样的装备，人们就不可能在太平洋和北冰洋沿岸的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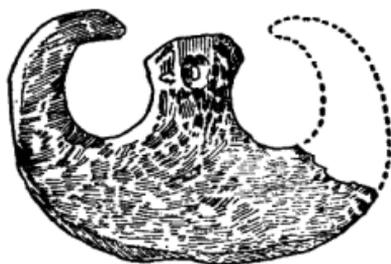
1 安德烈·勒鲁瓦-古兰，同前书，第363—365页。

2 日本北部的能转动鱼镖酷似爱斯基摩人中形制发达的鱼镖，而且可能出现得很早。但日本鱼镖的历史仍然不大清楚，缺乏足够的研究。

大地域定居下来，就不可能真正开发这些水域内从前人类几乎无法取得的海洋资源。

最后，如果不到外海，就不可能从事海上捕捞。因此，海上渔猎人以及海贝、螃蟹和昆布的采集者还应当有经得住海上的颠簸和风暴的大船。

必须看到，他们不是在风暴过后去拾拣抛到陆地上的“海洋礼物”的消极采集者，而是海上的捕捞者，一有需要，就敢于航行到距海岸很远的地方。他们应当拥有专门的航海船只，很可能是类似爱斯基摩人和阿留申群岛居民使用的那种轻便的大兽皮艇；不过也有可能是南方类型的较重而较耐用的木船，船上装有风帆和舷外支架，类似毛利人和南太平洋群岛其他居民的大船，这些居民远在石器时代就开发了南部的海域。



图四十八 坠饰。扬科夫斯基半岛。

因此，1953年我们在锡迭米河河口发现的一件骨器就特别惹人注意。这件骨制品不是简单的坠饰，而是滨海古代居民的船只图案化的雕像，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这正是海船应有的形状。至少在十八世纪的图画上，那些还不知道金属的毛利人——“日出航海家”的战船就是这样，船头和船尾高高翘起，风帆扯得很大。说不定这个雕像可能就是石器时代帆船的真实写照；遥想二千多年以前，太平洋上咸涩的海风还把船上的风帆张得满满的呢！

由此可见，这些沿岸居民决不是象十九世纪火地岛的落后居民那样从事采集并部分地从事狩猎。他们的文化决不是那样原始，也不是内陆类型的一般渔猎文化。

在贝丘时代，滨海的沿岸各地出现了海上采集者和海上渔猎

者的专门性文化。

这种专门性文化的存在，是贝丘时代滨海居民经济和生活方式的第一个特点，而它的出现则是他们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当时出现了与从前不同的新经济，产生了新文化。

毫无疑问，当时还出现了新的心理状态：形成了勇敢的航海者的新宇宙观，他们习惯于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因此，滨海边疆区海岸上头一批贝丘的出现不是衰落的表现；相反，它证明当地居民在生活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在贝丘时代滨海居民的经济生活中，还有一点也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即在滨海特别是在其内陆部分的居民中，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它的基础，如上所述，那是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奠定了的。

过去研究贝丘的人大概不止一次地看到过一种奇怪的椭圆形石块与陶片和石斧共存，它的轮廓象船的模样。器表一面突起，多少有点光滑；另一面平整，布满了细密的琢制痕迹——一种划纹。但是，热中于寻找石器时代磨制工具的考古学家们却忽略了这些外表粗陋、轮廓不是规整的几何形状、表面又没有磨光的石块。假如表面经过磨光，即使怀疑心理最大的人也能看出这是人工制造的。因此，没有一个研究者的报告提到过这种器物，在我们的博物馆里也没有一件这样的收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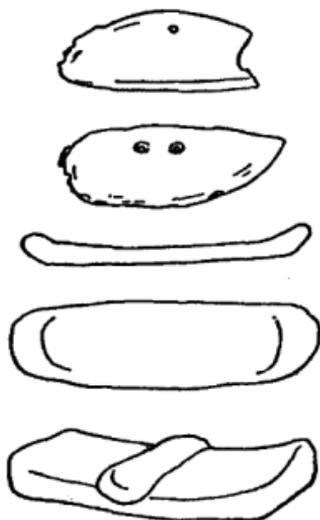
然而，这些器物的科学价值却大大超过最精致的石砬和石斧。它们的形制、尺寸和表面加工的性质都和上古的石磨谷器完全相同，这些磨谷器先于晚世的、沿轴心旋转的圆形手磨，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农业文化中常有发现¹。从“金字塔之国”古代陵墓中的女俑看来，古代埃及的妇女正是用这种工具来碾磨谷物。这种磨面方法对原始公社时代的农业非常有代表性，就象在领主管辖下的

1 约翰·斯托克、沃尔特·达尔文：《磨面的历史》，蒂格，1952年。

封建社会里使用手磨一样。

在滨海的居址里，现在愈来愈经常地发现磨谷器，更确切地说是磨棒，器形都是富于特征性的船形。

我们在扬科夫斯基半岛曾经发现这种磨谷器，随后又见于其它一些地方，例如在砂磧半岛的古代住所出有一整套磨谷器。这类工具现在已是贝丘出土资料中的常见器物。



图四十九 1—滨海的石刀(镰)，
2—中国的石刀(镰)，3—磨棒
(砂磧半岛)，4—磨谷器，5—
东北赤峰出土的磨盘和磨棒。

除磨谷器外，发现有肩石锄，一般不是磨制而是打制的，更进一步说明这是锄地的工具。这种石锄有时成堆出土，甚至多达几十件，例如在捷丘贺河口码头附近和奥耳加湾附近所见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种工具酷似东南亚的所谓有肩石斧以及考古学文献中称为石锄的华北远古农具¹。

这里还出有富于特征性的板岩磨制石刀-石镰，靠近刀背有装把的穿孔。这种工具的形制、尺寸尤其是带有穿孔的特点都同中国人用来收割庄稼特别是收割高

粱的早期石刀相似。

J. G. 安特生说，这种石刀是中国金属镰刀包括晚世铁制镰刀的前身和始祖。

安特生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长方形和半月形石刀同热河及直隶北部的现代铁刀相比，这些地区是种植高粱并用这种铁刀割

1 J. G. 安特生：《中国人史前期之研究》，图版 24 之 1—3，图版 25 之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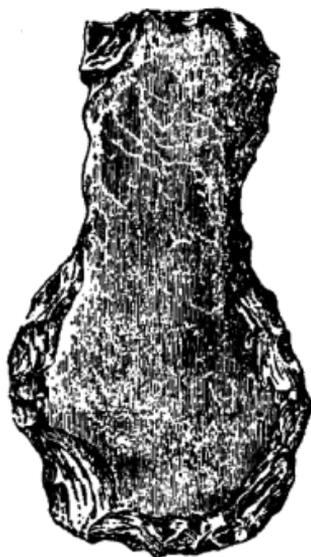
杆的主要地区。安特生认为这种相似性是中国古代即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一个证据¹。

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了农业劳动所必需的所有工具：有用来耕种土地的，有用来收割高秆作物的，也有用来磨面的。

这些器物表明，如果不是在滨海全境，至少在波谢特湾地区、锡迭米河河口附近和砂磧半岛等地非常广阔的范围，当时已经广泛地分布着农业文化，其技术装备与华北仰韶部落的农业经济大致处于同一水平。

除原始的锄耕农业外，滨海古代居民还有萌芽状态的家畜饲养业。

贝丘所出动物遗骨的出色特点是存在猪骨。例如，1956年在砂磧半岛的发掘中，发现狗、鹿、熊、鹰和猪的骨骼，以猪骨最多。这个时期的其它居址也是这样。居址里到处都有猪骨。砂磧半岛以小猪骨居多。这可能是由于养猪在经济生活中有其重要的作用，就象南太平洋地区处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水平的各个部落开始与欧洲人接触时期的情况那样。在这些部落中，养猪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例如 H. H. 米克鲁霍-马克莱访问巴布亚人时，头一天就收到了椰子、香蕉和两只野性很大的小猪等礼物，“猪脚牢牢捆住，小



图五十 石锄。波谢特。

¹ J. G. 安特生：《中国的一种早期文化》，载《中国地质调查所通报》，第5期第1册，1923年，第44页。

J. G. 安特生，同137页注2。

猪嗷嗷乱叫”。¹

后来，H. H. 米克鲁霍-马克莱亲眼看到，巴布亚人对猪的态度在我们看来确非同寻常。有一次，他在高伦杜村听到痛哭声和哀诉声，就象给人送葬那样。“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就看到了这个痛哭的女人。她一会儿用双手遮住眼睛，一会儿擦擦眼泪，慢慢地走着，哭叫着，象唱歌似地诉说着什么。在她后面跟着几个女人和小孩，他们也耷拉着头，但默默无声。”²原来，夜里这女人的一只大猪死了。考察家写道：“女人对猪如此依恋，其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些地方……有的女人用自己的奶喂养小猪。这一回也是这样。我笑着对这个女人说，猪还多呢，这时她指着她的乳房，回答说，这一只是她自己奶大的。”³

据H. H. 米克鲁霍-马克莱说，巴布亚人饲养的猪是新几内亚野猪的后代，小时候毛色呈条纹形状，长大后变成黑色。这种猪竖耳，长嘴，长脚。村民们还驯养偶然捕获的小野猪。“巴布亚人仅在隆重喜庆时宰猪，一口猪不仅全村人都吃得上，还要用来款待二、三个村子里来的客人。”⁴

巴布亚人的狗只作食用，但他们认为狗肉的味道和质量较差，对它的照料也就不及养猪。学者在描写巴布亚人的生活时写道：“马克莱岸上的巴布亚人虽然同其他种族完全隔绝，也根本不知道金属（直到1871年我在此访问时），但却能用石斧建造相当适用的、往往很大的茅舍，建成颇大的村落。他们在房舍众多而美观的村子附近设有种植场，可以终年从这里获得食物；他们饲养家畜，有猪、狗、鸡。”⁵他还用同样的话语描述了他所说的“富裕群岛”的

1 《H. H. 米克鲁霍-马克莱全集》，第1卷，第80页。

2 同上，第285页。

3 同上。

4 同上，第56页。

5 同上，第194页。

居民生活,说他们“种植许多块根作物,饲养猪和鸡”¹。

由此可见,在巴布亚人中,养猪和原始农业极相适应地同时共存。他们的文化水平与滨海境内贝丘遗址居民大致相近,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养猪业在后者的生活中也有同样的作用,所以在住所附近才有大量的猪骨,特别是小猪的骨骼。

这个推论还可以从仰韶农业文化的居址上存在猪骨的事实得到印证;我们知道,那些人也是食用猪肉和狗肉的。

因此,滨海部落的原始锄耕农业必然辅以家畜饲养业;土地提供植物食品;猪狗饲养业则供给肉食。

文化联系与古代中国的作用

综观贝丘遗址的出土资料,可以看出,滨海沿岸各地居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

滨海部落的物质文化有了根本改观。

诚然,石头仍然是劳动工具最重要的制作材料。代表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刀、鱼镖头和箭头仍然大量地、成套地出土,更不用说卵石坠一类的原始器物了。

因此总的说来,当时的文化在外表上还保持着新石器时代的形态。

但就本质而言,一切都已改观:石器的形制乃至石材和制作技术都发生了变化。

从前主要用来制造小型工具的火山玻璃——黑曜石,这时已经完全不用了。矽质岩也是这样。取而代之的几乎全部是板岩。

在劳动工具和武器的制作技术上,出现了真正的“板岩时代”。这样,过去高度发达的压削修整技术便消失了,因为它是同矽质岩的利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石材能够打出或压出刃口

1 《H.H.米克鲁霍-马克莱全集》,第I卷,第321页。

锐利的薄石片。

取而代之的是加工板岩时主要采用的磨制技术。石器的磨制成为万能的方法，不仅石砬和石斧，而且箭头、石刀和其它劳动工具都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

旧式的工具已经消失，出现了新的器物。压削修整的小型制品已经完全不用了。

在贝丘遗址里，不仅没有新石器时代居址中常见的那些用燧石或黑曜石制成的刀、刮削器、钻和镞，就连简单的石核、石片以及加工石材时打掉的碎石也几乎见不到了，只有制作石砬的卵石还留下一些初步加工时打掉的碎块。头一次出现了金属匕首和锋刃器的板岩仿制品。

同时，石砬的形制也有了变化，侧面的轮廓变成了对称的长方形。

考古发现物中最丰富的资料——陶器的面貌也为之一新。诚然，有时还能见到类似旧式陶器的某些因素，但在整体上，容器的形制已变得比较多样，比较复杂，出现了从前没有的器形。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圆锥形细把的敞口浅腹豆。容器的花纹和外表装饰也有显著变化。与器形的进化相反，纹饰变得比较简单划一。复杂的折线几何纹和之字纹好象分解成单独的母题，并且发生了变形。同时，容器的装饰手法上还出现了新的因素：广泛流行平行的弦纹和附加堆纹；开始出现对称的纽，与弦纹、附加堆纹相结合。器表往往磨光，有时还挂一层薄薄的深红色陶衣。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滨海居民生活史上这一新阶段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究竟是怎么来的。

所有这些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呢？

必须看到，这一切首先是同牵涉到滨海古代部落的生活基础的某些新现象，尤其是生产方式 and 经济领域里的变化相联系的。

滨海主要的、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无疑是溯源于邻近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是东亚最古老、最强大的农业中心。

我们在上面论述滨海新石器时代的一章里已经指出,中国在第一个国家即殷朝出现之前好久就存在农业文化。起初,在国家组织出现以前,这种文化是在两个独立的中心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西北部)由于在甘肃、河南和陕西的发掘,了解得比较清楚全面。发掘表明当时存在光辉的彩陶文化,它较之西方的同类文化毫不逊色,而其纹饰的丰富和器形的雅致甚至还超过后者。

中国原始时代文化的另一个发展中心在东部和东南部,这些地区同样很早就产生了农业,形成了独特的高度文化。一般认为这里存在所谓“黑陶文化”。

远古新石器时代中国的这两个主要文化中心(特别是后者即东方文化中心)都同我国远东距离很近,它们同滨海及阿穆尔河沿岸部落彼此为邻,因而不能不发生密切的文化联系。

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千百年中,中国的先进部落对远近四邻有着进步的影响。

这一点首先关系到远东部落的生活基础,关系到他们的经济,我们在其相当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可以看到原始农业正在出现的迹象。这些迹象再一次表现在贝丘文化上,而且这时更加清晰更加明显地反映出同中国远古农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虽然后者还只有石锄、石镰等农具。

这方面的证据是,滨海出土的石锄¹、石镰²等远古农人的主要劳动工具,其形制同远古中国的同类工具完全相同。

1 类似的有肩石斧-石锄可参见《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5期,图版24之1、2、3、25之1、2、3、4;第19期,图版57之3、4、7、60之1。

2 同上,第15期,图版26、164、165;第17期,图版21之2、4、22之1、2、3、4、23之1、2、5;第18期,图版52之13、14;第19期,图版61之3、6、10、13、62之1,117之1-8。

因此，贝丘文化的另一些新因素也表现出起源于中国远古农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迹象，这是不足为奇的。

仰韶文化中常见的那种石斧就是这样。例如，截面呈矩形的、对称的扁平石斧是贝丘遗址里最有代表性的石器，这种石斧也广泛流行于仰韶文化。安特生把它划为专门的一类，称之为“北方的碓”¹。

这类石碓也见于东北和朝鲜。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中还可看到滨海贝丘出土的其它几种磨制砍伐工具。

贝丘遗址经常出土一种分量较重的大型工具，是碓或斧的特殊变体，它的特点是纵剖面自背部以下大大敞开，至刃部附近最厚。这种工具的形状就象水滴的轮廓。

南京以南七十公里的新石器时代湖熟(老鼠墩)居址出有形制极其近似的工具，它们同陶纺轮、三足器、板岩磨制矛头、箭头和中间带有穿孔(以便装在把上)的板岩镰刀共存。黄河流域的居址也有这种工具，其中有些标本就是在彩陶文化的典型发现地仰韶村遗址出土的²。

板岩磨制的箭头和鱼镖头也是这样，这类器物是贝丘文化显著区别于滨海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别于邻近的亚洲北部和中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显著的因素；在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板岩尖状器。但中国和滨海的板岩尖状器却基本相同，只是中国的器形较宽较厚，铤部比较明显³。

同滨海一样，华北的仰韶文化居址也有那种用来装在鱼镖头

1 J.G.安特生，同158页注1，图版14之1—4；第19期，图版54之1—5，122之3,7,123之1,8，图版26。

2 《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9期，图版52之1。

3 同上，第19期，图版63之1—9，64之15—17，110之1—6,8—11，128之6,7。

上的穿孔尖锋,¹ 以及带有槽沟的石坠。²

奇怪的是,甚至贝丘出土的骨器,象形制独特的骨锥或骨钻,也竟然同甘肃仰韶文化的典型标本相同。它们用食草动物的长骨做成,一端劈成尖锋。³

滨海贝丘出土的骨针也同仰韶文化居址出土的完全相同⁴。很可能象管珠这类特别珍贵的饰物起初也是从那里,即从东南亚早期农业文化的分布地区传来的,后来成为本地匠人的样品。

诚然,中国出土的大管珠数量不及滨海。但在甘肃的发掘中,在一具骨架附近发现一颗绿色的“滑石”管珠,长四十三毫米,管道作圆柱体形,形制与滨海出土的完全相同⁵。有些玉饰也可能是中国起源的,早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特别珍重玉器。

陶器的相似性也很明显,而且这些相似点在滨海境内恰恰是新因素。

在容器的形制方面,首先是上面提到的敞口浅腹圈足豆。

其次,贝丘遗址经常出土一种平底器,鼓腹,有明显的领,唇微侈,肩部附有带孔器耳。它同华北新石器时代陶器,即彩陶文化仰韶类型的容器也极其相似。

这种安佛拉式的双耳罐在仰韶文化中最为普遍,奈尔斯·巴尔姆格伦曾详细研究仰韶文化的陶器,他写道,双耳罐是著名的半山墓地随葬陶器中最有代表性的器形。⁶ 仰韶双耳罐有高领和矮领

1 《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8期,图版18之1、2。

2 同上,第18期,图版19之8a,8b,52之1。

3 J. G. 安特生,同158页注1,图版146之2、7。

4 同上,第266页,图120a。

5 必须指出,晚期的长管珠广泛流行于日本列岛,以公元初的遗存出土最多。因此,滨海境内采集到的这种管珠有很大一部分也有可能是属于公元初几个世纪的。

6 奈尔斯·巴尔姆格伦:《半山及马厂随葬陶器》,《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三号第一册,北平,1934年,第9页。

两种。我们滨海的安佛拉式双耳罐与矮领的最为近似¹。仰韶文化容器的器耳通常象一个半环。贝丘文化的容器也附有这种器耳。

但滨海最普遍的容器，其器耳往往呈小鼓包的形状，带一个穿孔。^①类似的器耳有时也见于仰韶文化。²

贝丘遗址中特别流行浅腹平底碗，这种器形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也是很有代表性的。³

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滨海贝丘文化的典型器物是圈足豆，有的圈足矮而粗，有的高而细。⁴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纹饰中，由平行的、与滨海出土同样的附加堆纹组成的带纹占有显著地位。⁵有时豆的圈足也是这样装饰的。⁶这些情况也是滨海贝丘所出陶器的固有特点。

中国新石器时代还广泛流行弦纹，它的结构同上述附加堆纹相似，但不是凸起的，而是凹陷的线条。这种纹饰我们在滨海贝丘的出土资料中也经常看到。⁷

象陶纺轮这种分布很广的器物，也显出很大的相似性。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滨海的常见器形都是一面平整，另一面突起成器领⁸。纹饰也基本相同，是辐射状或相互交叉的线条，有的线条是篦点形状的虚线，有的则是连贯的划线⁹。

1 同上，第22页，图22—33；第96页，图87—92。

2 同上，第10页；第13页，图9、10。

3 《远东古物馆馆刊》，第18期，图版5之14；第19期，图版14之5、6、15之1、2；第19期，图版95之1、2、133之2。

4 同上，第15期，图版34之1、2；第19期，图版29之1—4，图版33之5，图版106之2、3。

5 同上，第15期，图版31之3、4、33之3、4、105之1、4。

6 同上，第18期。

7 同上，第15期，图版31之3、4、32之3、4。

8 同上，第18期，图版15之10、26之5、7；第19期，图版71之4，108之8。

9 同上，第19期，图版103之4、10。

① 我国考古界称之为“系”。——译者

贝丘遗址同南方的联系不仅表现在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上,而且渗透到整个物质文化,包括当时滨海居民的房屋建筑。

例如,对比迄今所知的滨海最古老的住所遗迹,可以发现捷丘贺新石器时代居址的住所与砂碛半岛贝丘时代的住所重大的、根本的区别。根据这些遗迹判断,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平面设计上,而且反映在住所结构上。

在捷丘贺,住所的外周作圆形或多角形,内部的居住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如上所述,它的平面设计和整个结构与北极地带的现代住所即十八—十九世纪科里亚克人的冬季房屋极其相似。圆屋顶中央的烟孔无疑也当作出入口。

相反,砂碛半岛的住所平面轮廓呈规则的长方形。结构上最重要的特点是置有平行的四排纵列立柱。这种结构在东北亚的北极部落住所里是没有的。但在遥远的南方的民族学资料中,却存在基本与此相同的住所平面设计和构筑方法。特·兰吉·海罗阿在论述萨摩阿群岛居民物质文化的专著中谈到了住所的建筑和结构,详细描写了萨摩阿人普通住房(“法莱约”)的结构。它的平面轮廓呈长方形。房顶很高,是两面坡的。房子的基础结构是成对安置的四排纵列立柱。其中两排较高,每排五根,承受屋顶的大部分压力,位置在房子内部。两排立柱之间好象留出宽敞的纵廊,占据住所内的大部分空间。屋顶的其余重量分担在较矮的墙壁立柱上。这些立柱也是五根一排。另有一种长方形的客房(“法莱-阿佛劳”)也是这样建筑的。传说“法莱-阿佛劳”是萨摩阿群岛最古老的住房,其中第一所是萨摩阿人传说中的英雄萨·唐哥洛阿建造的,其形状正是这样。¹

玻里尼西亚人及其亲属部落的祖先应当是从其故乡,即最可

1 特·兰吉·海罗阿,同150页注1,第16—17页,图7;第20—21页,图9。
W.I. 菲利普斯:《毛里人的房子和食物贮藏所》,惠灵顿,1952年。

能是从印度支那和中国南方把这种建筑传统带到萨摩阿群岛的。古代中国的住房以及宫殿、庙宇也有按这样的结构原则和平面设计来建造的。

中国人从黑陶文化时期和殷代开始，便直接在地面上或在夯土台基上建筑住所，房架由三、四排立柱支承，立柱底下置有石柱础，稍晚甚至还有铜柱础。房子平面轮廓作长方形。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房子在卜骨上有其图形。克里尔把它同希腊的老式庙宇相比拟¹。这个建筑类型出现于青铜时代初期，在随后的几千年里，一直稳定地存在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中。我国远东的渤海人和满族人也有这类建筑，如满洲人的庙宇和宫殿等豪华建筑。屋顶用平行的几排纵列立柱支承。屋内因而分成两道或更多的长条形柱廊。

这种建筑的初期形式，在民族学上是萨摩阿人的“法莱约”和“法莱-阿佛劳”，在考古学上则是砂磧半岛的地穴式住所。因此，这种地穴式住所是在南方类型而不是在北方类型的住所进化序列中占据着稳固的地位。

可以设想，在贝丘时代，这种形制的住所也正是从南方，即从邻近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最可能是从其南方沿海地区传到我国滨海境内的。这个想法还可以从邻近的朝鲜存在同样结构的住所这一事实得到证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工作队曾在图们江沿岸新石器时代五洞遗址发掘出这种住所的遗迹。

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影响应当是通过与滨海相邻的中国各地区（首先是山东和东北沿海地区即辽东）以及朝鲜进入滨海的。因此，我们在这些地区可以找到近似滨海发现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是不足为奇的。

1 H. G. 克里尔:《中国早期文化之研究》,1948年,第61—67页。

辽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最值得注意的重要遗存是魏子窝附近单砣子居址和墓地。单砣子是海边的一个小山岗。它是沿岸低地上的一个孤立高地。从前这片低地是海底，单砣子岗则是一个真正的岛。

这个小岛在长时期中曾一直有人居住，因为这里堆积的文化层很厚。文化层里含有大量陶器和石器。

人们选择岩石嶙峋的、地处富产鱼类和可食软体动物的海洋中的小岛作为居址，这说明他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捕鱼和采集。关于采集，小岛上发现有许多贝壳。在邻近的旅大附近大小海湾里，可以采集到极其丰富的可食软体动物，因而遗留下一堆堆的贝丘。单砣子岛的文化层出有许多鱼骨和圆筒形、圆锥形或长方形的陶网坠。这些发现表明当时主要以网捕鱼。出土的箭头、鸟骨和兽骨则证明，狩猎在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兽骨中以野猪骨最多，显然，附近芦苇丛生的沼泽低地出产野猪；也有可能一部分野猪已变成家养的猪。随着农业逐渐推广，畜牧业也发展起来。有些居址和贝丘已经出有牛、马骨骼。

单砣子岛上的居民还完全采用新石器时代的技术。石头和骨料是制作劳动工具和武器的基本材料。他们使用磨制石斧和石镞。这些工具主要是以当地的闪长石制成的，轮廓呈梯形或长方形，一面作成陡刃。此外，还有一种上部穿有圆孔的宽扁石斧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器物。公元前第一千年上半叶的周代，中国人已把这种器物普遍用作礼器。在单砣子岛的一具新石器时代骨架附近，也发现一件这种形制的精致石斧。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板岩制品，有磨制的箭头、石刀和匕首。石刀最典型的形制是我们熟悉的半月形，中央有二、三个安柄的穿孔^①。居址中除器形和纹饰比较粗糙的陶器，如表面经磨光的黑

^① 说这是安柄的穿孔，这可能是作者叙述上的错误。——译者

色或红色陶罐、敞口浅腹碗和豆以外，还有相当精美的高颈壶，甚至还有多色的彩绘陶片。

单砣子出土器物中也有完整的彩绘陶。这些都是陶壶，器形为小圈足、鼓腹、敛口，器表以三种颜色绘满了独特的直线几何形“地毯”花纹。其中一件绘以红、白、黑三色，纹样是分布成棋盘形状的方格纹，每个方格分成顶角朝向中央的四个三角形。另两件容器的彩绘呈黑、黄、红三色，纹样更为复杂，是边框绘成阶梯形状的菱形，其中一件的菱形边框为单层，另一件则是层层相套。单砣子的彩绘陶近似旅大与新石器时代器物共存的陶器，但同较早的华北新石器时代彩陶却迥然不同。后者的特点是在红色底子上施以黑色单彩，纹样是曲线，尤以螺旋纹为普遍。

很可能辽东的这种以直线几何图形为母题的繁缛彩绘，其产生基础与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纵行之字形划纹相同，是后者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纹饰的基础当是高度发达的编织篮子和席子的技术，因为篮子和席子上的平行之字纹和简单的或阶梯形的菱形图案本身就是从编织技术中产生的，只要看一看太平洋群岛诸部落（如萨摩阿群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居民）和北美、南美印第安人的篮子、席子等编织物，就可以确信这一点。这些地区到处都可看到类似的纹饰母题和结构。¹

辽东的古代陶匠实际上只需把篮子、席子上的这些花纹移植到陶器上，看来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

辽东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这种直线几何形纹饰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近似滨海贝丘所出的直线纹饰，只是后者比较简朴而贫乏罢了。

¹ 参见特·兰吉·海罗阿，同150页注1，图版 XVI 之 A-2及 D₁图版 XVII 之 B及C。

W. 约赫利森：《阿留申群岛的历史、民族学与考古学》，华盛顿，1953年，第59—62页。

这里还有环绕容器上部的附加弦纹，由内填斜线的三角形组成并以划线为边饰的带纹、内填斜线的之字形或折线几何形条纹。必须注意到，如上所述，折线几何纹在我国滨海不仅见于较早期的遗存，而且有时也见于贝丘出土的陶器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辽东所出陶器的彩绘中有一种宽边的十字纹。滨海贝丘出土的陶片上则有以刻划的直线组成的这种大十字纹。

滨海的彩陶很少，但单砣子居址和墓地出土的磨光红陶在外表上却与贝丘出土的滨海陶器相同。器形也相符，如高领鼓腹壶、浅腹碗和圆锥形高圈足豆。

在辽东，与这种陶器共出的有椭圆形或长方形的磨制石斧、半月形或长方形的板岩磨制穿孔刀-镰、板岩磨制的尖状器、圆筒形的石管珠。一句话，这里存在滨海贝丘遗址固有的各种石器。骨器也相同，包括骨锥或骨钻、野猪獠牙制品。¹

在这方面，不能忽略一个情况，即在更遥远的南方乃至印度支那的文化中，可以发现某些因素与滨海的贝丘文化相似。例如宗朗森地方就有滨海那样的贝丘，在贝丘里三·八米深处发现了饰有螺旋纹和折线几何纹的豆。这些贝丘还出有外表挂红色陶衣的容器、有肩小锄、扁平形磨制石斧和饰有规整的十字形划纹的陶环，十字纹与滨海贝丘所出某些陶器的纹饰完全相同。在东京湾沿岸的新石器时代居址中，有一个居址出有三件与滨海出土品相似的板岩尖状器，其中一件有穿孔痕迹。²台湾的新石器时代也有这种用作鱼镖头附加尖锋的尖状器，以及截面作长方形的扁平磨制

1 《镜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之先史时代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东京·京都，1929年。

2 O. 门京：《东亚的石器时代》，载《史密特纪念文集》，维也纳，1928年。

石斧。¹

显然，印度支那的上述因素都是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中国沿海各地传入的。这些地区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故乡。许多代表我国滨海贝丘文化的成分不仅从那里渗入东北方的满洲、朝鲜和滨海，而且远传南亚，直达湄公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对贝丘文化的断代来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与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存相似的贝丘时代遗存不仅见于仰韶文化，而且存在于黑陶文化中。著名的城子崖居址的下层出土物便是属于黑陶文化晚期。该遗址在华北中原地区东北部的中心，即中国最古老的殷代国家兴起的地方。城子崖下层遗址的居民也象仰韶文化的部落那样，一直使用石斧、石刀以及同样的箭头和骨器。

城子崖居址下层还没有使用金属的明显痕迹，但其居民可能已知道金属。他们多用手制陶器，但也使用陶轮。与仰韶文化不同，这里没有彩陶，但器形比较发达完善。出土物以器壁极薄而十分坚实的磨光黑陶为特征。器形的最大特点是有鬲、鼎、鬲等各种形制的三足器、高圈足豆、敞口浅腹碗和侈唇深腹的高脚杯形器。

城子崖下层居址的出色特点是四周有一层很厚的防御设施即类似城墙的遗迹，墙脚筑在掘入地下的沟里。围墙以夯土和石块垒筑而成，宽达十一·六米，高九米^①。

这些宏伟的防御围墙和出土的第一批卜骨表明，城子崖下层的居址应当属于中国已经存在阶级社会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文化显然是早商文化或先商文化。²

1 马热·比兰：《论福摩萨发现的若干新石器时代器物》，载《远东古物馆馆刊》，第4期，1932年。

2 傅斯年、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南京，1934年。

① 查原报告，城墙系以黄土和灰土夯筑而成，仅墙基夯土中掺有干薑石；推测城墙原高约六米，自墙根至墙顶厚一〇·六至九·一一米（第27—28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子崖居址下层有不少器物与滨海贝丘的出土物相同。这首先是城子崖下层遗址的居民从较早期的黑陶文化乃至仰韶文化继承下来的那些物质文化特征。这方面的陶器有：凸弦纹细高圈足的豆¹、粗矮圈足的敞口皿²、敞口浅腹的孟³和侈唇鼓腹平底的簋⁴。石器则有侧面轮廓对称、截面作长方形的扁平石斧⁵、下部厚大象水滴形状的石斧⁶、有铤的板岩箭头（仅细部与滨海的箭头略有不同）⁷、收割庄稼的板岩刀即穿孔石刀-石镰⁸，这些特征有的直接过渡到随后的商文化，只有微小的变化，如细高圈足豆和磨制石刀-石镰⁹。

由此可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商殷文化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空白。所以无怪乎贝丘文化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及早期黑陶文化具有共同的特征，只是它的年代属于邻近的中国已经存在发达的青铜时代文化和商代国家的时期。

在这方面，必须扼要地谈谈远古的中国与其北方邻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的有关文献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有所论述。

不少研究中国远古文化和国家出现问题的学者（克里尔、埃贝哈德、怀履光）在其著作中指出，华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一些重

1 同上，图版 XVIII 之 2，图版 XXX 之 5。

2 同上，图版 XVIII 之 4。

3 同上，图版 XVII 之 12。

4 同上，图版 XVII 之 16。

5 同上，图版 XXXIV 之 10。

6 同上，图版 XXXIV 之 4。

7 同上，图版 XXXVII 之 16, 23。

8 同上，图版 XXXVII 之 8, 10。

9 参见《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 年。

要因素同亚洲大陆北方部落乃至北美的某些文化因素相似。¹

这些“北方成分”包括中国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下列因素：
1. 古亚细亚类型的圆形地穴式住所，以房顶的烟孔为出入口；2. 半月形或四边形的板岩磨制穿孔石刀；3. 与不久前爱斯基摩人所用者相似的箭头和能转动的鱼镖头；4. 强弓；5. 不开襟的长袖衫；6. 广泛使用骨器。

此外，还有形形色色的神话和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据说也是北方起源的成分，如关于狐狸精和半仙的神话，关于神仙被兽类敌人追赶的神话以及妻女伴客同宿、妇女婚前性自由的习俗。² 据此，怀履光断定黄河流域的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北方的、“近极圈的”性质；埃贝哈德则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中国远古文明和中国民族是混合起源的。

按照埃贝哈德的观点，中国的古老文明是北方“近极圈的”文化等等一系列文化在黄河流域混合而成的，起初北方的影响具有比较重大的意义，后来在商代，南方的成分占了上风。

因此，埃贝哈德和怀履光认为，在中国民族的形成中起着特别重要作用的，在新石器时代是北方的民族成分即通古斯或古亚细亚族源的部落，随后在青铜时代的商代，则是南方的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民族。

乍看起来，这些观点的论据，即从物质文化以及部分地从精神

1 W. 埃贝哈德：《古代中国的本地文化》，莱登-北京，1942年。

怀履光：《长屋与龙船》，载《古代》，第12期，1938年。

H. G. 克里尔，同前书，第46页。

W. 埃贝哈德：《中国早期文化及其发展（一种新的假说）》，载《史密森协会评议委员会年报》，1937年，华盛顿。

W. 埃贝哈德：《中国史》，波恩，1948年。书中开头部分对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古代作了一般性的介绍（第18—36页）。

2 W. 埃贝哈德：《中国早期文化及其发展》，载《史密森协会评议委员会年报》，1937年，第516—517页。

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引证的上述例子,是值得注意的。就连H. H. 切鲍克萨罗夫也相信其中某些论据。他在论述中国人起源问题的重要著作中主张东北部的(河南-山东的)文化发源地的创建者,一部分就是历史上的通古斯人或“古亚细亚人”,认为上古时代中国人的祖先同东北及阿穆尔河流域存在民族上和文化上的联系。即使把中国编年史中有关挹娄、勿吉和靺鞨风俗的记载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作了一翻对比,H. H. 切鲍克萨罗夫仍然主张“‘黄土之国’的古代居民在民族上和文化上无疑与大概属于满洲语群的北方邻人的后代非常接近”。¹

然而,只要比较缜密地考虑这些观点的论据,那就不难断定,埃贝哈德和怀履光所作的断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特别是说什么在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上存在北方文化和北方民族成分的巨大影响,那更站不住脚。在如此古老的时期似乎就存在这一系列因素,比方说什么黄河流域曾广泛流行古亚细亚类型的半地穴式住所或使用强弓,这是没有可靠证据而非常值得怀疑的。至于其它因素,象妻女伴客同宿或神仙被敌人追赶的传说之类,那都不是局限于中国或北方,而是普遍地与氏族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

尤其重要的是,仔细分析有关的具体事实,我们确实可以说华北新石器时代和较晚时期的文化同北方首先是同我国滨海的文化之间存在一致之处,但我们所得出的却完全是另一种结论。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滨海的考古研究表明,这种一致性是在原则上完全是另一种条件下存在的,也就是说,在南方同北方的古代文化之间、中国同我国远东之间、中国人的祖先同通古斯-满洲人及古亚细亚人的祖先之间,其相互关系的状况事实上是与上述

1 H. H. 切鲍克萨罗夫:《关于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载《苏联民族学》,第1期,1947年,第65—66页。

诸说根本不同的。

我们已经看到，滨海和东北历史上较早时期的新石器文化同中国本土新石器时代农人的文化是迥然不同的。稍晚，即在我国滨海及邻近的朝鲜、辽东沿海各地出现了崭新的贝丘遗址文化的时候，情况便有了重大变化。在这些地处黄河流域以北的东亚地区的文化中骤然出现了物质文化和习俗上的许多新因素，这些因素过去只见于南方，即古老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仰韶、龙山农业文化地区。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古代中国居民及其北方邻人的这一切新的文化因素，其发源地恰恰是中国，而不是北方。

在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中国是强大的文化中心，其影响遍及四面八方，首先是渗入自然和气候条件有利于发展农业（哪怕是萌芽状态的农业）的地区。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强。例如松花江、辽河及其许多支流象嫩江、牡丹江等河道所灌溉的富饶的东北与内蒙平原，还有朝鲜、辽东以及自图们江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海沿岸，均在这种影响之下。印度支那的广袤地域和北起本州南迄台湾的东亚全部岛屿也不例外。

分析当时即公元前第二千年末至第一千年初的实际历史情况，可以相当清晰地了解到那些使南北联系得以大大加强的具体历史事实。

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即公元前第二千年末，发生了中国和整个东亚历史上见于文献的第一个国家殷朝的创建者商部落同他们的敌人周部落之间的斗争。

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公元前 1122 年，周武王击溃了末代殷王受辛的军队，建立了新的王朝周代（公元前 1122—249 年）。公元前 1122 年，武王镇压了受辛之子武庚的反抗，继而称王。此外，武王还不得不同自己的兄弟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中央集

权政策并举行叛乱。^① 武王这个旨在进一步巩固周国、反对旧的氏族部落制度的离心倾向削弱国家纽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武王讨伐叛乱兄弟的这场胜利的战争中北狄即戎、夷诸部的参战起了很大作用，后来中国编年史中把他们称为混夷或玁狁，格罗特认为它的意思是“荒漠的臣民”¹。

由此可见，周打败殷以后，中国同亚洲北方部落及东方部落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所有这些事件应当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在辽东、朝鲜和滨海部落中的传播。

除了编年史中关于“北狄”参加武王征伐以及周人同东夷、北狄之间的冲突的记载之外，还有其它资料也说明在周代初期，中国人同东北面的邻人之间的联系有所增进。肃慎向武王及周代其他天子“朝贡”的故事即属此类。

在这方面，“北狄”（即匈奴祖先）的赤峰“第二期史前文化”与其邻人“东夷”（即滨海贝丘文化的人们）的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些部落的文化不仅存在于同一时期，而且在一系列重要特征上极其近似。两个文化都有磨光红陶和相同的容器形制，包括敞口浅腹碗、细长颈“球形”器、豆、小敛口“球形”器和两侧带把（更确切地说是截面作圆形的环形器耳）的容器。

这种文化上的共同性可能不仅是相互联系的结果，而且还由于这些部落都同样受到了中国人的影响。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东北原先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才在公元前第二千年末至第一千年初被新的文化，即近似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赤峰“第二期史前

1 J. J. M. 德-格罗特：《公元前的匈奴人》，载《有关亚洲史的中国文献》，第1卷，柏林-莱比锡，1921年，第7页。

① 《史记》载：“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卷四、周本纪）“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卷三、殷本纪）可见武庚反周是武王死后的事，处理此事的是周公。——译者

文化”和滨海贝丘文化所取代。

新来的中国文化的传播可能有各种方式，其中不仅包括某种文化因素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部落的简单形式，而且古代中国人还可能直接进入了周围的部族。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即有商代中国人进入东方部落群的明确记载。根据中国史料，殷朝覆灭后或覆灭前不久即公元前 1121 年，殷朝的箕子跑到了朝鲜和辽东¹。

殷代国家遭难后，向东北面的辽东和朝鲜方向迁移的当然不止一些大臣，而且还有他们的下属。例如一千年后，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辽阳地区还住有一群陶匠，他们自称是古代商部落的遗民，可见还纪念着自己的祖先。商民大批移到这里，所以他们的文化给当地土人以强有力的影响。² 中国文字史料中有关中国居民迁入东北部的记载，在人类学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根据出土的人骨判断，公元前第一千年辽东半岛的居民在人类学上同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沙锅屯文化的部落非常近似。对比辽东远古墓葬所出的人骨和现代中国人的骨骼，日本考古学家得出结论说，貔子窝的新石器时代人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祖先。³

由此可见，滨海沿岸贝丘文化的起源和传播应当同公元前第二千年末和第一千年内中国本身及其相邻各地所发生的事件有联系。如上所述，这些事件的本质是，出现了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亚洲东部第一个奴隶主国家发展起来，并立即走上了对比较落后的邻人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的道路。这种政策历代殷王即已开始实行，他们需要奴隶来耕种土地并从事其它劳动。周王更加有力地推行这种政策，尤其是以武功和灭亡殷代国家的业绩而负

1 H. 比丘林：《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第 II 卷，第 8 页。〔译注：见伏胜：《尚书大传·卷五·鸿范》。〕

2 W. 埃贝哈德，《中国早期文化及其发展》，第 527—528 页。

3 清野谦次、金关丈夫、平井隆：《关东州貔子窝遗址所出人骨的考察》，第 1—4 页，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附录，东京·京都，1929 年。

盛名的武王更显得突出。由于这些事件,贝丘文化便突然出现了,它同较早期的文化几乎没有什么进化继承关系。

中国邻近部落的生活和文化进展得非常急速。而且这种变化显得极其深刻,以致新型的风俗和文化几乎完全掩盖了从前的一切,结果便发生了文化传统的更替。

公元前第二至第一千年滨海内地和北方的部落

上面我们仅仅分析了滨海南部沿岸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史料比较清晰。

如上所述,滨海的贝丘就象古代的城址和中世纪出色的雕塑艺术品那样,最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使他们急于了解贝丘遗址的古代居民。

的确,贝丘里大量的贝壳和古代器物,特别是陶片和磨制石器残件,使观察家顿时感到惊奇,这些陶器和石器的罕见器形,说明它们年代古老,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原始时代。

因此,公元前第二千年末至第一千年初沿海部落的生活情况比当时滨海内陆大小河流谷地(如绥芬河流域或乌苏里江及其支流沿岸)居民的习俗和文化更为清楚。贝丘时代的滨海内陆部分,乍一看来甚至会以为它是一片无人荒野。

但这种印象当然是没有根据而不足为信的。事实上新石器时代的滨海边疆区内陆各地的居民不可能全部消失得无踪无影,例如奥西诺夫卡河畔的遗址或先基纳帽下层的出土物都是属于这个时代。

麦河河谷的石灰岗(或称鸽岗)居址,是与贝丘遗址的人同时代的内陆居民遗留下来的第一个文化遗存。在鸽岗边缘的悬崖上,发现有许多陶片同贝丘出土的相似,但又有区别。在器底残件中有一块算子。这种容器是古代中国常用的“甗”,早在仰韶文化

的居址中即有发现,随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使用,直到中世纪以后¹。“甗”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下部的器底无孔,用以烧水,底下生火。这是普通的袋足鬲。上部与下部相隔一算,一般用以蒸饭或蒸肉。这种蒸食的方法是始于石器时代几千年来中国烹调术独特的民族传统,与中国农业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除这种陶器外, 鸽岗居址下层还出有黑曜石片和板岩磨制石刀或石镰, 后者与贝丘里的常见形制相同, 中央有一个穿孔。此外, 还单独发现一件磨制石斧, 也与贝丘出土的石斧相似。

这一切表明, 贝丘时代在滨海内地居住着各个部落, 根据鸽岗出土的残甗和磨制石刀-石镰判断, 他们主要从事农业。

与贝丘遗址相当或同时的其它遗存还表明, 这一时期滨海内陆各地的部落与沿海的渔人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相互关系。

关于这些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夹皮沟小河谷地的出土物。在这宜人的小溪谷里, 在河岸断面上, 发现了两层相迭压的文化层, 即不同时期的居住遗址。上层的居住遗址应当断为铁器时代初期。下层的文化遗迹属于较早时期, 出有动物骨骼、火堆遗留的木炭、陶片, 还有一件磨制石斧。

这一层的出土物以陶器最有代表性。器表上布满了纵列的之字形划纹。另有一种器壁极薄的陶片, 饰有折线几何纹, 刻划精细, 构图雅致。

上述特点表明, 夹皮沟河居址下层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奥西诺夫卡陶器不同, 而与南面的波谢特地区考察队湾和格拉德卡亚河沿岸的整个新石器时代居址群相联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层的上部出有贝丘文化典型形制的陶片——厚壁, 器表磨光, 呈棕黄色, 纹饰以附加堆纹为特征。夹

1 J.G.安特生,《黄土的子孙》,第222页。

皮沟河居址下层出土的一件石斧也同贝丘遗址出土的石斧极其相似，呈扁平形，只是两个侧棱略修圆。

因此可以设想，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旧的文化，可能连同在现今乌苏里斯克城和兴凯湖地区创造这种文化的居民一起，被南方起源的，更确切地说是沿海起源的新的文化和新的居民所取代。很可能从前生活在兴凯湖以南海岸上的部落有一部分这时进入了内陆。上文描写过的哈林斯卡亚山的出土物也证明当时发生了激烈的事件。

同时，捷丘贺湾地区的新发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滨海北方发生的事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发现一部分已在上面谈到过。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里曾有一个大居址，居址里的住所排成几列，均为半地穴式。

这个居址的主要文化层即上层出有管珠和一件板岩刀。它们都和滨海南部贝丘遗址的同类出土物相似。这里还发现一件管珠的粗坯，说明这类饰物是捷丘贺本地制作的。由此可见，当滨海南部各地出现贝丘文化的时候，这个位于姆拉莫尔纳亚河边山岬上的捷丘贺居址仍然继续存在。特别重要的是，后来就在这个捷丘贺湾出现了面貌完全不同的、含有南方类型器物的遗存。

1955年，我们在捷丘贺湾调查时，新发现了一群过去一无所知的居址，获得了极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可以追溯姆拉莫尔纳亚河畔新石器时代晚期居址废弃以后滨海北方所发生的事件。第一个遗址位于捷丘贺湾北岸勃里涅尔岬对面。这里的文化遗迹散见于相当高的台地形残丘上。残丘自西南至东北向海延伸约半公里，基本上是花岗岩，它的西南面有一片宽阔的沼泽谷地，一条名叫“五一河”的溪涧从这里流过；东南面濒临大海。遗址面积不大，约四百平方米。它的地势略向海倾斜，所以雨水降落下来，便立刻顺着地面流掉，使上部的腐殖层现时已受到严重冲刷，大部分被破

坏。文化遗迹也被冲刷出来，暴露在地表上。

台地上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因为北面有高山为屏障，可以挡住刺骨的寒风，旁边还有大海和溪流。

第二个遗址在姆拉莫尔纳亚河岸上，距海约五公里。居住遗迹见于八米高的台地上，在台地的陡壁变得比较平缓的一边。台地下有一片不深的宽阔谷地，谷地的一侧散见有零星的文化遗物。文化层的上部由于种菜而被扰乱。从菜地里采集到贝丘时代形制的陶片和一块有孔板岩刀残件。此外，在离海四、五公里的莫纳斯特尔卡河岸上，当地居民发现了一件用深色板岩磨制的精致石刀，此器今藏符拉迪沃斯托克博物馆。

以上三个遗址有两个位于距海较远的河谷，另一个几乎就在海岸上。

但即使这个海边遗址也和一般的贝丘遗址不同，它没有海贝壳。其原因当然首先可以归之为捷丘贺湾不适于这些软体动物生活。这个海湾伸入陆地不深，直接受海浪冲击。但更重要的应是另一点：这些遗址总共出有六件完整的和三件残缺的“有肩石斧”即石锄，证明古代居民从事农业。

捷丘贺的“有肩石斧”是用各种岩石的椭圆形卵石制成的，有石灰岩、火成绿石角砾岩、砂岩和板岩。它的安柄部分和肩部是以横向打击法草率打成的；刃部也打得很粗糙，两面从纵向打击而成。这种草率的打击和粗钝的刃口恰恰说明这些工具就是石锄。它不可能用来砍劈树木，而显然是用来掘松土地或从灌木丛里开出播种地段的。

此外，捷丘贺湾的遗址出有滨海南部贝丘中普通形制的精致磨制石斧。这是真正的斧。轮廓和截面均作长方形，刃部经细致加工，而且一面的磨口比另一面大。

这里还出有在贝丘遗址里常见的板岩磨制工具，包括矛头和

刀的残片、匕首把、一件矛铤和一件部分残去的有孔石刀。其中有一件扁平阔叶尖状器，显然是用灰色板岩制成的矛头。中央有柱脊，自矛叶直通铤部，铤的截面作菱形。制作者大概想以此来表示这件石矛所模拟的金属矛头是有筒的。

有一件用板岩磨制的半月形长大石刀残件（残长十一·二厘米）也很值得注意。同样的石刀在辽东貔子窝新石器时代晚期居址也发现一件，而且是完整的。上述器物均与陶器共存，出有挂鲜红色陶衣的磨光陶片。偶尔在陶片上可以看到简单的弦纹。器形为折肩、细颈。总的来说，捷丘贺湾居址的陶器与贝丘的陶器非常相似。但这里没有发现贝丘中常见的大型厚壁容器的残片。

发现大量形制简朴的即边缘带槽沟的卵石坠，计约四十件，可见这些遗址的居民从事捕鱼。出土的石锄则表明，农业在他们的生活中也应当具有很大意义。

与贝丘文化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居然传到了如此遥远的北方，这个事实使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滨海本身的范围。

这就是爱斯基摩文化的起源问题。

滨海的古代文化与爱斯基摩文化的起源

我们已经看到，公元前第一、二千年之交中国发生的事件在中国以外的遥远地区包括在滨海境内都有其影响。

如上所述，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滨海边疆区文化史上甚至当地居民一般历史上的整整一个新时代。有根据认为，这些事件还有更加广泛的间接影响和反应。

看来，滨海考古遗存所反映的文化上的进步和应当发生过的民族关系方面的变化，在北方更加广阔的地域也有表现。

在北极部落的历史上，象白令海峡沿岸爱斯基摩人祖先文化

的出现和进一步传播等重要事件,都是同上述变化相关联的。¹

众所周知,爱斯基摩人一直是极北地区最典型的居民,他们的文化同北极的沿海地区和冻土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爱斯基摩人及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是白令海峡两岸。这个狭长地带包括楚科奇半岛的海岸和阿拉斯加。此外,爱斯基摩人早就进入了格陵兰和拉布拉多半岛。

整个爱斯基摩文化可以说是猎取海豹和鲸鱼的海上猎人的文化。根据考古学与民族学资料判断,这个文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能转动的鱼镖和皮筏。古爱斯基摩人开发着盛产海兽的地方,在那里建筑半地穴式的冬季房屋,过着定居的生活。

然而,这种高度专门化的文化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产生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几十年来,爱斯基摩人及其文化的研究者一直非常关心这些北极海上猎人的起源及其文化的根基问题。²

文献中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从更为古老的、专门化程度较低的内陆渔猎文化中产生的。

例如,古爱斯基摩文化的杰出研究者Г·科林斯就是这样看的。他认为爱斯基摩文化可能植根于欧亚大陆的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晚期。³这种观点无疑是有些根据的。很可能晚期的爱斯基摩部落中包括有森林冻土带和冻土带的个别狩猎部落,因为在

1 关于当前存在的几种理论的概况,可参见 C. И. 鲁金科:《白令海古代文化与爱斯基摩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第5—13页。

又见 H. B. 科林斯:《阿拉斯加圣劳伦斯岛的考古研究》,《史密森杂集》,第96期,1937年。

H. B. 科林斯:《爱斯基摩史前学纲要》,《史密森杂集》,第100期,1940年。

2 参见 C. И. 鲁金科,同前书,第5—13页。

3 亨利·B. 科林斯:《爱斯基摩史前学纲要》,《史密森杂集》,第100期,1940年。

H. B. 科林斯:《爱斯基摩的考古研究及其对美洲人类古代问题的影响》,载《美国哲学学会通报》,第86卷,第2期,1943年。

古爱斯基摩人的物质文化中存在下列因素,即圆底的器形、陶器的假编织纹(棋盘状乳钉纹)、燧石打制的细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石刀和复合工具的嵌入刃部)。的确,这些都是公元前第一、二千年东北亚的印迪吉尔卡河、科累马河沿岸和楚科奇半岛的上古渔猎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因素。¹

这个时期在北美也存在极其相似的内陆狩猎文化(所谓“登拜〔Denbigh〕燧石器”)。

因此可以确认,爱斯基摩文化的上述因素是该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所留下的早期文化遗迹,具有纯新石器时代的性质。这一期文化可以称为北亚大陆类型。

但是,在爱斯基摩文化的整个分布范围内,从堪察加半岛到巴芬湾和格陵兰,它的其它因素即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却全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显然有另一种起源。其中第一个因素自然是能转动的鱼镖。勒鲁瓦-古兰在报告中有力地说明,能转动的鱼镖是整个太平洋地区分布得极其广泛的文化成分。这种工具在亚洲沿海地区(从日本到白令海峡)最为流行,并向东分布到北美沿海。²最南部的标本见于南太平洋美兰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最北部则见于格陵兰。同时,本特·阿内尔还指出,玻利尼西亚的鱼镖与日本新石器时代的鱼镖极其相似。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洋地区形制最古老的即没有穿孔、筒不闭合的鱼镖,特别是与滨海贝丘出土的鱼镖头同一类的A型和C型鱼镖。勒鲁瓦-古兰认为,正是从这些“不需要闭合的筒,只用皮条捆在柄上”的鱼镖产生出那些在楚克奇人、爱斯基摩人等国民

1 A.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雅库特并入俄国以前的历史》,载《雅库特史》,第I卷,列宁格勒,1955年,第112—127页。

2 安德烈·勒鲁瓦-古兰,同前书,地图30、31、32。

3 本特·阿内尔,同前书,第66—68页。

G. J. 格罗奥特,同前书,图10。

族中广泛流行的筒不闭合的鱼镖。

随后，由于长期的进化，出现了带有孔眼以穿系皮条的鱼镖，最后又出现了筒闭合的鱼镖。

勒鲁瓦-古兰在论述无孔鱼镖头的时候认为：“这些简单的形制，在亚洲是古白令海文化早期鱼镖的原型、在美洲是多塞特人的鱼镖的近似类型。”¹

勒鲁瓦-古兰还分析了这些鱼镖的地理分布，指出它们都是有规律地见于爱斯基摩鱼镖分布地区的周围，与一些更为古老筒朴的形制相同。他在结语中写道，根据“整个历史背景可以推测，这些形制是阿依努人和海德人在爱斯基摩人定居于白令海沿岸之前所共有的古代文明的残余”。²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在个别地方产生这样的鱼镖，但是在这些鱼镖的主要分布范围内即太平洋地区，它们应当有同一个起源，产生于同一个发源地。这个发源地可能是海岛，如北海道或本州，也可能是阿穆尔河河口以南的海岸。滨海贝丘和日本列岛绳文文化中的古朴的能转动鱼镖便是一个有助于说明上述推测的证据。但是，也有可能这些形制的鱼镖在当时或更早时候出现于中国沿海各地，甚至出现于长江、黄河等大河流域。这一点的直接证据是，无论在华北，还是在华南以至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居址都经常出土带孔或无孔的板岩鱼镖头。因此必须承认，能转动的鱼镖不是象 G. 杰辛所划定的什么“近极圈”文化³的共同财产，而纯粹是太平洋地区的发明。它的出现和发展不可分割地同海上捕兽业及大鱼捕捞业的进化联系在一起，这些生产部门在太平洋地区各部落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 A. 勒鲁瓦-古兰，同前书，第 365 页。

2 同上，第 366 页。

3 古托姆·杰辛：《极圈的石器时代》，载《北极学报》，第 II 期，哥本哈根，1944 年。

第二个因素是脂灯。勒鲁瓦-古兰确切地断定,脂灯的分布范围基本上与能转动的鱼镖相同,在太平洋大文化区的北部,即从白令海峡至日本,甚至分布到美洲大陆北部。阿留申群岛当是连接亚美两洲脂灯分布地区的桥梁。¹

爱斯基摩文化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皮筏。乍一看来,也许会以为皮筏纯粹是北极起源的。但阿留申人使用皮筏的事实却表明,这种皮筏与其说同北极腹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有关,不如说同太平洋沿岸居民海上狩猎这种主要经济形态相联系。只要有海象皮,他们自然就会想到可以用它造船。由此可见,这种皮筏也可能产生于它们现今分布地区以南很远的地方。这可以从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得到证明。相传日本北方的古代居民,即半神话的小个子“穴居人”(Koropok-un-g'uru),便曾经使用这种皮筏。

第四个物质文化因素是磨制的板岩制品,这是所有爱斯基摩部落无一例外的特点。这些器物包括男子的猎刀、女子的石刀——“乌洛”,以及磨制的鱼镖头尖锋。为了评价这三种板岩工具对整个爱斯基摩文化的意义,必须注意到它们是北极海上猎人在生活和生产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装备。它们也是爱斯基摩人祖先在生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器物和生产活动的基础,每个男子和每个女人天天都必需使用这种最简单最必要的劳动工具。

尤其重要的是,不用下什么功夫,就能在距离白令海峡沿岸和格陵兰很远的南方找到与之相似的工具。爱斯基摩男人的板岩刀和匕首酷似我国滨海和朝鲜可以断为贝丘时代的同类板岩尖状器。

乌洛型女用石刀的形制则与东北、滨海、朝鲜和华北等东亚地区的半月形和长方形板岩刀-镰相似。至于鱼镖头的板岩尖锋,同样的形制更遍布于我国滨海、朝鲜、日本、华北以及更南部的印度

1 A. 勒鲁瓦-古兰,同前书,地图 35。

支那和台湾。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认为,古爱斯基摩文化的形成与邻近的东亚各地的历史有联系。多数研究者认为,而且放射性碳素的分析结果也表明,古爱斯基摩文化最早期即奥克维克期和古白令海期的遗存大致出现于公元前第一千年之末及公元初几世纪。因此,这个文化可能同东亚较早期的文化(包括东亚群岛古代部落和滨海贝丘时代居民的文化)有渊源关系,当时在朝鲜、日本列岛和滨海都开始广泛流行板岩制品和与之相伴随的其它文化因素。看来,不仅工具及其制作技术传播开来,而且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迁徙各处。爱斯基摩人的神话便是一个例证,其中尤以海界女王谢德娜和狗婚配的神话占有重要地位。民族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个神话是太平洋较南部各地诸部落(包括古代中国人)的神话特征(如古代中国人有人类始祖盘古的神话)。它同图腾崇拜及母权制的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疑是起源于东南亚各民族远古时代的。此外,古爱斯基摩人的曲线纹饰也可能与阿穆尔河沿岸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日本列岛绳文文化的曲线纹饰甚至同毛利人的纹饰都有联系。

当然,如果认为古爱斯基摩文化是以现成的、完备的形式出现于白令海峡沿岸,那就错了。如上所述,很可能在此之前这里存在过内陆起源的文化,可以称之为“旧爱斯基摩文化”。此外,从南方带来或传来的太平洋因素到了新的地方也应当受到了某种改造或发生了某种变化。但不管怎样,假如没有南方奠基性的影响,便不可能出现新爱斯基摩文化。

后来,在它的较晚阶段,海上猎人的这个文化更加深远、更加广泛地传到北极腹地,传到格陵兰;而且在北欧的瑞典和挪威的石器时代北极文化中,以及在科拉半岛和卡累利阿,看来也有某种程度的反映。但这一点已经大大越出本书所谈问题的范围了。

前在滨海还没有发现本地冶炼红铜和青铜的遗迹，没有找到铸造作坊、铸范以及本地冶炼业的其它可靠证据，也没有本地形制的青铜制品。因此，这个文化还完全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但却非常进步而独特。

如上所述，滨海部落的生活有了不少巨大的进步，他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经具有与过去不同的性质。

所有这些都不能不促进滨海古代居民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滨海贝丘时代的评价问题，过去有一种非常固定的观点，即扬科夫斯基和马尔加里托夫最早提出的见解。这些初期的研究者及其后继者 А. И. 拉津、В. К. 阿尔谢尼耶夫和 Л. Н. 伊万耶夫等人得出了一个结论：同邻近各地的居民比起来，滨海贝丘时代的文化是原始的，居民是极其落后的。这个结论不仅关系到滨海新石器时代的断代问题，而且更广泛地牵涉到滨海的整个文化史。

滨海居民原始的贝丘时代文化同他们光辉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好象这两个历史时期互相脱节，彼此隔着一道鸿沟。

过去可以认为，渤海和女真时代的滨海中世纪高度文化根本没有本地的根基和发展条件，它是滨海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偶然的插曲。按照这种观点，渤海和女真的文化只是偶然落到滨海这片荒僻之地的异域奇葩。

但是现在，我们却有充分的把握说，这种观点是同实物资料不相符合的。

滨海沿岸部分的贝丘遗址实际上代表了一个确定的、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即滨海部落的生活中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正是由于这些变革，滨海部落才能够在后来向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发展的更高阶段过渡，向阶级社会和国家过渡。

与此同时，贝丘文化也发展成为中世纪的新文化。这种变化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了一系列的中间环节，从而反映出当地部落发展过程的渐进性和本质上的连贯性。

下一章我们就来谈谈这个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时代。

第五章 由石器向金属器的过渡

(公元前七至二世纪)

在滨海，古老的石器时代文化和原始公社的社会关系延续了好几千年，当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没有阶级和国家。

贝丘遗址的时代，情形也仍是这样。在这些遗址里，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新型社会关系的萌芽。但是生产力的普遍提高(表现在经济生活的复杂化上)，以及随之而来的交换的发达，使古代社会结构的基础不能不遭到破坏。一个划分为阶级的新型社会逐渐取代了氏族社会，同时也出现了国家，先是渤海国，后来是女真人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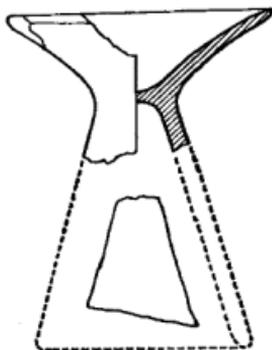
这个内在的过程由于当地同邻国(中国、朝鲜)的联系而得以更快地发展并日趋成熟。在这些邻国，阶级社会出现得较早，最初是奴隶制社会，以后进入了封建社会。

可惜，远东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渤海国的前驱时期，至今仍研究得很不够。然而关于这个时期毕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考古资料。中国文字史料中也有些片断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一定程度上了解早期渤海人登上历史舞台的前驱时期的历史概况。

在这方面，乌苏里斯克城地区夹皮沟河畔的出土物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在贝丘时期内陆文化遗迹的地层上，压着一个界线分明的文化层，其中含有大量陶片。这些陶器与下层陶器不同，即胎壁较厚，体积较大，并且完全没有纹饰。按形制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有形状独特的豆，呈双圆锥形，圈足高而粗。这些豆的怪异形状实在令人惊讶。其圈足之大，与豆盘极不相称。乍看时，甚至很

难断定哪里是圈足，哪里是豆盘(图五十一)。第二组有大型平底罐，有的两侧突起一对圆柱体形的纽，类似器耳。

除陶片外，这一层还出有一块露出了海绵状骨质的大骨，大概是某种海兽的骨骼，根据其磨损的表面判断，这显然是工具，很可能是磨棒。1956年，我们在兴凯湖畔诺沃卡恰林斯克村附近的谢米皮亚特纳雅谷作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一个完整的居址，居址里保存着一排半地穴式住所的遗迹。在其中一所的填土中和居住面上，发现一些平底容器的残片，上面也有夹皮沟河居址陶器上的那种小组。在这个居址的另一些地点，还采集到一些典型的豆把，与贝丘遗址所出的相同。



图五十一 夹皮沟河居址出土的容器。

夹皮沟河与兴凯湖居址的出土物清楚地表明，滨海这个前所未知的古代文化，是沿着更早时期的基本轨道继续发展的。例如，这里依然存在滨海贝丘时代陶器的显著特征——高圈足豆；有些容器的表面也经过打磨加工(尽管磨得很草率)，两种文化的器壁都相当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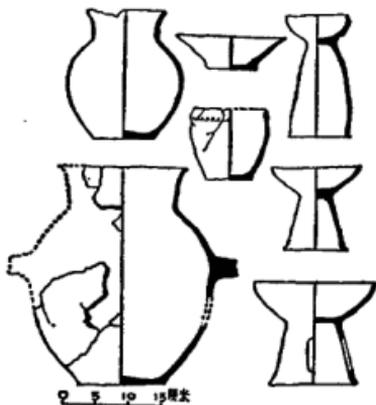
但是，这两个居址完全没有前期形制的石器，证明它们已经属于新的历史时代。夹皮沟河谷出土的石器，已经不是贝丘中所见的那种类型的石斧和石锛，而是一种特殊形制的石斧。斧身厚重，截面近方形，有明显的肩和柄，可以称之为夹皮沟型石斧。不过，这已经是滨海最后的石斧。真正的石器时代这时已经结束了。新型的劳动工具即金属器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是哪一种金属排挤了石器？是铁还是青铜？

当时不但有了青铜工具，而且有了铁制工具。在夹皮沟河谷

这个多层居址的上面几层中，发现了铁器残件，包括中国北方农人今天仍然使用的那种铧或锄。因此可以说，滨海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这些出土物应归属于什么时期？把我们的发现物和南满的考古遗存比较一下，就可以得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南满与古代中



图五十二 辽东出土的容器。

国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在发掘辽东半岛旅顺西南的古代居址和墓地时，发现了一批富有特征的墓葬，墓圻周壁用海贝壳构成，并用贝壳覆盖¹。研究者认为，建墓时先挖墓穴，然后用木料做成墓室。墓室与圻壁之间填以贝壳，再填以土。

这些墓葬出有轮制陶器，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敞口浅腹碗，一类是与中国周代、汉代陶罐相似的细颈容器。与陶器同出的有一件铁制带钩、几个青色玻璃耳珥。这些墓葬以前曾出过青铜镜、青铜兵器、秦始皇时期及汉代中国钱币半两、五铢等。据此，这些墓葬的年代可断为汉代，即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二、三世纪之间。

另有一批墓葬，其圻壁与墓室之间不是用贝壳，而是用碎石及陶片填充的。

这些墓葬所出土的器物也与上述不同。首先，陶器比贝墓所出的粗陋。全是手制，无一轮制的，器形以豆最多。其中一件与夹

1 驹井和爱、原田淑人：《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1931年。〔译注：《牧羊城》的原文为：“墓室与圻壁之间填以贝壳，墓室盖板上，稍稍覆以贝壳，上面再填以土。”（42页）〕

皮沟河居址上层所出的豆一样,形体的比例也很奇特(图五十二)。

这些豆的圈足高得出奇,而豆盘则矮得不合比例。乍看到时,总想把它底朝上地倒过来。但是,有一件豆的圈足上有三角形的镂孔,表明它的确是柄,而不是盘。

其次是细而高的圈足罐,以及“球形”的鼓腹细颈壶。最大的一件陶壶,腹部两侧有一对“犄角”形的小纽,与夹皮沟及谢米皮亚特纳雅居址出土的完全一样。有一座墓出有金属制的和石制的小钏和小环等饰物,还有赤色钻孔玉珠一颗。墓主人显然是一个妇女。死者胸前置有一个玛瑙小环,中国妇女至今仍佩带这种小环,用以悬挂针线包或掏耳勺。此外,还发现铜丝钏数件。

另一墓中发现青铜剑两件、空釜斧两件、青铜镞两件、饰物三件。

铜剑形制颇富特征:剑身宽大,束腰,作叶形,中脊显著突起,通贯全身,至柄部与粗大的实心茎连成一体。铜斧尺寸较小,器形短而宽,刃部鼓起,作扇状展开,圆角方釜。它的外形近似我们断为卡拉苏克时代的西伯利亚空釜斧。

铜镞与汉代形制差别很大。镞形扁平,有后锋,铤部粗大。后锋长大,其长度为镞身的一半。类似的镞在殷周时代的墓葬中曾有出土。

还有一种独特的墓葬——盟周墓,其圜壁被焙烧至相当于瓦片的硬度,出土物的性质与上述器物非常相似,但时代较晚。盟周墓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有所记载。据后汉郑玄著述,夏、周两代,中国人埋葬八至十五岁的儿童和少年,墓圜的周壁便是事先经过焙烧的^①。在一座盟周墓中,出土空釜铜斧一件,与碎石墓所出相同。该墓还出有双刃直剑一柄,其中脊转化成长茎;带后锋的铜镞一件,也和碎石墓所出相同。该墓最精萃的出土物是一件纹饰繁缛

^① 见《礼记·檀弓上》郑氏注。——译者

华丽的铜剑柄。这些地方发现的若干儿童瓮棺葬也属于这一时代。

综上所述,辽东古墓群出有一批形制固定的铜器,其典型特征与殷、周考古资料相似:有铤有后锋的扁平箭镞、有茎有中脊的矛头和形体较小的方釜宽斧。

根据望周墓所出土的五铢钱及考古学家原田于1925年发掘的乐浪汉代砖槨墓所出的柄部尚保存漆绘痕迹的铜剑,日本作者们把这里出土的一部分铜剑断为汉代器物^①。

他们写道:周末秦初中国已有铁制工具出现,但是兵器仍以青铜制造。公元前211年^②,秦始皇帝诏令没收民间所有铜制兵器,铸成一尊巨大的佛像^③,并禁止再用青铜制造兵器。此后兵器遂用铁制。武帝时(公元前140—85年^④),冶铁收归官营。而那时的朝鲜和东北才开始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因此,在这些地方,广泛使用的仍是铜剑与铜矛,而不是铁制品。

然而,这些研究者自己又指出,更早的青铜器在东北也有发现,其中有一件铜戈,刻有造于秦始皇帝95年^⑤即公元前222年的铭文。我们知道,在周末,已经有大量移民从中国本土进入辽东,汉代在这里还设置了特别的中国行政管理机构。

因此,应当认为当时辽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与中国其他部分相同。铁器在这里也象中国一样普遍,尽管这里还使用着铜

① <牧羊城>原文的意思是:第一,铜剑是套在漆鞘里的;第二,关于这种剑的断代,<牧羊城>作者认为其下限可断为西汉晚期。——译者

② 应为221年。按,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年代,奥氏所说,错误百出。翻译时按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及文物出版社<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用译注予以校正。——译者

③ <牧羊城>原文是“铸造了钟镞金人”。当时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奥氏把“金人”说成是“佛像”,足见其对中国历史的无知。——译者

④ 应为公元前140—87年。——译者

⑤ 应为秦始皇25年。——译者

剑。可见辽东墓葬的发掘资料是很重要的。这些墓葬显然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贝墓，出有与汉代相似的陶器，还有铁器；其他墓葬另成一组，墓里没有这样的陶器，也没有铁器。

出有高圈足豆和双侧纽壶的碎石墓属于第二组。日本考古学家把这些墓葬的年代断为东周至西汉的过渡时期。但也有可能属于更早时期，因为这里的箭镞和空釜斧与殷及西周的同类器物相似。

因此，这些遗存应归属于铜铁并用时期，即铁器时代之初，青铜时代之末，也即公元前六至三世纪的战国时代。^①

拿辽东墓葬所出陶器与夹皮沟河及谢米皮亚特纳雅谷居址所出陶器作一对比，便可以看出，这些有鲜明特征的器物不仅彼此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遗址的居民也应当有这样的空釜铜斧、铜矛及铜镞。因而当地的文化也应当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大致从公元前六至三世纪，约当中国的周、秦两代。从陶器的形制看来，这个文化与战国时代东北南部及朝鲜居民的同期文化不仅具有相同的基础，而且应当有直接的亲属关系。

这些新发现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滨海内陆部分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贝丘遗址时代与中世纪之间这段历史的认识。

我们还掌握了另外一些考古遗存，这些遗存使我们能够瞥见继上述遗存之后直至滨海中世纪之前的时期。

在滨海这一时期的遗存中，先基纳帽居址是最出色的早期遗存之一，它同夹皮沟河居址上层及谢米皮亚特纳雅谷的出土物紧紧衔接。该遗址位于绥芬河右岸，在乌苏里斯克城西三十五公里的波克罗夫卡村附近。此外，滨海其他地方的一些零星发现，以及

^① 战国年代应为公元前五——三世纪。——译者

与之同期的阿穆尔河沿岸遗存,也是属于这一时期的。

先基纳帽兀立在绥芬河高峻的河岸上,是一座风景秀丽的石崮。凡是到过乌苏里斯克一带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地方。从好几公里以外便能一眼望见它那奇异的形状——这地方果然象个大礼帽。

先基纳帽超出附近高地约十五米,高出绥芬河五十——八十米;其西北两侧为绝壁。崮顶是一片略微倾斜的平台,面积虽不很大,但适于建筑居址。

从先基纳帽顶上四顾,绥芬河上下游低低的谷地尽在眼底。这是一座崛起于富饶的河谷当中,能够控制四周的天然的险要山寨。

A. B. 叶里谢耶夫逐个描述绥芬河沿岸的古城时写道:“在通往尼科尔斯克的路上,一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座兀立在河对岸的平顶奇峰,很可能这里也是河谷当中的据点之一。”¹他所说的显然就是这个石崮。

1955年, H. H. 扎别林娜在先基纳帽顶上首次发现了古代陶器的碎片,从而证实了1890年作出的上述推测。

后来,我们在那里又发现了黑曜石片、经过人手加工的板岩和一件白玉小环的残段。

1956年在先基纳帽顶上的发掘,发现了中世纪晚期女真文化的少数遗迹,同时也发现了前面已经谈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主要的出土物却是属于另一个文化历史时代,即晚于新石器时代而大大早于女真时期。这些东西是从一些天然形成后经人类改造的不大的坑里出土的,有两个坑是在风化的岩石上凿出来的,呈相当规整的长方形。坑中发现灶址,保存有灶石,以及杂有杂草或禾秸的红烧土块。

1 A. B. 叶里谢耶夫,同前书,第363页。

另有几块奇特的厚陶板也与灶有关。陶板一面为素面，另一面饰满菱形印纹。看来这是模仿某种粗糙织物的纹饰，也有可能是席纹。据拼合复原的一块陶板观察，陶板的一面边缘翘起，象火盘或烤盘的边缘。不过这很可能不是火盘，而是与中国汉代炉灶结构相同的炉前壁。

另外几面灶壁可能是用木料或石头、泥土制作的，并以草泥或苇泥搪缝；这里还出有草泥块。

在崗顶的最高处，临近绝壁的地方，在一个灰坑里发现鱼鳞铠甲的残破甲片。甲片全部经过细致的砥磨，呈规整的长方形。边缘有穿孔，以便缝缀在皮革上。甲片已经断裂成碎块，与几堆灶灰混杂在一起。

在崗顶西部边沿，残存着一个石料堆砌物，类似炕台。

由此可见，先基纳帽顶上第二期遗址的居民留下了丰富的活动遗迹，远远超过了第一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居民所留下的古朴陶器、黑曜石片和石器。

先基纳帽上层的居住者曾经建造某种住所。其中大部分只残留下泥面的灶。这些住所都是地面建筑，也许是简单的窝棚，但更可能是圆木房屋。其中一间显然砌有火炕。



图五十三 骨制甲片、骨锥、陶纺轮。先基纳帽。

根据灶洞里出有火烧的骨制铠甲碎片可以推定，这里曾举行过某种仪式，可能是祭祀这里的山神。鉴于东北古代居民中存在崇拜山神的风俗，这种推测是完全有可能成立的。

灶址附近和石岗整个发掘面上都散布着陶片。按其外形，一小部分可以归属于很早的时期，即新石器时代；还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属于中世纪；而主要部分则属于先基纳帽居民人数最多、居住时间最长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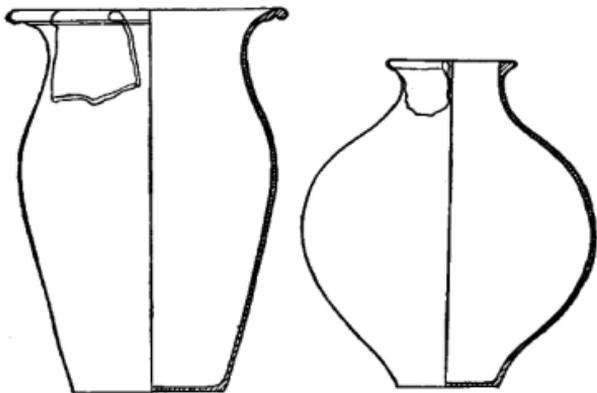
陶片中以大型厚壁器的残片最多；也有一些形体较小的容器的残片；还有两件小型陶器基本保存完整。

大多数容器都是手制的，没有使用陶轮。陶片呈褐红色或浅黄色，胎质为加沙或加沙粒的粗陶。

这些陶片很厚，很坚硬，原因可能是制作时使用了拍子，把湿软的胎壁拍打结实。

根据口沿残片和保存完好的小型器（显然是大型器的仿制品）可以断定，这些容器的形制是大平底、大鼓腹、折肩、细颈、侈唇，有时唇部特意加厚或作盘状展开。

这类容器中，有的腹部有小组，有的则带有弯曲成马蹄铁形状



图五十四 先基纳帽出土的陶器(复原图)。

的、截面呈圆形的粗壮器耳。底部有时镂有圆孔，似筛。

这些容器多为素面。但是有一些容器不仅器壁上，而且大平底上都布满了纹饰。纹样是在软坯上用力压出来的菱形或方形印纹，作棋盘式布局。方格边线的宽度在一厘米以内。这种纹饰看来是用刻有槽沟、方格凸起的木拍压印出来的。

形体较小的容器与上述大型器的形制应是十分接近的，只是器壁相应地薄一些。这种陶器分为二式。一式颈部位置较高，较粗，几乎全是素面。另一式颈部较明显，折肩，唇外侈更甚。口沿外部常附加堆纹一周，堆纹上布以竖道划纹或锯齿纹。整个颈部划有很深的弦纹带。颈部以下的肩部饰有排列整齐的圆窝纹一周。

这些富有特征的陶片和前述第一式器的残片，基本上代表了先基纳帽陶器的面貌。

还有一类容器即第三式，其口沿的特点和陶土的成分都与前二者不同。这类容器的口径较小，但口沿甚厚。唇外侈，有的是圆唇，但多数是纵断面呈三角形。颈



图五十五 陶片。先基纳帽。

部不明显，整个唇外侈。胎质较前二式结实，火候也较高。从器表的细弦纹看来，这是轮制陶器。根据现存陶片，很难推断器物的形制，不过这些陶片倒很象中国周代陶器及某些西汉陶器。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敞口盘或敞口碗的残片，以及几件豆把，有的是粗大的实心把，有的则是空心把。

陶器中还有单面鼓起的(包括圆锥形的)陶纺轮及陶网坠。网

坠作短圆柱体形，两端有系绳用的刻痕。也有陶制的饰物或避邪物，如管珠和一端穿孔的、野猪獠牙状的弯曲佩饰。



图五十六 陶片及石制饰物。先基纳帽。

松软的薄石片制的佩饰数件。

即使把新石器时代形制的石器及陶器排除在外，也可以看出，先基纳帽出土物与滨海早期的遗存有很多共同点。例如，磨光的薄壁罐和高圈足或实心足的豆的碎片，都是贝丘遗址文化的典型器物。以平行弦纹和一周圆窝纹一起构成的带纹也是二者的共同点。

先基纳帽陶器与夹皮沟上层出土物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这就是器组。

然而，先基纳帽文化还有其崭新的特点，即颈部饰有弦纹带的

兽骨和鹿角也被广泛利用，制造弯锥和箭头。骨镞都有粗大的铤，呈圆柱形、三棱形或四棱形。

还有一件扁平的大纺轮，是用鹿角的盘座制成的。

兽骨还用来制作铠甲上的缀片，这在中国史书记载东北及其邻接的我国远东地区的挹娄部落时曾有提及^①。先基纳帽还出土一件饰物或避邪物，是用一颗完整的野猪獠牙制成的，末端有一穿孔。

此外，还出土磨棒二件，

^① 参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晋书·四夷传·肃慎》。——译者

细颈器这种新器形。轮制陶器也是当时滨海居民物质文化中的新事物,这些陶器酷似周代陶器及某些汉代陶器。

先基纳帽的出土物并不是我国远东孤立的、单独地发现。例如,在日本海沿岸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的奥耳加海湾地区,就发现过口沿作盘状展开的大型器残片。

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阿穆尔河高峻的右岸,靠近一家酒厂的地方,有一个含有两个文化层的古代居址。在它的上层发掘出与先基纳帽出土物相似的大量陶片,器形为大口沿、细颈、深腹,腹部以下逐渐内敛。这些容器的颈部也和先基纳帽出土容器一样,一般饰有弦纹构成的宽带纹。器表常布满用手指在湿软的陶坯上按出的小窝纹。

这里也出有高柄豆的残片。它表明这个居址的陶器与更早的甚至贝丘时期的陶器都有联系。

此外,在阿穆尔河流域马尔梅日村附近的一个发现物颇为丰富的居址里,也出有类似上述第一类容器的陶片,即口沿作盘状展开,细颈,颈部饰有弦纹带。这个居址中还出土一颗用叶腊石型的白色软石制成的小管珠。这种石珠常见于外贝加尔地区及其邻近的蒙古各地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墓地中。另外,在马尔梅日还发现了冶炼红铜的遗迹,即铸铜时凝固的铜屑。

在哈巴罗夫斯克酒厂居址的范围内,发现一处独一无二的遗存,其年代当与酒厂居址上层及马尔梅日的出土物相同。这是一座古墓。由于河岸被冲刷,该墓受到严重破坏,只保存一部分。但是它的葬式却有非常鲜明的特征。该墓用两个大容器为葬具,两个容器原先显然是以口沿相套合的,骨架应是在容器内。发掘时仅见有器壁的残片及口沿的一部分。但是,据此已足以推定其形制。这是与酒厂居址及马尔梅日居址所出形制相同的陶罐:小口、口沿作盘状展开,口沿面上有几道弦纹。除人骨和陶片外,这里还

发现骨骸两件，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随葬物。

历史上有一个时期，即周朝末年及汉代，在邻近我国远东的若干东亚地区，即中国的南方、山东，以及朝鲜，曾盛行过瓮棺葬。这种葬法也见于辽东半岛，例如古牧羊城附近的海贝墓所在地，就发现有瓮棺葬。

这种墓葬中考察得最详尽的，是日本九州北部福冈县须玖字冈本地方的瓮棺葬。在冈本发现这种墓葬十处，它们构成密集的墓群，一般以两只大瓮为葬具。个别容器高达一百零五厘米，直径约为四十——六十厘米。

每一对容器均以口沿相套合，有时一瓮的口沿深深插入另一个瓮里。瓮棺内除死者骨骸外，发现有锯齿形边饰的中国铜镜残件、石管珠、铜矛、铜匕首或剑¹。

为了充分认识先基纳帽、马尔梅日和哈巴罗夫斯克酒厂等地的居址的意义，为了了解这些遗存所反映的远东部落生活的演变，就必须把它们同东亚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存作比较。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表明，在公元前第一千年和公元初的若干世纪中，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和太平洋岛屿世界的远东诸部落的历史命运有许多共同之处。

从辽东到滨海及阿穆尔河地区，所有的部落都生活在气候较温和的沿海自然地理环境中。这些部落主要从事捕鱼，兼营农业。当中国已经有了阶级，建立了国家，发展着冶金业的时候，当殷周时代的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发明了文字，开始建造城廓官室的时候，这些部落尚处于漫长的石器时代。所有这些部落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周秦以至汉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1 岛田贞彦：《筑前须玖史前遗迹之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报告11，1930年。

柏小山：《弥生文化——日本列岛的一种史前文化》，德国亚洲自然及民族学会出版（纪念版），第I卷，东京，1933年，第127—134页。

等方面的影响。

由于这些原因，远东诸部落生活中发生的历史事件便不是孤立的，而是互有联系的、沿着相同的方向发展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部落物质文化的相似性，以及同样的葬俗，即上面提到的瓮棺葬，都是明显的证据。

如果以考察得最透彻的日本瓮棺葬为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列岛以陶瓮为葬具的埋葬制度，是在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即公元前四至三世纪以及稍后的时期出现的。

当时，日本列岛流行一种新型的陶器，先是在南方，尔后在北方。这就是弥生式的陶器，它与较早时期即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截然不同。典型的弥生式陶器呈黄褐色或褐色。有的容器挂有红色陶衣，表面磨光。

器形多有一定的规格：高把豆、安佛拉式深腹罐（唇常作盘状外敞）。早期的弥生式陶器形式比较简单，种类比较单调，纹饰也十分简朴。器表一般饰以独特的划纹，是制坯时主要以木制的“刷子”或篦（齿）状的工具划出来的。花纹的形式是由平行凹线构成的波浪形带纹，外侧镶以数周弦纹。此外，还普遍采用附加堆纹。

弥生式陶器的所有这些新的特征，表面上似乎是一种衰退现象，实际上却说明这时已经产生了新的、更加完善的制陶技术；偶尔甚至使用了陶轮¹。从总体看来，弥生式陶器的器形、纹饰和制作技术，都与先基纳帽、酒厂附近居址及马尔梅日居址的陶器相同，至少可以说十分接近。

物质文化的演变也表现在石器上。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新型石器。居址中多处发现半月形磨制石刀，刀的中部有两、三个系柄的孔²。

1 柏小山，同上书，图版 XII。

2 N. G. 芒罗，同前书，图 183（特别是图 5、6、7）。

骨器和石器仍然是主要工具，不过其中往往有肯定是模仿金属工具的器物。

依照箭镞、刀和匕首等金属原件的形状，用板岩和页岩制出了逼真而完美的仿制品。

可见，当时金属已经是人们熟悉的东西，但是金属制品还很稀少。居址中根本没有见到金属器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墓葬中出土的金属制品只见有兵器，主要是青铜匕首或短剑、铜矛，以及青铜镜之类的奢侈品。

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也发生深刻变化。弥生式陶器的文化层中已见到马骨。

农业无疑已广泛盛行。出现了真正的农具，即以软质石材制成的石锄，锄上有横槽以便系柄。当时耕种土地同后来一样，都是依靠人力。

首次发现了当时所栽培的作物的残迹。在陶片中见到炭化的大米粒及其印痕。有的居址出有底部及壁上带小孔的器皿，这是专门蒸饭用的容器。

从前那种原始的经济，逐渐被农业排挤而退居次要地位。

伴随着经济领域的转折，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进步。

大量事实说明交换已有了广泛的发展，而且不仅是在岛屿内部，更重要的是在各岛屿与大陆之间进行。

居址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种可以容纳许多家庭的氏族公社大型住所已不复存在，出现了面积较小的地穴式住房。

同时，与古代住所相联系的妇女雕像也根本没有了。显然，当时母系氏族正在向父系氏族过渡。

在这个总的背景上，许多事实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这些事实虽然比较零碎，但却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清晰轮廓。

从金属制品的性质和出土情况看来，它们无疑是极少数人的

用具。

这些人是氏族中的少数贵族。他们手里掌握着全部武器，集中了奢侈品之类的财富和交换的产品。马匹也应当是这些人占有的。我们知道，在日本的整个晚期历史上，马是社会上层即“武士阶层”的专有物，农民是没有马的。

居民的大多数与开始分化出来的氏族贵族之间的差别，也反映在埋葬制度和墓地上。

前面说到的瓮棺葬，是贵族特有的葬法。考古学家正是在这些瓮棺葬中发现了奢侈品及武器等随葬品，即表明贵族区别于氏族普通成员的一切物件。

在这些岛屿的部落中产生了氏族贵族。中国文献甚至说那里已经存在“国”。实际上并不是国，而是以贵族出身的军事领袖为首的氏族性质的集团。中国人自己也写道：“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①

这些蕞尔“氏族国”逐渐并成大国，它们的首领有时甚至由中国皇帝授予“国王”的封号。例如，九州岛冈本附近的瓮棺葬入葬以后才一两个世纪，这个地方就以伊都、奴或松浦等国名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了。^②

据后汉书载，公元57年，伊都国使者朝见皇帝，领受金印。1784年，在古伊都国境内，一个农民发现了这颗刻有“汉授伊都国王”数字的金印。^③

西南各地的首领和“国王”曾进行无休无止的战争，企图征服邻近的南方及北方部落，夺取他们的财产和土地。

南方和北方诸部落由于没有受到中国的直接影响，进步较慢，

① 见《汉书·地理志下》。——译者

② 据《魏志》卷三十，“奴国”或作“倭国”，“松藩国”即“末卢国”。——译者

③ 印文应为“汉委奴国王”，见藤田亮策《日本考古学辞典》146页及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上、一》。——译者

新石器时代技术的残余，以及建立在共同劳动和血缘氏族制基础上的原始公社关系，保持得比较长久，这就便利了西南诸部落对他们的征服。

南方^①诸部落在他们的首领率领下，利用自己在战斗器械和军事组织方面的优势，开始向邻近各地扩张。在几个世纪以后写成的日本最早的史籍中，凡是提到这次扩张的时候，都把它同神话中的第一代人间皇帝神武天皇个人相联系。传说神武天皇从九州迁到了本州岛现今山门郡。

据日本早期史书所载，此后日本人的祖先同较落后的北方居民（“夷”和“虾夷”）及部分南方居民（“熊袭”和“隼人”）之间，还进行了好几百年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入侵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北方部落素以悍勇著称。日本古代作家根子广乘说，北方部落“习性勇猛强悍，喜寇盗，善射，行动疾速无比”。1656年，耶稣会教士弗罗埃斯也写道，这个民族“作战英勇，日本人很害怕他们”。

南方部落的名称“熊袭”和“隼人”，本身就有“粗犷”和“勇猛”的含意。

一直到八世纪的中叶（730年），还不时发生隼人的起义。^②也差不多直到这时候（712年），本州岛的三分之一还在夷族手里。

但是到了后来，连最强大的北方部落也是一部分被同化或被灭绝了，一部分则被征服者驱逐到辽远的东北方，后者便是现代阿依努人的祖先。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民族。

在上述演变中，日本列岛与大陆的交往起了决定的作用。

毫无疑问，水稻的栽培是从大陆即中国或朝鲜学来的。日本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西南。——译者

② 据《大日本史·本纪一·卷十五》，事在日本元正天皇养老四年，公元720年。
——译者

列岛的马也是从大陆传来的。

青铜也是来自大陆；在日本古代，青铜叫作“卡拉卡内”^①，意思是“高丽的金属”。

日本岛的弥生时期的典型器物，如形制独特的束腰有后铜剑、箭头、铜镜、珠、璧等，在朝鲜和中国也曾出产。

甚至陶器也是这样，尽管它与本地新石器时代陶器有密切联系，但仍然近似大陆（朝鲜、中国）和我国滨海的陶器。不仅如此，就连最有代表性的“铜石并用时代的”石器（有横槽的石锄，半月形磨制穿孔石刀）也是从大陆借用的。同时，大陆上也发现有模仿金属匕首的板岩制品。

瓮棺葬的葬法也是先在大陆出现，后来传到日本列岛的。

上述种种借用发生的时间在公元前三、四个世纪之内，基本上是在周朝末年至前汉。当时中华国家的威力和对外影响的强度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辽东、朝鲜的联系大大加强。

在前面谈过的那个单砵子岛附近，在一块台地上有一个高丽寨居址，这里的出土物很值得注意¹。

单砵子岛上的早期居址，看来是因为海洋水位大大升高而被人们放弃的。高涨的海水浸没了小岛，岛上的文化层被沙掩埋。除泥沙外，文化层上面还沉积了很厚的一层专门生活在礁石上和海浪拍击地带的海洋软体动物的贝壳。

后来，海水又退走了，小岛四周变成不适于居住的潮湿的洼地。人们不得不迁徙到大陆海岸的高地上去。这样，他们便在高丽寨遗留下很厚的文化层。这些遗存证明，该遗址的居民过着定

1 浜田耕作：《瓮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之先史时代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东京·京都，1929年。

① “卡拉卡内”是日文词汇からかね，汉字写作“磨金”，即青铜，意为从中国或朝鲜传入的金属。——译者

居的生活方式，并且曾在这里长期居住。在这些地层的下层，还有不少与单砣子岛出土物很近似的东西，其中包括石制工具。甚至在上层也可以见到石制工具。这些都是和先前一样的石碾、石斧、石刀、石镞。出土物中还有不用陶轮而以泥条盘筑法手制的黑色粗陶。

但是，地层时代愈晚，就愈清晰地显出高丽寨遗址居民生活各方面都有新的重大变化的迹象。首先是古老的彩陶消失了。纹饰起了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容器，器形是典型的中国形制。

在这些陶器中，经常可以见到鬲和鼎一类的三足器。这是中国人及与之有近亲关系的东亚部落的远古文化特有的器物。

许多器皿具有规整的外形，说明其制作技术与当地的旧式陶器不同，使用了陶轮。

金属的使用已很普遍。金属器物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生活中习见的东西，其中不但有青铜器，而且有铁器。

这一切新事物，正如我们所料，全是来自中国。在中国，由于采用了陶轮及其他新技术，可以大批地生产形制规范化的陶器。中国陶匠的产品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国外。于是在辽东半岛上便出现了周代和汉代形制的典型中国陶器，以及金属器物，包括铁制的劳动工具。

这种状况是在东亚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起初，中国和邻近部落的联系是很有限、很偶然的。在新石器时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国家，中国人的祖先还处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条件下，这时中国的高度农业文化不仅对于沿海的定居渔人，甚至对于中国人的近邻也还未能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中国居民的利益当时还局限于氏族公社的狭窄范围之内，最大的范围也不过是部落联盟。当时还没有阶级，也没有向其他国家进行扩张的基础。

黄河流域的古代农人有足够的土地。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部落，当时即使有意对外扩展，那也主要是朝相反的方向，即朝向西方，朝向今日的中国土耳其斯坦，^①那里有更发达的农业文化，并且拥有当时视为珍宝的玉石等矿藏。

直到中国完全进入了金属时代，出现了文字，中华国家业已成熟，情况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对中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影响感受最深、最早的，是居住在朝鲜南部和东北南部的中国的近邻。

根据古代传说，公元前 1120 年商殷灭亡后，殷王族成员箕子亲王随即逃奔到东方，后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朝鲜¹。

这个传说表明，古时朝鲜当与中国存在民族上的某种联系。至于后来，到了周、秦和汉代，这种联系已经成为不容争辩的十分具体的事实了。

据 H. 比丘林说，远在“战国”时期，“现今直隶和山东两省的居民就曾被逼离乡背井，到朝鲜湾北岸去寻找安定的避难地”²。

中国人向东方第二次移民发生在汉朝初年，即公元前 195 年。当时，直隶人卫满占据了朝鲜国。到了公元前 128 年，朝鲜北部和辽东一度并入了宏大的汉帝国版图，成为它的郡³。

这时和中国的联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还深入到经济方面。

① 指我国新疆。——译者

1 H. 比丘林，同前书，第 8 页。（译注：见《尚书大传卷五·鹑尾》。周武王伐纣的年分，据《汉书律历志》引刘歆说，为公元前 1122 年；按万国鼎《中国历史纪年表》，应为公元前 1027 年。）

2 同上。（译注：参见《史记·朝鲜列传》。）

3 同上。〔译注：关于公元前 195 年汉人向东方移民一事，中国古籍中未见记载。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朝鲜王满，燕人。……汉兴，……燕王卢绾反，人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夷服而东走入塞，渡溟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郡，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会孝惠、高后天下初定……。”按：惠帝在位时间为公元前 194—188 年，奥氏所述可能是指此事。又，汉时在朝鲜置郡一事，是在公元前 108 年（汉元封三年）。〕

在这方面，当地农业地位的提高便是一个证明。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即高丽寨居址上层形成时期，辽东居民已不象从前那样向海岸发展，而是开拓便于耕作的台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同中国一样，在长时期内，还是用青铜制造兵器：弩的部件、刀、匕首、剑、矛、镞。而新的金属——铁则仅仅用于制造农具：锄、铧、镰。

农人的村落（想必有中国移民杂居其中）的外貌也和石器时代渔人居址完全不同。新出现的地面住所代替了原始的半地穴建筑。

辽东居民中这时通行中国的布币和刀币，这同样说明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钱币已经成为他们日用之物，否则不可能这么大量地出土。

以上事实说明，辽东居民及邻近的朝鲜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交换日益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

由此可见，中国这时已经和先前不同，它同南方及东方的近邻已经有了密切的接触。

当时中国热中于扩大这种对外联系。农民需要新的肥沃土地，手工业者和商人需要市场，统治阶级则需要异域的财富和领土。

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向北方和东方逃亡，想在那里寻找自由。中国史书记载，据人居朝鲜南部韩国的逃亡者说，中国秦朝（公元前223—206年^①）的居民“避役入韩”^②。可以设想，在中国附近的其它地方，也流入了不少这样的逃亡者。

但是，中国人向毗邻地区的扩张，在那里传播农业、金属、手工

^① 应为公元前221—207年。——译者

^② 《晋书·四夷传·辰韩》。——译者

业和新的文化，这对于当地的土著居民说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使当地更快地达到较高的文化和经济水平。

中国的文化和国家组织对于遥远的国度也产生过这样的进步影响。

前面讲到的日本列岛公元前第一千年下半叶出现的情况就是鲜明的例证。

如果说在与大陆隔着海洋的日本列岛都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那么在我国远东境内，特别是滨海，也应当发生过同样重大的变化。在远东，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以及当地部落所处的地理条件，对于当地居民的进一步发展，非但没有产生障碍，反而起着促进作用。

前面讲到的滨海及阿穆尔河地区的考古遗存，特别是先基纳帽的出土物，都是这方面十分有力的证据。

这些遗存表明，远东古代居民的生产力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居独占地位的新石器时代技术向金属时代过渡，由古老的石器先后向红铜青铜器及铁器过渡。

远东诸部落的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另一个重大特点是，他们的畜牧业及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新型的更高级的社会关系必然日趋成熟。果然，到了公元第一千年的上半叶，在滨海境内，出现了阶级社会的萌芽，一种新型的文化正在发展起来。后来，如同欧亚其他国家一样，高大的城墙修筑起来了。按照恩格斯的形象说法，护城的堑壕“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①。

原始公社制度逐渐让位给新出现的阶级社会制度；古老的氏族生活方式逐渐让位给国家。在滨海，起初出现了渤海王国，后来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第一版，第162页。——译者

兴起了女真人的国家，它们的年代正是基辅罗斯时代。

由考古资料所证明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大致就是如此。

关于远东诸部落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历史，特别是公元一千年代的历史，可以从中国的文献里得到比较详细的了解。随着远东居民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交往的发展，中国文献的报导也愈益充分而丰富。

这种交往最早见于中国文献的，还是在遥远的古代，即公元前第三千年，文献中提到了属于半传说性质的肃慎或息慎。据《竹书纪年》所载，肃慎人大概在公元前 2225 年赠给舜帝一张弓和一些石镞的箭¹。

周人克殷，开创了新的朝代——周，此后他们就开始同肃慎发生接触。公元前 1122 年，周武王在河南击溃了殷国的军队，占据了殷国大半领土。因此，周人与其北邻及东邻的来往，包括与肃慎的来往，变得频繁起来。

据中国文献所载，武王打败殷朝之后，便开始同东方的九夷及南方的八蛮交往。于是就有肃慎人来朝，贡献了若干以石为镞以梨木为杆的箭²。武王令人在箭杆上铭刻“肃慎部之箭”数字，以便后人记住这事³。

后来，周成王(1115—1077 年^①)时，肃慎人还几次遣使到中国“贺”天子即位。M. 波兹德涅耶夫认为，这件事与成王攻伐居住在朝鲜境内非常与肃慎交战的那些部落有关⁴。

1 B. 劳费尔：《玉器——中国考古学与宗教之研究》，伦敦，1912 年，第 57 页。（译注：参见《今本竹书纪年·五帝纪》。）

2 M. 波兹德涅耶夫，同前书，第 4 页。

3 B. 劳费尔，同前书，第 57 页。（译注：《国语·鲁语下》：“仲尼曰：‘……昔武王克商，遍遣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

4 M. 波兹德涅耶夫，同前书，第 4 页。（译注：《尚书·周书序》：“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周书序》即《贿肃慎之命》序，书亡。）

① 应为公元前 1024—1005 年。——译者

有一则中国传说还说孔子知道肃慎：“495年，孔子在陈国。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一只被石箭射中的鸟落在国王宫庭的台阶上。有人问孔子，这是哪个地方的鸟。孔子说：‘这种鸟是隼的一种，来自肃慎国，而箭头则与武王赏赐给一个王子的那一种很相似。武王把这种箭头当作封爵的标志，把陈国封给了这个王子。’后来，在陈国国王的武器库中寻找，果然发现了一些作为传世之宝而保存着的箭。”¹

在一段有关公元254年^①高丽事件的记载中，载有关于古肃慎国的珍贵资料。史书说，这一年高句丽部落的首领卫宫叛乱，侵犯辽西。幽州刺史母丘俭派遣将领王欣前去讨伐。王欣“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记功”²。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古肃慎国，因为当时这里居住的部落早已不用这个名称了。

可见，中国远古史上的肃慎，是殷周时期居住在中国本土的东北面，即现今东北及与之相邻的我国远东各地的人们。

肃慎人在武王和成王时，至少曾两次向中国朝贡。但是，这种来往不过是短暂而偶然的，因而关于肃慎人的生活情形，中国人的印象应是很模糊的。

上面那个提到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学问家孔子谈论肃慎的传说，是很能说明这个状况的。

孔子总共只讲了有关肃慎人及其国度的两件具体事实。其一

1 B. 劳费尔，同前书，第57页。〔译注：《国语·鲁语下》的原文为：“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括矢贯之，石弩，……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石弩，……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使求，得之金椁，如之。”关于孔丘在陈国的年分，据《史记·陈杞世家》，陈潘公六年（公元496年）、十三年（公元489年），孔丘在陈。〕

2 M. 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52—53页。（译注：见《三国志·魏志·母丘俭传》。）

① 应为245年。——译者

是，他们的国度里有隼。北方各国素以盛产猎鹰而闻名。我们在下文将谈到，一千五百年以后的女真时期，把契丹使者引到大洋之滨的，正是鹰隼。契丹为了打通那条遣使必经的著名的“鹰路”，曾几次同女真部落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

另一个事实是，使用石镞的箭。肃慎人进献给中国天子的正是这种箭。

总之，在这个传说中肃慎人的国度还非常模糊。只是由于从渺茫的远方神奇地飞来一支箭，才谈论到这个国度。这个传说假托孔子之口来谈论肃慎，恐怕不是偶然的。既然这位鸿儒硕学关于肃慎都不能说出什么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表明，中国人对他们实在不知道更多的东西了。

由此可见，自战国初期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周成王时候起，中国与肃慎的联系就完全断绝了。魏朝的史书说：“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存在过秦和汉，仍没有达到这一点。”¹

晋朝的史书的说法也基本相同：“周朝的公辅当了王之后，他们曾派了一个使者前来祝贺。后来一千多年内，在混沌的秦汉时期，未曾有过贡献。”²

这样，中国史书中关于远东诸民族的记载，便给我们提供了依据，可以把滨海及阿穆尔河地区属于秦汉以前（即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一个时期的考古遗存与肃慎相联系。贝丘遗址也属于这一类。当然，这些遗存并不一定都属于肃慎，因为肃慎可能只是居住在这个地域的诸部落之一。较晚时期的即勿吉或靺鞨时期（公元五世

1 H. B. 克尤涅尔：手稿，第 69 页（译注：原文没有注明手稿篇名，据奥氏此书英文版注，此手稿可能发表在克尤涅尔的下述遗著中：关于南西伯利亚、亚洲中部和远东诸民族的中国文献，莫斯科，1961 年）。（译注：其实这是《晋书·四夷传·肃慎》中的一句：“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

2 B. E. 拉里切夫译自《晋书》。（译注：这是俄译者对《晋书·四夷传·肃慎》一段话的错误译文。原文是：“逮于周公辅成王，复遣使人贺。尔后千余年，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

纪)的中国文献指出：“而黑水部尤为劲”，“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最为强国”¹。

在汉代，中国人把肃慎地域的居民改称为挹娄人。

中国人关于挹娄的记述较之肃慎要全面详细得多。这些记载展现出挹娄诸部落富有特色的生活图景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关于挹娄的资料始见于《后汉书》(公元25—220年)。据《后汉书》所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²中国人还写道：挹娄“土地多山险”^①。И.比丘林在注释中特别指出：“挹娄王国领土包括现今满洲吉林府东半部。”³

Н.В.克尤涅尔校核И.比丘林的译文时补充指出，中国原文并不是泛说挹娄国与沃沮接壤，而是说与北沃沮接壤。据史书，挹娄国居民“形似夫余，而言语各异”⁴。

挹娄人同他们的前驱(也可能是裔祖)肃慎人一样，使用石镞；镞施有毒，“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⁵。

这个独特的细节诚然有趣，但并不是重要的材料，它不能说明挹娄的文化发展水平。

如此详细的描写，表明中国人的确亲眼见过挹娄人的武器，其中当有石镞。但是也有可能这里所说的情节是属于更遥远的北方

1 И.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70、92页。(译注：见《北史·勿吉传》。)

2 И.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23—25页。Н.В.克尤涅尔，同前书，第2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3 И.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23—25页。

4 И.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23—25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5 И.比丘林，同前书，卷II，第23—25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① 《后汉书·东夷传·挹娄》。——译者

部落，即居住在阿穆尔河下游及其东北的那些部落。关于这一点，史书对公元六世纪勿吉或靺鞨的记载，有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话。在介绍靺鞨部落中的拂涅部时，史书作者说：“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¹我们知道，科里亚克人、堪察加人（伊特里门人），一直到十七——十八世纪还处在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技术正处于鼎盛状态。石镞的见闻大概就是从这些北方部落传到中国的。中国人对石镞之所以有深刻的印象，也可能是由于早自周朝以来，石镞就被史籍当成传奇之物而大加渲染。

然而，在其他方面，各类史书的记载，都说明挹娄人的生活和他文化，较之石器时代的人们（包括公元十七——十八世纪的堪察加人及科里亚克人）要发达得多。

据《后汉书》作者说，挹娄人“有五谷”，就是说不但种植谷物，而且种植豆类。挹娄人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不是狩猎或捕鱼。至于畜牧业，《后汉书》仅仅说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²。

《三国志》补充说：挹娄有“牛、马”；还用植物纤维做衣服，“有……麻布”³。

史书接着说，挹娄“夏则裸袒，以尺布隐其前后。……冬以猪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①。

挹娄人居住在“山林之间”。由于“土气寒”，他们在冬季筑造半地穴式住所，“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②。

《后汉书》描写挹娄的生活和住所时，谈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但不十分清楚的事。书中写道：“其人臭秽不洁，作厕于中，圜之而

1 M.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70 页。（译注：见《北史·勿吉传》。）

2 M.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24 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3 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译注：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成书在《后汉书》之前，说它补充《后汉书》是不对的。）

① 《后汉书·东夷传·挹娄》。——译者

②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译者

居。²¹这段描写,令人想起楚克奇人全家共用一个尿盆的习俗。

有趣的是,书里说六世纪的靺鞨部落有用尿洗脸的习惯,就象十九世纪的楚克奇人那样:“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²²在住所当中安置一个公用的“厕”,即尿盆,可能就是为了积尿。

《三国志》谈到挹娄人的室内用具,特别指出“东夷饮食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

关于挹娄部落的社会关系,《后汉书》的描述虽很简略,却也颇为明确:“无君长,其邑落各有大人。”挹娄诸氏族“众……少”。

中国人特别指出挹娄人尚武好斗:“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又善射,发能人人目。……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

关于挹娄邻部北沃沮人的一段记载,证明以上所说并非虚构:“挹娄人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²³

尽管挹娄人尚武好斗,但到了汉代,仍落入夫余人的统治之下:“自汉兴已后,臣属于夫余。”²⁴

挹娄与夫余的关系史,《三国志》中有补充说明,谈到了夫余对挹娄的沉重压迫和挹娄人的起义:挹娄“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公元222—226年^①)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²⁵。

挹娄摆脱了夫余的压迫后,立刻就同中国发生了直接联系。

1 《三国志》的说法有所不同:“其人不洁,作畜圈在中央,人围其表而居。”(Э. В. 沙夫库诺夫与 B. 拉里切夫的译文)应当依照《后汉书》的说法。因为如果是“作畜圈”,那么说挹娄人的那一句便没有根据,无法理解。而且,中文里在此处表示“畜圈”的那个字,也可以俄译为“厕”。(译注:《三国志》的原文是“作溷在中央”,“溷”即“厕”,与《后汉书》并无不同。)

2 И.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70 页。(译注:见《北史·勿吉传》。)

3 И.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29 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4 И.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24 页。(译注:见《后汉书·东夷传·挹娄》。)

5 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译注:见《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传》。)

① 应为 220—226 年。——译者

《晋书》中所说的中国和挹娄“在文帝时（220—227年）曾互相赠礼”²¹，可资证明。

公元三世纪，挹娄遣使见于史书的至少有四次。史书载道，景元（公元260—264年）末，挹娄人来中国。他们“来贡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属。魏帝〔命令他们回到相府去〕，赐其王〔锦缎、毛织品和棉布〕”²²。

魏朝史书载道，挹娄人随带方物前来朝见：“魏朝时（公元262年），通古斯部落肃慎（即挹娄）向中国皇帝进献：弓三十张，楛矢若干，石弩三百多枚，皮、骨、铁铠甲二十领，豹皮四百张。”²³

据《晋书》的记载，双方都派遣了使者。对于《魏志》开列的礼品清单，《晋书》补充道，中国皇帝还以床上用品和公鸡若干赏给挹娄王。

挹娄向中国遣使，见于《魏志》^①的，有下列几次：“太康元年（晋武帝在位时，公元280年），他们的王派遣使者送来土产。二年（281年）又来进贡。七年（286年）也曾来过。”^{2③}

1 H.B.克尤涅尔，同前书。（译注：《晋书·四夷传·肃慎氏》原文是：“及文帝作相……。”“文帝”是司马昭的谥号，事情发生在公元262年。俄译者误认“文帝”是魏文帝曹丕。“作相”是指司马昭执政，却被误认为“互相赠礼”。参见下条的译注。又，魏文帝在位年代为公元220—226年。）

2 同上。（译注：《晋书》原文是：“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来贡楛矢、石弩、弓、甲、貂皮之属。魏帝诏归于相府，赐其王傅鸡、锦缎、绵帛。”“归于相府”及“傅鸡……”两句，俄译错漏。）

3 鸟居龙藏：南满史前居民，载《东京帝国大学科学院杂志》，第XXXVI卷，1915年。（译注：《魏志·三少帝纪第四》：景元三年“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

① 应为《晋书》。——译者

② 《晋书·四夷传·肃慎》原文是：“至武帝元康初，复来贡献。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弩。至成帝时，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元康元年是公元291年，东晋元帝在位是317—323年，成帝在位是326—342年。俄文把年份都搞错了。——译者

同中国的交往不仅有政治上的，而且还有经济上的原因¹。

挹娄国以好貂、赤玉输往中国²。

《三国志》补充说，此即“今所谓挹娄貂是也”³。

《魏志》^①中有关挹娄国的资料是很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后汉书》和《三国志》有关挹娄历史的记载内容是相同的，那么《魏志》的叙述则显然是一篇新的文献。这篇文字的产生，无疑是以某些新的材料为依据。这些材料可能是到中国来的挹娄人提供的，也可能是在公元四世纪去过东北的中国人的见闻。

《晋书》谈论挹娄就是以这一段文字为基础的，并且还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使我们能较充分地了解经过一百年之后即公元四世纪挹娄人的生活情形。

《魏志》说，挹娄国就是古肃慎国：“肃慎氏一名挹娄。”它距离夫余有六十天的路程，东边接着大海，西边接着宰国即漫汗国。“北极弱水。……居深山穷谷。其路险阻，车马不通。”⁴

这部史书还有趣地介绍了“其利入铁”的石材的出产地。“其国东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将取之，必先祈〔山〕神”⁵。

1 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

2 同上。（译注：见《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

3 同上。

4 同上。（译注：见《晋书·四夷传·挹娄》。）

5 《晋书》的说法不同：“其国东北有山，可以采石。人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把铁运进来，使用前必先祈神。”这个外误，可能是《晋书》作者在转抄前人文字的时候，由于不懂这句话的含意而造成的。大概转抄者认为不可能有能够砍铁的石头，因而把有关的词句删弃了（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

译注：正文中被当作出自《魏志》的那一段引文，其实就是《晋书·四夷传·肃慎氏》的原文，而奥氏注释里所引的《晋书》文字，完全是俄译者由于错误理解原文而闹的笑话。他把“其利入铁”和“将取之”理解错了。

① 此处及以下多处，所谓《魏志》，其实都应是《晋书》。奥氏所依据的是《晋书·四夷传》的两种俄译本，由于两种译文互相出入很大，就误认其中一种是出自《魏志》。奥氏也不知道《魏志》就是《三国志》的组成部分，竟把他所谓的《魏志》与《三国志》并列，并妄加揣测和议论。——译者

书中还提到“有石弩，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长尺有咫”。

据《魏志》的作者们说，挹娄人夏天住在“巢”里，冬天住在“穴”里。想必史书所说的“穴”，应是深掘于地下的住所，“巢”则是干栏式的夏季住所。直到近代，在远东许多民族中，这样的住所还很流行。

关于畜牧业，提到这个国度的居民有马，却不乘骑，“但以为财产而已。无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

挹娄人除了穿皮衣之外，也用毛制作衣裳：“绩毛以为布”。更有趣味的是，他们还普遍用树皮做衣：“有树名雒常……其木生皮可衣。”挹娄还有麻布，夏季用一块麻布遮体：“以布作褙，长三尺余^①，以蔽前后。”

留辮子是挹娄人的特征：“俗皆编发。”

关于挹娄人的生活方式，《魏志》的作者指出，他们没有井和灶。他们“作大罐，受四五升。食则下蹲，以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暖。土无盐铁，烧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¹。

《魏志》中的“大罐”，《晋书》作“鬲”，鬲是空足的三足器，空足本身也是器腹。《晋书》的说法是，挹娄人“坐在编织物上”，也就是坐在席子上^②。古时那乃-果尔特人就是坐在席子上的。

《魏志》着重介绍了挹娄人的婚姻习俗：

“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挹娄的两性关系，以婚前的性交自由为特点：“妇贞而女淫，贵壮而贱。”对于葬俗也作了详细的描写：“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交木做

1 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译注：《晋书·四夷传·肃慎氏》原文为：“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

① 应为“径尺余”。——译者

② 《晋书》的俄译者把“坐则箕踞”理解为“坐在编织物上”，奥氏干脆说是“坐在席子上”，并据此妄发议论。

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性凶悍，故而无相怜之心，无相敬之情。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谓之不壮。”¹

挹娄人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有一个我们不十分理解，但是颇值得注意的习惯，就是通同偷盗者处死：“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故虽野处而不相犯。”

关于同中国的交往，这部史书说，挹娄人至“元帝中兴，又诣江左贡其石弩”。成帝时(326—342年)，他们也曾进贡。

以上关于挹娄的资料，一般认为与贝丘文化遗存有联系。我在早年的几篇有关滨海考古的著作中，依从前辈之说，也持这种观点。然而，1953至1958年，关于滨海公元前第二至第一千年以及公元最初几世纪的考古遗存，积累了一些新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必须重新考虑这个传统观点。我们已经知道，贝丘文化的年代可以断为公元前第二千年之末和第一千年上半叶。因此，这个文化，以及嗣后出现的绥芬河流域青铜-铁器时代文化(夹皮沟河上层居址)，应当归属于中国文献中所说的肃慎时期，而不是挹娄时期。至于挹娄，据中国文献，他们居住在滨海的时期是汉代。因此，前面描述的先基纳帽居址(指这个居址主要的即中层的文化层)等遗存，才应归属于挹娄时期。

总之，在本章所述的时期中，铁器在滨海逐渐取得最后的胜利，与中国的联系不断增强，一种新型的文化正在形成。

1 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译注：此段俄译文大译。《晋书·四夷传·肃慎氏》原文为：“……贵壮而贱老。死者，其日即葬之于野。……性凶悍，以无忧哀相尚。父母死……。”)

第六章 靺鞨部落和渤海国

五至七世纪的勿吉(靺鞨)部落

至公元五、六世纪时,挹娄国称为勿吉。

魏时^①的史料说,勿吉国就是古肃慎国,或称靺鞨,在高句丽以北。关于由中国去勿吉国的路程,史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去洛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余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广里余,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即松花江)。”¹

史书列举了勿吉的七个部落(部类):其一号称粟末部,与高丽接壤。有胜兵七千^②,“多骁武”,时常侵犯高丽。其二是伯咄部,在粟末北,也有战士七千人。其三是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是拂涅部,住在更远的东北方^③。其五是室部^④,在拂涅东。其六号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号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军队不超过三千人。

据史书描写,靺鞨国土普遍低洼而潮湿。居民从事农业。土地用马偶耕。农作物有粟、小麦(麦稞)^⑤,也种水稻。用大米做

1 H. 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 69 页。(译注:见《魏书·勿吉传》。“(即松花江)”几个字系俄译者所加。)

① 应为“北魏时”。——译者

② 《北史·勿吉传》的原文是“胜兵数千”。——译者

③ 《北史·勿吉传》的原文是“在伯咄东”。——译者

④ 据《北史·勿吉传》及《隋书·靺鞨传》,应为“号室部”。——译者

⑤ 《北史·勿吉传》作“土多粟、麦、稞”;《魏书·勿吉传》作“有粟及麦稞”;《隋书·靺鞨传》作“土多粟麦稞”。按“稞”即“稷”,就是“糜子”,似应从《北史》,把麦稞视为一词是不对的。——译者

酒：“炒米酿酒^①，饮能至醉。”除养马外，又“多猪，无羊”^②，也没有牛。

狩猎仍占重要地位：“以射猎为业。”^③据史书载，靺鞨人以弓箭狩猎，箭施有毒：“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④勿吉国人相信，空气染毒也能致命。书中提到石镞：“以石为镞”^⑤。

关于勿吉人的住所，书中说：“筑城而居，造穴养畜^⑥，屋形似塚，开口于上，以梯出入。”

关于婚姻和嫁娶仪式，史书说举行婚礼时，“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⑦。И.比丘林的译文还说男子头发上结一根豹尾^⑧。

“初婚之夕，男近女身^⑨，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⑩这里描写的习俗，与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所说的堪察加人抓新娘的习俗显然相似。新郎必须抓住新娘，撕破她的衣服；用手接触她的身体，这显然就是接触她的乳房。

靺鞨人的婚姻生活，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看来这是群婚制的残余，可是这时父系氏族制却又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中国人写道，靺鞨人“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⑪。

关于葬俗，说是在埋葬地点搭棚，以防雨水淋湿墓葬。如果死在秋冬，则“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⑫。这里说的就是古

1 И.比丘林，同前书，卷 II，第70页。

① 《北史·勿吉传》原文为“嚼米酿酒”。——译者

② 《北史·勿吉传》。——译者

③ 同上。——译者

④ 同上。——译者

⑤ 《魏书·勿吉传》。——译者

⑥ 《魏书·勿吉传》原文为“筑城穴居”。——译者

⑦ 同上。——译者

⑧ 《北史·勿吉传》：“头插武豹尾。”——译者

⑨ 《魏书·勿吉传》原文为“男就女家”。——译者

⑩ 《隋书·靺鞨传》。——译者

⑪ 《北史·勿吉传》。——译者

代尤卡吉尔人中盛行的那种剔净骨髓的葬俗，按照这种风俗，剔下的肉应当让野兽吃掉。

史书还说有一座圣山叫“太山”^①。据比丘林的译文，“人不得上山搜汗，行经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²¹

勿吉(靺鞨)邑落各自有长，互不统属，“不相总一”^②。不过比丘林的译文提到靺鞨人有一个总首领：“渠帅曰大莫弗瞞咄。”²²

隋朝史书补充说，靺鞨有莫弗瞞咄，“东夷中为强”^③。

中国人称靺鞨部落是骁勇好战的民族：“其人劲悍，于东夷最强”，“常轻豆莫娄等国，诸国亦患之。”^④ 魏孝文帝时(471—477年^⑤)，靺鞨派使者乙力支来到中国。乙力支说，他从本国出发，乘船溯难河(嫩江)西行，到了太谿河，便把船沉到河底，登岸步行。继而乙力支渡过洛孤水(据 H. 比丘林考证为木伦河)，沿着与契丹交接的西界到达和龙。

乙力支在朝廷里说，他们的军队击败了高句丽，现在打算联合百济，由水路攻入高句丽，占领这个国家。在进攻高句丽之前，他们决定遣使与中国朝廷商议可否。

对此，皇帝诏敕“三国应互相亲近^⑥，宜共和顺，勿相侵扰”。

乙力支重返沉船的河岸，把船从水底拖出，驾船回国。

此后，勿吉国多次遣使来中国：477、485、486、488、493、503年，都曾来过。而且史书还记载，477年送来马五百匹；488年送来

1 H. 比丘林，同前书。(译注：见《北史·勿吉传》。)

2 同上。(译注：见《北史·勿吉传》。)

① 《北史·勿吉传》作“从太山”，《魏书·勿吉传》及《隋书·靺鞨传》作“徙太山”。

——译者

② 《北史·勿吉传》。——译者

③ 《隋书·靺鞨传》的原文为：“渠帅曰大莫弗瞞咄，东夷中为强国。”——译者

④ 《魏书·勿吉传》。——译者

⑤ 应为471—499年。——译者

⑥ 《魏书·勿吉传》及《北史·勿吉传》均作“三国同是藩附”。——译者

红木箭(楛矢),以及其它土产。

493年来中国的使者,有随行人员五百名。此后,503年、520年,又有使者前来。直到中国发生“纷扰”,遣使才因而停止。但是后来与中国的联系复又加强:“以至于齐,朝贡不绝。”^①据史书载,581年靺鞨遣使进贡。文帝召见时把使者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朕闻彼土人勇,今来实副朕怀。视尔等如子,尔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亲奉圣颜,愿长为奴仆。”²¹

靺鞨土地西北与契丹接壤,因此,他们时常互相侵扰。隋朝史书记载靺鞨的一次遣使时说:“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出我意料者^②’,使者谢罪。”为此,皇帝设宴盛情招待使者一行,并且诏令使者及其随从在席前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就是说这是一场战斗舞蹈,使中国人为之惊惶。据史书载,皇帝当时对大臣们说:“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²²

跳这样的战舞,是氏族社会通常的礼俗,曾广泛流行于世界上许多部落。它与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公元七世纪初,发生了一件新奇的事情,透过这件事,可以瞥见靺鞨部落的内部动态。

据史书载,隋朝第二个皇帝——炀帝与高丽开战并打了胜仗,靺鞨渠帅度地稽(或突地稽)率部投降炀帝,被授予重要官职。这位靺鞨酋长入居柳城,同边界上的中国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

1 H. 比丘林,同前书,第72页。(译注:见《北史·勿吉传》。原文为“文帝诏其使曰……”。)

2 同上,第72、93页。(译注:见《隋书·靺鞨传》。)

① 《北史·勿吉传》。——译者

② 《隋书·靺鞨传》此句为:“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译者

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①

617年，各地人民起义，国内纷乱，度地稽被放回柳城，但是，途中遇到了觊觎帝位的叛将李密。“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度地稽后来被王须俘获，未几逃脱，返回罗芝¹。隋亡以后，度地稽继续为中国效力。据O. B. 沙夫库诺夫搜集的史料，“627年，度地稽击退了突厥部落对幽州的进犯，又立下战功，为此被授予左卫将军的军衔”²此外，还赐姓李氏，封蕃国公，即蕃地方的总督。度地稽死后，他的儿子拥有强大兵力，被任命为营州都督，拜右领军大将军。他着手修筑一条石路，把他的领地同中国连接起来。这条石路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靺鞨与中国的联系日益加强，同时也是为了便于使者来往^③。

676年，度地稽的儿子大破吐蕃，封燕国公^④。

看来，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河沿岸的古代遗址，凡是其居民已开始广泛采用本地矿石冶铁因而进入了真正的铁器时代的，都应当归属于勿吉或早期靺鞨部落。当时铁已成为制造劳动工具和兵器的原料而最终取代了青铜。

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已熟悉的奥西诺夫卡山岗的发掘得到证明。这里，在石器时代的两期地层上压着另一个文化层即上层，其中出有铁器。

1 同上，第72、92—93页。（译注：据《隋书·靺鞨传》原文，“王须”应为“王须拔”，“返回罗芝”应为“遁归罗芝”。）

2 O. B. 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史》（毕业论文），列宁格勒，1955年。（译注：见《旧唐书·靺鞨传》。）

3 同上。（译注：见《旧唐书·靺鞨传》。）

① 《隋书·靺鞨传》。——译者

② 沙夫库诺夫的材料，出自《旧唐书·靺鞨传》，但错误百出。其一，突地稽击退突厥犯幽州的军队，是在627年（贞观元年）之前。其二，“贞观初，拜右卫将军”，而不是“左卫将军”。其三，“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而不是“拥有强大兵力”。其四，关于“筑石路”一说，纯系对李谨行“为积石道经略大使”一语的错误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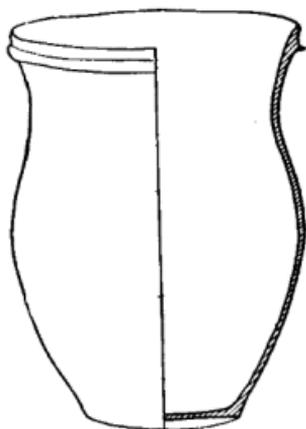
这个地层直接压在表土层下面，其中在灰化沙质粘土的上部，发现陶器残片，其形制和下面的新石器时代地层所出土的陶器不同。器壁为素面，口沿下有明显的附加堆纹一周。在土层下，还发现一些石块，好象构成一小块铺砌的地面。此外没有任何建筑物和住所的遗迹。然而通过进一步的发掘，却发现了木炭痕迹，经清理斂平，才看出这是烧毁的墙壁残迹。

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一条狭长的灰炭层自南至北通贯整个发掘面，然后转为大致作东西方向延伸。建筑物的墙角不是方角，而是圆角。灰炭层宽达十厘米。有些地方只有浅灰色的灰层，有些地方则含有保存极好的炭块。含炭层上下厚度为二十——二十五厘米。这显然是烧焦的木板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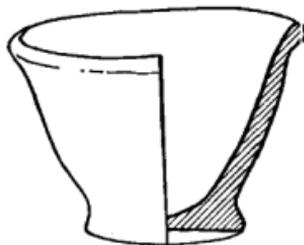
遗址清理完毕后，看出住所平面呈方形。面积约为二十平方米。基底掘入地下半米，打破了下面的两个文化层。居住面是平坦的，仅略有坑洼，可能与居住者的劳动有关。房子中央有一小灶，直径约四十厘米。灶已变成灰炭，轮廓象透镜形状，里面填满了烧成红色的花岗石碎块。

北墙跟下还有一个较小的灶，看样子与前者相同。但灶台平整，用石块砌成，也有火烧痕迹。彻底清理之后，才看出灶底平面是方形的。

居住面上未发现任何器物或陶片。其原因显然是室内经常保持整洁，垃圾和废物全都打扫干净，丢到室外。但是在靠近东墙的一个不大的袋状灰坑里十分意外地发现小型陶马两件，好象原是仔细地藏在这里后来被遗忘了。其中一件头部残缺，另一件在古时就已经被砸成两半。这可能是玩具或宗教雕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间被放弃的住所里，最好的器物都是埋在一处墙脚下（这同1954年在阿穆尔河上游卢仁基地方发掘一个地穴式住所时所见的情况相同）。这间住所是在火灾中烧毁的，因而能够十分清楚地



图五十七 陶罐。奥西诺夫卡铁器时代住所出土。



图五十八 陶碗。奥西诺夫卡铁器时代住所出土。



图五十九 象生雕像。奥西诺夫卡铁器时代住所出土。

查明房基的结构。

清除住所中的堆积并查明居住面之后，便对墙壁进行了清理。原来墙壁是由一根紧挨一根并排竖立的木棍构成的。木棍靠在穴壁上，发掘时已经烧焦。残墙高二十厘米至半米。木棍直径为十至十二厘米。

住所四角，有四个彼此对称的柱洞，直径

约为二十五——三十厘米。毁坏程度较轻的南部，柱洞保存得最好。这些柱洞大致呈圆柱形，洞底为碗状圆底。柱洞里填满了搀杂

灰炭的深色泥土。室内靠近中心的地方，也有四个柱洞，与上述柱洞完全一样，只是较浅。这四根内柱支撑着屋顶。因此，住所的支架共有八根立柱。

在住所被遗弃之后，一些陶器、铁矿渣以及本来在侧旁的石砌物的一部分便被冲到或扔到住所的中央。石块排列的形状象是灶石。在石块上面沉积的泥土里，有铁矿渣和一件表面磨光的薄壁平底容器残片。在同一深度，还发现许多同一类型的陶器碎片，显然属于同一时期。

由此可见，房屋本身或居住面的年代略早于这里的冲积物。但是出土的陶器证明，这个住所无疑是属于铁器时代的。

总的说来，奥西诺夫卡铁器时代住所的出土物是很有代表性的，器形属于同一个体系。全部陶器都是手制的，没有使用陶轮。大多数陶片属于器形富有代表性的细而高的容器。这些器皿都是薄壁的；根据阿穆尔河畔布拉戈维申斯克以上的铁器时代居址所出的类似的完整陶罐推断，器底为小平底。器壁上方三分之一作成鼓腹，近口沿处立即收敛成器颈。唇外侈，边沿饰窄条的附加堆纹一周。堆纹一般为尖棱，素面，有时被横划道截成锯齿纹。有一件陶器，其堆纹施有斜划道，模拟绳纹。陶片多为素面，没有磨光，略显粗糙。但也有一些表面磨光的容器，尽管打磨得比较草率。有一块大陶片带有“棋盘纹”或“乳钉纹”的痕迹。这是用刻有方格网纹的小拍子拍印的。另有一块陶片，其纹饰为倾斜的指甲纹组成的两条平行横带。还有一块陶片的纹饰也是平行的横带，其母题是倾斜的篦点纹。有一件小容器，只剩下一块连着器壁的平底残部，它的特点是器壁极薄。

有一件残陶器需要单独谈一谈。这是一件相当大的容器，只留下口沿残片。这个口沿作盘状外折，其独有的特点是双唇，即唇部被一道深槽分为上下两半。除小口深腹器外，这个遗址的居民

还使用形制古老的圆锥形小碗。碗底或附加小圈足，或仍为平底，仅外沿加厚，以使稳重。此外，还出有一件敞口浅碟的破片，其口沿略内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两件象生陶塑。根据其中保存较好的一件推断，二者都是陶马。雕像躯体修长，臀部浑圆；颈部高昂，是典型的马的形状；头部较小，已部份损坏，但其耳朵一只保存完整，另一只也残留一部分；马尾很短，但清晰可辨；腹下有四个圆突，代表短矮的马腿（图五十九）。

这两件雕像可能是儿童玩具，但也可能与萨满教有关，用在为马群祈福的仪式上。东北的古代居址里也发现过非常近似的象生陶像。在哈尔滨东北阿什河（阿拉楚喀河）河谷黄山地方，以及哈尔滨东南城高子和 Чэн (Шэнтунь)① 车站之间的地方，曾经出土过十一件这样的象生陶像。据 В. В. 波诺索夫的著录，陶像的塑造“很粗陋，看来也很草率。但全部经过焙烧”。据他推断，这些雕像是狗、鲜卑鼬、熊和猪的形象。

在波诺索夫发表的插图中，陶猪是清晰可辨的。另外，根据弯钩似地翘起的尾巴，也可以辨认出狗的形象¹。在娘娘庙遗址，发现陶熊和陶野猪各一件。特别是“野猪头塑造得维妙维肖，粗钝的猪嘴稍稍掀起，獠牙突出，两耳耸起。直竖的鬃毛使整个形象更加逼真”²。

在奥西诺夫卡住所的陶器中，还有一种浑圆的圆锥形小纺轮，

1 В. П. 波诺索夫：《哈尔滨市郊出土的史前雕像》，载《普尔热瓦斯基学会科学著作集》，哈尔滨，1942年，第59—60页，图1—9。

2 В. С. 马卡罗夫：Л. М. 雅科夫列夫在城高子车站与城车站之间遗址所获发现物描述，载《哈尔滨探险家与民族学家协会通报》，第8期，考古，哈尔滨，1950年，第19、20页，图版1，图17。

① Чэн (Шэнтунь)，音译为城（升屯）。蒙黑龙江省文物队张泰湘同志查阅有关资料后告知，哈尔滨东南无此地点，疑系“三家子”之误。三家子位于城高子和舍利屯之间，是一个小车站。——译者

也许是织机上的坠轮。

由此可见，勿吉或靺鞨部落经过六个世纪的发展，到了公元七世纪的时候，与前期比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Э. В. 沙夫库诺夫搜集的中国史料，“靺鞨同中国、高句丽以及邻近部落进行着频繁的实物贸易，经常充当中国、高句丽同北方诸邻部之间的中间人。靺鞨人供应白鹰、鹿、白细布、银鼠皮、貂皮、虎皮、熊皮、靺鞨骏马、鱼皮、角（应是鹿茸——奥氏注）、玉石、人参等等货物，以换取铁、兵器和生产工具。”¹

靺鞨已经有了犁耕农业；饲养马、猪。这时铁制劳动工具早已取代了石制工具，尽管拂涅部以东的部落仍然使用石镢。靺鞨人的社会无疑已是非常发达的父系氏族制度。当时很可能存在着阿穆尔河靺鞨部落联盟和松花江靺鞨部落联盟，甚至可能存在一个在“大莫弗瞞咄”即大酋长统辖下的所有七个部落的联合体。由此可见，到了公元七世纪，靺鞨部落已经发展到氏族制度的最高阶段，因而一旦具备了适当的条件，氏族制度便必然开始解体，向阶级社会过渡，同时也就演变为国家。

靺鞨部落同邻近的阶级社会的接触，同中国及朝鲜各国的交往，促进了它的古代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因为在中国和朝鲜，早已形成封建关系，并存在封建的生产方式。

靺鞨同中国及朝鲜的关系，不仅进行贸易。从他们的酋长度地稽的事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还直接参与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参加了中国和朝鲜之间的战争。

他们的父系氏族上层人物很乐于接受中国的习俗，甚至投附中国皇帝，为之效力。

1 Э. В.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

因此，无怪乎靺鞨部落不久便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后来称为渤海国。

渤海国的兴起

渤海兴起的历史，与公元七世纪远东政治局势的激烈动荡有直接关系。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朝鲜境内有三个独立的国家：高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中高丽最大，据有朝鲜北部和满洲东部；百济国土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丽国有五郡，共领城邑一百七十六座，人口四、五百万，境内多高山深谷，耕地稀少，居民终日辛劳仍不得温饱。但其营造术和冶金业却颇发达。

整个七世纪中充满了高丽、百济同隋唐中国之间残酷的流血冲突。另一个朝鲜国家即新罗则支持中国。

597年，中国皇帝隋文帝写给高句丽国王汤一封玺书，责备他非但没有竭诚履行隋室藩附的义务，反而暗中使用财货“利动小人”，召兵买马，准备战争。

文帝还说，汤“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聘奸谋，动作邪说，……常遣使人密覘消息”。

汤的罪名还有恶遇中国其他藩附。文帝写道：“而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¹

文帝以陈室的下场对汤发出威胁，陈室是582年被隋人灭亡的。文帝追述了陈军覆没的经过之后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①

1 И. 比丘林，同前书，第 II 卷，第 60—61、84—85 页；H. B. 克尤涅尔，同前书。

① 《隋书·高丽传》。隋灭陈是公元 589 年（祯明三年正月）的事。——译者

汤不久死去，王子元嗣立。皇帝授给元几个封号，并赐衣一套，但没有册封为王。后来文帝满足了元的请求，承认他是高句丽国王。可是，第二年，即598年，元就率领靺鞨骑兵万余人进犯辽西。

于是，皇帝发兵讨元，并诏令废黜他的王位。讨元大军缺乏粮食，疾疫大作，“王师不振”。然而，元看到中国军队逼近，十分“惶惧”，送出了一封谢罪书，自称“辽东粪土臣元”。自此他又被承认是高句丽的统治者，继续向中国朝贡¹。

605年，炀帝即位。炀帝征召各藩臣入朝觐见。元因“藩礼阙阙”，就是说要求独立，便“惧”而没有应召入朝。^①因此，611年中国发兵进攻高丽。这次进军无功而返。613年再次发兵，也遭到同样的结局。当时中国发生了杨玄感的叛乱。皇帝闻讯“大惧”，立即还军。614年，他征发全国兵力出征高丽。但是又遇到叛乱“蜂起，人多流亡”。皇帝只得满足于以下三项，即元有了屈服的表示，隋军有所俘获，拘留了高丽的使者。此后，“会天下大乱，遂不复行”²。

唐朝第一个皇帝^②登极以后，于641年派使者陈大德到高丽，收集其国内情报。篡位者泉盖苏文杀死前国王建武，篡夺了高丽政权。这时，中国皇帝找到了进攻高句丽并侵占其国土的方便借口。于是决定出兵，惩罚盖苏文“贼杀其主”的罪行。^③

645年开始军事行动。皇帝亲自出征。中国军队依靠猛攻，连下数城，直逼白崖城下。“其城因山临水，四面险绝。”经过一场

1 H. 比丘林，同前书，第 II 卷，第 62 页。（译注：见《隋书·东夷传·高丽》。）

2 同上。（译注：见《隋书·高丽传》。）

① 《隋书·高丽传》的原文是：“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入朝。元惧，藩礼阙阙。”——译者

② 应为“唐朝第二个皇帝”。——译者

③ 此事发生在公元 642 年（贞观十六年）。引文见《新唐书·高丽传》。——译者

鏖战，迫使该城投降。继而进取安市。高丽北部军队开来保卫该城，其中有靺鞨兵五万^①。对此，皇帝说：“彼若勒兵安市，而壁据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纵靺鞨略吾牛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夜间取城，^②中策也。与吾争锋，则禽矣！”高句丽将领高延寿不听避免决战的明智劝告，决定攻击中国军队。皇帝听到敌军出动的消息，说道：“虏坠吾策中矣。”高句丽人总是以精锐的靺鞨骑兵打头阵，皇帝便命令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攻击这支骑兵。突厥人与靺鞨人初次交锋之后，次日即展开决战，结果高句丽全军覆灭。皇帝下令释放俘虏三万人回家，取得战利品马牛十万头，明光铠七万领^③。被俘的高句丽将领都授给官职。只有靺鞨人遭到残酷的惩罚，靺鞨俘虏三千人全被处死¹。

650年，由于皇帝去世，战事暂告停顿。高句丽国王藏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的宿敌即中国的同盟者契丹实行报复，因为契丹时常侵扰靺鞨部落及高句丽。654年，藏率领靺鞨军队进攻契丹，取新城，但“因大风，更兼缺箭，乃返”。契丹人企图中途阻击，但是被打败。他们放起野火，再次投入战斗，但又吃了败仗：“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次年，即655年，新罗人控告高句丽和靺鞨夺了他们三十五个城邑，并呼吁“惟天子哀救”²。

盖苏文死后，他的儿子们自相争斗，被中国朝廷所利用，战火又重新燃起。

当时进攻高句丽，具备最有利的客观条件。高句丽五谷不收，

1 Ⅺ. 比丘林，同前书，第112页。（译注：见《新唐书·北狄·黑水靺鞨》。）

2 同上，第118页。（译注：《新唐书·高丽传》的原文为：“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战新城，大风，矢皆还激，为契丹所乘，大败。契丹火野复战，人死相藉，积尸而冢之。”奥氏所述不但引文有错，而且把胜败双方弄颠倒了，胜利者应是契丹。又，“新罗人控告高句丽和靺鞨夺了他们的三十五个城邑”，应为三十六城。）

① 《新唐书·高丽传》：“高丽北部靺鞨高延寿、南部靺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译者

② 《新唐书·高丽传》原文作“拔城夜去”。——译者

③ 《旧唐书》所载为明光甲五千领，《新唐书》为万领。——译者

百姓惊惶，“人相掠卖，地震裂，狼狐入城，蚘穴于门，人心危骇”¹。

由于兄弟阋墙而四分五裂的高句丽，国内流传着中国奸细们散布的险恶谣言，说是抵抗无益，因为有一本什么“秘记”^①说：“不及九百年（高氏于公元前 37 年建国），当有八十大将灭之”，即消灭独立的高句丽。当时中国大将李勣恰好是八十岁。

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军队和突厥人于 668 年占领了平壤，三万高句丽人被迁入中国²。

高句丽人试图进行最后的反抗，但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发卢河一役之后，俘虏被李谨行将军割掉一万只耳朵^②。自此“平壤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³。

就这样，高句丽国灭亡了。但是，不愿意服从征服者的人们逃入北方的靺鞨部落联盟之地，在那里找到了避难所。

于是，在粟末靺鞨境内，逐渐形成了未来的渤海国的基础。中国史书记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遁残稍归之。”⁴

1 同上，121 页。（译注：见《新唐书·高丽传》。）

2 同上。（译注：见《新唐书·高丽传》，事在公元 669 年。）

3 同上，第 123 页。（译注：见《新唐书·高丽传》。）

4 3. H. 马特维耶夫：《渤海》，第 13 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以下所述的渤海历史，主要参考文献为：

И. 比丘林：《中华帝国统计资料》，II，1842 年，第 II 辑，第 254—256 页。

И. 比丘林：《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第 II 卷，第 178 页。

В. 帕诺夫，同前书。

И. 波兹德涅耶夫，同前书，第 12—16 页。

3. H. 马特维耶夫：《渤海》，《国立远东大学著作集》，第 3 册，第 6 辑，符拉迪沃斯托克，1929 年。

3. B.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

魏特夫、冯家升：《辽代社会史》，《美国哲学学会会报》，新辑，第 36 卷，费城，1949 年，第 420 页。

① 指《高丽秘记》。奥氏说“高氏于公元前 37 年建国”，系据日本三省堂《最新世界年表》。查《高丽史·世家四》，高句丽建国在前汉昭帝始元五年，即公元前 83 年。——译者

② 《新唐书·高丽传》的原文为：“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再战，俘馘万计。”——译者

另一些中国史料载有渤海建国的详细经过。据说唐朝女皇帝武则天时期，契丹酋长李尽忠攻陷中国城市营州，任命高丽人乞乞仲象为该城长官。乞乞仲象当了营州长官之后，勾通靺鞨酋长乞四比羽，合力占领辽河以东疆域，在太白山（长白山）东北筑垒固守。唐朝武后看重他们的实力，便封以爵位¹，赐乞乞仲象以震国领地，赐乞四比羽以许国领地²。

但是，女皇帝招降二酋长的希望却落了空。

乞四比羽不接受女皇帝的建议，在同中国军队交战时战死。乞乞仲象则于696年李尽忠率契丹进犯中国北部时南渡辽河，占据长白山东北的地域，在奥娄河固守。此后，中国朝廷“承认他是享有震国公爵位的国王”³。

不久，乞乞仲象死。女皇帝派李楷固率中国兵前来征伐，乞乞仲象的儿子祚荣（大祚荣）因而受到中国军队的进攻。

祚荣向北撤退，来到他的族人居住的旧地，即松花江支流辉发河畔，从而免遭覆灭。后来，他击败了李楷固的军队。祚荣联合高句丽亡国后流落国外的残部，以及乞四比羽的靺鞨部，并把朝鲜北部、东北和滨海的夫余、沃沮、弁韩、朝鲜等国土地尽行并入自己的领土⁴。

据史书记载，祚荣的领土方圆五千里^①。这样，乞乞仲象的儿子就成了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他登上王位，自号震国王。这个国家后来便定名为渤海⁵。祚荣称王是在698年，当时女皇帝武后

1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14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2 Э. H.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第19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3 И. 比丘林：《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第II卷，第136页。（译注：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是乞乞仲象之子祚荣于“圣历中自立为震国王”。）

4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14—15页。（译注：见《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5 Э. B.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第21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① 此据《新唐书·渤海传》。《旧唐书·渤海传》作“地方二千里”。——译者

在位。

武后的继承者睿宗即帝位后，被迫承认祚荣是新建国家的首领，并且派遣大臣张行岌去见祚荣，以便建立友好的关系^①。睿宗甚致晋升祚荣为山东北部的渤海郡太守，尽管祚荣只是在名义上领有这个郡^②。

祚荣的政权仅仅达到辽阳以北，南面则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新建的国家后来称为渤海国（意即海边的国家），完全是由于渤海郡的关系。

祚荣派他的儿子到中国朝廷致谢。712年，睿宗皇帝遣使册立祚荣为渤海国君主，封渤海郡王。并授予“左骁卫大将军”及忽汗州都督的官职^③。

719年，祚荣死，谥为高王。死前不久，他在牡丹江宁古塔附近建立了京城，即上京城。

祚荣死后，其子桂娄郡王武艺继位。武艺兼并了原先独立的东北诸部落，扩大了渤海的疆域。中国皇帝对此只得认可，因为他无力阻挠渤海疆土的向北扩张。

渤海国国王自武艺起建立年号，定年号为仁安¹。这种举动是对中国的直接挑战。只有天子即中国皇帝才能有年号。

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渤海国首领对中国皇帝特权的僭越。武艺的行为使中国朝廷大为震怒。但是，中国人力所能及的唯一办法是把武艺定年号以后的渤海从自己的史书中勾销。自从“大突

1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14—15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① 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唐遣侍御史张行岌往招慰是在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封祚荣为渤海郡王在睿宗先天二年（713年）。——译者

② 渤海郡原是汉置，在今河北省沧县一带，唐置渤海县。唐睿宗给祚荣的封号是渤海的郡王，并非渤海郡的太守。——译者

③ 《旧唐书·渤海传》：“睿宗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往册拜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可见此事在唐睿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而且这时并没有册立祚荣为渤海国王。——译者

羽(武艺)自称为独立的国王以后,中国历史就不再记载渤海国的事了¹。

武艺借此公开表明,他已经不是中国朝廷的藩臣^①。为了贯彻与中国对抗并增强渤海国力的方针,武艺发动了战事,以征服那些仍然保持独立的阿穆尔河靺鞨部落。

726年,阿穆尔河靺鞨酋长倪属利稽派使者到中国。皇帝拜倪属利稽为勃利州刺史,以后又任命他为黑水州(即阿穆尔州)都督。武艺听到黑水靺鞨遣使和皇帝救命的消息,就对臣下说:“黑水途经我境,始与唐家相通。旧……皆先告我……,今不计会即请汉官,必是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

为了打乱阿穆尔河靺鞨同中国的种种策划,武艺决定派他的弟弟门艺、舅舅任雅率兵去阿穆尔河。门艺原在中国朝廷做质子,深知中国的实力。他担心与中国冲突会带来恶果,便在越过渤海国界并进入阿穆尔部落地域之前,给武艺写了一封信,试图说服他放弃向阿穆尔河的进军。门艺在信里写道:“黑水请吏而我击之,是背唐也。唐大国,兵万倍我,与之产怨,我且亡!昔高丽盛时,土三十万,抗唐为敌,可谓雄疆,唐兵一临,扫地尽矣。今我众比高丽三之一,王将违之,不可。”²

武艺受到弟弟的反对,大为恼怒,因而把军权转给从兄壹夏,召还门艺。同时密令斩杀门艺。

1 3.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18页。(译注:所谓自武艺自力为国王之后,中国史书即不再记载渤海事迹,这与事实不符。不仅武艺以后的事,《新唐书·渤海靺鞨传》屡有记载,而且开元七年(719年)武艺嗣立,就是由唐玄宗“赐典册义王并所领”。《新唐书·渤海传》只是说,“咸通时(860—874年),三朝献。……后朝贡至否,史家失传。”另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渤海王虔晃元年(当唐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至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即辽太祖元显元年渤海亡为止,年号失载。”又,本页“黑水途经我境……”的引文,见《旧唐书·渤海传》。)

2 同上。(译注:据《新唐书·渤海传》,这些话是门艺当面对武艺说的,“武艺不从。兵至境,又以书固谏。”)

① 见注1后的译注。——译者

门艺知道大祸临头，便逃亡中国。中国皇帝诏拜门艺为将军。渤海国随即派遣使者至中国朝廷，宣称门艺叛逆，要取回他的首级。皇帝密遣门艺到遥远的安西地方，一面告诉渤海郡王：门艺前来请求皇帝庇护，要杀死他为情理所不容，不过仍然把他驱逐了。皇帝还示意留住渤海使者，不让及时回国，回书经过鸿胪寺送去。但是，武艺得悉了真相，因而写信给皇帝说：“大国示人以信，岂有欺诳之理。……门艺……伏请依前杀却。”²¹

事过七年，武艺决定攻打中国，派将领张文休摧毁登州城。皇帝诏令门艺率领幽州驻防军前往登州援救。同时派军官金思兰前往新罗，令其通知中国的这个老盟国的国王：中国军队即将通过新罗国境，从南方进攻渤海。

然而这次出兵失利，因为冬季的酷寒和深厚的积雪使中国军队冻死一半^①。自此武艺对他的弟弟的怨恨更甚。听说门艺奉命调到了东都（河南府），武艺便雇用刺客截杀门艺。但是门艺急起自卫，刺客被擒受戮。

在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同时，武艺开始派遣使者聘问日本。据日本文献记载，727年，他派近臣宁远和军官高仁义去日本^②。船在海中迷失方向，停靠在 Мацмай 岛^③，当地人杀死了宁远和高仁义以及另外十六个人^④。幸存者只有八人，其中一人是使团成员高斋德。他们乘船至本州岛的出羽国登陆。出羽国首领把渤海派来使者的消息驰驿奏禀圣武天皇。于是日本京城遣使相迎，他向

1 3.H. 马特维耶夫，同上书，第19页。（译注：见《旧唐书·渤海靺鞨传》。）

① 此处所述与中国史书颇有出入。《旧唐书·新罗传》：“（开元）二十一年，渤海靺鞨越海入寇登州，时（新罗国王）兴光族人金思兰先因人朝留京师，拜为大仆员外卿，至是遣归国发兵以讨靺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仍令大仆员外卿金思兰往新罗发兵以攻其南境，属山阻寒冻，雪深丈余，兵士死者过半，竟无功而还。”——译者

② 高仁义的官职是“宁远将军郎将”，并不是另有一人叫“宁远”。——译者

③ 摘译为“松每岛”。——译者

④ 据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应为“仁义等以下十六人”。——译者

渤海人问明了情况，并以衣履相赠。728年1月，天皇在京都大极殿接见了来使。高斋德这时成为使团团长，他向天皇呈递了国书并且说：“武艺启：山河异域，国土不同，延听风猷，但增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开基，奕叶重光，本支百世。武艺黍当列国，监总诸蕃，复高丽之旧居，有扶余之遗俗，但以天涯路阻，海汉悠悠，音耗未通，吉凶绝问，亲仁接援，庶叶前经，通使聘邻，始于今日。”^①

接着，渤海大使向天皇呈献貂皮三百张（一说为豹皮三百张）。大使并说：“土宜虽贱，用表献芹之诚。”^②

据日本文献说，天皇大喜。他召高斋德等人入宫，授予官位，赐宴款待使节一行¹。

728年2月，天皇派遣朝臣引田虫麻吕聘问渤海郡王，随带国书一封，内容如下：“天皇敬问渤海郡王省启，……幸修曩好，朕以嘉之。宜佩义怀仁，监抚有境。沧波虽隔，不断往来，便因首领高斋德等还次付书并信物。”礼品有：彩帛一百十四匹，丝麻混织物一百十四匹，丝线二十四团，丝绳一百根。官员等人另以彩帛赏赐^③。4月，引田虫麻吕与渤海使者一行同赴渤海国。使团官员再次得到各种赏赐。

729年8月，日本使者返回本国。他向天皇作了报告，呈交了渤海国的礼物。这些礼物分给了各地的著名神社²。

738年武艺死后，他的儿子大钦茂袭渤海王位。他采取若干措施，与唐朝中国修好，向皇帝的朝廷遣使达二十八次。

于是中国朝廷就与渤海和解，并且“事实上”承认了这个国家

1 同上。（译注：见《续日本纪·十》。）

2 同上，第21—22页。（译注：见《续日本纪·十》，但年分有错，729年的事，应为730年〔天平二年〕。下文738年的事，应在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

③ 这些话其实是渤海国武王仁安八年（727年）致日本圣武天皇书的部分内容，全文见《续日本纪·十》。——译者

② 据《续日本纪·十》，《日本圣武天皇答武王书》中开列的礼品清单是：“彩帛一十匹，绫一十匹，纁二十匹，丝一百两，绵二百屯。”——译者

的存在。钦茂死于785年。^①族弟大元义继位,可是他在位仅仅一年就因暴虐多疑而被国人所杀。接着钦茂的孙子大华珣即位。华珣以后,还有过几任统治者。其中最杰出的是仁秀,他使北方诸部落都臣属了渤海。

渤海国起初只占有海岸迤西约一千里^②的一块不大的领土。国土没有正规的行政区划。

八至九世纪,渤海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繁荣昌盛起来,成为一个强国。国界南接朝鲜半岛的新罗,东濒日本海,西达契丹地,北括阿穆尔河。现在的滨海边疆区,至少它的南部(另据考古资料推断,还有苏昌地区),也曾是渤海的一部分。

A. B. 格列宾希科夫曾详细研究过中国史料,他对这个时期的渤海疆界,作了如下的描述:

“北界由嫩江口开始,沿松花江而下,至呼尔哈河口对岸的江左古城德理镇,再由现今三姓地方的上水处开始,走向东北,与松花江及阿穆尔河右岸平行,把乌苏里江口包括在内,经过哈巴罗夫斯克下水处,大约在北纬45°处到达日本海岸;由此往南的海岸线即为渤海东界,直到今天的朝鲜城市咸兴。”^③

渤海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即二等城市)。

唐代旅行家贾耽的笔记中说,渤海的首都位于忽汗(海)岸;忽汗河就是呼尔哈河(忽汗就是宁古塔西边的毕尔腾湖)^④。首都叫作上京或龙泉府,下辖三城:龙、湖、渤。南面是中京(现在的辽阳),下辖六城:卢、显、铁、汤、荣、兴。称为东京的京城位于貔、貂

1 A. B. 格列宾希科夫:《关于阿穆尔边疆区历史的考古学研究》,载《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学会纪念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16。

① 应为794年(贞元十年,渤海大兴五十七年,成王中兴元年)。《渤海国志长编·六》:“按钦茂薨于何年,唐书失载。……《续日本纪》载嵩璠致日本国书有祖钦茂卒于大兴五十七年之语,兹从之。”——译者

② 据《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应为二千里。——译者

③ 呼尔哈河即今牡丹江,毕尔腾湖即今镜泊湖。——译者

故地，下辖四城：庆、盐、穆、贺。南京在沃沮故地（现在的海城），它的府治下面有三个城市：沃、晴、椒。还有一个京城叫作西京，位于高丽故地，领有四城：神、桓、丰、正¹。

由此可见，渤海的政治和行政的中心，即它的首都上京（或可称为北方的京城）是在今日的宁古塔附近。后来国都迁到牡丹江岸的东京，地点在宁古塔和兴凯湖之间，就是说，又回到了靺鞨部落的故地。

在今琿春附近与牡丹江岸那个京城同名的龙泉府^①是当时的一个海港。渤海的船只从这里驶往日本、新罗和中国。П. 卡法罗夫认为，这个港口在波谢特湾地区²。

关于渤海城市的性质，可以从位于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畔，即在现今东京城地方的渤海东京^②的发掘结果得到了解³。

渤海的这个京都在松花江支流牡丹江边。平面作长方形或近正方形。东西长约四公里，南北稍短。四周有城垣，东段长三千九百一十一米，西段长三千三百三十三米，北段长四千五百零二米。墙垣保存尚好。各段都成直线，但是北段有一个长方形的突出部，长约一公里，宽近一百米。这个突出部的作用是专门卫护王宫。城垣是土筑的，高达三·六米；顶部平坦，宽不到一米。墙垣外侧垒石加固。四面城墙的中部都有与古时城门相应的豁口。

在城内北部，有一座内城，是宫殿的所在地。这就是所谓“禁城”。外城中央有一条大街，把城市分为东西或左右两部分。街宽八十七米，由外城南门通至内城南门。

1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 10 页。（译注：见《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

2 同上。

3 《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址的发掘调查》，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五册，东京，1939 年。

① 其实并非同名，牡丹江畔的京城是龙泉府。——译者

② 应为“上京”。——译者

这条大街两边，各有四条较窄的街道与之平行或直交。这样，整个城市便被规整地划分为棋盘式的几个“坊”。东半部的面积比西半部大。

牡丹江边这座古城的规整的平面布局，总体说来与唐朝京城长安的规划是一致的。仿中国制度建成的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其街道也是这种格局。东京城划分为东西两半和若干对称的街坊，这种设计同长安的平面布局也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地方仅仅是长安有一百四十个坊，而这里大约只有八十二个坊。这里的坊想必也跟长安一样，各有一个名称。



图六十 乌苏里斯克城附近绥芬河岸中世纪建筑物内出土的陶制怪兽头像(1957年发掘,修复品)。

城内当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现在的东京城可能就建在西市的旧址上，有一个“西地”的地名可以作为旁证。

内城另有城垣。城垣土筑，高达二米。有的地方可以见到石堆，证明城垣原是用石块垒砌墙面的。城垣东段长一千零六十米，北段长一千一百八十二米。

内城有南北两个城门。

发掘工作的重点是原先宏伟壮观的子城即禁城。宫殿建筑群四周有土垣，有些地段的土垣用石块砌面。面积为 545×656 米。

进入禁城的道路穿过宽六米半高八米半的壮观的南门。南门遗址还保存着前后三排平整的大础石。中排础石有一个特点，即各柱之间曾垒筑过石垣。根据石垣中断的间隔推断，城门里当有三个各宽约二米的平行门道。

走进城门，便是由南向北排列的重重宫殿。共发掘了六座宫

殿建筑的遗址。

其中一座规模特别宏大。这座殿建在一座台基上，台高二·七米，南北宽二十四米，东西长五十五米半。根据玄武熔岩础石的位置推断，大殿横列立柱十二排，纵列五排。台基四边用粗略打凿的长方形巨石作成护壁。台基的每一端及西段的中央，^①都有专门的阶梯，与殿门相应。在主台基的两侧，还有两“翼”，面积各为六平方米。此外，根据保留在原地的石柱础推断，大殿三面有特殊的“回廊”。

这座建筑物有一个出色的特点，就是在台基护壁的顶端置有雕琢精巧的石狮子头。此外，墙壁上部用花草纹砖装饰。大殿的地面原来是铺砖的，屋顶以瓦盖成，饰有绿色琉璃鸱吻。

殿门用华丽的绿色琉璃饰物为装饰。看来这是一座“会堂”，是举行隆重接待和正式典礼的地方。

在宫殿建筑群中，有王室的住宅和官署的宫殿。这里发现有抹泥的砖砌烟道，这是取暖系统——炕的遗迹。

内城东部有御花园的遗址，面积为 218×327 米，周围砌有石墙，高约二米。花园中发现一个枯池，池中心有两个人工堆成的小岛。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堆成的小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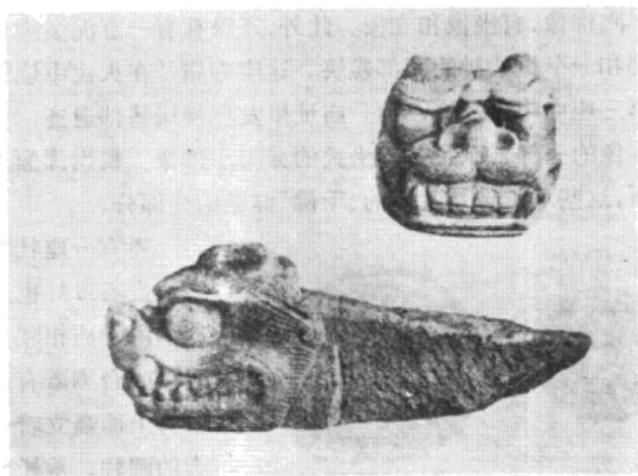
花园内曾有一些建筑，现尚存有柱础。其中一座是主要建筑，有几条柱廊由此向外延伸，柱廊尽头各有一座方形建筑。

枯池中的西岛高二·七米，发现有亭子的遗迹。这座亭子以绿琉璃瓦盖成，它的平面不是通常的长方形，而是八角形的，与法隆寺镜背上或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佛画上的建筑物一样。^②岛上有石桥与池岸相连。

另一个小岛上也有一座不大的建筑。两个小岛上的建筑遗迹

^① 应为“台基南边的两端及北边的中央”。——译者

^② 即日本法隆寺山居弹琴镜背的山亭图和敦煌佛画中的八角堂。——译者



图六十一 石狮子头。东京城。

中以莲瓣形柱础装饰特别有意思。屋顶也有华丽的装饰。屋檐及其转角处均饰有圆瓦当。这里的琉璃釉也是绿色的。

京城里除宫殿外，还有宏大的佛庙。中国史书说，渤海王朝的开国者祚荣曾派遣一个王子到唐的朝廷，请求允许引入佛教，设立寺庙。

共发现寺庙遗址六座。

其中一座建在台基上，台基中央是一座环有回廊的殿堂。这里有五尊神像的台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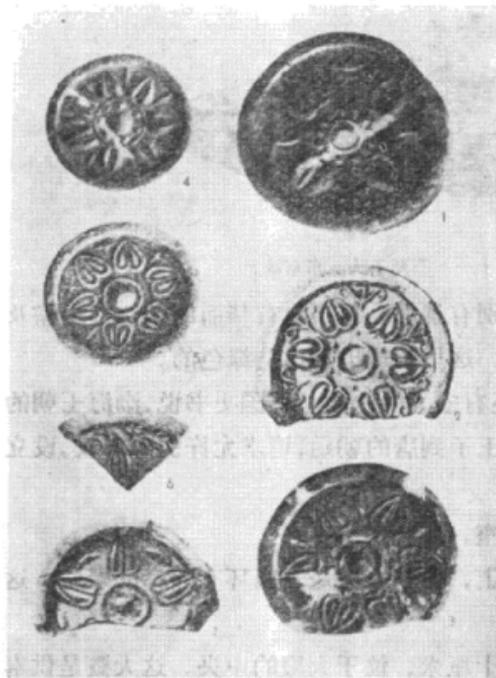
最大的神座高约三十厘米，位于大殿的中央。这大概是供奉至尊神像的坛座。两侧分设供奉其他神像的长方形或圆形的坛座。有两个坛座上面有凹穴，对照当麻寺^①金堂的同样凹穴，当是放置花瓶的地方。研究者认为，这座庙堂是主殿。在它对面，发现一些石柱础和瓦片，可能是“讲殿”的遗址。

另一座寺庙的废墟里出有神坛遗迹。神坛前面，发现一些不

^① 日本佛寺。——译者

大的赤陶佛像，有坐像和立像。此外，还保存有一尊泥塑佛像的若干残部和一个护法神的面部残块。这座寺庙是在火灾中烧毁的。

第三座寺庙也是烧毁的。庙址里发现神坛基部遗迹，一尊小型铜佛像的头部，以及若干坐式的赤陶小佛像。根据佛像上的铁钉推断，这些小佛像是常见的“千佛”群像的一部分。



图六十二 瓦当纹饰。东京城。

二块、圆形古镜二件¹。

由此可见，古代东京城辉煌的寺庙和宫殿，与渤海国当时的昌

还有一座壮观的石香炉或石罩灯也是同这些渤海寺庙相联系的。香炉的台脚雕有莲花。台脚上面矗立着一根粗大的圆柱，承托着莲花形的柱头。柱头上面是一盏透雕的石罩灯，罩灯上面是模仿瓦顶的石顶，中央有一个镂空工巧的尖顶，类似佛塔上传统的攒尖。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据从前的盛京省地理志记载，城内有一口石砌的八角水池。池内曾发现人骨二具、铁砧

¹ 伊藤清造：《新满洲国建筑史·四》，载《满蒙》1932年八月号。（译注：语出《盛京通志·卷二十八·宁古塔境内古迹》，并无《盛京省地理志》一书。所谓八角水池，应为八角井。）



图六十三 乌苏里斯克城地区考古遗存分布示意图(费多罗夫绘):

- 1——古采石场, 2——旧石器时代遗存, 3——古道,
 4——古城, 5——石像, 6——小城堡, 7——石龟,
 8——小城堡, 9——柱础, 10——龟趺(石龟上刻
 有铭文和龙图), 11——古城, 12——采石场, 13——
 小城堡, 14——新石器时代遗存。

盛和实力是完全相称的。

关于府治一类的城市的面貌, 可以从绥芬河谷的遗存中得到了解。这里保存着一些城市和城堡的废墟, 濠沟和修筑完善的大路的遗迹。在各个城址附近, 还有豪华的贵族墓地, 依照中国风俗, 墓地上置有巨大的石刻, 有人像和兽像。到处都可以找到古代

中国钱币、什物和武器。这些遗存绝大多数属于随后一个时期。但也有一部分可以归属于渤海时代，例如，原先存在于乌苏里斯克城地区而现在却几乎完全消失了的一座古城址，就是属于这一类。这想必是率宾城——渤海国率宾府的府治（图六十三）。城墙有敌楼、马面、护壕。古城内有明显的古建筑基址。这些建筑物是用坚硬的灰砖和蓝砖砌造的。屋顶覆瓦，瓦的里面保留着椽皮席子的印痕。个别建筑物占地面积竟达三百五十平方米¹。

后来，在这个渤海城址上新建了一座女真人的居址。古城的土墙加厚加高了。但是，城址里仍然可以见到个别早期的器物，例如有一种特别的铜权，形状象个厚圆盘，两面刻有象形文字和植物纹饰。

1953年，我们在原驻军花园的广场上一条偶然挖掘的沟里，在深约一米处，发现了一个古文化层。出土物有：瓷碗残片若干，与唐代瓷器相似；石圆盘一块，刻有象形字铭文；轮制灰陶器一件，已碎裂残缺。

根据大量的瓦片以及龙头雕像、石础和瓦当之类的建筑遗迹推断，古率宾城内也应存在过瓦顶圆柱的建筑物，尽管可能不如东京城那样壮观豪华。

这些建筑物是渤海贵族的宅邸、佛寺和堂皇的衙署。

滨海地区有一座规模不大但很雅致的建筑，是属于渤海时代的。这是一座庙宇遗迹，位于夹皮沟河谷中央的一座岗丘上，即在现今克罗乌诺夫卡村附近。Э. В. 沙夫库诺夫在这里发掘出一个平面为方形的建筑物的矮石墙，看来这是寺庙台基的护壁。护壁外面抹有石灰。此外，佛寺外面还有一道石围墙。寺庙周围，岗峦环抱，林木繁茂。渤海人显然曾在这里耕种土地。当时，在这一片

1 A. 3. 费多罗夫：《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城及其近郊的古迹》，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1916年。

葱郁的背景衬托下，从远处也能一眼望见这座庙宇。这庙是瓦顶的；檐瓦端头的装饰和古代东京城完全一样，是莲瓣团花圆瓦当；墙壁上有类似护墙板的装饰，纹样是螺旋形宽带纹。丘陵脚下，有一座巨冢，是用大块花岗石砌造的。墓主人想必是渤海贵族，寺庙是附属于巨冢的。关于渤海统治阶级——封建主的生活和文化，考古资料所提供的情况就是如此。

关于当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情况，渤海城市的发掘工作所提供的资料还很微少。根据东京城发掘报告，在城圈内开掘探沟，发现了一些竖穴，穴底呈方形或三角形。个别竖穴宽达三米。竖穴里填满了掺混灰、炭的褐色土，从中出土了纺锤、陶片、动物骨头和贝壳。在竖穴里也发现了釉色类似唐三彩的若干陶片。

这些竖穴应是手工业者和奴隶居住的地穴式住所遗址。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渤海统治者的壮丽宫殿、寺庙、花园和人工湖。

渤海居民主要从事农业。

农村居民种植高粱、豆类、谷物，饲养家畜，经营各种副业，包括狩猎、捕鱼和采集海带。据《唐书》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郑颍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绸，位城之铁，虑城之稻，涇沱湖之鲫。果有九都之李，乐游之梨。”¹

渤海人也进行贸易，其规模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中国和其他邻国把渤海的皮货，如貂皮、鼬皮、鹿皮、虎皮、熊皮，视为珍品。

关于当时村落的面貌，可以根据Ф.Ф.布谢和B.П.马尔加里托夫在舒范河谷发掘的几个住所遗址来加以判断。这里发现了取暖的三联火炕遗迹，以及铁制农具——铧、镰各一件。有一间住所出土石臼一件，以及槌、凿、炉和铁矿渣等锻铁业的遗迹。

1 O. B.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第40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1955年，远东考古队在科克沙罗夫卡村附近的古城内发现一间半地穴式住所遗迹。

渤海人的家庭关系中有一种很有趣的习俗，它证明妇女享有独立而崇高的社会地位。史书说，渤海妇女悍勇而嫉妒。她们结成十多个人的同盟，以便侦察丈夫的行动，不许丈夫纳妾。一个女人如果对自己的丈夫没有这种猜疑，就要遭到大家的鄙视¹。

关于渤海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目前尚不甚清楚，不过可以肯定渤海有奴隶。

当时存在奴隶一制，有中国史书的记载为证。史书说，渤海国的使者带来男女奴隶若干人。在大历年间（776—779年^①），渤海使者曾有一次向中国朝廷进献日本舞女十一人^②。925年，渤海人又以年轻的男女奴隶进献中国皇帝³。

渤海人的奴隶是从对北方诸部落、日本列岛、朝鲜和辽东进行劫掠性攻伐中俘获的。

同中国一样，也可以把罪人籍设为官奴；官府驱使他们从事修路、筑城、开矿和采石等各种官营工程。

同时，在渤海还存在着对主要的直接生产者农民的各种封建剥削。这是必然的，因为渤海国的兴起和发展同中国和朝鲜有紧密的关系，而那些地方早已存在发达的封建关系了。渤海人从这些国家吸取政治、经济和生活方面的各种因素，想必同时也接受了与本国极为发达的农业经济相适应的封建剥削形式。

史籍中提到的所谓“无姓者”是很值得注意的。“无姓者”是居民中的下层，和贵族不同，他们除了使用渤海名字之外，没有再加

1 兀·波兹德涅耶夫，同前书，第15页。（译注：见南宋初年洪皓：《松漠纪闻》。）

2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19、20页。（译注：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

① 应为766—779年。——译者

② 见《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译者

上中国姓氏的崇高权利，即不能假冒属于中国传统的“百家姓”之列。例如，高、张、杨、突、乌、李等等，都是贵族的姓氏。

渤海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属于“无姓者”的范围，他们与自持出身“高贵”的贵族之间隔着门第的高墙¹。

渤海的国家机构完全仿效当时中国封建国家的制度。渤海贵族各方面无不以唐代中国为楷模。国家首脑称为“郡王”或“王”（渤海郡王）。据中国史料所载，“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主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贵妃，长子曰副王。”^①这些都同这类高贵人物的中国称谓相符。

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王命具有“法律的效力，没有他的批准，什么也不能实行”。

文官职掌庶政。最高官员是“左右”二相。二相典领六部。左相典领的三部是：义部、仁部、刑部。右相典领的三部是：智部、礼部、忠部^②。

依照中国宫廷的惯例，官员入朝必须随带表明权柄和品位的标志，穿着礼仪制度规定的服装。一、二、三秩的官员朝见国王，必须身穿紫衣，手持记录王命的牙笏，玉带上佩带金鱼。四、五秩的官员穿绯衣，带牙笏、银鱼。六、七秩的官员穿浅绯衣，八秩官员穿绿衣。他们也持带记录王命的大笏²。

军事方面，置有将军等职，其制度同文官一样，分为两组：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

渤海国同邻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1 ③. B.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译注：见洪皓《松漠纪闻》。）

2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 17 页。（译注：见《新唐书·渤海传》。）

① 语出《新唐书·渤海传》，奥氏所引的俄译文对中文的断句大误，应为：“俗谓王曰可毒夫，曰圣主，曰基下，其命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译者

② 此说与我国史书所载不符，《新唐书·渤海传》称：“政堂省大内相一人，居左右相上，……左六司忠、仁、义部，……右六司智、礼、信部。”——译者

除了中国以外，渤海人还向日本朝廷遣使聘问，尽管当时赴日本的海路是艰难险恶的¹。

例如，739年，平群广成由中国返回日本。据他报告说，归国途中，于海上遇险，飘至昆仑岛，乃决定从登州入海，取道渤海国。在日本海中又遇风暴，一船倾覆，四十人丧生，其中一人是渤海国的大使。

773年^①，日本派遣使者武生鸟守去渤海。一行在海上遇暴风，被吹到能登国，及至岸边，人船俱没。776年，渤海使者又遇恶风，桅折帆落。一百二十人淹死，幸存四十六人。796年又是如此，渤海使者一行海中遇险之后被狂风吹着虾夷岛；复在该地遭到盗寇袭击。他们各自奔散，使者身边只剩数人，几翻周折，始抵出羽国^②。

764年，日本官员镰束为渤海使团送行，在海上遭遇风暴。镰束命人把妻子、婴儿、乳母、中国学生高某及优婆塞戒融抛到海里。他说：“大海起风浪，是因为船里有女人和不象男人的优婆塞。”可是，风暴却愈来愈猛，九天以后，他们才飘著隐歧岛^③。

渤海人聘问日本，通常都给日本天皇带去国书和礼物。例如，739年，他们赠送日本天皇熊皮七张，貂皮六张，斧三十把，蜜三十升，并呈递了郡王的玺书^④。

渤海使者多在日本受到礼遇和尊重。日方供以膳食和各种日需用品。天皇赠以礼物，为客人举行盛大的接见仪式和宴会、竞技、

1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21—40页。（译注：参见《续日本纪·十》。）

① 据《续日本纪·十》，应为772年（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三年）。——译者

② 此事发生在公元786年（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五年）。——译者

③ 此说与日本史书所载不符。据《续日本纪》，此事发生在镰束护送渤海使者回国事毕返回日本的途中，被抛入海中的是由唐朝回日本、路经渤海、“相随归朝”的日本学生高内弓及其妻、子并日僧戒融共四人。——译者

④ 据《续日本纪·十》，这年渤海使者带给日本天皇的礼品是“大虫皮、熊皮各七张，豹皮六张，人参三十斤，蜜三斛”。——译者

和舞蹈。日本也派遣回访使者，携带礼物去渤海国。

例如，761年，日本派遣官员一名随返国的渤海使者去渤海国。他给渤海郡王带去的礼物有：绢二十四匹，纁三十四匹，丝二百绚，绵三百屯；“殊嘉尔忠，更加优赐锦四匹，两面二匹，采帛四匹，调布四匹，白罗十四匹，丝三百绚”。^①渤海使团的成员往往得到日方的各种封赏。

可是聘日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几次，日方认为渤海使者及渤海郡王不遵礼节，对天皇陛下有失恭敬。日本对这类事情的介意不在中国之下。772年^②，渤海使者一行三百二十人携带礼品与贺表向天皇恭贺正旦。但这次郡王的表函下签署的不是封号和姓名，而是“天孙”二字，违背了常例。日方指责其措词傲慢，退回了表函。使者随即请罪，恳请准予以郡王名义修改表文，这事才算了结。

关于这次聘问，还有另一种说法：

“依渤海旧例，凡聘使中有品位的人，都登入表册。这次聘使表册中，发现某些低级官员姓名的末尾字眼冒犯先皇名讳。于是，使者被指责为污辱天皇。使者壹万福异常惶惧，请求改字。天皇诏令准予修改文字，并且表示了宽恕。772年2月，天皇将致郡王的礼物和国书交使者带回。国书中写道，如果郡王想保持良好关系，就不得对天皇不敬。”^③

① 据《渤海国志长编》，应为：大兴二十二年（759年），渤海遣使赠日本天皇“土毛绢三十匹，美浓纁三十匹，丝二百绚，绵三百屯。殊嘉尔忠，更加优赐锦四匹，两面二匹，纁罗四匹，白罗十四匹，彩帛三十匹，白绵一百帖”。——译者

② 应为771年（日本光仁宝龟二年）。——译者

③ 所谓两种说法，其实是一回事。《续日本纪·廿三》载772年日本光仁天皇致文王书：“……今省来书，顿改文道，日下不注官品姓名，书尾虚陈天孙僭号。远度王意，岂有是乎；近虑事势，疑有错误。故仰有司，停其实礼。但使人万福等深悔前咎，代王申谢。朕矜远来，听其悔改。王悉此意，永念良图。昔者高氏之世，兵乱无休，为假朝威，被称兄弟，方今大氏，曾无事故，妄称舅甥，于礼失矣。后岁之使，不可更然。若能改往自新，实乃继好无穷耳。”——译者

828年，日方甚至不允许渤海人入京。日本人赏赐他们礼物之后提出，他们来日本通聘，至多只能十年一次^①。后来，日方又多次向渤海来使提出责难，说他们先期入觐。

872年，日本京城内外疫病猖獗。众人认为这是异域带来的毒气所致。为此各寺庙设醮修禳。天皇也不敢在宫内接见使者。

但是，渤海对日本的聘问并没有停止。

渤海创建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成为其对外称雄的可靠支柱。渤海军队对朝鲜和日本举行过大胆的海上进军，使那里的居民惊恐万状。有一句古代谚语，说渤海人“三人当一虎”^②，就是和这几次的侵袭有关系的¹。

渤海人最喜爱的游戏是马球。这种马上竞技和吉尔吉斯人及其他草原民族的“抢羊”类似，是旨在对渤海男性居民进行军事训练的体育活动之一。

中国朝廷力图把渤海的统治者置于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并且认为，渤海郡王是中华帝国的藩臣。实际上，渤海对中国皇帝的依附，从来没有超出形式上的册封。他由中国皇帝册立，死后由中国皇帝授予谥号。这样的相互关系，对于一个在古老的大帝国边陲兴起不久的新国家的首脑说来，是只有好处的。野蛮人所称羨的中国封号能够提高渤海统治者在臣民中的威望，加强他对邻族的影响。

渤海拥有当时的高度文化。渤海文化基本上是从中国吸取的，但是在许多方面有其特点。东京城的发掘，乌苏里斯克城地区的文物，使我们对于渤海国十分发达的营造术和建筑学，对于渤海

1 瓦·波兹德涅耶夫，同前书，第15页。

① 所说与日本史书记载不符。据《续日本后纪·十一》，先是826年（渤海建兴八年），日本约以每十二年通聘一次。因此，828年，渤海遣使聘日时，“从界末却回”，“不得入觐”，日方坚持要渤海遵依前约，“年满一纪后许入觐”。——译者

② 洪皓：《松漠纪闻》。——译者

工匠的艺术和技术成就，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有不少是可以同他们的中国及朝鲜老师的工艺相比美的。

渤海工匠的制品，最常见的是建筑物的装饰。这主要是屋瓦，有盖屋顶的板瓦，盖屋檐的筒瓦，盖屋脊的长方形平瓦。瓦为深灰色。瓦的里面都有粗麻布的印痕。屋檐的半圆形瓦当饰有印纹；屋顶的正脊和垂脊饰有绿琉璃釉的怪兽头像。整个屋顶为深灰色，屋脊和饰物则是绿色的。

屋檐圆瓦当饰四、五、六、七瓣莲花图案。在中国及朝鲜北部新罗国境内，当时的建筑物也是以这样的装饰物为特点。在渤海，最常见的是六瓣莲花纹。

渤海人用于建筑的砖，分为长方和正方两种。长方砖为深灰色。一面有时有草席印痕或浮雕的植物纹。这种砖看来是用于装饰高大建筑的承重石墙的上部。

个别的方砖也有纹饰。花纹是八瓣团花，四边环绕着四朵六瓣的花，四角各有一朵四、五瓣的花。所有花朵都有茎叶。有的砖在角上印有“典和屯”三个字的阳文款识。推测这三个字是表示造砖的地点。这种莲花砖的图案在唐代中国，以及在当时的朝鲜、日本，都是极为流行的。

最为夺目的屋顶装饰是一种称为“鸱吻”的怪兽形象。无论宫殿还是寺庙，屋顶上都饰有一对这样的塑象。它的质料是焙烧后变为灰白色的粘土，表面挂绿釉。东京城废墟里没有找到完整的鸱吻，但是根据残部可以看出，它的形状是突眼而有翅。在日本河内郡高井田鸟坂的寺庙遗址里，曾有类似的雕塑出土。这种雕像的母型见于中国唐代遗存。

屋顶垂脊下端，有另一类怪物雕像，即所谓“鬼瓦”，这是陶制的鬼脸或龙首，龙头均作大眼圆突、长角蜷曲、毗牙裂嘴的形象。

装饰柱础的陶圈是一组特殊的陶制品。陶圈挂绿釉，有的有

字,意思是“马”。除素面的陶圈外,也有饰以莲瓣纹的。

前面已经提到,石雕的狮子头是体积最大的一种发现物。东京城的一座宫殿台基前面布列着五个石狮子头,在台基左翼的东侧也发现几个,另外在台基以南发现一个残件。这些雕像具有强烈的图案风格,特别突出粗大的獠牙和咬紧的牙齿,以及圆睁的大眼和宽大的鼻孔,还细致地表达了一绺一绺的卷毛。

金属器物主要是和建筑的木结构部分有关的东西,如截面为方形的铁钉、门轴箍和门抱角。后者饰有缠枝卷叶的花草纹和图案化的野兽纹。武器有箭镞四件。其一作凿形,余为树叶形,叶铤之间均有折肩。

陶器有挂釉和不挂釉之分。唐代典型的釉为绿、褐、黄三彩。与唐朝陶器相同的渤海釉陶大概是从中国运来的,但是这种陶器渤海也能制造。例如,中国史料报导,691年渤海曾向中国皇帝进献精美陶器。^①不带釉的陶器呈黑色,器壁薄而坚硬。按器形可分为罐、壶、碗和深腹杯。还有火候极高的红褐色陶片。全部陶器都是轮制的。

渤海陶器的纹饰,其突出的特点是一种较宽的弯曲带纹,带纹内填以特殊的篦纹。这种纹饰的制作技术和结构组合近似公元七—九世纪米努辛斯克古墓中以及蒙古突厥时代的同期遗存中出土的所谓黠戛斯式瓶。

宗教艺术品有佛教的小雕像,以佛像为主。大部分佛像都是用同一种常见的方法制作的,用专门的印模子印压出来。也有青铜和铁铸的佛教雕像,其中包括观世音菩萨像。中国史料提到,814年进献中国朝廷的“贡物”中,有金银制的佛教雕像。除了小

^① 《杜阳杂编·卷下》载:“武宗会昌元年渤海贡玛瑙槽、紫瓷盆……。紫瓷盆盈容半斛,内外通莹,其色纯紫,厚可寸余,举之则若鸿毛。”这一年是公元841年。奥氏把“武宗”误认为武则天,而把会昌元年(841年)擅改为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年)。——译者

型佛像以外,在各个寺庙里还发现有大佛像的残迹,如螺发、宝髻、衣褶、瓔珞。此外还有壁画残迹,画在草拌泥的墙面上。内容是佛教神像和花朵,与敦煌“千佛洞”壁画基本一致。

在宫殿废墟中出有各种小型物件,其中有浅蓝色玻璃珠,一件玻璃瓶碎片、一件浇铸植物纹装饰品的青铜范和铁剪等等。

石制物有佛教窣堵波的顶盖和大理石制的兽头形器足等,这类宗教雕像是唐代中国的典型器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件金属制的骑士像。其中一件酷似中国唐墓出土的骑马俑。工艺精湛,富有写实性。另一件却很简略,骑士的形像仅用马背上的一根小棍来表示。

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博物馆里,也藏有这样的骑士像。这类小雕像可以称之为鞑靼式雕像。

渤海不仅以灵巧的工匠而著称,而且以作家、诗人、学者等文人而闻名。渤海国人普遍使用中国文字,珍视中国典籍。

武艺的儿子大钦茂和中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之后,便请求中国皇帝玄宗送书给渤海,包括《唐礼》和《三国志》¹。

起初,渤海的几代郡王曾派遣青年人到中国京师长安学习中国语文、文学、古今制度。据И·扎哈罗夫收集的材料,831年,从中国学成归国的渤海人,一次就有一百五十人之多²。其中许多人通过相应的考试,甚至获得了中国的学位。

后来,渤海国内也在寺院附设乡塾。相传不识字和不会射箭

1 Э.В. 沙夫库诺夫,同前书。(译注:《玉海卷一五四·朝贡类·锡予外夷》:“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

2 И.扎哈罗夫:《俄满大辞典》,圣彼得堡,1875年。(译注:《新唐书·卷二二〇·新罗传》云:贞观二十二年,“遣子文王及弟伊赞子春秋来朝,……。又诣国学观释奠、讲论,……。玄宗开元中,……又遣子弟入太学学学术。……开成……五年,鸿胪寺籍质子及学生岁满者一百五人,皆还之。”此系新罗之事,并非渤海事;事在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应为一百零五人,不是一百五十人,而且这一百零五人并非全是学成归国的。扎哈罗夫用的材料,当出自《满洲源流考·卷十七》,作了错误理解。)

的人都不准成婚。于是，使用中国语文的学校和本国学者就在渤海陆续地出现了。其中一个就是渤海人裴颀。这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曾在日本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裴颀曾两次出使日本。第一次赴日是在882年，日本史书记述了他在日本受到接待的情形：

“裴颀大使既是硕学卓识，天皇乃敕命著名文士菅原道真与之交往。彼等相互极为爱重。天皇陛下并赐渤海大使御衣一件。嗣后使者一行归国，天皇复委该使者以礼物及玺书转达郡王。”

裴颀第二次赴日是在895年，他又见到了菅原道真：

“别后重逢，皆大欢快，设宴相邀，即席而赋。”

裴颀死后，他的儿子裴璆于908年出使日本。日方对裴璆的接待，一如对其父那样尊重。在京城为他设宴，天皇赐御衣一件。

“六月，朝臣藤原诸葛奉天皇敕令至鸿胪馆，将国书、敕书及礼品递交渤海来使。既而，召众文士会于鸿胪馆，为使节一行饯别。裴璆为裴颀之子，而淳茂恰系道真之子。‘淳茂诗言及先人时事，璆读而感泣，淳茂与璆两世邂逅，世以为奇。’^①”

裴氏以前的渤海使者也都是博学多才的人物。例如739年，^②天皇为接待渤海使者，在宫中赐宴，并且和使者同观群臣射箭。渤海大使则在日本人面前表演了音乐方面的才艺。

759年，渤海使者一行二十四人到达筑前。进京后，“朝臣太保藤原在舍中宴请渤海客人，约集著名文士作陪。他提议即席赋诗。天皇赐女乐为宴会助兴。席间，宾主赋诗、吟诵，并且合唱歌曲。”

872年，出使日本的一个渤海使者酷爱诗歌，时常约集文士学者来宾馆吟诗，他自己则奏乐以饯诗友。¹

通常鄙视“东夷”的中国文人，对于渤海的文化，都予以应有的

① 《大日本史·卷二百十四·文学·菅原淳茂传》。——译者

② 据《续日本纪·十》，此事在740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译者

1 3. 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22、27、28、30页。（译注：以上有关裴氏等事迹，与《大日本史》等所载在文字上有出入，故而无法直引原句，只能按俄文译出。）

评价。在邻近诸部落的原始生活的背景上，渤海文化的成就显得格外突出。渤海真不愧是一个“海东盛国，一个富有教化和学者辈出的国度”¹。

可见不仅满洲和滨海诸野蛮部落中发生的早期阶级社会，而且这些地区的文明的高度繁荣，都是与渤海相联系的。

后来，渤海强盛的国势被契丹部落所动摇，以至消灭。

以畜牧为业的契丹人自古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分为许多细小的氏族，在历史上曾长期未能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在魏朝^①时归附中国，后来又归附突厥，最后在唐朝时又重新臣服于中国。

公元九世纪，中国势力衰微，契丹就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时，契丹的八个游牧部落组成了一个联盟。联盟首领由其中一部的大人担任，每三年轮换一次。如果全盟遇到大灾，如畜群衰毙或作战失败，就要提前换掉首领。这时，全盟首领的权位标志——旗和鼓——便传到继任者的帐里。中国史料记载，遥辇（或称沁丹）大人担任首领时，契丹多次被据有幽州的中国人刘仁恭击败。众人把失败归咎于首领，罢了遥辇，于901年推举大贺部大人安巴坚（或称阿保机）担任契丹联盟的首领²。

安巴坚是一个雄劲强勇的首领。他征服了邻近的部落：北边的室韦，南边的奚，喀尔喀的靺鞨。

过了三年，安巴坚违反惯例，不肯交出联盟首领的权柄。他的借口是，中国的皇帝不是替换的。安巴坚怙勇恃强，把持政权九年之久。最后，“诸部共责谗之”，他再也压制不住了。

1 B. 哥尔斯基：《满洲朝廷的开端与初期业绩》，载《北京俄国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I卷，1852年，第23页。

2 B. П. 瓦西利耶夫：《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地区的历史与古迹》（附录有关契丹、女真和蒙古靺鞨的中国文献的译文），圣彼得堡，1857年。（译注：据《辽史·本纪第一、太祖上》载，阿保机属于“迭刺部”。）

① 应是“北魏”。——译者

他与诸部大人为此而发生冲突，结果安巴坚的部落脱离联盟而自立。《辽志》中记载，安巴坚传旗鼓给继任者时说：“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乃别自立一部，以为汉城，可乎？”¹ 诸部同意，他就天山以东的流阿里河畔建造了一座中国城。^① 该城建成之后，安巴坚开垦农田，设置廛市，从事盐铁生产。

后来，安巴坚重新取得了统率契丹诸部的权力。这一次是强行夺取的。据中国史料记载，他的妻子述律劝他派人通告诸部大人：“我有盐铁之利，诸部所食。然诸部知食盐之利，而不知其盐有主人可乎？当来犒我。”诸部同意，带了牛、酒来到盐池。但安巴坚却设了伏兵。等众人烂醉之后，伏兵跃出，尽杀诸部大人。安巴坚独揽了契丹的统治权，坚决推行他的历届前任早已奠基的对外侵略政策。

据《辽志》说，居住在东北面的“诸夷皆畏服”了，但安巴坚并不就此满足。他发动了和中国本身的斗争²。

契丹首领拥有一支由游牧人组成的精锐骑兵。在行军途中，中军前方及左右两侧有三支庞大的侦察部队。遭遇敌军时，为了保持战马精力，在原地静待敌军接近。在战斗中，常用伏击战术，力图首先夺取粮草，在上风处向敌军放起燎原野火。“退败无耻，散而复聚，寒而益坚，此其所长也。”³

中国政局的动荡和国力的衰弱为安巴坚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种种计划提供了条件。在中国，强盛的唐朝于907年灭亡以后，便开始了混乱和改朝换代的时期。905年，安巴坚率兵十万侵入中国，

1 B.П. 瓦西利耶夫·同前书，第177—178页。（译注：“诸部共贵诰之”及“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的引文，均见古今逸史本《辽志·并今部落》。）

2 同上，第177页。（译注：见古今逸史本《辽志·并今部落》。）

3 同上，第80页。（译注：见《辽志·兵马制度》。）

① 《辽志·并今部落》的原文是“汗城在炭山东滦河上”。——译者

破坏了许多城邑，掳走生口六万五千带回契丹地^①。他强迫俘虏修建城廓。916年，安巴坚西征突厥，掳生口一万六千。同年，安巴坚称帝。917年至922年之间，他多次侵袭中国，都是获胜而归。这时中国国内一片混乱，大批中国人逃亡到契丹地。他们在这里传播文化，建造城邑，引进各种工艺和学识。中国人韩延徽当了安巴坚的顾问，为建立中国式的国家典章制度作了许多努力。据史书说，韩延徽规定了国家的体制，营建了都邑，奖励务农和经商，设置了官署，制定了官员的名分，创造了契丹文字（是三千个简化了的汉字）。他建造了若干寺庙，允许释、儒、道三家进入契丹。这样，契丹人便仿效中国人和渤海人的榜样，迅速地掌握了文明¹。

从947年起，契丹国家采用中国名称——辽。它沿袭渤海制度，设置五座京城。

926年，安巴坚击败渤海人，夺取了扶余城。随后又包围并攻下了渤海王城忽汗州（“上京”），俘其王大湮谩。在渤海被占领的国土上，建立了一个藩属的东契丹王国，即东丹国。安巴坚长子图欲（人皇）立为国王。渤海王城改称天福，成为东丹国的京城。大湮谩连同其族属被迁徙到天福以西²。

可是，渤海王位的继承者大光显却宁愿投奔高丽，带去了几万人。大光显附入高丽宗籍，取名王继。他的僚佐也各按品位获得了田地和宅邸^②。

尽管渤海遭到破灭，政府投降了敌人，叛卖了国家，可是，即使在这种民族灾难之后，很多人仍然坚持反抗契丹。就在926年的

1 同上，第14页。（译注：见《契丹国志卷一·太祖纪》及《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一》。）

2 同上，第16页。（译注：见《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① 《辽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称，唐天祐二年（公元905年）“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及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奥氏所说可能即指此事。——译者

② 事见《高丽史·世家卷二》。——译者

3月和7月,渤海人曾两次起兵抗击侵略者¹。

据魏特夫的看法,这种举动是对放弃斗争的前渤海当权者迅速降敌的抗议。

为了彻底平息渤海人的反抗,契丹人不仅把渤海的王族和贵族移送到皇都,而且还着手把大量平民迁徙到其他地区,即上京和中京。对于留居原地的居民则实行严密的监视。驻扎在契丹国东部的警备部队占辽国政府这种兵力总数的一半²。

然而,在满洲东北部和乌苏里边疆区南部,渤海人仍然保留了一片领土。其中显然包括率宾城。直到女真人崛起之前,这个城市一直是独立的。

居住在阿穆尔河沿岸和满洲北部的靺鞨部落,一般地说都是不依附于契丹的。他们与契丹仅保持贸易关系。

渤海使者照旧聘问中国。他们在929,931,932,933,936,937年都到过中国朝廷。渤海与契丹之争于十世纪三十年代波及日本。

930年,渤海使者一行九十四人^①到达日本。为首的仍是裴颀的儿子裴璆。天皇派官员询问他们访日事由。裴璆自称是契丹国大使,并说:“尽管他和其他渤海人臣服了契丹,但实际上是仇恨契丹的。”使者们咒骂契丹人。日方官员把以上情由奏禀了天皇。天皇诏令转告渤海大使:“朕闻渤海之于契丹,世仇之国也。今汝怀二心,朝秦暮楚,为人臣者岂一日如此乎哉?”^②继而将大使遣返回国。

自此,渤海人对日本的聘问就完全断绝了³。

1 魏特夫,同前书,第404—405页。(译注:见《辽史卷二、太祖本纪》。)

2 同上,第404页。

3 3.H.马特维耶夫,同前书,第28页。(译注:《渤海国志长编二》在延长八年条下注云:日本全史于此文下云裴璆因奉谢状,即释放还,此后朝贡遂绝。)

① 据《扶桑略记、廿四》,应为九十三人。——译者

② 见日本史料《续本朝通鉴·三》。——译者

975年，在契丹所占的渤海国土上爆发了起义。为首的是一个渤海将领。起义者被辽国军队击败，但其首领没有被俘。

渤海人在斗争中力图依靠中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朝的皇帝在一次出征中来到幽州城下。该城长官大鸾河出城觐见，向皇帝表示忠诚。随行者有军官十五人，骑兵卫队三百人。皇帝赐以渤海“都指挥使”的官衔¹。

直到981年，即安巴坚进攻渤海后五十五年，渤海国的残余力量仍然存在。它甚至还有相当的实力，因而宋朝皇帝准备出兵征讨侵犯北境的契丹人时，决定吸收渤海人参加联合的军事行动，以便粉碎共同的宿敌。下面是他写给渤海人的一封信的简要内容：“太平兴国……六年，赐乌舍城浮渝府（即扶余）渤海瑊府王诏曰：‘……盖兹北戎，非理构怨，辄肆荐食，犯我封略。一昨出师逆击，斩获甚众。今欲鼓行深入，席卷长驱，焚其龙庭，大歼丑类。素闻尔国密迹寇仇，迫于吞并，力不能制，因而服属，困于宰割。当灵旗破敌之际，是邻邦雪愤之日。所宜尽出族帐，佐予兵锋，俟其翦灭，沛然封赏。幽蓟土宇，复归中原，朔漠之外，悉以相与。曷乃协力，朕不食言。’”²

1029至1030年间，辽国当局决定把它统治下的南部地区即原中国地区的征敛制度也照样在原渤海地区实行，这时，在渤海爆发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反抗占领者压迫的运动。人民举行起义，并试图在原来的渤海领土上重建一个独立的国家。

起义军俘虏并杀死了许多契丹贵族。副摄政王兼北部各府的首相萧孝先和他的妻子——圣宗皇帝的女儿南阳公主在东京城被起义军捉住³。

1 3.H. 马特维耶夫，同前书。（译注：参见《宋史·渤海传》。奥氏说“随行者有军官十五人”，应为十六人。）

2 同上。（译注：见《宋史·渤海传》。）

3 魏特夫，同前书，第419页。（译注：见《辽史卷十七、圣宗本纪八》。萧孝先是辽国勇谋，东京留守。）

据高丽正史载，起义军的领袖——渤海始祖七代孙大延琳建立新国，国号兴辽，自立为皇帝¹。

1029及1030年，大延琳两次向高丽朝廷吁求援助，但是高丽非但不愿意给予援助，反而加紧了边界的防备。一部分高丽官员想借这个机会越过鸭绿江，夺取契丹占据的土地。但契丹的边境戍兵打退了高丽的偷袭²。

1030年，叛徒杨祥世将军暗中与辽勾结。他在夜间打开东京的南门，放进敌军。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新建的国家灭亡了。起义者还继续坚持了几个月，最后，辽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减轻了赋税³。

渤海人反抗辽国压迫的斗争此后仍在继续，特别是当辽国趋于衰微的时候。魏特夫说：“当日益增强的离心力使政府的铁钳变得松弛以后，渤海人便最先起来反抗他们多年的压迫者。”⁴

但是，在整个十世纪中，契丹仍然具有威慑而强盛的势力，而渤海则已丧失了重新振兴其原有的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力量。

安巴坚次子德光(尧骨)在位时期(927—947年)，辽国臻于极盛。当时后唐统治下的中国发生自相残杀，这就促成了辽的兴盛。933年，从厚即帝位，但是他的兄弟从珂叛乱，夺取了帝位。这时，驻守太原的将领石敬瑭也起兵，并向契丹乞援。德光当即利用了这个机会。契丹人通过著名的雁门关山口，进入太原，占领了中国。

石敬瑭攻陷洛阳，后唐末帝从珂在城中自焚。德光把他的傀儡石敬瑭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宣布中国是辽的属国，并且占据了中

1 魏特夫，同前书，第420页。(译注：《高丽史节要》载：“延琳，渤海始祖大祚荣七代孙，叛契丹，国号兴辽。”《高丽史卷五、世家》的说法与此同，并没有做皇帝的说法。)

2 同上，第419页。(译注：见《高丽史卷五、世家》。)

3 同上，第405页。(译注：见《辽史卷十七、圣宗本纪》。)

4 同上。

国的边远州县。

石敬瑭把山西雁门关以北土地和幽州割让给契丹。契丹遂定都于幽州，即今北京。后来，德光废黜了统治中国的石敬瑭的儿子，自立为中国皇帝，改国号为辽¹。但是德光死后，中国人便立即摆脱了契丹的统治。

952年，从契丹手里夺回了瀛、莫、幽三州²。

1004年，契丹与中国新建的宋朝达成协议，契丹交出仍然在他们控制下的一部分中国北方州县，换取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此两国边境开始安宁。两国经常互派使者携带礼品恭贺正旦和生辰。”³

1049年^①，契丹共置有五京、六府、一百五十六城、二百县、六十属国。契丹领土东临大海，西抵阿尔泰，北至克鲁伦河，南达鄂尔多斯。

但是，作为一个庞杂的政治与民族联合体的辽国却迅速地瓦解了，这同它的迅速兴起差不了多少。

早在契丹第七代皇帝兴宗在位时(1031—1055年)，国内形势就已经十分紧张。征敛无度，盗寇肆虐，民变蜂起。大臣萧韩家奴上书皇帝说：

“臣又闻：自昔有国家者不能无盗。比年以来，群黎凋弊，利于剽窃。良民往往化为凶暴，甚者杀人无忌，至有亡命山泽，基乱首祸。所谓民以困穷，皆为盗贼者，诚如圣虑。今欲芟夷本根，愿陛下轻徭省役，使民务农，衣食既足，安习教化而重犯法。则民趋礼

1 B.П.瓦西利耶夫，同261页注2，第16—17页。（译注：见《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四》。）

2 同上，第20页。（译注：见《旧五代史·卷一一九·周世宗纪六》及《契丹国志·卷五·穆宗纪》。）

3 同上，第22页。（译注：见《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

① 据《辽志卷三七·地理志》，事在1044年（辽重熙十三年）。——译者

义，刑罚罕用矣！”^①

萧韩家奴援引唐代第一个皇帝的故事^②说，太宗曾询问群臣治盗的方法。群臣答称需要采用严刑峻法。太宗笑着说：寇盗所以滋生，是由于赋敛无度、民不聊生的缘故；如果消除了这个根源，则骚乱自止。

萧韩家奴写道，由此可见，盗寇的多寡，取决于衣食的丰匮和徭役的轻重。¹

当然，这些明睿的言词和谏议是不足以扭转局面的。被役服的诸部落和民族的劳动群众受到的残酷剥削，赋税的繁苛和官吏的贪婪无厌，仍然一如既往，使国内民穷财尽。更何况契丹晚期几代皇帝又都是昏聩无能，无所用心。史书在描绘这几个皇帝时，使用的是最阴郁的笔调。

到了十一世纪，契丹国家已经摇摇欲坠，只消外力稍加触动，就将土崩瓦解。女真人的起事，便是这种外力的推动。

1 魏特夫，同前书，第420页。（译注：见《辽史·文学·萧韩家奴传》。）

① 《辽史·百三·萧韩家奴传》。——译者

② 这里说的是唐太宗，应为唐代第二个皇帝。——译者

第七章 女真国时代

女真国的兴起与历史

女真人肩负着一项历史的重任：他们必须把渤海灭亡后东北及滨海诸民族所丧失的一切，即高度的文化、发达的经济和自己的国家恢复起来。可是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只能在事过两百年之后白手起家，从头开始。

女真(或朱理真)的族名是在公元十二世纪始见于中国人的历史著作的，当时被视为靺鞨诸部的一支¹。

中国人宇文懋昭写的《金志》说，开始知道女真的名称是在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年)，即靺鞨部落前来中国朝贡的时候。虽然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女真或朱理真的名称当时就已经存在，可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在中国人看来，后世的女真人的祖先原是靺鞨诸部的一支。他们“世居”混同江(松花江)以东，在长白山脚下，鸭绿江的源头²。这里是唐代黑水靺鞨的故地。南邻高丽，北接室韦，西达渤海和铁离³。混同江以南诸女真部落先是从属于渤海，后来同渤海人一起从属于契丹。据中国人说，十世纪时，他们被称为熟女真，因为他们那里“无有盗贼”，没有争讼，也不与契丹为敌。商人们去他们那里贸易可以通行无阻。熟女真居住在东京以东二百里^①。

再往南是受契丹管辖的熟女真。他们的地域在东京五百里以

1 B. И. 瓦西利耶夫，同261页注2。(译注：见《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

2 同上，第196页。(译注：见《金志·初兴本末》。)

3 同上，第28页。(译注：见《金志·初兴本末》。)

① 《契丹国志·控制诸国》。——译者

外,南接新罗^①。他们平时不用纳税,但遇战事,必须应辽国政府的征召发兵。他们是卓越的猎人,但同时也从事农业。



图六十四 女真。选自《三才图会》，
1606年。

女真圖

洛阳^②以南的女真人,是契丹为削弱其势力而把他们迁徙到这里的。这些部落按常例缴纳赋税¹。

居住在北方即松花江流域的部落,称为生女真²。他们东北面的地域“不知其极”。据中国人说,他们“无君长所管,精于骑射,前后屡与契丹为边患”³。在松花江以北的阿穆尔河流域某地,曾居住有若干人数众多的部落,其中一部(或一个氏族)号称完颜。后来就是以它为基础,诸部逐渐聚合,创建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金帝国。

生女真给契丹人造成许多麻烦,使他们不得不沿女真边界修筑一系列堡寨,构成一条全长两千里的防线,派兵驻守,还要为驻军输送给养。新兴的金朝就是在这些不驯顺的北方女真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 198 页。(译注:见《金史·初兴本末》。)

2 同上,第 28, 198 页。(译注:见《契丹国志卷二十二·控制诸国》。)

3 同上,第 27 页。(译注:见《契丹国志·控制诸国》。)

① 此处指“五节度熟女真”,但《契丹国志》原文无“南接新罗”一语。——译者

② 据《金史·初兴本末》,应为“辽阳”。——译者

人中产生的。这里形成了未来帝国的核心。不久，这个帝国的威力和盛势，就远远地超出了早年的渤海王国。

无怪乎正是在这里，在黑水诸部的地域内，继渤海灭亡之后，又重新振兴起国家组织。

早在很久以前，当这些部落还没有发挥多少显著的政治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北方诸部族独立地位的支柱。同时，同许多比较落后的邻族相比，女真人显然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无疑大量继承了渤海时期的文化。他们也多方得益于同中国及高丽人昔日的联系。因此，无怪乎正是女真人不仅得以迅速兴起，而且能够建立复杂的国家机构，创造自己的文字和文学。



图六十五 贡兽皮图（选自《满洲实录》）。

据金朝自己的历史传说，金人的始祖是高丽人函普¹。函普六十岁时，来到仆斡水边的完颜部。他的兄弟保活里居住在耶懒地方²。

相传函普来到这里后，他的氏族便同完颜氏族之间爆发了血族复仇事件。完颜氏族人问他：“若能为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函普提议合并部落，以结束哄斗，并且许诺娶完颜部六十岁的贤女为妻，使两个仇族结为亲戚。函普继而提出用赔偿法代替血

1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

2 同上。

族复仇，即杀一人赔马十匹、牛十头、黄金六两¹。

函普以青牛为聘礼，娶了那个六十岁的女人。他得了三个儿子^①，他们后来成为完颜部落的成员。这个传说还有几种不同说法。它的价值在于鲜明地反映了直到十九世纪仍然存在于阿穆尔河诸部落的氏族生活的特点，氏族内部和氏族之间的关系，例如血族复仇、杀人的赔偿法、氏族间的通婚、接受外人入族(收养)，以及存在一种谋求谈判以结束两个仇族间的械斗并建立和平的调解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真传说已经提到了作为私人财产的耕地。这里所说的大概是庞大的父系家庭公社所属的土地。

函普的曾孙绥可最早教会黑水人建造地面住所：“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不经常迁徙，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²绥可及其族人在安出虎水(阿勒楚喀河)的岸边定居下来。

绥可的儿子石鲁决心夺取部落内的统治权。但是生女真“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因此石鲁决意“立条教”。值得注意的是，石鲁统治女真诸部的企图得到征服者契丹人(或称辽人)的支持。《金史》直率地指出辽帝封他当了官³。

然而，石鲁与族人之间立即发生了冲突，差一点丢了性命：“诸父部人皆不悦，欲坑杀之，已被执。”他的另一个叔父谢里忽发箭射向捉住石鲁的人群，救了石鲁。此后，石鲁开始“稍以条教为治”，

1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注：俄译文对《金史》这段文字的理解大谬。《金史》原文是：“始祖至完颜部居久之，其部人尝杀他族之人，由是两族交恶哄斗，不能解。完颜部人谓始祖曰：若能部人解此怨，使两族不相杀，部有贤女年六十而未嫁，当以相配，仍为同部。”)

2 同上。(译注：《金史》原文中“迁徙不常”一句，俄译者误为“不经常迁徙”。)

3 同上。

①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的原文是“后生二男……一女”。——译者

并且征讨诸部，力图役服他们。相传石鲁到达了白山，进入苏滨、耶懒等地。

金朝正史把石鲁这些军事行动说成是“耀武”，“所至克捷”，“顺者抚之，不从者伐之”。

但是，实际上事情并不全如此顺利。同一个传说又说：“隐官之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①甚至石鲁死后，尸体也遭到敌人（“贼”）的追夺。夺尸的人中，有一个是加古部落的人，叫做蒲虎。石鲁的灵柩被抢劫者捣毁^②。

石鲁的儿子乌古乃生于1021年。《金史》描写他是一个机敏而狡黠的外交家，善于利用一切适当时机增强本部的实力，同时又帮助辽国朝廷削弱别的部落。

据《金史》载，这个时期，许多氏族和部落不堪辽人的压迫，逃

入女真地域。辽国派武官曷鲁追索铁勒、乌惹等部逋逃者。乌古乃怕辽兵长驱深入他的地域并占领道路、山口，就决定施狡计阻止他们前进。他对曷鲁说：“兵若深入，诸部必惊扰，变生不测，逋户亦不可得，非计也。”^③曷鲁听了乌古乃所说，颇以为然，就停止前



图六十六 辽帝。法维亚绘。

①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的原文是：“辽以惕隐官之。诸部犹以旧俗不肯用条教。”按“惕隐”是官名，俄译者把句子断错了，并把“惕隐”误解为部落的名称。——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的原文是：“载柩而行，遇贼于路，夺柩去。部众追贼与战，复得柩。加古部人蒲虎复来袭之，垂及，蒲虎向诸路人曰：石鲁柩去此几何。其人曰：远矣，追之不及也。蒲虎遂止。于是乃得归葬焉。”——译者

③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进。事后，乌古乃派兵搜出了逋逃者，送还辽人。

有一次，蒲轰（拂捏）部落首长拔乙门起兵攻契丹，占了“虜路”。这是契丹使者去海边取海东青的经由之路。乌古乃表面与拔乙门交好，甚至送妻妾子女给他做人质。可是，他同时又报告契丹，说如果契丹用兵，起事者将据险防守，“非岁月可平也”。乌古乃告诉契丹“可以计取”^①，随后便向信任他的拔乙门发动突然袭击。乌古乃背信弃义俘获了受骗的拔乙门，献给辽帝。辽帝大喜，在宫中赐宴，给他加官晋级，封为节度使，即生女真诸部落和氏族的总督。皇帝还要授乌古乃统辖女真的官印。但是乌古乃不受，托词如果受印，就有杀身之祸。他的部人曾“扬言曰：主公若受印系（辽）籍，部人必杀之”²¹。看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生女真不愿成为辽的臣民。至于他们的首领乌古乃，他显然实行两面政策。女真人的正史自然是千方百计美化乌古乃的活动，把他一生中这段可疑的经历故意说得含混其词。但是即使在这幅歪曲的画面里，也可以捉住事件的真实线索。按照史书的记载，乌古乃不肯受印，似乎是出于权术。他暗中唆使族人扬言要杀他，而私下又对辽国皇帝说，他改日将秘密接印。

乌古乃在族人和辽人之间上下其手，后来果然达到了他孜孜以求的目的。

乌古乃当上了节度使以后，逐渐在本族建立起女真人前所未有的“官属”、“纪纲”^②。

为了增强女真的军事力量，乌古乃采取措施以改进兵器。史书说：“生女真旧无铁，邻国有以甲冑来鬻者，倾货厚贾以与鬻易……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③

1 同上。

①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② 同上。——译者

③ 同上。——译者

据史书所述,乌古乃的活动还有一个特征,表现出他是那个时代(即恩格斯据摩尔根的分期法称之为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典型的军事首领。

《金史》说:“景祖(乌古乃)为人宽恕,能容物……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例如,一次有个“叛去者”对乌古乃手下人说:“汝主活罗也,活罗吾能获之,吾岂能为活罗屈哉……。”^①

史书解说道,活罗是一种鸟名。这种鸟出在北方,形状象鸡,非常贪饕。马、牛、骆驼如果被它啄破脊背,便立刻死去。它饥不得食的时候,就连沙石也能下咽¹。

乌古乃经常饮食超人,好色无度,因而他的仇人给他取了这样一个难听的外号。

但是,乌古乃对于诽谤者非但不介意,反而给予厚赏,“人以此益信服之”^②。

乌古乃收附并役服了许多本来独立的部落:斡泔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

1074年,^③没拈部酋长谢野率部人起兵反契丹,乌古乃讨伐没拈取胜,但事后突然死去。

此后,乌古乃以下几代嗣位人继承了完成统一女真的事业,尽管也是成败参半。此中一大障碍,便是各部之间的斗争和女真当权氏族即函普后裔接连不断的内讧。

这种内讧在乌古乃死后立即就开始了。乌古乃死前立嘱由次子劄里钵代长子跋黑袭女真首领位^④。跋黑得到另一些族人支

1 同上。

① 同 278 页注②。——译者

② 同上。——译者

③ 据《金史卷一·本纪第一·世纪》,应为 1072 年(辽咸雍八年)。——译者

④ 据《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跋黑是乌古乃的异母弟。——译者

持，便发动各部反对劬里钵。

女真历史说，“劬里钵袭位后”，“内外溃叛，缔交为寇”^①。

跋黑的拥护者在民间煽动说：“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劬里钵，颇刺淑。”女真部众大乱，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然而，经过一场紧张激烈的流血斗争，劬里钵（世祖）最终制服了对手，“基业自此大矣”^②。

破多吐水之役是这场斗争的转折点。这时跋黑本人已经不在人世；他在爱妾家里饮宴，被一块肉噎死了。

拥立过跋黑的两个酋长桓赧和散达这时集结所属各部落与劬里钵的军队对阵。战役前，劬里钵的军吏见敌军阵容威严，“未战而惧，皆植立无人色”。劬里钵对己方军士们的惊慌情状装作没有看见。他命令军队在战前解甲少憩，用水润面，喝一点炒面糊，然后“训励之”^③，以鼓舞士气。同时，他还把他的兄弟穆宗拉到一边，对他说：“今日之事若胜，是为偶然。万一有不胜，吾必无生。汝今介甲遥观，勿预战事。若我死，汝勿收吾骨，勿顾恋亲戚，亟驰奔告汝兄颇刺淑，于辽系籍，受印乞师，告以此仇。”^④

在此之前已经约定，他将发出开战信号，军队听见信号即应冲向敌阵。

劬里钵对辞不失说：“待吾三扬旗三鸣鼓，即弃旗决战，死生唯在今日，命不足惜。”^⑤

约定的信号发出后，劬里钵不披甲，只穿一件缁袍，卷起袖子，身先士卒突入敌阵。辞不失攻击敌人后路。在这毁灭性的打击

①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② 同上。——译者

③ 同上。——译者

④ 此处俄译文错两处。《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的原文是：“今日之事若胜则已。……以报此仇。”——译者

⑤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下，敌人惨败：“死者如仆麻，破多吐水为之赤，弃车、甲、马、牛、军实，尽获之。”^① 勃里钵认为这次胜利是一件奇迹，是天赐的恩典，乃下令停止追击残敌。

这次胜仗迫使桓被、散达两部降服。但是还有个别部落继续与勃里钵交战。勃里钵接连击败不肯降服的各部落军队。俘获其酋长杯乃、腊酷等人献给契丹。作战过程中，勃里钵军包围并攻下了窝谋罕的城邑。窝谋罕遁走。全城生口财货统归胜利者所有。勃里钵当着辽国使者的面决定对战败者的生杀处置。这时俘虏们都跪在地上，其中一个人手执长刀突然冲到勃里钵面前，向他高喊：“勿杀我！”辽使和左右都逃散，但是勃里钵面不改色，握住这人的手说：“吾不杀汝也。”事后下令把这处死；那些四散的左右臣僚，也因怯懦而受到惩戒。史书写道：“其胆勇镇物如此。”^②

勃里钵当政以来为了役服那些原本自由的女真部落而一直进行的斗争，就这样以他的胜利而告完成了。

然而在公开的斗争中失败的敌人，毕竟不甘心于既成的状态。他们甚至雇用凶手，图谋行刺，但是未能得手。勃里钵死于1092年，他达到了一生追求的目的，实现了对若干女真部落的统治。可是，即使在他弥留之时，建立年青国家的理想也一直萦回于脑海。

相传勃里钵临终前，为了在阴间能知道本国的情况，嘱咐他的元配拿懶一年后死，嘱咐他的兄弟三年后死^③。

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在勒拿河下游已经雅库特化了的通古斯族系诸部落的史诗传说中，还流传着这样一类故事，说是从前有一些英雄壮士杀死自己的亲属，让他们把人间的消息传到阴间。

① 同上。——译者

② 同上。——译者

③ 此说与《金史·本纪第一·世纪》所载不符。《金史》的原文是：“寝疾遂笃。元娶拿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后我一岁耳。肃宗请后事。曰：汝惟后我三年。”——译者

我们从史书记载的上述传说中也可以看到某种类似的情形。

劼里钵死后，他的兄弟颇刺淑袭节度使。劼里钵当政时，颇刺淑因熟知“辽人国政人情”，主办与契丹人的一切交往。关于女真人同契丹官吏的交往情形，女真历史提供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细节：凡女真使者向辽国陈述事情，辽国官吏总是令他们站在^①很远的地方说话。使者的话由专门人员从中转述。这些人时常弄错原意。

颇刺淑要求亲自向官吏陈述“委曲”，他拒绝通过中介人说话。那些人没有办法，只得让他亲自陈词。面对吃惊的官吏们，颇刺淑彬彬有礼地解释说：“鄙陋无文，故如此。”²官吏们信以为真，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史书还记载了另一个有趣的细节，反映了女真酋长和辽人的相互关系。史书说，颇刺淑“凡白事于辽官，皆令远跪陈词”²。

颇刺淑继续为役服各女真部落而奋斗。这时他又得与劼里钵的对手杯乃再次交战。相传他在开战之前做了一个“异梦”，因而把军队交给手下将官率领，他自己则下马呼叫劼里钵的名字，说“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则今日之事，神祇鉴之。”说毕，在草原上燃起野火，火乘风势，越烧越旺，“烟焰涨天”^②。他的军队趁着浓烟向敌人猛冲过去，大败敌军。他们生擒了杯乃，把他作为反叛者献给契丹朝廷。

可是，后来颇刺淑又“释其罪”，使之“复得其力”。这就是说，对待他的办法也象对另一些起先反对过颇刺淑但后来投降了的部

1 同 275 页注 1。

2 同上。（译注：这与上面所说是同一回事。奥氏不知《金史》的两种俄译文同出一源，便把俄译文的出入误认为史书有两种记载。）

① 《金史》原意为“跪在”。——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落酋长那样。杯乃被任命为宰臣^①。

对于抗拒者，颇刺淑的惩罚是残酷的。麻产想保持本氏族的独立，便遭到这样的处置。麻产“据直屋铠水，缮完营堡，诱纳亡命，招之不听”。

为了惩罚麻产，首先擒获了他的下属，并对他的族人大肆劫掠，弄得他们“铍釜无遗”^②。然后捉住了麻产，砍下他的首级献给契丹朝廷。

阿骨打和乌雅束两人参加了对麻产的讨伐。辽国朝廷因阿骨打平麻产之役有功，擢任他为辽军的千夫长。盈歌、辞不失、欢都、详稳等人也都得到这个军衔¹。

颇刺淑在位三年就死了，盈歌继位，并立即投入了与敌对部落的斗争。

当星显水纥石烈部起兵反抗契丹，杀死辽国派往海边的取鹰使者，阻绝鹰路时，契丹皇帝便命盈歌出兵讨伐。起事者“据险立柵”，阻断通路。盈歌军攻下了这个寨子，救出了幸存的几个辽使，把他们送回契丹。后来，与契丹接壤的几个部落也曾起兵发难。盈歌协同契丹，打败并安抚了“寇盗”^③。

契丹人看到盈歌实力不断增长，开始感到不安。盈歌的军队围困阿疏城，这时辽国便收留了酋长阿疏。契丹派使者命令盈歌罢兵解围。辽使将要到达时，盈歌决定更换军队的衣服旗帜，扮成与城中被围困的军队一样，借以欺骗辽使。辽使没有上当，诡计未成功。但是盈歌依旧不肯遵命罢兵，经过猛攻，拿下了这座城。

1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译注：《金史》原文是：“辽命太祖为详稳，仍命穆宗、辞不失、欢都皆为详稳。”俄译文把官名“详稳”误为人名。）

① 此段大译。《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的原文是：“……遂获杯乃，因而献诸辽。并获活罗。肃宗释其罪，左右任使之，后竟得其力焉。”被释罪的是活罗。——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③ 同上。——译者

破城之后，契丹又派使者乙烈，即从前的奚部落节度使，来见盈歌。乙烈命令释放阿疏城全体被俘居民并交出几百匹马，作为赔偿。

盈歌说，如果释放阿疏的族众并给予赔偿，那么各部落就会不再听令了。为了证明这话说得有理，他暗地指使居住在主隈水和秃答水畔的两部落阻绝鹰路。

这件事办成以后，他又示意懿故德部节度使声言，辽人要打开鹰路，非靠生女真节度使即盈歌不可。随后，他带兵出征，假装去平定起事的部落，打通鹰路，实际上是去土温水围猎捕鱼。

不知真象的辽帝相信了盈歌，派使者送去赐物，犒赏“平”鹰路有功的将士。盈歌却把这些赐物转给主隈和秃答两部落的首长，答谢他们阻绝了鹰路^①。

盈歌还对女真族的阿典部落采用了奸诈的手段。阿典部落派使者斡达刺来见盈歌，提议结成联盟，共同攻辽。盈歌却把斡达刺交给契丹，从而加强了辽人对他的信任。

契丹见盈歌十分忠心，便要他参加讨伐以海里为首领的不顺从的部落。

女真历史说，盈歌这时候获得了一千多副铠甲：“女真甲兵之数始见于此，盖未尝满千也。”辽人攻海里军，不克。于是盈歌对辽将说：“退尔军，我当独取海里。”^②辽将许诺，盈歌即冲向敌阵，海里头部中箭，摔下坐骑。盈歌乘机击溃了海里军。事后，献海里首级给契丹朝廷。皇帝在头鱼宴上召见盈歌，大为嘉奖，并且擢升了他的官阶。

盈歌就是这样继承前辈实行的对待辽国的两面政策。他千方

^① 此处所述与《金史》原文有出入。《金史·本纪第一·世纪》称：“……八年，辛巳，辽使持赐物来赏平鹰路之有功者。九年，壬午，使蒲家奴以辽赐给主隈、秃答之民，且修鹰路而归。”——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译者

百计地显示自己是契丹皇帝的忠实拥护者和藩臣，同时却利用辽人的支持，暗中加强对其他女真部落的统治，扩充与契丹抗衡的军事实力。

这支力量也开始引起了邻国高丽的重视。盈歌当政时已与高丽建立外交关系，高丽派来了首任大使。至于同其他女真部落的关系以及内政制度的建立，如果女真历史所说可信，则在这些方面盈歌已经彻底战胜了古老的部落制度的离心力，并且降服了那些不顺从的部落。盈歌从取消各部落的“信牌”着手，“擅置牌号者置于法。自是号令乃一，民听不疑矣。……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①。

这就是说，盈歌用自己委派的人替换了推选的首长，为女真部落中央集权的政体初次奠定了基础。他于1103年死去，在位十二年。

史书总结他的业绩时指出，盈歌治下的生女真国“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¹。

在盈歌的继任者即劾里钵的长子乌雅束当政时，日益强盛的女真部落联盟，受到了一次严重的考验，这就是同高丽人之间的一次激烈的但幸而是短暂的斗争。

乌雅束（康宗）同高丽的关系起初是良好的，但后来却发生了分歧，未能通过和平的外交途径加以解决。分歧的原因看来是乌雅束企图役服与高丽交界的“五水”诸部。最早拒绝归顺乌雅束的是乌河诸部^②，他们越界进入了高丽。《金史》记载，女真将领大败高丽，“抚定边民”^③。

1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

① 同280页注②。——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一·世纪》。

“乌河”是“五水”的错误译名。《金史·本纪第一·世纪》载：“五水之民附于高丽。”并不存在另外的“乌河”诸部。——译者

③ 同上。——译者

但是，随后在苏滨水（绥芬河）上又发生了新的事件：“苏滨水民不听命”，含国部落的首长也不肯应召来见。乌雅束派了一些代表，“召诸官俛告谕之”。斡准和职德两个部落来了，可是“既至复亡去”。乌雅束的大将们就开始对不顺从者大张挾伐。

一场血战爆发了。城堡被围攻，房舍被烧毁。高丽人介入了战事，他们不肯交出投附他们的逃亡者，并且筑起九座堡寨，乌雅束指挥下的女真人也在曷懒甸筑起九座堡寨和他们对峙。

乌雅束当政的第七年，女真国五谷不登，饥荒严重，饥民四方流散，寇盗屡发。女真贵族和富人要求对偷盗者处以死刑，没有获准。当局下令向偷盗者课以罚金，金额等于赃物价值的三倍，代替死刑，但这也无济于事。实行这个办法，饥民只得变卖妻室子女为奴婢。因此，最后决定，一切债务推迟三年偿还，人民才稍安定。

乌雅束死时五十三岁，当政十一年。

乌雅束时，同契丹人也开始发生了冲突。史书载道：

“初，辽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东青于海上，道出境内，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公私厌苦之，康宗尝以不遣阿速为言，稍拒其使者。”¹

这是女真人公开反抗统治者契丹的开端。

但是，完成女真统一事业的大任是由乌雅束的继任者——乌古乃的孙子阿骨打担负起来的。

女真首领当时面临的任務，已经不是对分散而互相仇视的同血统部落的征伐（这是为未来的远东大国奠定了根基的前辈们所致力的事業），也不是对爱好和平的高丽人的战争，而是要反对强大而威严的辽帝国。

相传，乌雅束死前梦见一只狼，他射了许多发箭，总是不能伤它，而阿骨打上来一箭就把狼射倒了！

在这个传说中，狼的形象显然是代表后来被阿骨打推翻的辽

1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

帝国。

如果说阿骨打的前辈迎合辽国的政策，并且奴颜婢膝地奉事辽国皇帝，那么现在已是公开反对他们的时候了。

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因为契丹虽然缺乏根据，但历来把女真人当作臣民，阻挠他们聚合为国家。所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要下决心进行这样一场斗争，不但阿骨打本人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胆略，而且必须坚信自己能够受到全体人民无条件的支持。阿骨打是抱有这种信念的，因为他深知女真人对强暴的辽人怀着深仇大恨。

作为一个战功卓著的勇敢军人，阿骨打享有崇高的声望。早在父亲在世的时候，幼年的阿骨打就曾参战负伤。相传阿骨打受伤后，父亲把他抱在膝上，爱抚地说：“此儿长大，吾复何忧？”^①

阿骨打不久便成为本部落最优秀的射手，能够箭无虚发地接连射中飞鸟。他的射击本领曾使辽国的使者们大为惊奇：他一箭射中了三百二十步远的目标，任何人都无法企及。阿骨打二十三岁时出阵迎敌，头不戴盔，马不披甲，左右无不吃惊。他在女真平民中尤其博得人心的事，是乌雅束治下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对偷窃富户食物的人施用死刑。

据史书记载，阿骨打宣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骨肉之爱，人心所同。”^②阿骨打还说，不能为财货而把人处死，因为“财者人所致也”^③。

因此，当阿骨打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他是女真统治宗室中最孚众望的人物。这一点对尔后一整段女真历史的发展过

1 同上。

2 同上。

③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载：“世祖被四创，疾困，坐太祖于膝，循其发而抚之曰：此儿长大，吾复何忧？”受伤的是世祖劬里鉢。——译者

程,即这位年轻的国王担负起新的宏伟使命的阶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早在乌雅束葬殡期间,就出现了同契丹破裂和争斗的第一个诱因。当时前来吊丧的辽国使者要强夺丧主的马,对女真人施以极大的侮辱。但是,由于乌雅束的儿子谋良虎出面干预,制止了冲突。历史记载道:

“太祖袭位为都勃极烈,辽使阿息保……径骑至康宗疾所,饲糒马,欲取之。太祖怒,将杀之。宗雄谏而止。”¹冲突因而被推迟了,但并不长久。

1112年,在每年一度的“头鱼”节期间举行的有契丹显贵和辽帝国藩附部落酋长参加的隆重集会上,阿骨打向辽帝发出了挑战。

这个节日是在河面冰上举行庆祝的。人们在河面上凿冰钓鱼。然后,在宴席上,各藩附部落的酋长必须依次在皇帝面前起舞,用以表示对皇帝意志的顺从。这种对被征服的和藩附的诸部落酋长们带侮辱性的古老仪式,是契丹统治者的一种特殊的凯旋式,形式隆重,观众如潮。

据史书记载,1112年2月,契丹皇帝出巡春州,在混同江逗留。“头鱼宴”即在此举行。“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会。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首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²

已经喝得半醉的辽国皇帝怒气冲冲,再次命令阿骨打起舞。但是阿骨打端立在皇帝面前,直瞪瞪地看着他,断然拒绝照办。挑战已经发出了。

1113年,阿骨打自定称号为“都勃极烈”,大概意思当是“大贝

1 同283页注2。

2 魏特夫,同前书,第422页。(译注:见《辽史卷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勒”，即国王。^①

1114年，他命令军队打造兵器，加固并封闭重要的隘口，加强堡寨的守备，随时准备听命出击。契丹皇帝天祚（1111—1125年）^②怠惰成性，不问政事，于是女真向契丹发动攻击的诱因，很快就出现了。这首先是经由“鹰路”去海边的契丹使者恣意为虐；其次是女真族阿疏部落的“叛逆”酋长逃往契丹。

阿骨打在拉林河集结战士二千五百名，以突袭方式在边界上击败了一支辽国部队。契丹皇帝原先对已经发生的事件没有在意，甚至出京围猎，但是在拉林河之役以后，他省悟到了帝国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

然而，契丹人初败之后，又接连败阵。阿骨打在拉林河既败契丹军，复向契丹城市宁江州进逼（该城位于吉林以北，混同江东岸）。1114年，阿骨打攻下此城，接着又在混同江上打败都统萧奉先^③率领的辽国精锐部队。

战斗开始前，阿骨打申告天地，历述契丹人对他的欺侮。然后，他在军前讲话，说：“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相传阿骨打讲完话后，张弓射箭，火焰从脚下迸起，并在女真战士们的矛上燃烧^④。

契丹人大败，阿骨打获得全胜。惊慌失措的辽国皇帝一反常例地宽恕了败军。但是，这只能使辽军更加丧失斗志。他们觉得

① 把“都勃极烈”说成是“国王”是不对的。《金史·金国语解·官称》：“都勃极烈，总治官名，犹汉云冢宰。”《金史·百官志序》：“金自景祖始建官属，统诸郡，以专征伐。……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故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可见都勃极烈只是高于一般的勃极烈的官名。——译者

② 应为1101—1125年。——译者

③ 应是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见《辽史卷一〇二·肖奉先列传》。——译者

④ 这个传说见于《金史·本纪第二·太祖》，是初战来流水（即拉林河）之前的事。原文是：“诸军攘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于人足及戈矛之上。”不是说阿骨打一人射箭。——译者

与其拚死战斗,不如投降或败退。

居住在辽国东北地区的各部落看到契丹军队被打垮,纷纷脱离他们所憎恨的压迫者,投附到阿骨打方面来。统率契丹东方军的哈亲王^①也投向了阿骨打。

阿骨打不久就组成了一支万人大军。1115年初,阿骨打即帝位,定国号为“金”。



图六十七 金帝。法维亚绘。

据史书记载,似乎阿骨打就此说过以下一段话:“宾州之铁,其质虽优,却易生锈,竟至蚀尽。唯金不锈不坏。况完颜族向尚金光灿烂之色,吾与吾祖逊普同完颜族本相联系。今吾以‘金’号吾帝国者,其源盖出于斯耳。”²¹

阿骨打连战连捷。辽国朝廷自拉林河惨败之后,力图避免战争,几次派使者对阿骨打进行训诫。但是这类措施只能更加坚定阿骨打彻

底搞垮契丹的决心。他在达鲁城下大败辽军,攻下黄龙府。逼得

1 A. B. 格列宾希科夫: 满族及其语言文字, 载《东方研究所通报》, 第 XV 卷, 第 1 期,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12, 8—9 页。

据 Г. 罗佐夫译文, 阿骨打的话略有不同: “宾铁虽坚, 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 完颜部尚白, 于是国号大金, 改元收国。”

译注: 罗佐夫的译文, 与《金史·本纪第二·太祖》相符。但奥氏在正文中的引文, 不见于中国史书, 因而按俄文译出。

① 史书里没有这样一个哈亲王, 当时降女真的有铁骠王回离保, 所说可能是此人。——译者

辽国皇帝不得不御驾亲征。

据史书载，阿骨打登上一座高阜，对天祷告，只见契丹阵容严密，犹如浓云密林一般。但是阿骨打鼓励左右说：“辽兵心二而情怯，虽多不足畏。”¹战斗开始了。起初辽军打得很顽强，特别是右翼。女真人九次冲击都没有成功。第二天，辽军自扰，官兵溃散。阿骨打乘机向契丹人发起攻击，大败辽军，尽夺其营盘，并缴获农具数千件。

接着攻陷了黄龙府。辽帝闻讯后，在斡邻泺地方集结兵力，忽传将领耶律章奴谋反，乃不得已回师。

随后于1115年^①，在渤海故地也爆发了反契丹的起义。造成起义的原因，是驻扎在东京的契丹士兵“与渤海人有怨，而多杀渤海人，永昌乃诱诸渤海并其戍卒入据东京。……远近响应有兵八千人。遂僭称帝，改元隆基”²。

这自然是渤海遗裔恢复独立国家的一次尝试。高永昌发动起义时，曾指望得到契丹的敌人女真的援助，他向阿骨打提议结成军事联盟。

但是，渤海的复国是同阿骨打的计划相违背的。他立即派兵攻打高永昌。遣将去东京时，阿骨打对他们说：“东京渤海人德我旧矣，易为招怀。如其不从，即议进讨。”³

惊慌失措的高永昌再次派遣使者带金印一颗、银牌五十块去见阿骨打。使者对阿骨打申明，他的国君愿做他的藩臣。然而有一个叫高禘的渤海贵族却说：这一切不过是诡计而已，因而高永昌的请求遭到拒绝。

1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

2 《金史》。（译注：《金史卷七十一·斡鲁传》说的是“东京汉人与渤海人有怨，……。”）

3 《金史卷七十一·斡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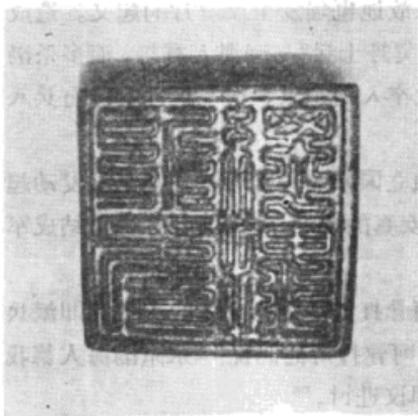
① 据《金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此事在收国二年，即公元1116年。——译者

接着高永昌下令处死了金国使者胡沙补和撒八，与女真人开战，但是被女真打垮。结果东京投降了阿骨打，在整个被征服的领土上实行了金朝的制度¹。

然而三年之后，1118年，东京又爆发了反女真的起义。“东京……结众叛。”^①起义立刻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首恶”被“诛”²，余众各笞百杖，籍没资产一半。

至1118年，东北全境的契丹人已被尽数驱逐。契丹手里只剩下蒙古和中国北方。

阿骨打以两年时间从事改革。第一步是模仿中国制度建立行政机构和豪华的宫廷。



图六十八 总押所印。锡迭米河畔。

史书关于采用中国宫廷礼仪的记载，特意强调太祖阿骨打为人谦逊，并忠诚于女真族的传统旧俗。

据史书说，阿骨打起先不肯接受下属对皇帝的尊仪，尽管大臣们违背他的意愿按中国宫中的习俗向他跪拜。赴宴时，主人向他跪拜，他也同样还礼。他对那些进谏采用中国宫廷礼仪的人说：“我不能更改旧俗。”但是，后来他终于接受了帝王的礼仪。

除此以外，阿骨打还改组了军队，建立了兵部，采用了在汉字的基础上新创的女真字，以代替契丹文字。史书记载，女真字的创

1 同287页注3。

2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

①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事在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译者

制者希尹于1118年^①得到阿骨打赏赐的马一匹、衣一套。

1117年，^②阿骨打下令访求学者参与制定法律。

此后，阿骨打又投身于同辽国的斗争。这时，宋朝皇帝徽宗于1116年^③向他提出请求，希望灭辽之后，把早先被契丹占据的中国土地归还中国人，契丹其余土地可归属女真。此外，宋朝将把原来输辽的岁贡改输阿骨打。

宋帝遣书阿骨打说：“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界下邑。”阿骨打答复说：“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④

契丹皇帝试图与阿骨打订立和约，先后七次向他遣使，提出议和条件如下：阿骨打奉事辽帝如长兄，纳贡，每年到中京来，允许辽国遣往宋朝中国及高丽的使者通行，送子孙来做人质^⑤。1119年，辽帝又命人给阿骨打送去立帝位的封册和玉玺。但是，对于这一切和平建议，阿骨打的回答却是与契丹重新开战。这一次是攻打上京。发兵以前，他告谕官民，声言辽主失道，上下同怨。阿骨打定出约法：凡降者即抚恤之，不服者即消灭之。

上京没有自动归降，依靠强攻才攻下来。但是阿骨打为了笼络契丹国人民，“赦”了上京的官民^⑥。

1120年，攻破中京(大定府)。这时阿骨打诏示，首先要索取城中的各类祭器、乐器、地图、书籍和典章^⑦。

同年(1120年)及次年，女真人接连攻下许多契丹城邑。女真

1 同288页注2。

2 同上。

3 同上。(译注：据《金史卷二·太祖本纪》，金破辽中京在1122年(天辅六年)，而阿骨打下诏则是1121年的事。)

① 据《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事在天辅三年，即公元1119年。——译者

② 据《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应为1118年(天辅二年)。——译者

③ 据《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事在天辅元年，即公元1117年。

④ 这里所说不确。《辽史卷廿八·天祚皇帝二》所载的议和条件是：“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入及原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译者

统治宗族的宿仇阿疏被生擒。

据史书载，金国军士认不出是阿疏，问：“尔为谁？”阿疏回答：“我破辽鬼也。”^①后来认出是阿疏，阿骨打便下令把他杖笞一顿，然后释放^②。史书中另有一说则称阿疏被处死¹。

为庆祝胜利，阿骨打下令释放狱中囚犯，准鬻身为奴婢的人自赎为良。

至于契丹方面，则朝中大乱，使国家濒于崩溃。

金人攻下中京时，辽国皇帝还在禁囿鸳鸯泺若无其事地打猎。内侍密谋拥立太子敖卢斡。事泄，太子及拥立者全部处死。军中听到他们的死讯，“无不流涕”²。

然而，不久以后辽国又立了一个新皇帝叫耶律淳。结果辽帝国乃裂为两部分，有新旧两个皇帝。旧帝余下沙漠以北的领土，西南、西北诸部落也继续服从他的统治。新皇帝耶律淳拥有南部领土。但这也只是燭火余辉而已。辽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尽管唐古特人的西夏王国曾出兵保卫契丹，也无济于事。女真打败了唐古特军，随后又攻下了辽国剩下的两京，其中包括北京^③。不肯归降阿骨打的契丹残部，向西方败走，在那里建立西辽国或黑契丹国，一直存在到1204年^④。

这样，女真人在阿骨打的率领下，用了十年工夫，就把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克鲁伦河并拥用强大军队的契丹大帝国灭亡了。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女真启心，深入一呼，土崩瓦解。”^⑤这是《辽志》关于“宾铁”王朝不光彩的结局的说法。

1 《金史》。（译注：中文本《金史》中，没有阿疏被处死一说。）

2 《金史》。（译注：见《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三》。）

① 《金史卷六十七·阿疏传》。——译者

② 《金史·本纪第二·太祖》。——译者

③ 指燕京，后来才更名为北京。——译者

④ 据《辽史卷三十·天祚帝纪四》，西辽亡于宋宁宗嘉定六年，即公元1213年。

——译者

⑤ 《契丹国志·初兴本末》。——译者

阿骨打死于1123年，终年五十六岁。他遗留下一个巨大的帝国。金国版图包括了东北、华北、以及蒙古的很大一部分。

阿骨打的继承者是他的弟弟吴乞买(1123—1135年)，史书详细记载了推选吴乞买当金国皇帝的特别情节。阿骨打死后，斜也、吾都补、宗峻、斡本“率宗亲百官”请吴乞买正帝位。吴乞买不允。这时斡本率诸弟强使他“以赭袍被体，置玺怀中”，拥他登上了宝座。为了庆贺登极大典，吴乞买宣布实行大赦，并且开仓赈济贫民¹。吴乞买袭承前任皇帝的政策，把南部国界扩展到黄河旧河口。1125年，他俘虏了辽国的末代皇帝，从而完全摧毁了契丹。但是，他同时又下令，凡盗掘辽国皇陵者，皆处以死刑^①。

吴乞买在位时，同高丽发生了边界事件。女真军官谗班完颜忽刺古报告：“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夺其兵仗。”^②

吴乞买接到谗班的奏禀后，谕示不要为小事挑起战争，对这个事件不必在意。不但如此，他还一般地规定，未奉特许，女真人不得去高丽边界。后来高丽扩充军队，增强边防，并收容金国的叛亡者。即使在这时候，吴乞买仍然命令不许进犯高丽。

只要看一看金帝国同宋朝中国的关系，就很容易明白它为什么这样注意同高丽保持和平³。

女真人在阿骨打时期就开始和北宋发生冲突。阿骨打起初把契丹抢占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③及所辖六州归还了宋朝。作为交换条件，宋朝承担义务把早先输契丹的岁币四十万缗

1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2 《金史卷二·太宗本纪》。

① 据《金史卷二·太宗本纪》，太宗下诏，有盗发辽陵者，罪死。事在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译者

②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译者

③ 即燕京。——译者

输给女真，对前来向金国皇帝恭贺正旦及生辰的使者送给十万缗钱，并开设榷场交易^①。

可是，女真人仍然把华北的部分中国土地据为己有，并且在撤离北京^②的州县时，尽数掳走了这个地区的富户。但早先降附金人的平州长官却释放了这些中国人。后来平州长官被女真人打败，逃到北京^③，寻求宋军的保护。

金人要求处死他，宋朝廷未能顶回他们的要求，于是这个投奔宋营的平州长官就被斩首了。因此，B. II. 瓦西利耶夫说：“宋朝廷显露出心口不一。它想占有全部中国土地，却又害怕同金人闹翻。”¹

女真人发觉了宋朝廷的孱弱，因而很快就开始了积极的行动。

吴乞买即位以后，开始向华北大举进攻。他的一员大将粘没喝^③自云州出兵，包围山西省首府太原。另一员女真大将斡离不自平州出兵攻北京^④。宋将郭药师原是契丹将军，这时叛变。女真人利用他的叛变，占领北京^④及其附近州县。北京^④的陷落为女真人深入中国内地开辟了道路。

被这个临头大难吓坏了的宋帝徽宗（1101—1125年）让位给自己的儿子。这时，斡离不的军队正向宋帝国的首都洛阳挺进^⑤。中国军队闻其逼近，便不战而逃。黄河大桥虽已烧毁，但是女真人乘舟渡河，占领了滑州。随后，女真人包围了汴京（现代的开封府），逼迫宋朝接受媾和条件：宋帝应屈尊于女真皇帝之下，今后称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66 页。

① 所说不确。应是：宋岁输金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又别输燕京代租钱一百万缗；遣使贺金正旦、生辰；置榷场交易，等，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太祖纪下》。——译者

② 即燕京。——译者

③ 即宗翰、粘罕。——译者

④ 即燕京。——译者

⑤ 宋首都不在洛阳，而在汴梁；金军这次进军，也没有到洛阳的记载。——译者

金帝为伯父，自称为侄子。

中国人必须把边境三镇割给金人，也就是说要交出黄河北岸几乎包括山西全境及河北省的行政管辖权。他们必须交纳数额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赔款：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牛马一万头，帛一百万匹。最后，女真人还要求送去一个宰相当押信^①。

然而，宋朝廷完全同意了上述要求。他们开始收集金银，向京城民家以至妓院搜括，也只得到黄金二十万两，白银四百万两。愤怒的居民组成了二十万人的中国军队抗击六万女真军。但是韩离不要求革去中国将帅，宋朝廷依旧照办。韩离不携带宋朝官吏在京内搜罗到的全部财物，引兵北还。

正如 B. II. 瓦西利耶夫所说：中国朝廷“把金人的退兵当作自己的胜利来庆贺”。然而，另一员女真大将粘没喝却认为韩离不签订的媾和条件不能使他满意，于是从他所围困的太原城下引兵向中国推进。

宋朝廷派遣军队前去迎击。粘没喝起先在中国军队面前退却。但不久中国军队在太原城下战败溃散。于是两员女真大将又分路向中国进军。太原失守。宋朝廷惊恐万状，竟然一概禁止袭击金人，不准在京城集结军队，以免惹怒敌人。

女真人连下州县，兵临京师。他们包围了宋京，继而冲入城内。皇帝亲至胜利者的军营求见，同意割让黄河以北全部土地。

但女真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再次要求巨额赔款，随后又于 1127 年虏走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及皇族全部人丁，下令从别的姓氏中另立新帝。

女真人退兵时带走了父子二帝。为了侮辱中国，他们把两个前皇帝宣布为庶人，连王侯的身分也不给。老皇帝夫妇被装上牛

^①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等书的记载，都是说当时女真要求以亲王宰相为质。
——译者

车，凄凉寒伧地运走了。皇帝宗族三百人用衣袖结扎在一起，也被全部带走¹。女真人虏去宫内全部财物，包括宝印、祭器、舆辇、冠服、珪璋、乐器、珍宝、舆图、书籍，以及宦者、百工等等。

敌人退走以后，由女真人立的新皇帝张邦昌退位，后被杀。北宋末代皇帝的兄弟康王即帝位。自此开始了南宋的朝代。

然而，女真人仍在同中国继续斗争。粘没喝又向南方进兵。宋朝皇帝放弃了京城扬州，先逃到南京（镇江），从那里又迁到杭州（在浙江）。女真人焚毁扬州，拒绝宋朝廷的请和。他们全部占领了宋朝的四京。只差捉住逃往越州的皇帝了。1127年已虏走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女真大将兀朮作战失利：宋将韩世忠调遣海船入江。只是由于江上无风，使韩世忠的战船不能发挥威力，兀朮才得救。兀朮用火箭烧毁战船，渡过了江，但终于不敢前进，引兵北还。回军途中，女真人在宋朝名将中国民族英雄岳飞手下败绩。

女真人力图利用自相残杀削弱中国，便在黄河以南的山东和山西境内建立了一个缓冲国，立前济南知府叛臣刘豫为王。1130年，刘豫被宣布为新建的齐朝皇帝。他同意对金国皇帝自称儿子，奉女真正朔，来表示对女真的依附。

刘豫后来试图与宋朝交战，但是遭到挫败。他的靠山粘没喝死后，他就被废黜，他的王朝也不复存在了。

与此同时，在西线即陕西，金人与宋朝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这场战斗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里活动的中国军队抑制并分散着女真人对南线即中国命运所悬之地的压力。此外，陕西是入川的必经之地。按照B. II. 瓦西利耶夫的说法，四川“土地富饶，生活安定，等于宋朝所剩领土的一半”。

这一战互有胜败。虽然中国失了三条道路，即秦凤、熙河与永

¹ 《金史》。（译注：事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七·二帝北狩》，被掳走的皇帝宗族共三千人，被迫“衣袂相联属而往”，奥氏误为“用衣袖结扎在一起”。）

兴,^①但女真人终不能进入四川。

1134年,吴乞买死。阿骨打的孙子合剌(1134—1149年)^②袭金朝帝位。

正如史书所示,吴乞买在世时,大将粘没喝事实上攫取了实权,吴乞买不过是名义上当政。

合剌登帝位后,粘没喝搞了一次阴谋。事泄,粘没喝服毒酒自尽。

合剌起先于1139年与宋朝中国讲和,但是1140年又发动了战争。这时发生了一次叛乱,吴乞买的儿子蒲卢虎和大将挾懶与这事有牵连。中国使者看来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次反叛。这是女真人对宋朝中国重新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

女真人的目标是夺取自古属于中国的土地:河南、山西和山东。然而女真侵略者遭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岳飞是抗金的主要英雄。1140年,北路抗金部队的主帅岳飞取得了几次辉煌胜利,收复了被金人侵占的若干城市,其中包括西京和河南府。岳飞打败了最有名的女真大将兀朮,迫使他困守汴京。

这几次打败似乎不可战胜的女真军的胜仗,对中国人和女真人本身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朝当时准备收复早先被金人夺去的一切。黄河以北,北京^③以南,群情鼎沸。谁也不愿意顺服金人。甚至金国的将军也有许多投奔岳飞。”²¹但南宋朝廷对女真竟如此畏惧,更害怕这些胜利。朝廷下令不许刺激女真人,召回岳飞。岳飞夺回的一切又被交还给金帝国,而岳飞本人后来遭到仇人诬告,

1 B. П. 瓦西利耶夫,同261页注2,第76页。(译注: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岳飞规复中原》。)

① 此处俄译者把行政区划的“路”误为道路,应为秦凤、熙河、永兴三路。——译者

② 吴乞买死于1135年,合剌在位年分为1135—1149年。——译者

③ 即燕京。——译者

被捕入狱后毒死。他的勇敢的儿子被当众处决。

宋朝皇帝不惜以任何代价同女真人议和。他重用秦桧——一个狂热的主和派和投降派。“他力促皇帝媾和，单这一件事就使他在中国人眼里成为可恶的人；可是，在主战派的哀号声中，秦桧居然安然无恙并官居帝国的丞相，由此可以看出，皇帝本人是多么希望媾和。”¹由于秦桧不断活动，1141年，^①缔结了和约。金宋两国划定以淮河为界。宋朝每年向金人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宋朝皇帝今后应自称为女真皇帝的臣下。

遵照和约，金人于次年派遣使者送袞冕圭册给宋朝廷，以表示他们册封宋帝。

与此同时，开放了边界市场，以便女真人同中国人进行自由贸易。女真方面归还了在被俘期间死去的皇帝及皇后的灵柩。

从这时起，女真帝国已开始渐趋衰落。

合刺在位末期，嗜酒成癖。据史书说，他日夜饮酒。大臣们进谏规劝，他说明日当戒，但过后却又狂饮²。后来，他的残暴引起了左右更深的怨恨。先是在1144年，合刺盛怒之下杀了自己的儿子魏王道济。继而在1146年，^②在便殿宴席上酒醉之时，杀死户部尚书宗礼。此后又听信谗言，处死学者八人，史书上写道：“君子之党熄焉。”^③

1148年，^④又发生了惊动朝廷和全国的事件。先是在四月壬申日，皇帝寝殿遭电击起火，烧去韩幔与隔板。后来在丁丑日，“有龙斗于利州。……大风坏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飘飏十余

1 同295页注1，第77页。（译注：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四·金亮南侵》。）

2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① 应为1142年（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译者

② 据《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事在1147年（金皇统七年）。——译者

③ 《金史卷一百廿五·蔡松年传》。——译者

④ 据《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事在1149年（金皇统九年）。——译者

米^①，死伤者数百人”。

鉴于自然界这些变异，皇帝决定颁发诏书，敕命学士张钧替他起草一份罪己诏，承认自己犯了过失，引起自然界发生种种异常现象。¹张钧拟就的诏书里说，皇帝的德行与他的职责实不相称，因此上天才要惩戒他。诏书中皇帝自称“无道的人”、“昏庸的人”、“盲人”、“孩童”^②。

廷臣萧肄这时因与诏书起草者有仇，便控告他恶意选用这些字眼。

萧肄对皇帝说：“此汉人托文字以谥主上也。”皇帝听信了萧肄的谗言，赏赐他一条通天犀带，命人杖笞学士数百。张钧受笞后没有死，皇帝又下令用刀插进他的嘴里，把他凌迟细剐。

张钧被酷刑处死以后不久，女真朝廷里又发生了流血事件。由于完颜亮告密，皇后裴满被杀。随后皇帝出外狩猎，又派人杀死德妃、夹谷氏和张氏。打猎回来，又在寝殿杀死妃子裴满氏。²

阿骨打的孙子迪古乃（完颜亮）利用群臣的不满，密谋搞掉皇帝。

密谋事泄，但是被捕的参与者没有供出同党。史书说，参与密谋的宫内卫士偷取了皇帝的大印，^③打开宫门，放进了密谋者迪古乃和驸马唐括辨。当他们走进寝殿大门时，这里的卫士觉察了他们的来意，但他们拔箭相威胁，卫士们不敢反抗。忽土和阿里出虎随即走进寝殿，刺死了皇帝。随后完颜亮进来，朝着皇帝“手刃之，血溅满其面与衣”³。

1 《金史卷一百廿九·萧肄传》。

2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及《金史卷六三·熙宗悼平皇后传》。

3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①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的原文是“瓦木人畜皆飘颺十数里”。——译者

② 张钧起草的诏书原文有“惟德弗类，上干天威”，“顾兹寡昧，眇予小子”等语。萧肄译奏道：“弗类是大无道，寡者孤独无亲。昧则于人事弗晓，眇则目无所见。小子，婴童之称。此汉人托文字以谥主上也。”见《金史卷一二九·萧肄传》。——译者

③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的原文是“窃符矫诏”，不是偷取皇帝大印。——译者

合刺在位十四年，三十一岁被杀。

第二天，迪古乃称帝。

迪古乃(完颜亮)死后，因生前犯下的罪行而被废除帝号，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海陵王。

海陵王以血腥政变开端的历时十一年的朝代(1149—1161年)，自始至终笼罩着一连串悲惨事件的阴影。迪古乃即位的第一年，就不得不开始同女真上层统治集团中仇视他的贵族进行斗争。这些贵族们一再密谋推翻迪古乃。

先是在1149年，两个忠于前皇帝的宰相被处死刑。接着迪古乃又怀疑自己的第七子宗本及其同党图谋不轨，诏令处斩。

1150年，又揭露了一件谋反案，为这事杀了吴乞买子孙七十人，粘没喝子孙三十人。其后是撒离喝遭到大祸。由于一个仇人的密告，撒里喝受诛，全族被灭。

1153年^①，又查出一件贵族谋反案。参与密谋的有丞相萧裕、真定尹冯玉^②、御史中丞萧招折、博州同知遥设。这些人全被处决¹。

女真史书把这种镇压描写成一个罪恶的统治者的暴虐行径。史书带倾向性地选录了一些暴露迪古乃的罪恶和贪色的故事和笑话。例如，1150年^③，他接受了朝廷的谏请，增益嫔妃，把受诛的谋反者们的妻妾召纳入宫。据史书说，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京城内外许多“不赞同”的言论。史书详述了迪古乃命令乌带的妻子唐括定哥杀死亲夫的情节。她叫人掐死了酒后睡熟的乌带，接着迪古

1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① 应为1154年(金贞元二年)。——译者

② 没有冯玉其人，应是“前真定尹萧冯家努”(或作萧丰家奴，冯家奴)，见《金史卷五、海陵本纪》。——译者

③ 据《金史卷五·海陵本纪》，应为1151年(金天德三年)。——译者

乃便把她纳为妃子。¹

据史书载，1153年，迪古乃命诸从姊妹入宫，在宫殿内铺设地毯，把她们的衣裳统统脱光，“裸逐为戏”。²

史书里有一段详细的记载，是关于阿骨打的孙子乌禄的妻子——美丽的王妃乌林答氏之死的传说。迪古乃听说她姿色非凡，要召她入宫。王妃决心自尽，但是不能死在家里，而是要死在去皇官的途中，以免皇帝以不从君命的罪名处死她的丈夫。据史书所载，乌林答氏对乌禄说：

“我当自勉，不可累大王也。”然后，她召进王府的管家，对他说：“汝，王之腹心人也。为我祷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明监我心。”最后，她召来全体家仆，对他们说：“我自初年为妇，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违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旧人，当念旧恩，无或妄图也。违此言者，我死后于冥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后来乌林答氏在途中自杀。³

但是，史书里也有一些记载，表明迪古乃还有另一种品质，反映了迪古乃作为金国元首的活动情况。

1150年，^①迪古乃从一个小囊里面取出皇后献赠给他的一张田家稼穡图。他对大臣们说，这张图含有深意。据他讲，画这张图的用意是因为“太子生深宫中，不知民间稼穡之艰难”。^②接着他就申斥百官，说他们苟图自安，不以民事为念，致使官署里事多留滞。迪古乃还严厉谴责官吏们对“不法”官吏的罪行徇情包庇。针对这

1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及《金史卷一三二·乌带传》。但史书未载“掐死了酒后熟睡的乌带”。

2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事在1154年（金贞元二年）。

3 《金史卷六四·世宗昭德皇后传》。

① 事在1151年（金天德三年）。——译者

②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译者

种情形，皇帝宣布，今后将依据百官的勤惰施行赏罚。

1154年，迪古乃愤怒地警告宰臣及其僚佐：

“朝廷之事，尤在慎密。昨授张中孚、赵庆袭官，除书未到，先已知之。皆汝等泄之也。敢复尔者，杀无赦。”^①

1157年，^②官员杨伯雄指责皇帝不该把王储置于远离皇宫和国事的地方。对此皇帝讲了一段激动的话。他援引《书经》^③的辞句说：“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谈到自己，迪古乃坚决驳斥加在他身上的这一类非难。他说：“朕或体中不佳……而庶事皆奏决便殿。……朕每当闲暇，颇阅教坊声乐，聊以自娱。……如我，虽使声乐喧动天地，宰相敢有滥与人官，而吏敢有受赇者乎？外间敢有窃议者乎？”^④

1156年，^⑤迪古乃给予争权夺利的贵族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取消了早先册封的亲王爵位，收回了授爵的“告身”。“参酌等第”^⑥削降了亲王存者二品以上死者一品的品位。公私文书上，但有王爵字样者，立限毁抹。此外，他还下令毁去已死的亲王坟墓上的碑志。

早在1152年，^⑦迪古乃便决定把皇都从原来的上京即会宁府迁到南面的燕京。官吏们绘制了燕京新宫室的图样，依照“阴阳五姓所宜”，选定了营造宫室的动工日期和地址。这个意图遭到权贵们的激烈反对。迪古乃的亲生儿子按答海（别名谋良虎^⑧）向迪古乃提出异议说：“弃祖宗兴王之地而他徙，非义也。”^⑨

1 《金史卷七三·按答海传》。

① 同299页注②。事在1155年（金贞元三年）——译者

② 事在1158年（金正隆三年）。——译者

③ 《尚书·五子之歌》。——译者

④ 《金史卷八十二·炆思阿补传》。——译者

⑤ 事在1157年（金正隆二年）。——译者

⑥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译者

⑦ 事在1151年（金天德三年）。——译者

⑧ 按答海是谋良虎（宗雄）的次子，见《金史·卷七三·按答海传》。——译者

但是迪古乃不听这种带威胁口气的劝告，作为对这种意见的答复，他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促使女真人不再把旧京看成是民族中心。女真最早几代皇帝，包括阿骨打和吴乞买，都埋葬在上京。单只这一点，就使旧京成为圣地。因此迪古乃决计把二帝的灵柩隆重迁葬于南面的燕京。

1154年，^①他派丞相仆散师恭和将军胡拔鲁去上京迁陵。他把老太后徒单也迎到燕京。

先帝灵柩的迁葬和太后之迎入燕京都搞得隆重而排场，就象演戏一般，目的是给人民和贵族们造成一种印象，使他们感到皇帝孝敬父母，严守古老的传统习俗。

为了抵消保守派贵族的敌意宣传的作用，迪古乃无疑需要做出这个引人注目的姿态，因为保守派贵族利用关于皇帝骄纵淫逸的传闻，竭力败坏他的名声。迪古乃的目的达到了。

据史书描写，皇帝出京迎接太后，“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温清，愿痛笞之”。

太后扶起他说：“凡民有子克家，犹爱之。况我有子如此。”她生气地叱退了持杖者。¹

一年以后，1155年，^②又举行过一次这类的仪式，把函普以后十代列祖^③的遗骨全部迁葬于大房山。于是，在燕京建成了新的女真皇陵。

两年后，1156年，^④与发动对女真贵族的上述坚决进攻同时，迪古乃又采取了另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步骤。燕京改名为中京，上

1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① 事在1155年(金贞元三年)。——译者

② 事在1156年(金正隆元年)。——译者

③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的原文是“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函普应是包括在十帝之内的。——译者

④ 事在1153年(金贞元元年)。——译者

京相应地改称北京，汴京成为南京。¹

皇都的迁移并不是迪古乃的一时任性，而是有长远打算的重要政治行动。其佐证不仅是贵族们的拚命反对，而且还有以下的事实，即会宁府的先帝旧宫室被毁坏，旧宅第被夷平，名刹储宁寺被拆毁。最后，整个城址都被翻耕为农田，播种了粮食作物。²这样就把旧京彻底毁掉了。

对于敌视迪古乃的女真贵族们（即代表古旧的封建宗法传统的势力）来说，京城的南迁是一个经过周密预谋的新打击。在他们眼里，上京是旧时代的堡垒，是旧秩序的象征。那些自恃门第高贵并与阿骨打的后人即金国当今朝廷有密切关系的女真旧族，想必都麇居在这里。这里是反抗迪古乃的中心。颠覆贵族们所痛恨的皇帝的种种密谋，都是从这里牵的线。

金朝发行本国钱币一事，也可能与迪古乃推行的反对封建宗法贵族的总政策有关。女真历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证明国内经济生活中新的进步趋势正在增长。

关于迪古乃与贵族的冲突的结局，可以从金朝史书中保存的宋朝与女真人的来往文书中得到了解。文书谈的是女真人逃亡到中国的问题。宋朝廷写道：“当兴隆时（完颜亮时），固有大朝名族贵将南来者。”³

由此可见，在敌视迪古乃的贵族中，最活跃分子已在肉体上被消灭了。另一些则变节或逃亡到邻国。余下的人也不再冒险与威严的皇帝进行较量了。

迪古乃压服贵族的反抗后，便着手实施对外政策方面种种庞大的侵略计划。

1 同 301 页注 1。

2 同上。

3 《金史卷九三·宗浩传》。

1158年，^①他开始大张旗鼓地准备同中国打仗，这是他的一次致命的战争。他下令营造战船，征召了一支由女真人、中国人、契丹人和奚人编成的大军。

开始备战的时候，迪古乃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宋朝中国。他对将军萧玉说：“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②

但是，事与愿违。备战使国力过度紧张。二十至五十岁的人悉数被征召入伍。甚至不顾明令，强征独子当兵。平民破产，田园荒废。农民的马匹几乎全被夺走。为了取得制作弓弦之类的牛筋和皮革，还不时宰杀耕牛，“至于乌鹊狗彘，无不被害者”^③。

太医使祁宰进谏迪古乃，劝他不要发动战争。他对皇帝说，星象不吉利，陆军必将失利，水军将遇大雾而败绩，骑兵在江湖地带将因众多河道和溪流而受阻。

祁宰接着说：战争不得人心，因为人民怨声载道，惶惶不安。

但皇帝却下令把祁宰在通衢斩首，家产没官，以儆效尤，尽管“天下哀之”。^④

皇帝继续准备同中国打仗。无论地震还是人民起义都未能使他罢休。1159年，^⑤东海县两农民张旺、徐元造反。皇帝从海路派去士兵九百名，镇压起义。从这个数字，可以估计起义者的实力。讨伐队屠杀农民五千人，余众投降。皇帝命令，把被俘的起义者以野蛮的方法处死：肢解、车裂、锯死、烧死。

但这无济于事。农民起义的烈火愈烧愈旺。1160年，^⑥“大名府贼王九叛”。数万农民拿起武器。

1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

① 应为1159年(金正隆四年)。——译者

② 《金史卷十七·宗本传附萧玉传》。——译者

③ 《金史卷八十三·祁宰传》。——译者

④ 事在1160年(金正隆五年)。——译者

⑤ 事在1161年(金正隆六年)。——译者

“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

《金史》的漢文本對於這些農民起義描述得更為生動，說起義者的情形是：

“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上又惡聞盜賊事，言者輒罪之。”¹

與農民騷動同時，被女真役服的諸契丹部落也不願為金帝國流血，紛紛起事。先是 1160 年，^①契丹人不補遇見皇帝車騎經過，就從山上奔馳下來，伏在道左，控告丞相李惟忠。他說自己鎮壓東海起義有功，而李惟忠卻隱功不報。可是，皇帝竟下令把不補處斬，以懲其放肆。

接着，金人想從這些契丹部落中召兵，契丹余眾就起來造反，為首的叫做撒八。起事者聲言，他們不能去同中國人作戰，因為他們的居地不斷遭到鄰近部落的侵擾。皇帝派兵一萬人前去討伐，起事的契丹人便沿龍駒河西走，投奔耶律大石。皇帝盛怒之下敕令屠殺他統治下的亡遼耶律氏和宋趙氏後代一百三十餘人。

1160 年，^②對中國的進軍終究開始了。這時接連出現凶兆：太白晝見。這種異象促發了軍士的逃亡，“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③

軍隊給養沒有保證，士兵各自設法從農家的田園里尋取食物。軍隊簡直形同烏合之眾。

迪古乃的軍隊在山東敗績，被迫退却。這時，迪古乃下詔，凡違忤他的意旨而主張與中國講和的人，一概處死。皇太后徒單氏反對同宋朝交戰，也不能幸免一死。侍婢十餘人同太后一起被殺，

1 同 303 頁注 1。

① 事在 1161 年（金正隆六年）。——譯者

② 《金史卷五·海陵本紀》。——譯者

太后居住的宫殿被烧毁。迪古乃命人把太后尸体丢进河里^①。

将军萧玉也受到残酷的惩处。他向迪古乃指出，去中国的途中横着一条长江，而“舟楫非我所长”。皇帝听到这些话，愤怒地大叫道，萧玉把他比做符坚，因为符坚伐晋，由于一兵一卒也未能渡江而以失败告终。为此，迪古乃命人把这个放肆的将军的舌头割掉，把他的身体钉在行刑台上。^②

当迪古乃的军队渡过淮河后，中国人击溃了他的船队，并用掷火机把船只烧毁。船队在河上焚烧了四昼夜。然而这并未能阻止迪古乃的前进。他继续向中国腹地长江推进。中国人又在这里迎击，烧掉了他准备渡江用的船只三百艘。

中国人夺取了渡口处的江心沙洲。这时迪古乃下令：凡违忤他旨意的人，一律杖责五十；如果水师的军官们不能保证大军三天以内渡江，将处死刑。

这时消息传来，说是猛安完颜福寿率军经山东南下，行至泰安府（当时称泰州）又向东京折回，目的是要废黜迪古乃，拥立阿骨打的曾孙^③、讹里朵的儿子乌禄亲王做新皇帝。曹国公乌禄派人去问他为什么北回，福寿回答说：“此人（完颜亮）失道，不能保天下，国公乃太祖皇帝亲孙，我辈欲推戴为主，以此来耳。”^④于是福寿渡辽水进东京城。猛安卢万家奴、高忠建率兵二万人，完颜谋衍自长安率兵五千人，都来归附完颜福寿。

据史书载，官民们反复劝说乌禄即皇帝位，但他不肯依从。然

①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所载是：“弑皇太后徒单氏于宁德宫，仍命即宫中焚之，弃其骨水中。”——译者

② 这里所说的，与上文所引迪古乃与萧玉的对话，是同一件事。萧玉是金国的尚书左丞相，迪古乃南犯宋朝以前曾征求他的意见，于是有这样一段对答。事后萧玉受到杖责。至于割舌钉碓，只是迪古乃自说有过这种想法，并没有实行。事见《金史卷七十六·萧玉传》。——译者

③ 应为阿骨打的孙子。——译者

④ 《金史卷八十六·完颜福寿传》。——译者

而尽管乌禄再三推辞，仍然无法推却官民的固请。于是乌禄告祭了太祖庙，随后在宣政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¹

接着乌禄颁布诏书，揭露迪古乃的罪恶，诛杀他的党羽。

这时，迪古乃的军队正大破宋军。听到这个消息，迪古乃便引兵北还，以便剿灭起事者。但是，又爆发了新的叛乱，这一次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军队里，他在叛乱中被杀。

关于迪古乃之死，史书是这样讲的：清晨，许多军人朝他的营帐走来。迪古乃以为是中国人。突然一支箭飞来，他抓住一看，才知道是他自己的人射的。第二支箭把迪古乃射倒在地，随后就有人把他劈了一刀。因为迪古乃“手足犹动”，^①就把他勒死，又把尸体烧掉。皇帝死后，其衣物被士兵们抢劫一空。然后，女真大军举师北还。

这个后来被称为世宗的乌禄（1160—1189年）^②就这样当了皇帝。史书说，乌禄体貌奇伟，须髯过腰。在贵族子弟中，他是最出色的射箭能手。史书把乌禄描写成女真贵族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君主。从一开始，史书就在他身边绕以真命天子的光环。例如，母亲死后，乌禄刚躺下睡觉，就有红光照室，卧室上方出现黄龙——帝王之尊的象征。后来又有大星坠入他的宅第。有一次东梁水泛滥成灾，江面涨至城墙的高度。洪水冲透城墙的石罅，象喷泉似地涌进城里。居民惶恐不已。乌禄却登上城垣，以酒酹之，水就退去了。

乌禄即位后，改元大定，下诏大赦，颁布诏文揭发迪古乃罪恶数十事，宴飧将士，分别授给官爵和赏赐，并且免征人民赋税三

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① 《金史卷一百三十二·完颜元宣传》。——译者

② 应为1161—1189年。——译者

年。^①乌禄还派官吏去山东“安抚”百姓，招安叛乱者。诏令遣返逃避徭役的农民回原籍务农。这时，会宁、胡里改、速频等路的南征军已从南方撤回，皇帝便拿出内府金银器物赠给这些军人。

乌禄当政的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契丹人的起义。1162年，契丹的一个首领甚至被他的从众推戴为皇帝。由于战争败绩，他逃到沙陀，在那里被擒受戮。这样，复辟辽帝国的企图便遭到失败。契丹首领窝拔^②所发动的起义也被剿灭。不投降的一律处死，他们的妻子没为婢妾。

1163年，与中国人的长期战争仍在继续。双方各有胜负；勇敢的中国人曾不止一次打败金帝国的军队。但是女真军队不断派生力军替换败军。中国皇帝听从了主和派一位宰相的劝说，同意媾和。实际上也没有别的出路，因为1165年中国军队在淮阳之役遭到彻底失败。乌禄同意了中国人的愿望，在较之1141年的条件稍为缓和的基础上签定了和约。岁贡减至银十万两。^③

此后，在每一个方便的场合，乌禄都向中国显示爱好和平和善意的态度。如1172年^④宋朝茶商误越边界，依律当斩。乌禄赦免了这些人的罪过，也没有把这个事件通知宋朝廷，以免商人返境后被当局治罪。

1187年，^⑤宋朝廷遣使者送来先帝高宗的遗物，有玉器五件，玻璃器二十件以及弓箭等。乌禄命人把这些宝物全数退还，因为这是中国人珍贵的先主遗物。

①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说的是“擒将士，赐官赏各有差，仍给复三年”，并不是免赋税。——译者

② 应为“窝斡”，并无窝拔其人。——译者

③ 据《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事在1142年（金皇统二年）。岁贡应为银绢各减五万。——译者

④ 应为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译者

⑤ 应为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译者

然而,当宋朝皇帝 1173 年^①要求允许他不再亲接女真皇帝玺书的时候,女真皇帝通过丞相良弼向他指出:现在已经不称他为藩臣,他的公文已经不再称为表和书,^②丞相说“恩赐亦已多矣”,拒绝了他的请求¹。

乌禄对高丽的态度承袭了历代女真皇帝的传统政策,力求保持和好。当高丽地方官起事投奔女真时,乌禄把他押交高丽当局。

史书还记载了 1170 年^③皇帝同王储的一次谈话。世宗告诉他,唐太宗死前曾嘱咐太子高宗说:“吾伐高丽不克终,汝可继之!”乌禄说:“如此之事,朕不以遗汝。”²

乌禄与夏国也力求保持良好关系。1169 年,^④夏国大臣任得敬强迫国王李仁孝上表报告乌禄,请求允许他分国土之半给任得敬。乌禄不准,将礼物退回。后来夏国国王诛杀了叛臣,遣使者向乌禄致谢³。

为了增强国力,乌禄花了很大精力整饬国内政治。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他说:“前代之君,虽享富贵,不知稼穡艰难者甚多。其失天下,皆由此也。……盖幼失师保之训……故不知民间疾苦也。”⁴

为了给百官树立榜样,皇帝每年正月都到京城近郊巡视农事。⁵

他试图促使怠惰的官吏们关心他们治下各府州的农业发展。

1 《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

2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3 《金史卷一三四·西夏传》。

4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5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① 据《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应为 1174 年(金大定十四年)。——译者

② 俄译不确。《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的原文是:“宋国免称臣为侄,免奉表为书。”——译者

③ 应为 1171 年(金大定十一年)。——译者

④ 应为 1170 年(金大定十年)。——译者

听说山东等路的地方官吏“骄纵奢侈，不事耕稼”，乌禄就派了一个官员去那里计口授地，要他们从事农业。如果在某处发现有多余土地，乌禄就命令把土地佃给外来户。^①

1173年，^②乌禄下诏，自二月一日到八月底，禁绝饮宴和祭祀，以免妨碍农耕。¹

后来，乌禄又诏令禁止屠宰马匹。他说：“马者军旅所用，牛者农耕之资。杀牛有禁，马亦何殊？其令禁之。”²

为了增加贵重金属数量，他准许自由开采金银，不收捐税。³

皇帝还经管铸币问题。他召集朝臣，同他们讨论关于铸造铜币的议案。有些朝臣主张开放金银矿，允许一切人开采。皇帝说：“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左丞相石琚补充道：“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古所以禁止也。”因此，铸钱还是由国家去管。⁴

皇帝力求在民间尤其是官吏间养成节俭的风尚，在这方面，他也想以身作则，影响他人。

1175年，^③有一次皇帝在广仁殿撩起身上的衣服说：“此服已三年。”还有一次他说：“朕服御或旧，常使浣濯，至于破碎，方始更易。”⁵

别人也必须照办，1166年^④甚至下了一道命令，凡穿著金线

1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2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3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4 《金史卷四八·食货三》。

5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① 此处错误颇多。《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的原文是，大定廿一年，“上闻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赡者，方许招人租佃”。——译者

② 应为1174年（金大定十四年）。——译者

③ 应为1176年（金大定十六年）。——译者

④ 应为1167年（金大定七年）。——译者

缝制的锦服的人,以及贩卖金丝纺织物的商人,都要治罪。¹

皇帝还极力反对宫内的过度奢华。他说:“向时(皇帝的)帐幕常用涂金为饰,今则不尔,但令足用,何必事纷华也。”²

乌禄还采取措施,节减御膳和宫中食物开支。他追述说,以往辽国朝廷,每日宰羊三百头。他说,应当想到和皇帝一样需要饮食的人民。乌禄诏令停止征敛同州的沙苑羊以进贡朝廷³。他也禁止通过驿站递送荔枝入宫(曾有一次他想尝新鲜荔枝,兵部就在沿途特设铺递,传送荔枝)。

史书以满意的口吻指出,御膳每顿只备办菜肴四五样,比先前减少十之七八。⁴

这种做法引起群臣强烈的不满。这时乌禄说:“女直官多谓朕食用太俭,朕谓不然。夫一食多费,岂为美事?……贵为天子,能息节约,亦不恶也。”⁵

皇帝对于宫室的营造也作了限制。在这方面,他征引了孔子谴责营造宫室竞尚奢华的言论。有人提出要修缮正殿,乌禄说,这座殿还是辽时的建筑,全无华饰,但是仍然坚固如初,而别的殿则年年修理,足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他接着说:“今土木之工,天裂尤甚。下则吏与工匠结合为奸,侵克工物。上则户工部官支钱度材,惟务苟办,至有工役才毕,随即欹漏者。奸弊苟且,劳民费财,莫甚于此。”⁶

乌禄以更大的热情竭力激发和保持女真人的民族精神。为此降诏,给那些曾为金帝国的昌盛作出卓著贡献的功臣们立碑,树立

1 同309页注5。

2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3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4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5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6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在金太祖即开国元勋阿骨打的庙里。在庙堂上还悬挂了功臣们的画像。

乌禄认为,加强对本民族旧俗的信守并抵制中国风俗的影响,是特别重要的事。1175年,^①乌禄和群臣议论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他说:

“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²¹

乌禄要群臣习效女真古代风俗,不要忘记根本。据史书载,1170年,^②他在睿思殿命歌者唱女真歌曲,这时他对太子和诸亲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直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²²

在帝国境内,以金朝旧都会宁府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女真旧俗的渊藪。

迪古乃把帝国的中心南迁燕京,而乌禄却恢复了会宁府原先的作用,于1170年^③重新把这个城市命名为上京。

1172年^④,乌禄对群臣谈到这件事时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燕京),女直人寢忘旧风,而迷恋于中国风俗^⑤。朕时尝见女直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时一变此风。……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效之。”²³

1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2 同上。

3 同上。

① 应为1176年(金大定十六年)。——译者

② 应为1173年(金大定十三年)。——译者

③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原文无“而迷恋于中国风俗”一语。——译者

1183年，^①乌禄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启程去上京会宁府。此行的缘由是，按照女真旧俗，在端午节这一天，金朝皇帝应当在該城设宴。

到了上京，乌禄说：“朕思故乡，积有日矣。今既至此，……。”^②

然后，他举行宴会，席上每人赐饮一杯。

“……宗戚皆沾醉起舞。”^①

宴会进行了一整天，自清晨直至日落。

1184年^③4月，群臣固请皇上返回中京，乌禄怆然地说：“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辄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②

后来，又举行了一次宴会。皇帝在宴席上加赐了宗室父老的官阶，年高者加封将军，宗妇即王妃们亦授以封号，赏赐绢、银。在慰劳群臣的宴席上，乌禄对他们说：“朕寻常不饮酒，今日甚欲沉醉。”

“宗室妇女及群臣故老，按女真风俗^④以次起舞进酒。”

史书说，乌禄这时深受感动，又对在座的人说：“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皇帝命宗室子弟坐在殿上，听他唱歌。歌词内容是：“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皇帝慷慨悲激，歌毕“泣下”^③。

乌禄力图阻止女真人的中国化，因此禁止女真人取中国姓氏，穿中国服装。

1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2 同上。

3 同上。

① 应为1184年（金大定廿四年）。——译者

② 下半句是“可极欢饮”，本书未引。——译者

③ 应为1185年（金大定廿五年）。——译者

④ 《金史》原文无“按女真风俗”数字。——译者

据史书载,1186年^①,乌禄颁布了一道法令:“……女直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裳。”²¹谁敢违犯这条法令,都要治罪。

1176年还查出了一件事:原来宫中诸王子的小名,不是用女真语,而是用汉语取的。于是命人开列出最好的女真名字,送呈皇帝,以便他能从中选择,给王子取名。

1173年,^②乌禄禁止宫廷卫士说汉语,敕令他们学习女真语。²

乌禄以种种方法维护女真旧俗以及建立在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基础上的女真传统信仰,而对异域的宗教——佛教和道教——抱敌视态度。

皇帝用尖锐而有力的言词谴责释道两教的宣扬者是欺骗和说谎。

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被佛教“惑之,旋悟其非”。³

“至于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为同泰寺奴,辽道宗以民户赐寺僧,复加以三公之官,其感深矣!”⁴

他还说:“人皆以奉道崇佛设斋读经为福。”

但是他却是要使百姓免受灾难,这难道“不胜于彼乎”?

“闻愚民祈福,多建佛寺,虽已条禁,尚多犯者。”皇帝严令不得为修建佛寺徒费财货。⁵

与此同时,他却非常喜爱和尊重中国的经史典籍,把它当作真正智慧的源泉。他特别推崇司马迁^③著作。有一次他对大臣们说:“近览资治通鉴。……司马迁^③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

1 同 312 页注 1。

2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3 同上。

4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5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① 应为 1187 年(金大定廿七年)。——译者

② 应为 1174 年(金大定十四年)。——译者

③ 应是司马光。——译者

加也。²¹

皇帝深信有必要把这些瑰宝变为女真人的财富，便命人译出中国经书和其他书籍。为此成立了一个译经所。该所于1182年^①把《易经》、《书经》、《论语》、《孟子》、《老子》、《杨子》、《文中子》、《列子》及《新唐书》进呈给皇帝。

这时乌禄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²²

同年，以译成女真文的孝经一千本分赐护卫亲军³。

培养女真学者，也是作为一件国家大事提出来的。乌禄说，女真人当中很少有才学卓著的人。

因此，他命令要擢用依中国制度考中进士的女真人，分配他们到官署中担任令史一类的官职，因为刀笔出身的官员养成了贪财的习性，而儒生则不然。女真人中发现的此类人材有徒单谔、夹谷阿里、补尼、庞古鉴等人，都授给官职⁴。

乌禄预感到金朝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招致灭亡，便试图提倡尚武精神，授给诸亲王以猛安的名号，命他们演习武艺，尤其是射箭。

据史书记载，1169年，^②皇帝接见宋朝中国、高丽和夏国的使者的时候，举行了一次射箭表演。宋朝使者射中箭靶五十次，而乌禄的护卫亲军中，能够命中七次的只有几个人。过后，皇帝痛心地说，护卫每隔三天才当值一次，职务太轻松了。他感叹道：“岂徒令饱食安卧而已？”²⁵

1 同313页注5。

2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3 同上。

4 同上。

5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① 应为1183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译者

② 应为1170年（金大定十年）。——译者

乌禄想以身作则影响他人。一次，他在常武殿参加击球。群臣谏止，但是皇帝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说：“朕以示习武耳。”¹为了加强军队，乌禄调整了军队的布防，把最骁勇的部队调进都城；贮存了给养，以备一旦发生战争之用。

皇帝严厉斥责那些不知体恤农民生活的官吏。1169年，^①他对近臣石琚说：“女直人径居达要，不知闾阎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间何事不知？”²

乌禄说：“朕居深宫……劳民之事，岂能尽知？”³

因此，大臣们必须经常向皇帝奏陈民情。同时，还诏令减少那些“不急之务”，“罢无名之役”。⁴

对于官吏的滥用职权，包括贪污受贿，乌禄也非常注意。他下诏说，凡是“带着礼物”即贿赂走进大臣家的人，都要革职。大臣们贪污受贿，也要罢官。^②

同时，乌禄力求尽可能实行宽刑轻典。百夫长阿思钵盗窃库藏的黄金珠宝，另一些人因受怀疑而被捕，并遭到毒刑拷问。八个人挨了杖笞，其中死了三人。事后查明他们是无辜的，皇帝说：“箠笞之下，何求不得？”诏令抚恤死者家属，各给钱二百贯，未死者各给五十贯。⁵

金朝史书描述的乌禄生平事迹，大致就是如此。毫无疑问，这

1 同上。

2 同上。

3 同上。

4 《金史》。（译注：据《金史卷九·章宗本纪》或《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罢不急之役，省无名之费”是董师中给章宗奏章中的话，与世宗乌禄无关。）

5 《金史卷四五·刑志》。（译注：所说杖笞八人，死去三人，与《金史》所载不符。《金史》原文为：“执其可疑者八人鞠之，掠三人，死五人。”）

① 应为1170年（金大定十年）。——译者

② 事见《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原文是：“（大定）十一年……尚书省奏汾阳军节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馈献，法当夺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书省、枢密院生日节辰，馈献不少。此而不问，小官馈献，即加按劾，岂正天下之道。自今宰执枢密馈献，亦宜罢去。”说的是罢去馈献，不是罢官，俄译者弄错了。——译者

些记载在许多地方是把这个人物理想化了。

只要比较广泛、比较全面地作一观察，就不难看出，乌禄的政策鲜明地反映了女真氏族部落上层的封建宗法思想。在乌禄漫长的一生中，这一部分社会势力一直是他的支柱。

乌禄总是强调，他对待贵族的态度与迪古乃截然不同。他说：迪古乃“为人如虎，处死无辜的大臣，谁的意见也不听：一句话合意就擢升，一句话不合意就降职和责罚”¹。

乌禄谴责迪古乃的残暴，因而特意诏令寻出某些被他处死的大臣的遗骸，给予礼葬。

1175年^①，他为这件事对丞相良弼说：“海陵非理杀戮臣下，甚可哀悯，其孀论出等遗骸，仰逐处访求，官为收葬。”²

乌禄本人则是虚心采纳百官的进谏。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总是倾听他们的意见。

他下达了一系列旨在维护贵族利益的诏令：规定凡告老致仕的官员，应发给终生的养老金；猛安、谋克的官职准许世袭；世袭的贵族爵位不许因小罪夺免。

无怪乎感激涕零的朝臣们1170年^②给乌禄上了一个冗长而堂皇的尊号：

“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³

乌禄（世宗）死后，他的孙子麻达葛（1181—1208年）^③袭帝位。他在位时，中国人开始为收复被女真人侵占的土地而斗争。持续了三十八年的和平时期结束了。

1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译注：《金史》的原文为：“海陵为人如虎。”“故国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责罚之。”）

2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3 《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① 应为1176年（金大定十六年）。——译者

② 应为1171年（金大定十一年）。——译者

③ 应为1190—1208年。——译者

起初，中国人“欲风励诸将”，贬谪了与金人缔结过可恶的和约的秦桧，而对抗金英雄岳飞则追赐荣誉封号。后来，1206年，中国人强渡黄河，占领了几个城市。但金人转入反攻，打败了中国人。为了巩固已取得的胜利，他们要求宋朝交出主战派中国宰相的首级。金人得到了他的头，用车拉着举行了隆重的游行，并展出示众。甚至叫人画下这个场面，作为永久的纪念。

麻达葛死于1208年，由吴乞买的后人卫绍王(允济)嗣位。他在位五年，自1209至1213年。

卫绍王时，开始了同蒙古人的战争，战争以女真朝廷和金国的灭亡而告结束。

金人与宋朝中国互相削弱的战争进行了几十年。另一方面，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一些畜牧部落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两岸从事游牧。宋朝的中国人把这些部落统称为鞑靼，或塔塔儿。《金国志》说，鞑靼是靺鞨遗种，居阴山附近。

唐代及唐代以后，鞑靼分为两支。靠近中国的一支称为熟鞑靼，从事农业，吃熟食。

远离中国的一支称为生鞑靼。他们单纯以狩猎为生。因地不产铁，用骨镞。契丹虽然和他们贸易，但并不把铁输入鞑靼地。

金国兴起后，“金人占据了黄河以东的疆域，铁和铜输入鞑靼境，他们便制造了大量兵器”¹。

中国人孟珙同蒙古军队一起参加过灭亡金帝国的战斗和围攻蔡州的战役，他在自己写的《蒙鞑备录》^①中说鞑靼国地“丰水草，宜羊马”。羊马是鞑靼人的饮食来源。据他说：“出入止饮马乳或宰羊为粮。”羊的头数为马匹的六、七倍。鞑靼人出发作战，沿途

1 B.И.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2，第 165 页。（译注：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

① 据王国维著《蒙鞑备录笺证》跋，《蒙鞑备录》的作者是赵珙。——译者

狩猎，“射兔、鹿、野豕”。靺鞨境内有几处也产粟：“彼国亦有一二处出黑黍米，彼亦煮为解粥。”^①

靺鞨人以弓箭为武器，箭杆用沙柳木做成。他们的“手刀甚轻薄而弯”^②。靺鞨“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起兵数十万”^③。

十三世纪初，经过靺鞨诸部落间激烈的流血斗争，铁木真登上首领地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原是草原上诸部长之一克烈部王罕下面的一个普通的十夫长。王罕本人受女真皇帝册封为汗，因而又算是女真的藩臣。铁木真打败敌对的乃蛮诸部和王罕的军队后，于1206年在鄂嫩河源头迭里温孛勒答黑地方大会诸族酋长，立起九游白旄纛，自封为汗。

自此，铁木真始称成吉思汗，他的民族取名为蒙古。蒙古原是先前居住在女真东北面以雄健骁勇著称的一个古老部落的名称。以成吉思汗为中心联合起来的蒙古诸部，成为一支可怕的侵略势力。他们的进攻矛头首先指向邻近的唐古特国家西夏，随后就转向女真人的金帝国。

蒙古人与金人早就结下了世仇。孟珙说，似乎在世宗(1161—1189年)时，就流传过一句预言，说是“靺鞨来，靺鞨去，赶得官家没去处”^④。世宗(乌禄)听到这话，下令立即出兵剿杀靺鞨。后来每隔三年金兵北征一次，对靺鞨游牧居地大肆杀掠，叫做“搜罗和消灭奴隶”^⑤。孟珙写道：“迄今中国^⑥人尽能记之，曰：二十年前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靺鞨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今靺鞨大臣当时多

1 同317页注1，第224页。(译注：见《蒙鞨备录·军政》。)

① 《蒙鞨备录·粮食》。——译者

② 《蒙鞨备录·军装器械》。——译者

③ 《蒙鞨备录·征伐》。——译者

④ 《蒙鞨备录·征伐》的原文是“减丁”。——译者

⑤ 原书为“中原”。——译者

有虏掠住于金国者。”²¹此外，鞑靼人每年向女真人进贡，金人只在边界以外收受，不许鞑靼人进入金国境内。结果，“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²²。

这些事件的余波长期留在蒙古人的记忆里。在《秘史》^①和拉施特所著的《史集》里，载有关于成吉思汗的祖先俺巴孩合罕之死的情节。《秘史》说俺巴孩合罕送女儿出嫁，去至阿亦里兀惕氏和备鲁兀惕氏塔塔儿部，这些塔塔儿人居住在捕鱼儿海子和阔连海子之间的兀儿失温河畔。途中，主因部的塔塔儿人捉住了俺巴孩合罕，并把他转送给中国的金汗，即女真的国君³。金国皇帝“对他们仇恨到极点”，便下令用铁钉把俺巴孩钉在木驴上处死。⁴

蒙古人传说，俺巴孩合罕死前嘱咐鞑靼人要替他向女真人报仇：“大合罕国君我为亲自送女儿出嫁，被塔塔儿部捕捉去。就是五个指甲磨尽了，十个指头坏完了，也要给我报仇！”²⁵

合不勒汗的儿子斡勤巴尔合黑也被敌人捕获，献与金汗，而且也象俺巴孩那样，被钉在木驴上处死⁶。

蒙古名将合丹把阿秃儿想必也是死在女真人手里⁷。

1 据孟珙所称，铁木真本人幼时似曾被女真人所俘，为奴十年，后逃出。孟珙写道：“所以尽知金国事宜。”但《秘史》却没有铁木真为女真所俘的记载（参见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218 页）。（译注：见《蒙鞑备录·鞑主始起》。奥氏在正文中的引文，见《蒙鞑备录·征伐》。）

2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227 页。（译注：见《蒙鞑备录·征伐》。）

3 C. A. 科津译：元朝秘史，第 I 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 年，第 84 页。（译注：见《元朝秘史》卷一。）

4 拉施特：史集，第 I 卷，第二部，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 年，第 22、42、66 页。（译注：见屠寄《蒙兀儿史记》世纪第一，15 页；冯承钧《多桑蒙古史》，上册，第 36 页。）

5 C. A. 科津译：元朝秘史，第 I 卷，第 84 页。（译注：见《蒙兀儿史记》世纪第一，第 15 页。）

6 拉施特，同前书，第 33 页。（译注：见《蒙兀儿史记》世纪第一，第 15 页。）

7 同上，第 41 页。（译注：参见《蒙兀儿史记》世纪第一，第 13、15 页。）

① 指《蒙古秘史》。——译者

1210年，^①蒙古与女真开始发生冲突。冲突的发动者是成吉思，他首先向女真人挑战。

相传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卡塔国君杀我先辈俺巴孩合罕、斡勤巴尔合黑及合丹把阿秃儿，其刑至酷。今我前往报仇，伏乞大哉天帝辅助保佑。”²¹

据中国史料记载，金国亲王允济去静州接受成吉思汗送来的贡物，成吉思汗对他有失礼仪。另外，蒙古大将遮别侵入金国境，袭击为防御蒙古人而建筑的边寨乌沙堡。

不久，金帝去世，允济嗣帝位，新任皇帝派使者送诏书给成吉思汗，传告他允济登极，要求他拜接。但是成吉思汗朝南面转过脸去，吐了一口唾沫，说道：“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于是立即上马离去。自此双方都着手备战，蒙古人开始袭击金帝国的西北界。²

史书记述了金国进行战备时的形势。1209年，^②国内笼罩着种种阴暗的预兆和恐惧：谣传上天亲自预告大难将临；一颗紫红星^③陨落下来，又发生了地震；可怕的乌云自东北方向即从蒙古草原涌来；黄河水清五百里。

皇帝出宫慰抚百姓，可是关于种种灾难的征兆的传说却愈传愈盛。

1210年，中都有恶火自渠内冒出，大风吹倒房屋、^④折断树木，

1 同319页注4，第42页。（译注：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册第67页：“1211年3月，（成吉思汗）发自怯绿连河，南侵中国。出师以前，登一高山，……跪神曰：‘长生之天，阿勒坛汗辱杀我诸父别儿罕、俺巴孩二人，脱汝许我复仇，请以臂助，并命下地之人类以及善恶诸神联合辅我。’”）

2 И. 比丘林：《成吉思汗早期四汗史》，圣彼得堡，1829年，第42—45页。（译注：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① 应为1211年（金大安三年）。——译者

② 应为1210年（金大安二年）。——译者

③ 据《金史卷十三、卫绍王本纪》，应为碧星。——译者

④ “大风吹倒房屋”云云，事在1211年（金大安三年）。——译者

黑气从北方出现，宛若峥嵘山石，白气中贯，如龙似虎。

皇帝下诏招募勇士从军并安抚逃亡者，但是不久他本人也心灰意懒，因而禁止别人向他报告“边境盗寇的恶事”¹。然而，风暴却愈逼愈近。

1211年，守卫北方边界的女真将军纳哈买住报告说，蒙古人“造箭制楯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盖欲惜马力也。”^①

女真皇帝不相信他的话，把纳哈买住当做边境冲突的肇事者囚禁起来。但是事过不久，成吉思汗就亲自带兵向女真杀来了。遮别攻陷乌沙堡和乌月营。成吉思汗败女真军于会河川，兵临西京。

西京守将胡沙虎(阿疎的裔孙)“大惧”，率守军弃城，突围逃走。蒙古人尾随追击。自胡沙虎溃逃以后，帝国整个西北部都被蒙古人占领。但西京没有陷落。

胡沙虎逃到蔚州后，抢劫官民财物。可是皇帝并没有加以惩处，“皆不问”，^②反而提升了官职。这就使得军队士气更加涣散。

同年，1211年，金军步骑四十万人在会河堡河畔被打得一败涂地^③。1212年，成吉思汗攻取了昌、桓、抚三州。秋天，蒙军包围西京。起先攻城不下，成吉思汗本人在强攻时中箭受伤。然而，到了冬季，遮别再次突然发动攻击，攻克了这座城市^④。

1213年，战事愈演愈烈。蒙古人接连攻占金国城镇，横扫一切抵抗力量。凡是不开门请降的城邑，破城之后，全城斩首。金国军官(特别是契丹族的军官)的纷纷叛降，最后又加上女真朝廷里的宫廷政变造成的混乱，使蒙古军队得以顺利推进。胡沙虎曾在

1 《金史卷十三·卫绍王本纪》。(译注：《金史》的原文是“禁百姓不得传说边事”。)

①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八·宋宁宗嘉定四年》。——译者

② 《金史卷一三二·纥石烈执中传》。——译者

③ 这里所说的仍是前面说过的会河川之役，并不是另一次战役。事在1212年(金崇庆元年)。——译者

④ 1212年冬遮别克攻克的是金国的东京，不是西京。——译者

1212年被皇帝免职，遣送还乡，但这时候又被召回朝廷，起用为军队的统帅^①。他暗藏着复仇的愿望，决计夺取政权。

胡沙虎占领了皇宫，掌握了御玺，自称监国都元帅。皇帝被废黜了，随后又被胡沙虎派宦官杀死。胡沙虎立卫绍王的哥哥吾睹补为皇帝。未几，胡沙虎被将官高琪杀害。高琪出发作战的时候，胡沙虎曾对他说：“今日出兵果无功，当以军法从事矣。”^②

高琪被蒙古人打败，便命令士兵包围胡沙虎在北京的宅第。胡沙虎想逃跑，可是在翻墙的时候被衣服裹住，跌落下来。高琪的军士捉住了他，就地斩首。

成吉思汗利用敌人军心动摇，分兵三路，从三个方面开始全面进攻。一路南下，由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

另一路由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等几员大将率领，沿海岸东进。成吉思汗本人和拖雷居中路，直取中都，即北京。

这次出征，攻克了黄河以北所有的城邑，只剩下十个城市^③没有占领。中都就是这十个城市中的一个。

蒙古军官驱使城郊百姓攻城。据史书记载，这样一来，攻城和守城的双方，“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认”，“人无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④。蒙古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洗劫了大约九十个州邑。河北、湖南^⑤、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①。

1214年春，蒙古人包围了北京。成吉思汗的左右将帅要求攻城。成吉思汗不许。据史书载，他派使者给金国皇帝传话说：“汝

1 И.比丘林，同320页注2。（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八·宋宁宗嘉定六年》。）

① 胡沙虎再次起用在1213年（金崇庆二年）。——译者

② 《金史卷百卅二·纥石烈执中传》。——译者

③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的原文是“唯中都……十一城不下”。——译者

④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八·宋宁宗嘉定六年》。——译者

⑤ 应为河南。——译者

山东、河北郡县，悉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复迫汝于险，天其谓我何？我今还军，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¹

成吉思汗缓和局势的真实原因，是蒙古方面已经人困马乏，需要休整。金国皇帝的谋士们提出应在北京城下进行决战，打败蒙军，但是皇帝拒绝了 this 建议。

金国皇帝满足了成吉思汗的愿望，把允济（卫绍王）的女儿嫁给他，送童男童女各五百、马匹三千及黄金锦帛作为陪嫁。

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下令处死虏来的青年男女数十万人。

成吉思汗退兵后，金国皇帝放弃了他认为必然陷落的北京，迁都汴京（开封府），只留皇太子做中都留守，但不久他也离开了这个城市。朝廷迁到汴京，成为成吉思汗军队再次南征的导因。这一次又是女真国家内部的混乱帮了他的忙。

大臣们把后方农民起义和经济崩溃的情况向皇帝报告说：“况海岱重地，群寇未平，田野无所收，仓廩无所积。”^①

士兵和军官都怕打仗：“一处受敌，余徒傍观，未尝发一卒以为援，稍见小却，则弃戈遁去。溃散军卒，还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² 史书认为其原因是兵疲将怯。

此外，据大臣侯挚给皇帝的奏摺所说，充任高级军官的世袭贵族，全是“自幼骄惰，不任劳苦，且心胆懦怯，何足依办？”³

最后，皇帝的卫军也发生叛乱。皇帝诏令解除卫军的马匹和铠甲。叛军投归成吉思汗。蒙古人随后即包围了中都——北京。

1215年，北京陷落。

皇帝府库所藏的财帛珍宝全被蒙古人得到。大批居民遭杀

1 同 320 页注 2，第 68 页。（译注：见《元史卷一·太祖本纪一》。

2 《金史卷一〇八·侯挚传》。

3 同上。

① 《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译者

戮。蒙古人焚烧宫室，大火一整月不熄。

此后若干年间，在被封为金国被占领地区总督的木华黎统率下，蒙古人镇服了个别女真城市和部队的顽强抵抗。目光短浅的宋朝廷也同时出兵攻打金人。他们丝毫没有想到，女真国灭亡以后，中国的命运将何等悲惨。但是，宋军为了挫败背腹受敌的女真人的抵抗和收复中国原有土地而进行的一切尝试，都没有取得成功。

鄂托喇尔城事件(1218年^①)之后，蒙古主力西去，对于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个因素使金人的危局暂时得到缓和。

成吉思汗甚至曾向女真人提议讲和，条件是让女真皇帝当河南王。据史书载，成吉思汗倾向于媾和，他说：“譬如围场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独余一兔，盍遂舍之。”¹但是，对方不接受成吉思汗的媾和建议，于是战争继续下去。

1223年，木华黎死。

同年，女真皇帝吾睹补死，终年六十一岁。皇子宁甲速(守绪)嗣位。他是金朝的末代皇帝(1223—1234年^②)。

成吉思汗发动的对女真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后进行了二十年。

1227年，成吉思汗死。临死前，他立嘱必须消灭宿仇女真，并且为蒙古首领们提出了一项借宋灭金的计划。

据《通鉴纲目》所载，成吉思汗说：女真精锐部队驻扎在潼关。南据丛山，北依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

1 H: 比丘林，同 320 页注 2，第 82 页。(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八·宋宁宗嘉定八年》。)

① 据《元史卷一·太祖纪》，应为 1219 年(太祖十四年)。——译者

② 应为 1224—1234 年。——译者

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之能战，破之必矣。言讫而崩”。¹

1228年^①，女真将军完颜陈和尚率回纥、乃蛮、羌、浑以及中国逃亡者所组成的骑兵四百人一举击败侵入大昌原的八千蒙军。《纲目》记载说，由于这次胜利，“士气皆倍，盖自有蒙古之难，二十年间，始有此捷”²。

但是，女真朝廷当时期求的唯一目标，是保住最后剩余的东西，即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土地。女真政府力求与蒙古媾和，便于1229年派阿虎带为使者，随带赠物为成吉思汗祭奠。嗣成吉思汗位当了蒙古皇帝的窝阔台不收赠物，他说：“汝主久不降，使先帝老于兵间，吾岂能忘也。赠何为哉？”女真人再次遣使，也被窝阔台斥逐。战争遂继续下去³。

1230—1231年，由速不台率军又一次发动南征。窝阔台本人、他的弟弟拖雷和侄子蒙哥也参加了这次出征。蒙古人攻占陕西，进入四川，连下许多城镇，继而围攻洛阳和皇帝所在地汴京。

女真人拚死抵抗，但是在军事上大势已去，节节败退。女真人都是仓促招募起来的，其中有些是久离田园渴望回家的农民，加之武器粗劣，所以不能抵挡敌军的冲击。最优秀的女真将帅相继阵亡，名将完颜陈和尚也牺牲了。钧州城下败阵之后，他躲进一个隐身所，但是随后就出来要见拖雷。他对拖雷说：“我……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蒙古人劝他投降，可是陈和尚说他宁死不当叛徒。蒙古人砍掉陈和尚的双脚，撕裂他的嘴，直到耳根，他喷血高呼道：“至死不屈！”几个蒙古将帅酹马奶祭奠他的亡灵，说：“好男子也！他日再生，当令

1 同320页注2，第143页。（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宋理宗宝庆三年》。）

2 同上，第146页。（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宋理宗绍定元年》。）

3 同上。（译注：见《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四·理宗绍定二年》。）

① 大昌原之战，陈迳续编的《纲目》说是在金正大五年（1228年），但据《续资治通鉴考异》，应在金正大七年，即1230年。——译者

我得之！”¹

相反，另一些金将却投降了蒙军。潼关守将投归蒙古人，为他们开放了进兵的道路。女真人向西南退却，“径入大山冰雪中”，沿途许多军官哗变。蒙古人获悉这个情况，便加速追击。金人退却的时候，正是“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随军妇女，弃掷老幼，哀号盈路”²。女真军行至铁岭，原想回击追兵，但由于饥饿，都已经困惫不支。他们投降以后，被蒙古人杀尽。

1232年，洛阳被围，城里守军只有六七千人。速不台率领蒙古军包围了城的三面，设置了抛石机。这时守军主帅是强伸。他命人撕破衣服做旗帜，竖在城垣上。

为了坚定守军抵抗的意志，他带领数百壮士“往来救应”，“大呼，以愁子军为号，其声势与万众无异”³。由于缺乏武器，洛阳保卫者用铜币铸造箭镞；每得一支蒙古人的箭，都折为四截，用圆筒发射。

他们还制造抛石机，能把巨石抛到百步之外，每发必中。蒙古军围城三个月，攻打不下，只得从城下退兵。后来，尽管窝阔台已经派遣了使者进汴京向女真皇帝劝降，速不台仍然对这个城市进行围攻。市民用竹做炮筒，城墙四面各置炮筒百余枝^①。他们拆下故宫的大木料制成楼橹。大炮的弹丸是圆的，取假山石的石料做成。

围城初期，守军在城门外筑起弯曲的土夹壁，其间宽度仅能容两三个守门士卒通过。但是这样一来，却妨碍了夜间出城偷袭。因

1 同320页注2，第176—177页。（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五年》。）

2 同上，第180页。（译注：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五年》。）

3 同上，第181页。（译注：同上。）

① 据《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五年》，用竹做炮筒、“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枚”的是攻城者，不是守城的市民。——译者

此，在城墙脚下挖了地道，派一千名勇士潜入护城濠，渡濠后以红灯为号，去焚烧敌军的木炮。但是，这一着没有成功。又用纸鸢带传单，号召被俘的中国人投向女真，也没有奏效。因此，“识者”们说：宰相想用纸鸢和纸灯打退敌人，但蒙古人害怕的却是另外一件东西——守军的火炮。守军用铁罐填以火药，然后点燃。这种炸弹名叫“震天雷”，能烧毁一百二十尺以内的任何东西，它的火花能够穿透铁甲。还使用一种“飞火枪”（火箭），可以烧毁十步以内的东西。蒙古人利用牛皮做掩护物，在城墙上掘出一些龛洞，躲在里面。守军用铁链系“震天雷”顺城墙倒挂下来，炸弹一爆发，人与牛皮便都被炸毁。

攻城战延续了十六昼夜，史书记载，双方死人各达百万^①。恼怒的蒙古人捣掘了女真皇太后的陵墓。可是到最后速不台宣布了两国已经开始和谈，蒙军便撤围了。金国朝廷派大臣出城到蒙古军营中犒劳蒙军将士，并送去一份厚礼。

皇帝利用蒙古退兵的机会，下令修复被攻城车击破的城垣，擢升守城有功的军官，赐酒肉金帛犒赏士卒。士卒们怨责一个丞相，皇帝就罢了他的官。士卒们听说皇帝准备弃城出走，就起来造反。于是皇帝命人拆毁皇宫，人心才安定下来。

但是过了不久，一个蒙古使者被女真士卒杀了。战事又起。

这时汴京存粮已经用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皇帝遂于1233年春弃城逃往四面临水的归德。

到归德后，皇帝斥逐了将军官奴，拜马用为元帅。官奴叛乱，攻杀马用，捕杀知府石盍女鲁欢，并且命令士兵包围皇帝的行宫。

这次叛乱共杀死士卒、官吏、平民三百人。

官奴还叫人去捉拿皇帝的近侍把奴申，但是皇帝把宝剑扔到

^①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五年》说的是：“蒙古攻城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译者

地上,因而来人未敢动手。

官奴来到皇帝面前,说被杀者是为谋反而处决的。皇帝“不得已”,便赦他无罪。此后,官奴把皇帝安置在照碧堂,谁也不敢去那里奏事。皇帝每日悲泣,悔恨自己不会识人,以至被人囚禁。但是,官奴在六月间被杀了。原来皇帝命忠于皇室的完出埋伏在门后,召官奴进殿议事。官奴进见,完出跃起,用矛把他刺倒,皇帝亲手割下了他的首级¹。

被速不台围困的汴京饥馑大作;守城军民纷纷饿死,各种皮革器物都拿来糜煮而食,竟有自食其妻子和子女的。贵族第宅、市楼、肆馆被拆了当柴烧。

除了饥馑,又爆发了厉疫,十五天内夺去了九十万人的生命^①。

元帅崔立利用民心的波动和士气的涣散,发动了政变。他杀死留守京师的亲朝派完颜家族成员——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捏阿不,随后就立亲王从恪为皇帝,自封为大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崔立夺取政权后,就和速不台进行谈判。崔立穿着皇帝的衣冠,出城见速不台。在宴席上,崔立对速不台“以父事之”。后又下令烧毁全部楼榭,并把从恪、两太后、诸亲王、皇室五百人、学者、僧侣、绣女、医者、画师等人献给速不台。

蒙古士兵照样虏走了崔立的妻妾和财宝。崔立闻讯,“大恸,无如之何”^②。人口一百四十万户的汴京面临着全城抄斩的惨祸。但是耶律楚材出面为这个城市讲情,因此,只斩了完颜氏宗族的成员。

紧接汴京的陷落,洛阳也因为粮尽而失守,守军向蒙古大将塔

1 《金史卷一一六·蒲察官奴传》。

① 《金史卷十七·哀宗本纪上》说的是:“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译者

② 《金史卷一一五·崔立传》。——译者

察儿投降。

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女真皇帝正由归德逃奔蔡州。同时，宋朝同蒙古结成了军事同盟，派兵从背后攻击女真。

由于对金人怀着旧恨而变得盲目的宋朝，也正在走向灭亡。金国皇帝派遣使者去宋廷传话说：

“蒙古^①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①

这个警告是有道理的，也是及时的。然而，执迷于战争狂热的宋朝廷所想的只是彻底消灭可恶的女真，收复黄河、淮河之间的中国原有疆土。

这时人们都已经明白，女真国家和金朝的末日已经来临。扈从皇帝逃往蔡州的官吏们艰难地拖着浮肿的双腿在泥水中徒步行走，沿途采集青枣当作粮食。

在亳州城里，女真父老出来迎接皇帝，他们遵照旧俗，伏在道旁，向圣上跪拜。皇帝对他们说：“国家涵养汝辈百有余年。今朕无德，令汝涂炭，朕亦无足言者。汝辈无忘祖宗之德可也。”百姓们高呼“万岁”，痛哭流涕。皇帝由亳州赴蔡州。蔡州父老也排列道旁，跪拜迎接。他们看见皇帝仪卫萧条，莫不饮泣，皇帝自己也嗟叹不已^②。

1233年9月，塔察儿统率蒙军到达蔡州城下；据史书说，城内大小将领十分“踊跃”，很高兴有机会同可恶的敌人决一死战。守军击败了塔察儿，可是孟珙率领宋军两万人前来援助蒙军。中国人还给蒙古人运来大米三十万袋^③。

1 《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纪下》。

2 H. 比丘林，同 320 页注 2，第 217—218 页。（译注：《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六年》。）

① 《金史》原文为“大元”。——译者

② 《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六年》的原文为“运米三十万石”。——译者

蔡州开始被围。

11月，两路敌军携带攻城器械和抛石机逼近城垣。守军主帅忽斜虎^①征召全城百姓参加守城，叫“妇女壮健者”穿上男人的衣服，搬运木石。皇帝亲自出面“慰抚”城中百姓。

12月，塔察儿派将军张柔率精兵五千人攻城。城内居民用钩子将两个敌人拖上城垣，张柔“中流矢如蝟”。宋朝的中国人打到柴潭，在潭上设立木栅，然后开始夺取柴潭楼。据说楼上有龙，并且埋伏了连弩。可是攻城者放干了潭水，“鱼贯而上”，攻取了这座楼。¹

随后，宋、蒙两军包围并攻破了外城，进逼土门。

关于这座被围困的城市在除夕这一天的情景，《纲目》中有一段生动的描写：“蒙古兵以正旦会饮，歌吹之声，四望相接。城中饥窘叹息而已。”孟珙（宋将）见到“黑气压城上，日无光。降者言城中绝粮已三月，鞍辔败鼓皆糜煮，且听以老弱互食；诸军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往往斩败军全队，拘其肉以食。”²城内当局“驱其老稚”，熬为人油，用干草蘸人油，去焚烧敌军的工事和攻城器具。显然，他们相信这种可怖的手段具有一种魔力。尽管采用了这种极端的手段，攻城者仍然占领了西城。

守军在英勇的将领忽斜虎的统率下，继续日夜鏖战。

皇帝曾试图弃城脱逃，可是在设置了木栅的地方遭遇敌军，只得返回。此后他下令宰杀厩内马匹，宴飨将帅。可是，这个城市的命运这时已成定局。蒙古人在城墙西段凿开五个豁口，冲进城里。他们在黄昏时退出城外，声言第二天还要进城来作战。

当晚，皇帝召见百官和将帅，传位给亲王完颜承麟，授予国玺。

1 同329页注2，第227页。（译注：《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九·理宗绍定六年》。）

2 同上，第233页。（译注：《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二十·理宗端平元年》。）

① 即完颜仲德。——译者

承麟不受，守绪便对他说：“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²¹

次日，敌军从两个方向攻城。鼓声隆隆，“呼声震天地”。忽斜虎率战士一千人坚持巷战。

守绪见城破国亡已不可免，便说：“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逃亡或投降敌人，朕必不至于此。”²²言毕自缢。守绪死前，嘱告左右火化他的尸体。忽斜虎听到皇帝的死讯，便说：“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矣。”^①说完就投河自尽了。

承麟退进堡砦，企图防守，但是被叛军杀死。

守绪的骨殖、珠宝、法物都被蒙古人和中国人作为战利品瓜分了。

个别地方，女真人继续抵抗。例如，据史书记载，1235年，汪世显管辖下的巩昌城仍未投降，但是他后来也宣布臣服于蒙古人。

女真帝国就这样悲惨地灭亡了。

十二——十三世纪的女真人

根据中国史家的看法，女真人创建的国家一共存在了一百一十八年，这是从阿骨打举兵反契丹的时候算起的。事实上，如果从以完颜部落为中心形成女真部落联盟的时候算起，也就是至少从乌古乃和勑里钵开始，女真国存在的时间差不多要长一倍，大约有两百年之久。

1 同上，第234页。（译注：同上译注。）

2 《金史卷十八·哀宗本纪下》。（译注：俄译不确。原文为：“……往往为人囚禁，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

① 《金史卷一一九·完颜仲德传》。——译者

《金史》^①对女真人的生活作了生动的描写。这无疑是二百年间女真生活的基本状况。

《金史》^①说，女真人地居原契丹国东北隅，多山，富产林木。土地宜于种植大麻和谷物。土产有人参、松实、蜜腊、北珠、生金、细布。境内多牛、马、猪、鹿、麝、^②青鼠、貂。女真国土以产隼、鹞、海东青等猎禽而闻名。

女真人性“勇悍，喜战斗，耐饥渴苦辛，骑上下崖壁如飞。济江河不用舟楫，浮马而渡”^③。

女真人善射箭，喜好渔猎：“每见野兽之踪，蹶而求之，能得其潜藏之所；又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而射之。”^④

他们对射猎的爱好非常强烈，以至早期的金国朝廷“四时皆猎”，后来海陵王（迪古乃）迁都到北京，因为“城外皆民田”，所以只有等到冬季才能出猎。可是，一到冬季，必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是花在围猎上的。后妃、亲王、近臣都参加围猎。每次打围场，都有随驾军士密布四周，把狐狸、野兔、野猪、鹿、麝^④赶进围里。野物必须先由皇帝射猎或放鹰隼击擒，接着是亲王和近臣射击，然后才轮到其余的人。

海陵王（迪古乃）酷爱打猎，当他十二岁的儿子光瑛捕获了一只麝^④的时候，他竟以此“告太庙”，即祭祀祖先。世宗“嗜猎尤甚。有三事令臣下不谏，曰作乐，曰饭僧，曰围场，其重田猎如此”¹。

农业在女真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土地显然是用牛耕，因为据说农村居民的赋税是按照牛的头数摊派的。女真人的主食是谷物做的食品；难怪阿骨打在决战之前叫战士们吃炒面糊增强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312 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六·田猎》。）

① 据下文所引的材料，应是《大金国志》。——译者

② 应是“麋”。——译者

③ 《大金国志卷卅九·初兴风土》。——译者

④ 应为“獐”。——译者

体力。

女真人住地“多依山谷，联木为棚，或覆以板与桦皮，如墙壁，亦以木为之。冬极寒，屋才高数尺，独开东南一扉，扉即掩，复以草绸缪塞之。穿土为床，煇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¹

可见，女真人住的是地面的住所。相传远在古代纣可就教会他们建造地面的房屋，以代替半地穴式住所。房屋用土灶烘暖，沿墙壁搭有宽敞的土榻一炕。炉灶的热气从炕下通过。人睡在热炕上。在阿穆尔河沿岸的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这类住所的遗迹，屋内有用石板搭成的炕。那乃人及阿穆尔河沿岸其他部落的住所，结构都与此相同。

女真人的冬衣是用厚毛皮缝制的。关于该国严峻的气候，中国人怀着惊惧的心情写道：“衣履稍薄，则堕指裂肤，虽盛夏如中华初冬。”²

除皮衣外，女真人还穿麻布衣服。这种布是他们国内大量生产的。中国史料报导说，金人爱穿白色的衣服。

女真富人穿的是贵重毛皮、丝绸、细布做的衣服，往往絮以丝绵。

穷人春夏两季穿短衣和内衣，冬天穿兽皮(包括鱼皮)制的上衣、裤子和袜子。

妇女的袍子叫大袄，跟男人的袍子一样，没有领子。

女真人的头发披散在肩上，这是他们与蕃辮的契丹人不同的地方。他们的后脑勺上垂着一个装头发的金色袋子^①。头发用彩绳系着。富人用珍珠和金子做首饰。妇女辮发盘髻。

后来，女真妇女中逐渐流行裹中国式的头巾。

1 同329页注2，第200页。——译者

2 H. 比丘林，同320页注2，第200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的原文是：“……唯盛夏如中华内地。”)

① 《大金国志卷卅九·初兴风土》的原文是：“垂金镮(锁)”。——译者

在女真人的婚俗中，还保留着一些远古的遗风。婚姻很早就由父母约定，即所谓“指腹为婚”。成婚的那一天，未来的女婿由亲戚陪着，携带酒馔，来到女家。“少者十余车，多者至十倍。”佳酿用金银器盛着，次一些的酒用瓦罐装着。贫穷人家盛酒用木器。酒过三巡，大家就吃油脂，样子象中国的蜜羹^①。然后，富贵人家沏茶，贫穷人家煮奶，招待客人^②。

酒席上，女人们^③不分大小，都坐在炕上。婿党毕恭毕敬地服侍她们，叫做“男下女”。过后，新郎牵出马，少者十匹多者百匹，岳父挑最好的留下，以牵出供选看的马匹头数少“为耻”。女家以衣裳赠送新郎，作为对婿家送来马匹的酬答；每留一匹马，酬送衣裳一套。

婚礼之后，新郎留在女家，“执仆隶役，虽行酒进食皆躬亲之”。三年之后，才能带新妇回家，女方陪送奴婢数十户，牛马若干。以上是富家的情形。至于贫苦人家，则是父母“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偶之意。听者有求娶欲纳之，则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母”¹。女真富人，无论出身贵贱，都有众多的妻妾。还有一种风俗，即父死后娶后母为妻，叔伯死，则侄儿娶其遗妻。

女真人历来信奉萨满教。在晚世的平民和守旧的人当中，萨满教想必仍占统治地位。萨满的法衣是一件缀满铁环的裙子²。根据1956年苏昌地区西叉河谷赫麦利尼茨卡亚村附近出土的萨满服装残件，可以断定这种法衣的式样。在这个地方，电工 П.М. 穆

1 同 333 页注 2，第 203—204 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九·婚姻》。

2 同上，第 202—203 页。

① 《大金国志卷卅九·婚姻》的原文是：“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说的是软脂象“寒具”，即油炸的馓子。——译者

② 《大金国志卷卅九·婚姻》的原文是：“宴罢，富者谕建茗，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译者

③ 《大金国志》原文作“妇家”，指的是女方的家属，不是“女人们”。——译者

兹钦科在一场暴雨冲开的地层里发现精美的铜镜九面、中国钱币四枚、圆锥形萨满佩饰二十三件。钱币三枚为“崇宁重宝”，一枚是“崇宁通宝”，全是宋徽宗时(即 1102—1106 年)铸造的。Э. В. 沙夫库诺夫在现场查明，铁制的佩饰是堆放在一起的，上面放着铜镜。那些十二世纪的钱币则在附近，距佩饰半米¹。

这里出土的铁制饰物，当是萨满腰带上悬挂的坠子。那乃人中曾有这样的萨满腰带，是用驼鹿皮制成的宽皮带。皮带上挂的叮当作响的小饰物都是圆锥形的，大多是萨满本人用铁打造出来的。每一个圆锥体挂在一个专门的铁环上，铁环缝在皮带上。这种铁制的圆锥体的数目少至十三个多至三十一个，即必须是奇数。苏昌出土的佩饰也是奇数的(二十三件)。除了这种中空的铁制圆锥体，腰带上还可以系托利(即金属镜)、小铜铃、小铜铎之类。这样，腰带的总重量达到七公斤。萨满舞蹈时，腰带上的全部金属部件发出震耳的铿锵声和噪音。



图六十九 女真时代的铜镜。
1956年苏昌出土。

那乃萨满的托利(镜)有如下的功用：“它是一种能够照出人间一切事情的镜子。此外，托利还是萨满用的盾牌，可以防御恶鬼射来的箭矢。因此，每当萨满举行巫术仪式时，装神念咒同敌人格斗得胜之后，就在托利上凿孔，凿多少孔，就表示恶鬼射了萨满多少箭。托利上穿孔愈多，萨满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愈高。托利

¹ Э. В. 沙夫库诺夫：《女真镜窖藏(手稿)》，见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室底案。

悬挂在皮带上，皮带套在脖子上，这样，托利就挂在背后和胸前。一个萨满可以有几个甚至很多托利。当萨满开始穿法衣的时候，他的助手便从他的袋里取出托利（托利愈多，就说明萨满愈富），用嘴喷以中国烧酒或俄国伏特加，然后把它套在萨满的头上。²¹

那乃萨满裙子上的圆锥形铁佩饰，是和镜子一起成堆地吊在身后的²。在女真萨满的裙子上面，这些物件想必也是这样吊着的。这是那乃萨满服装所独具的特点，而不见于西伯利亚其他地方的民族，也不见于所有别的通古斯部落。那乃人是女真人的后裔，这个特点，无疑是他们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且几乎保存了一千年。

女真萨满医治病人，病家杀猪狗禳鬼。

但有时却把治不好的或危险的病人用车载入深山峡谷“以避之”。亲戚和朋友死了，人们就用刀割破自己的额头，让泪水和血掺混在一起，叫做“送血泪”。死者埋入地下，不用棺材。“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①给死人上供的食物也一起烧掉，叫做“烧饭”²²。

女真人的节日中有元旦，在这一天要向太阳礼拜；还有端午，是祭天的日子⁴。

女真人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含有父系氏族社会的特征，不过也还有明显的母系氏族时代习俗的残余，如上面说过的新郎在女家留住三年的风俗。

关于女真人的氏族和部落结构，如果不能说保存在从女真国

1 H. A. 洛巴金，同 94 页注 1，第 261 页。

2 同上，图 31—35。

3 B. П.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200 页。（译注：见《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

4 同上，201 页。（译注：同上。）

① 《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初兴风土》。——译者

家的兴起到它的灭亡为止的整个历史过程里，那么至少可以说保留得很长久。特别有名的部落有女真国家史上著称的完颜部，它分为十二个氏族；另外还有徒单部、乌古伦部，这些部落各自又分为偶数(十四)的氏族。据此可以推断，女真部落都是分为两个胞族的。在十一世纪中叶，即劼里钵时候，由三十个部落形成的部落联盟已经臻至巩固。

加入联盟的部落有一个富有特征的称谓，都叫作“昆弟族”。这个联盟已经具备相当可观的实力。

氏族和部落的首领起先是推选出来的酋长。部落的首领称为孛堇或忽鲁。满清时代的女真历史作者们认为孛堇一词就是满语的贝勒。尽管 B. II. 瓦西利耶夫不同意这种解释，但这种说法还是很可信的。

到了战时，要另选新的酋长。这使我们联想起古代通古斯氏族实行的制度，即同时有两个酋长，一个管民事，一个管战事。

女真人的历史表明，女真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完颜部的一个家族出身的。联盟大酋长的称号往往是父子相传。

在氏族群的范围内，看来正在逐渐形成区域性的公社：在几次打败契丹和北宋之后，公社成员开始领得土地、耕牛和犁具。为此征课的赋税，数额是公社成员每二十五人每年输粟一石。女真氏族和部落中几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显得强烈。女真社会中早已存在贫穷的和富有的氏族成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女真的普通士兵也有一个跟丁(“伊勒希”，意思是“副从”)。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与别国交换的增长，旧的原始公社制即氏族制的关系日益瓦解，让位给阶级的关系。女真诸部上层贵族进行的氏族间及部落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促进了这一过程。

战争带来了奴隶和牲畜，以及各种珍宝，包括金属制品。女真

上层贵族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并不断加强他们的权力。

这样，在旧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便形成了产生女真国家的条件。而乌古乃和勃里钵则是这个国家的奠基者。

在女真国家的鼎盛阶段，即阿骨打以后的时期，财产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即使从正史中简略而片断的报导来看，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正史的作者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民众，而是帝王将相的活动。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蓄奴的制度在女真人中，特别是在高级贵族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 1168 年，^① 即乌禄在位时，尚书省奏请遣发役夫为越王永中、隋王永功两太子府营造宫室。

皇帝说：“朕见宫中竹有枯瘁者，欲令更植，恐劳人而止。二王府各有引从人力，又奴婢甚多，何得更役百姓？”²

富人嫁女的陪嫁，用奴婢数十户，牛马若干群；奴婢和牲畜在这里是合在一起计算的。根据十二世纪八十年代的一项材料，可以推定奴婢的人数以及奴婢与自由民的比例。当时，六百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个居民有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人，约计每六个人有一个奴婢，也就是平均每户有一个奴婢^②。

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与其他部落及宋朝中国进行的战争。³ 罪人，有时连同家属，也被籍没为奴婢³。

穷人卖身为奴或卖亲属为奴是很经常的事。

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2 华山、王庚唐：《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 and 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 年第 6 期，25—32 页。

3 B.И. 瓦西里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207 页（译注：《金史卷四五·刑志》的原文是：“杀人及盗劫者，击其脑杀之，……以家人为奴婢。”）

① 应为 1169 年（金大定九年）。——译者

② 这种计算方法是错误的。6,158,636 这个数字是金大定二十三年的人口总数，内正口 4,812,669，奴婢口 1,345,967。当时有谋克 1878，平均一谋克有奴婢七百人以上。据《金史卷四十六·食货一·户口》。——译者

早在吴乞买在位时就曾下达诏令：“权势之家，毋买贫民为奴。其胁买者，一人偿十五人；诈买者，一人偿二人，皆杖一百。”²¹

吴乞买还诏令从迁回宁江州的人家赎出“卖身者”六百余人。²²

1163年^①，乌禄在位时，发生了大旱和蝗灾；“百姓艰食，父母兄弟不能相保，多冒鬻为奴”。皇帝下诏派遣官员各处调查，凡查出这样一类的奴婢，就动用内库把他们赎出来³。

无力偿债的欠债人也沦为奴婢。

然而，奴隶制并不是生产的基础。在生产力增长、交换发达以及与辽国、封建的中国和朝鲜的联系的影响之下，取代女真父系氏族制而出现的是封建社会，主要的剥削形式显然是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

史书记录了一段值得注意的故事，它部分地揭示了这种剥削形式。1179年，^②有人禀奏世宗(乌禄)说：“山后之地皆为亲王、公主权势之家所占，转租于民。”²⁴

这已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形式一代役地租制。

为此，皇帝严厉申斥了宰臣，可是实际上大概一切都是依然如故。

由于女真封建宗法上层人物对平民的残酷剥削，由于经常发生的灾荒和饥馑，国内有大量流离失所、行乞为生的难民。史书在1163年^③项下援引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实：“上谓侍臣曰：秦王宗翰(粘没喝)……何乃无嗣？……上曰：朕尝闻宗翰在西京坑杀乞丐

1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2 同上。

3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4 《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

① 应为1164年(金大定四年)。——译者

② 应为1180年(金大定廿年)。——译者

③ 应为1164年(金大定四年)。——译者

千人，得非其报耶？”¹

因此，无怪乎强大的“黄金帝国”多次被人民的骚动和起义所震撼。

宫廷的史官们不愿意提起这类事件，可是在正史的字里行间，偶尔仍然透露出这类事件的一鳞半爪。

麻达葛在位时，连年歉收。人民“有养马、签军、挑濠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①

大臣董师中向皇帝警告说，如果他要带着扈从出巡游乐，将会发生横祸。董师中说，现在“饥饿之徒”又会象早年一样“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者矣！”²

丞相把人民起义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使皇帝这一次居然听从了臣下的忠告，放弃了劳民伤财的巡游。

可是，每当全国遇到危机，人民起义的火焰就一次再次地燃烧起来。迪古乃发动使他丢了性命的攻打宋朝中国的战争时曾是如此，女真同蒙古的最后一次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在这持续三十年的战争期间，全国尤其是山东境内，“红袄贼”和“黑旗贼”等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停止过。起义者冲进城邑，杀掠贵族，歼灭驻军，然后扬长而去。他们有时也被金将击败，但随后却又出现更多起义者，给政府军以新的打击。

例如，1214年，山东将领仆散安贞受命攻打“红袄贼”。但是后者消灭了三万政府军。^②这时，大臣张行信上疏，建议改变镇压起义者的老办法：“向者官军讨贼，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

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2 《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① 《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译者

② 这里把史实讲错了。《金史卷十九·宣宗本纪上》载：金贞祐三年（1215年），山东宣抚使仆散安贞派提控仆散留家等去镇压杨安儿率领的红袄军，结果是红袄军损失三万人，被官军打败。——译者

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盖不足虑。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奸人……势渐消矣。”¹

可是，这个建议自然是无法实行的。农民起义仍在继续。

在阿骨打开创的全盛时期，金国的疆域划分为十九个“路”，或称郡。其中五个“路”是以京城命名的，即：南京中都（今日的北京）、东京辽阳（在满洲）、上京即北京（会宁府）、西京大同府（在长城外）。^①

女真的首府最初当在牡丹江畔宁古塔附近，也就是渤海的东京所在地。后来，熙宗时的都城是上京（会宁府）。十五年以后，迪古乃在位时，把都城迁到北京。^②1160年，诏令禁止旧京居民返回原籍，彻底毁平了旧京，甚至把城址都翻耕了。³

据中国人说，1125年，女真的五京之一（应是指皇都）周围有三米多高的土城。城内没有街道，皇宫与其他建筑不同，四周栽了一圈柳树。³

金帝国早期的简朴的京城和州邑，后来变得日益富丽，建造了壮观的屋宇、宫室和寺庙。乌苏里斯克城附近克拉斯诺亚罗夫山岗上的建筑遗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麻达葛在位的时候，他的一个丞相描写京城的气象说：“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物，足以阅习武

1 《金史卷一〇七·张行信传》。

2 B. П. 瓦西利耶夫，同261页注2，第96—100页。〔译注：见《金史卷五·海陵本纪》。事在1157年（正隆二年）。〕

3 华山、王麋唐，同前书。

① 据《金史地理志上·中》，金海陵天德五年时，以京城命名的五个路是：中都路（治所大兴府）、南京路（开封府）、西京路（大同府）、北京路（大定府）、东京路（辽阳府）。

——译者

② 指中都、燕京。——译者

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²¹

除了五京之外，还有十四个府治，即B. П. 瓦西利耶夫所称的总管府。此外，在这些“路”的范围内，还有一些较小的建制，包括防御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县六百三十二。

在中国，女真人的领土位于山西、直隶南部以及山东、河南、江苏。十九个路中有十五个是在这些地区。

在蒙古，女真帝国边界的走向是：由呼伦池开始，几乎成一直线直达戈壁以南今日的呼和浩特。因此，整个蒙古草原和戈壁都在这条界线之外。在东北方向，女真的领土达到吉里迷（显然是基里亚克人）和兀的改（乌德人、乌德盖人）部落的居住地。

然而，及至乌禄在位时候，“兀的改部”仍是独立的，并不受金国的管辖。乌禄也曾下令不要侵扰他们。

在蒙古和东北，有四个大郡（“路”），并且有相应的四个京城。东京路包括东北南部，中心在辽阳。这个城市早自汉代起就是这个地区的首府。东北北部，即后来的吉林和萨哈连路，属于上京路，或称会宁府。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会宁府的遗址就在宁古塔附近渤海东京城的原址上。但B. П. 瓦西利耶夫则认为，这个城址是在临华府^①对面。

上京所管辖的各府内有呼尔哈府，或称宁古塔府。再往东去，是恤品故地，或称率宾故地。它的中心城市位于上京东南一千五百七十里，距呼尔哈一千一百里，在今日的乌苏里斯克城区内。恤品府南达朝鲜图们江。^②

北京路包括东蒙全部和东北一部分。西京路包括山西、直隶各一部分和今日的察哈尔。

1 《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

① “临华府”不见于中国史书。此处按俄文音译（Линьхуа-фу）。——译者

② 当时上京路只有一个府，即会宁府，下领胡里改路（即呼尔哈路，是节镇）、恤品路（节镇）等地。宁古塔是清代地名。——译者

1207年，帝国有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人口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包括满洲人和异族人在内。女真人本身以及归附女真的诸部落共有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中奴婢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口）。^①

国家行政机构仿照中国制度。国家元首是皇帝。

女真人把皇帝视为圣上，正如皇帝（天子）之于中国人一样。任何人见到他都要下跪。例如，当蒙古人围攻汴京的时候，皇帝忽然从端门出来，于是“人惊愕失措，但跪于道旁，老幼遮拥，至有误触御衣者”。¹

皇帝遵循中国式的礼制起居行动。皇宫非常豪华富丽。皇帝坐朝时，头戴蜀锦皇冠，^②身着窄袖褚袍和黄色圆领，腰系“玉带”（当是缀有玉佩饰和玉带钩的腰带）。

在举行祭祀和其他典礼的时候，皇帝穿戴袞冕法服；平居闲暇时则头戴皂巾。皇帝乘车出入，用一面日旗为前导，如果偕同皇后，则要增加两面月旗。旌旗一般都是黑色的。御驾出行的时候，銮舆周围有两面日月大绣旗。

每逢“大”礼（即隆重的典礼），要使用大量的旗幡，有五岳、青龙、白虎等等；此外，皇帝身边有一面五星联珠旗，还有一面名为“盖天”的大旗。在这面旗上悬挂着一些有魔力的神物，^③由最强悍的勇士执着。旁边有数十人拉着绳子护旗，以防风势。在皇帝头顶上，支着一把黄色或红色的伞，伞顶有一条金龙。

1 H. 比丘林，同 320 页注 2，第 183 页。（译注：见《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六·绍定五年》。）

① 所引“女真人”户口数字是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的猛安谋克户口统计数字。——译者

② 应为“须纱幘头”，见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四·服色》。——译者

③ 《大金国志卷卅四·旗帜》原文为：“近御又张一大旗，其制极广，错绘神物。”——译者

皇帝的仪卫由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组成。宫廷生活遵循着严格的礼仪制度。

吾睹补的老师杨云翼对宫廷的礼俗作了如下的描述：“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¹

皇后的宫室也是非常豪华的。皇后和贵妇有华盖殿车，如“五花楼”的形状，车身嵌金镶玉，极为富丽。车有双轮或四轮。皇后的车，四角有金凤。其他贵夫人的乘辇各按其品位饰有金孔雀和银螭头。

皇后的头顶上，张着一把以金凤为顶饰的大伞。宫中贵妇则用黑伞，以红浮图或青浮图为顶饰。²

国家的中枢机关是尚书省，首长是尚书令。他的助手们平分为“左”、“右”二司。尚书省的下属机构与中国制度相同，有吏、户、礼、兵、工、刑六部。此外，还有大宗正府、御史台、登闻检院、国史院、翰林院。

掌管税赋钱粮的有一种专门的税务机构——都转运司。

女真人民原来没有缴纳赋税和服徭役的制度。但是从金帝国建国时起，就规定了税制，即物力钱。这种赋税是按照住宅和人口的多寡征收的。

此外，还征派名目繁多的税金和徭役，有铺马钱、军须钱、河夫钱等等。

定居户按耕地数缴纳谷物赋税。例如，约在1162年，国家的仓廩贮粟达二千零七十九万余石；每年收取田赋达九百万石。国家还征课盐、酒、醋、茶等间接税。

1 《金史卷一一〇·杨云翼传》。

2 B. П. 瓦西利耶夫，同261页注2，第213—214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四·车伞》。）

女真人起初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不用货币。“其市无钱，以物博易……其舍屋车帐往往自能为之。”¹

但是后来，金钱以及货币流通在帝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政府遂对钱币发行极为重视(图七十)。

金国初年，沿用契丹钱及宋钱。迪古乃(海陵王)时，首次铸造本国钱币。为此，禁止民间使用红铜。甚至红铜器皿也只许官家出售。至于铸出的钱币，起先是害怕官钱积而不散，于是当局规定钱币必须迅速流通到民间。后来发现民间把钱币藏匿不用，于是又规定了贮存钱币的最长时期，违限者严惩不贷。但是，民间又开始私铸钱币，引起国家财政混乱。此后，铸造了低于实际价值的大钱，^①不久又发行铁钱。此举失败后，发行纸钞。结果币值跌落，物价上涨，于是又铸发银币。这些层出不穷的币制改革，都只能使帝国局势更加困难，经济日益衰败。²

女真国家以强大有力、组织完善的军队为柱石。

女真的军事组织最初是以氏族部落的建制为基础的。诸部落酋长各自掌握着一支常备的兵力——保伍。但主要的军事力量则是全体民众。凡是能够拿起武器的人在战时都成为战士。每一支军队都由部落首领统率，首领叫作勃极烈，他下面有千夫长猛安、百夫长谋克。

阿骨打改革了兵制。他决定以三百户为一谋克，以十谋克为一千猛安。³这样就大大改变了旧的氏族部落传统和秩序。想必这



图七十 世宗皇帝(乌禄)时(1178年)铸造的女真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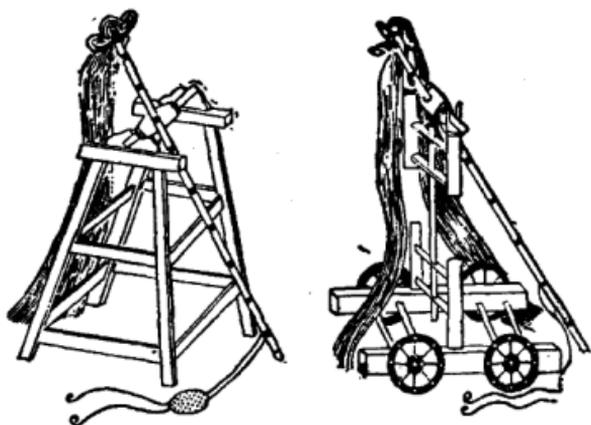
1 同上，第201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九·初兴风土》。)

2 同上，第122—123页。(译注：《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钱币》。)

3 同上，第113—114页。(译注：据《金史卷四四·兵志》，应以十谋克为一猛安。)

① 可能是指“泰和重宝”。——译者

种作法是同女真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实际变化相适应的。至少在帝国中部与南部是这样，因为在这一带地方，中国的影响比较强烈，使古老的父系氏族生活方式逐渐解体。



图七十一 宋代的中國拋石機。

除了作为主力的女真军队之外，还有由归附的契丹人、中国人以及渤海人组成的军队。

关于女真人的战术，女真历史在讲到阿骨打与辽帝的军队发生冲突时作了详尽的描写。阿骨打把骑兵分为五十人一队。前锋二十人，穿重甲，持刀、矛。其余三十人，穿轻甲，执弓箭、镖枪。

遇到敌军的时候，先派出斥候。随后，把军队分为中路和两翼，包抄敌军，四面同时进击。

女真骑兵冲向敌阵时，到达距敌一百步远的地方，就把缰绳挂在马颈上，一边张弓放箭，投掷镖枪，一边朝敌军疾驰。然后再同样疾速地返回。这样，骑兵连续冲锋，一当敌方阵脚混乱，就上去用马刀砍杀溃敌。¹

¹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满洲的居民》，哥廷根，1830年，第123页。（译注：参见《三朝北盟会编·三》。）

这是草原部落的典型战术。其中有许多东西想必是女真人从邻族和前统治者契丹人那里学来的。另一方面，女真人的军事工程技术也达到了高度水平。

女真人向中国人吸取了许多东西，但是也有其本身的传统。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自然条件的掩护——高地和林木茂密的陡峭山岗。

这样的山岗本身就是天然的堡塞，加上四周绕以土垣、堑壕、木栅，更使敌人难以进犯。

个别女真部落早就据有这一类山寨。至于金帝国的各个重镇——京城和府邑，也全都设有牢固的防御工事。

除永久性的城寨外，还有临时性的工事。

当敌人进攻时，女真部落往往在狭窄的山谷里设立防栅。有时女真军队在行军驻地四周堆筑临时性的壁垒，以防备敌人骑兵的攻击。

例如，离卡瓦列罗沃村不远的一座古城，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设施。这座古城位于一个高地上，离河道很远，古城中也没有任何定居遗迹。

这类城寨的数量是很多的，我们拟在后面讲到滨海地区的中世纪遗存时再作较详细的介绍。在充满战事记载的女真史里，经常提到这类城寨。

女真人的武器有抛石机。后来又出现了飞火枪，类似俄罗斯中世纪编年史里提到的“希腊火”。（见图七十一）

女真人的兵法不在东亚其他民族之下。可以说，其所以能够同威严的蒙古大军长期作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凭借了这一点。蒙古人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征服了北亚和东欧的许多国家，不过用了两年功夫，就以狂风烈火之势从阿穆尔河打到黑海和波罗的海，可是为了制服女真人，灭亡女真国家，竟花费了将近三十年的

时间:

金国的刑法起初是沿用辽法。后来熙宗(合剌)(1141—1148年^①)时颁布了“皇统新制”。刑律有千余条。中国人说,金国刑法极严。杀人及盗劫者,“堪其脑而致之死,籍其家为奴隶。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其赃,以十分为率,六归主,四没官”^②。

罪重者处以斩首或绞刑。后一种处决方式被认为是“比较轻”的,因为免去了重杖的毒打。

犯了重罪有时也可以自赎,但是仍要割去鼻子和耳朵。罪轻的用枝条笞打,有时则用木棍和装满沙子或石块的革袋责打罪犯。但是后来取消了责打。

监狱是深达数丈的地窖。徒刑最长的期限是五年。极刑是死刑。凡判徒刑的人都要受一定数目的杖责(判五年者杖责二百,四年者一百八十,三年者一百六十,两年者一百四十,一年者一百二十)。

服徒刑的地点叫作“都作院”,囚徒在那里锻造铁锹^③或从事沉重的土工。脚腕用脚镣锁着。“罪轻者用一,罪重者二之。”犯人服刑期满后即行释放,但是被褫夺了公权,“不得依旧为百姓”。¹

遇到大赦,犯人可以得到宽宥。《辽志》^④说:“金国以赦宥最为大事,或改元、或生子(皇子)、或册封、或迁都、或灾异,并皆肆赦。”

诚然,迪古乃(海陵王)即位以后,“尝谓赦宥非国家帝典,若惠奸宄,则贼良民”,因此诏告禁止谈论赦宥的事情。可是“不两年,

1 B.П. 瓦西里耶夫,同261页注2,第207—208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六·科条》的原文是:“年限满,则还便,不妨依旧为百姓。”)

① 应为1136—1149年。——译者

② 《大金国志卷卅六·科条》。——译者

③ 《大金国志卷卅六·科条》的原文是“使之磨甲”。——译者

④ 应是《大金国志卷卅六·赦宥》。——译者

躬自蹈之”。¹

关于女真国的文化生活，只能从史书中的一些片断记载得到了解，因为女真人的著作和文物全部荡然无存了。但是仅就史书中保存的材料，我们也可以说，女真文化并不低于远东历史上著名的渤海文化，甚至还要更高些。

和渤海人一样，女真人也有中国式的学校。史书甚至说，1150年开设了官办的最高学府。²在最困难的时候，在重大危机的年代，如饥馑波及全国，蒙古人威胁着帝国的生存，曾有人谏议停发学生的廩粟。但即使在这时，皇帝也没有采纳这项建议。³

历代皇帝都认为对学校授业情况的监督是一件极重要的国家大事。史书在1190年^①项下有一则值得注意的记载，它描写了麻达葛时代女真学校生活的情形。

有个名叫臣宰的官员^②曾上疏谈论国内的种种时弊和群臣的贪财趋利，他说，一切坏事的根源在于学校没有办好。据他说，学校的教师“失其本真，经史雅奥，委而不习”；老师和官员们“藻饰虚词”，只是为了钓取俸禄和私利。照他的意见，科场取士应当考问经史的基本道理，使应考的人把注意力放到主要的事情上，而“不惑于近习之靡”。⁴

这项建议虽然被采纳了，但是，史书作者痛心他指出，皇帝并未能使之实现。群臣依旧竞尚虚词，为钓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国家大事。

女真本民族的文字和文籍的创作是该民族文化史上最重要的

1 同 348 页注 1，第 209—210 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六·科条》。）

2 《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译注：《金史》的原文是：“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 年）。”〕

3 《金史卷十五·宣宗本纪中》。

4 《金史卷九九·徒单镒传》。

① 事在金明昌二年，应为 1191 年。——译者

② 以下所引是金平章政事徒单镒的上疏。奥氏误把“臣宰”当成人名。——译者

事件。

女真人原先没有文字。《金史》^①说：“与契丹言语不通，而无文字。”²¹随着强大的金帝国的兴起，为了治理国家，就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字。早在阿骨打时，1119年，谷神^②就奉皇帝的命令制定了本国文字，他仿照契丹人的办法，以经过减损的汉字作为女真字的基础。²

后来，旧式的女真字即所谓“大字”被新式的“小字”所代替。“小字”也是脱胎于汉字。³

据说“小字”是熙宗皇帝于1145年创制的。⁴

女真字存在的时间比金朝长久。特林岩石上有一块十六世纪的石碑，上面的女真字铭文，就是用“小字”镌刻的。这块石碑现在保存在滨海地志博物馆里。至满洲人时代，仍然存在女真语文学学校，直到十七世纪下半叶初，才明令停授这门课程。

女真文字起初是用于事务性的书信。但是后来也用来编写本国著作，首先是史籍，即为金朝历代皇帝树碑立传的编年史。

1127年^③已经修成《女真史》，即把民间流传的有关阿骨打的祖宗及其活动的故事记录下来。

颇刺淑的儿子乌野^④和耶律迪越“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201 页。

2 同上，第 55 页。（译注：见《金史卷七三·完颜希尹传》。）

3 同上。（译注：同上译注。）

4 A. B. 格列宾希科夫：《满族及其语言文字》，第 46 页。（译注：见《金史卷四·熙宗本纪》。）

① 应为《大金国志卷卅九·初兴风土》。——译者

② 即完颜希尹，见《金史卷七十三·完颜希尹传》。——译者

③ 事在金天会六年，应为 1128 年。——译者

④ 即完颜昷。——译者

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¹

后来，乌野于1140年^①向熙宗进呈《祖宗实录》三卷。皇帝焚香立受，赠赏编纂者俸禄有差。²

1147年，^②修成《辽史》；兀术向皇帝进呈《太宗史》。^③

麻达葛时，《世宗实录》编成。皇帝穿上礼服，从宝座上走下来，立而受之。³

遵照古老的惯例，历史的编修是由一批专职的官员即国史院的成员们负责，他们时刻不离朝廷：“如果皇帝降下什么旨意，他们便在皇帝左右伏地听取，回去以后就记录下来。”甚至屏人议事的时候，史官也不避开。麻达葛在位时取消了这种做法，史官们就抱怨说：“这样一来我们能在历史里写些什么，又能有什么进谏呢？”⁴皇帝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恢复了旧日的规矩。

按照中国古老的传统，皇帝不应当干涉史官的工作。历史必须公正而客观地陈述史实。

但是，不言而喻，十二世纪的史家，同以后许多世纪的史家们一样，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

史书中迪古乃本纪部分的遭遇就是一个证据。从史书的本文中就可以看出，这一段本纪按照乌禄（世宗）的旨意作了带倾向性的改写，因为乌禄力图诋毁他的前任者，从而为自己的政变辩护。

1 《金史卷六六·完颜品传》。

2 同上。

3 《金史卷十·章宗本纪二》。

4 《金史卷八八·石琚传》。（译注：此段引文俄译不确；奥氏又把世宗时的事误认为章宗时的事。《金史》记载的是：世宗大定十八年，记注官穆刺杰上书说：“朝奏屏人议事，史官亦不与闻，无由记录。”世宗（乌禄）说：“……唐太宗与臣下议论，始议如何，后竟如何，此政史臣在侧记而书之耳……。”“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① 应为1141年。——译者

② 事在金皇统八年，应为1148年。——译者

③ 据《金史卷四·熙宗本纪》，应是《太祖实录》。——译者

1164年^①，乌禄说：“海陵时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书多不实。”²¹

1164年，^②官员良弼被任命为丞相、监修国史。良弼说，迪古乃时“记注皆不完，……后世何观？”^③因此乌禄诏示：“令史官旁求书之。”²²

前面我们从史书汉文本中引用过一段有关迪古乃对先帝及祖宗遗体举行隆重迁葬仪式的文字。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完颜亮的事迹是怎样被“记注”下来的。

在汉文本里，皇帝只是责备自己由于公务繁忙，因而长久没有奉侍母亲；但在满文本里，这句无伤大体的话却改得面目全非了，变成了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是没有人性的罪人。

这句话在满文本中的说法是：“您的儿子违背了天理，丧失了良心。”在中文本里，太后接着说，她的儿子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而满文本却说太后讲了一句意思相反的话，似乎太后是说，她的儿子迪古乃只有亡国的才能：“平民家的败家子，父母尚且爱他呢，难道我不应更加爱我的儿子吗？”²³

可见，乌禄的史官们“改正”迪古乃的编年史，实际上是粗暴地伪造史实。

除史书外，女真文献中还有中文著作的译本。世宗(乌禄)时，

1 《金史卷六·世宗本纪上》。

2 《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

3 《金史卷五·海陵本纪》。(译注：《金史》是元代用汉文修撰的，满文本是清代译成的。两种版本分别由两个俄国人译成俄文，因此而有出入。至于徒单太后的话，《金史卷五·海陵本纪》的原文是：“贞元三年……上……懿太后前曰：亮不孝，久失温清，愿痛箠之。太后掖起之曰：凡民有子克家，犹爱之，况我有子如此。”)

① 应为1168年(金大定八年)。——译者

② 事在大定六年，应为1166年。——译者

③ 据《金史卷八十八·纥石烈良弼传》，这是世宗对良弼说的话。原文是：“世宗谓良弼曰：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译者

中国的经史译成了女真文¹。而一般地说,许多女真贵族,首先是皇室,都是娴习中国文献的,是一些很有学识的人。

皇帝及大臣们在谈话中时常引用中国历史和哲学著作中的词句。

女真皇帝把这些著作当成是治理国事的指南。

乌禄十分景仰司马迁^①的历史著作。同时,他又崇拜孔子的智慧。1140年,他亲到孔庙,北面再拜。他还说到自己:“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自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²

受过中国教育也是做官必需的条件。世宗说他自己“思庶职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达旦不能寐”。丞相良弼为此奏世宗说:

“我族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然后可。”³

女真宫廷里流行中国古典诗词。例如,1139年,为了庆祝兀术打败宋军,侍臣纷纷写诗进呈,皇帝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⁴

女真国内还出现了戏剧,这显然也是中国的影响所致。史书说,1190年“(麻达葛)禁伶人不得以历代帝王为戏及称万岁”⁵。

至于宗教方面,除了自古以来的萨满教之外,凡是受了中国人强烈影响的城市和地方,都盛行佛教和道教。

出家当僧尼的多半是贵族名门的男女。佛教的主持人住在京城,叫国师。国师穿紫衣,是京城最受尊崇的人物,威仪胜似王者。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85 页。(译注:《金史卷八·世宗本纪下》。)

2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译注:事在 1141 年(金皇统元年),说的是熙宗的事,而不是乌禄的事。)

3 《金史卷八八·纥石烈良弼传》。(译注:原文是:“女直、契丹人须是曾习汉人文字然后可。”)

4 《金史卷四·熙宗本纪》。(译注:事在 1141 年,金皇统元年。)

5 《金史卷九·章宗本纪上》。(译注:事在 1191 年,金明昌二年。)

① 应是司马光,见《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译者

“国主有时而拜。”^①此外,各府、州、县都有佛教的长老。

女真帝国“崇重道教与释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后”,金国内才出现道教¹。

以上是女真国家和文化的鼎盛时代女真人的生活状况。滨海的中世纪文化遗存,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它们是黄金帝国昔日的光荣和强盛的缄默无言的见证。

滨海的女真国遗存

滨海有大量考古遗存是属于女真时期的,主要是城堡遗址,以及各类偶然的发现物。这些遗存为探索曾经属于金国领土的滨海地区的中古时代居民的文化和生活状况,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前面已经讲过,我国乌苏里边疆区在金代曾是恤品(或率宾)府的一部分。这个府的中心设在今日的乌苏里斯克城及其近郊。

乌苏里斯克城的南部有一个宽阔的古代居住遗址,它的周围筑有高大的土垣。从土垣的断面可以看出,墙基是用横置的细圆木建成的,各圆木之间均保持一定的距离,圆木上分层堆筑黑土,可能经过夯实。墙垣的上部是用黄土分层夯筑的。

正如洛巴金早就发现的,在墙垣上部的泥土里,杂有瓦片和碎砖,它们同古城内所见的相同。这就说明,城垣在后期经过加高或修补。

1916年,在墙基内出土开元年号的钱币一枚,说明筑城的上限不早于八世纪前半叶。在普尔热瓦斯基考察时,土墙残高三俄尺,但是濠沟已经没有了。“似乎是为了代替这些濠沟,在城墙上了筑了许多马面,以便自侧面射箭和防守。”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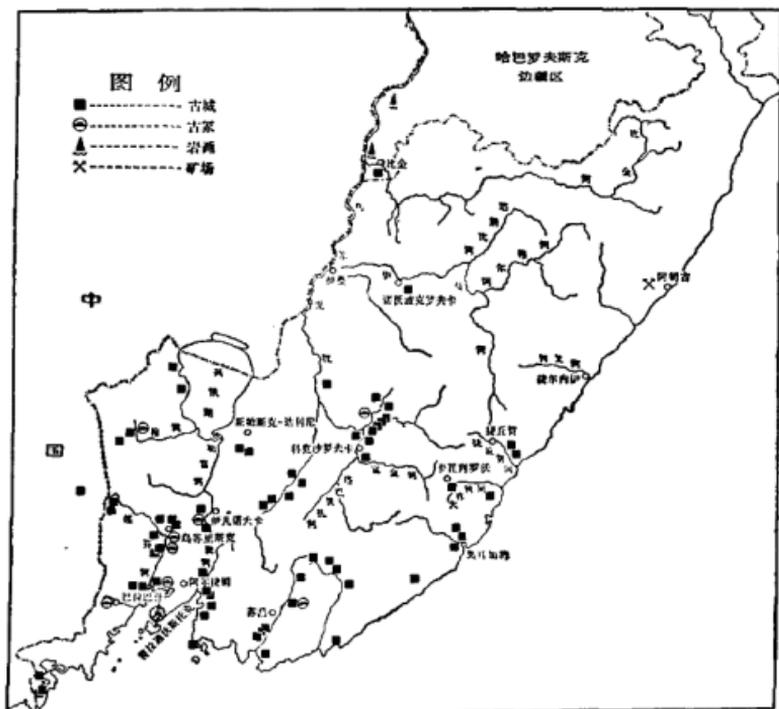
1 B. И. 瓦西利耶夫, 同 261 页注 2, 205—207 页。(译注:《大金国志卷三六·浮图》。)

2 H. M. 普尔热瓦斯基, 同前书, 第 66 页。

① 《大金国志卷三十六·浮图》。——译者

据布谢和克罗波特金发表的资料，古城保存下两个城门的遗迹，城门以瓮城防护。¹

费多罗夫在正对翁特别格罗夫斯卡亚大街的城垣附近，发现一个半月形的平台，台基周围筑有护壁，其厚度与城垣相同。在靠近平台中部的地方，城垣稍矮，便于守城者走下城墙到达平台。这里可能是安置抛石机的地点。在他考察的时期，在面临绥芬河的地方，也残留着一个这样的台座，这个台座同时也可以当做城堡的出口。



1 Ф.Ф布谢,Л.А.克罗波特金:阿穆尔边疆区的古迹,第17页。

城圈内的地面近长方形。但是有两面城垣不成直线，而是依高峻的绥芬河岸的走向稍作内凹，因为城墙是依傍绥芬河岸而建的。这一带有一片泥泞的洼地，古时可能是绥芬河或其支流的河床。据费多罗夫测定，古城面积为六十二俄亩^①。普尔热瓦斯基在城内曾看到许多小块的高阜，形似土冢，有的阜顶残留着一些碎砖，有一处还竖立着两块有凿孔的石板。¹

费多罗夫在古城里面也发现了一些古建筑的遗迹，“有的是植被显出特点的浅坑，有的则是坚固的房基”。据他说，驻防军花园旁边的练兵场上的古建筑基址保存得尤其完好。建筑材料是蓝灰色的砖。在这些建筑基址上还发现了几堆碎瓦片。这些瓦与晚期的中国瓦不同的地方是在背面没有布纹。建筑物的面积，最大的为一百五十平方米，最小的为二平方米。²

据费多罗夫说，墙基是由两重略作倾斜的砖砌成的。两重砖的间距为八十厘米，内填以土。住所的围墙也是砖面土墙。

在墙基里，距内墙面三十厘米的地方，“非常完好地保存着一条烟道，其断面是等腰梯形”。

1916年进行发掘的时候，A. 3. 费多罗夫在房基内发现了烧炕用的烟道遗迹，以及各类金属物件：钉子、残铁斧、刀、铁环、用途不明的把手、发簪、箭镞、矛头、熔锅和铠甲片。另有大量的铁渣。还出有陶器，其中有粗陋陶器的碎片；也有纹饰精美的细瓷片。发掘时发现古钱十四枚，其中有公元十一——十二世纪的钱币，说明这些住所属于女真时代。有九枚古钱可归属于十一世纪下半叶（1063

1 H. M. 普尔热瓦斯基，同前书，第 67 页。

2 A. 3. 费多罗夫：《尼科尔斯科-乌苏里斯克城及其近郊的古代遗存》，第 11 页。

① 1 俄亩合 1.09 公顷。——译者

—1096年)。有一枚古钱铸有祥符年号,属于1008—1017年^①,另一枚则有崇宁年号,属于1102—1107年^②。

在较深的地下,另有一层贫乏得多的文化层,¹可能是属于渤海时期的。П.卡法罗夫也曾写道:“在绥芬河左岸的河滩上,有古傅尔丹城的遗址,我认为是渤海时兴建的。”²

如果所说无误,那么乌苏里斯克城南部的古城就是渤海人始建的,后来女真人住在这里,A. 3. 费多罗夫发掘的就是这些女真人的住所。

远东考古队在原驻防军花园进行的工作,证实了费多罗夫的论断。在一个由于施工而挖成的坑里,在深约一米的地方,发现一层含有中世纪遗存的古文化层,出土物有瓦片、轮制灰陶片、一件中央有孔一面刻字的厚重石圆盘、淡青色釉陶或粗瓷器残片。

这些出土物与驻防军花园的另一些时代较晚的出土物不同,可以归属于渤海时期。

这里还有四个雕凿精美的柱础,旁边有一座小丘,丘顶建有一座凉亭。这个地点的发掘表明,在表土层下有一层很厚的草拌泥地层,这显然是某种建筑物的基址。再往下挖,发现一座中古时代建筑物的瓦屋顶的大量遗迹和支承木柱的两个大础石。

在背面有布纹的普通筒瓦中,杂有一些带着锯齿纹边饰的檐瓦和瓦当。有一件残瓦当饰有植物纹;另一件饰兽纹,可能是龙纹。

在草拌泥地层里和瓦片堆里,夹杂着一些轮制灰陶片、瓷碗片(其中有一些是带浮雕纹饰的白釉细瓷碗),以及中国钱币“开元通

1 A. 3. 费多罗夫: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驻军花园内发掘简报(1916年5月26日—7月26日)(手稿藏科学院远东分院档案)。

2 П. И. 卡法罗夫(帕拉季掌院):《南乌苏里边疆区的民族学考察(帕拉季掌院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和尼科尔斯克村发出的信件)》,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VII卷,第2期,1871年,圣彼得堡,1872年,第93页。

① 应为1008—1016年。——译者

② 应为1102—1106年。——译者

宝”和宋钱。

这里还发现一些铁钉和两件锻打成的铜牌，后者饰有精致的植物纹。

出土的中国宋钱和白釉瓷片表明，这一群文物属于女真时代，即金朝时期。

在城内现今幼儿园的大院里，也有一座小土岗，由于不久前挖掘地窖，已被严重破坏。毫无疑问，这就是И. А. 洛巴金作过记载的那座土岗。他说，城寨内有一座高约一·五——二俄尺的小土岗，岗顶上竖立着两根八棱柱（或杆子），高二俄尺，厚五——五·五俄寸。土岗内发现一个柱础和大量砖瓦。土岗周围有浅濠和土墙。此外，在城内还有一些“与上述相似的”土岗。¹

另一座古城座落在这个城寨的西边。

A. 3. 费多罗夫描述过这座古城，说它“面积很大，位于第一号古城的西北方，相距约一俄里”。古城的平面呈“梯形，几近于正方形，面积为五十六俄亩”。周围有颇厚的土垣，现已大部毁坏。“城垣的三面有濠沟，在古城的东南角，即军事施工委员会的砖厂大院内，濠沟保存得十分完好，深约一俄丈。”费多罗夫写道：“几年以前，士兵们还把马牵到满是积水的濠沟里去洗澡。”²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见过这座古城未被扰动时的遗址，据他的测量，城垣高五米，城内地面平坦，仅在西边有一个小土堆。另外，在古城以南八十米的地方，有一座方形小土台，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这可能是防御工事。³

在这座古城里，费多罗夫及其同事们从取土时抛弃的杂物堆里采集到许多屋瓦，以及装饰屋顶和房屋正面的雕塑。

1 И. А. 洛巴金：《阿穆尔地区四十九个古代遗址的若干资料》，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第34号，1869年。

2 A. 3. 费多罗夫，356页注2，第15页。

3 H. M. 普尔热瓦尔斯基，同前书，第66—67页。

1955年，远东考古队队员们在这座古城里发现有一件精美的龙头圆雕与瓦片、灰砖共存。这是大型建筑物(庙宇或宫殿)瓦顶屋脊上的饰物(图七十三)。

II. 卡法罗夫著录的古钱对这座遗址的断代具有重要意义。

据卡法罗夫的记载，距离渤海人始建的一号古城“不远”，“有一座巨大的古城，即女真人住地的遗迹；这里可以找到大量的钱币，上面铸有曾被女真人俘虏并拘禁在满洲腹地的那个宋朝君主的名字，^①据此可以推测古代的五国城就在附近”。¹



图七十三 龙头。乌苏里斯克，1955年。

稍后，A. 3. 费多罗夫也在这里发现了一枚中国铜币，上面铸有“崇宁重宝”，这是宋徽宗(公元1101—1125年)的年号。这个皇帝和他的儿子钦宗就是被女真人俘虏的那两个皇帝。²

现今乌苏里斯克城里有这样两座大城寨，这就说明了中古时期这个地方被称为“双城”的原因。据A. 3. 费多罗夫说，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仍然这样称呼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甚至当时中国商会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分会的印章上也刻有“双城子”的字样。³

这两座城寨四郊，在过去显然有许多村落，以及墓地、水井、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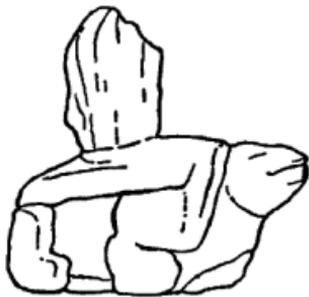
1 II. 卡法罗夫，同前书，第95—96页。

2 A. 3. 费多罗夫，同365页注2，第16—17页。

3 同上，第23页。

① 应为年号。——译者

字和道路等，因为到二十世纪初，在今乌苏里斯克城地区内还一直保存着一些古建筑遗迹，如石雕的人像或动物即是一例。



图七十四 乌苏里斯克的石龟。
现存哈巴罗夫斯克博物馆。

在南面的古城附近，在林德霍尔姆磨坊的院内，有一个用玫瑰色粗粒花岗石雕刻的石龟。龟背上驮着石碑。石碑只残留下基部，上面刻有两个字。这个石龟现在放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志博物馆的大门前面（图七十四）。

石龟北面有两座土冢。其中北冢已于1893年由Ф.Ф.布谢作过发掘。冢内出土一副用凿平的石板砌成的石棺。棺内有人骨架一具，还有铁镢和谷粒。棺长一百二十七厘米，宽一百十二厘米，高八十七厘米。

洛巴金和普尔热瓦斯基还见到了另一个石龟，当时是原地放着的。普尔热瓦斯基记述道：“除此以外，在通向另一座城寨的路上，离我们住的村庄半俄里^①的地方，有一个用淡红色花岗石草率打凿的石龟平放在一座小土包上。石龟长七英尺，宽六英尺，厚三英尺。旁边横着一块石碑，从龟背上的槽沟看来，石碑原来是安在龟背上的。这块石碑用大理石制成，长约八英尺，碑额已被打掉，也横在旁边，上刻龙纹。”²¹

其实这个石龟的雕工和造型决不是象普尔热瓦斯基所感觉的那样粗陋。它是女真时代同类巨型圆雕的一件出色标本。

这个石刻的风格与现今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第一个石龟有重大的区别。哈巴罗夫斯克的那件石龟外形比较古朴，体积较小，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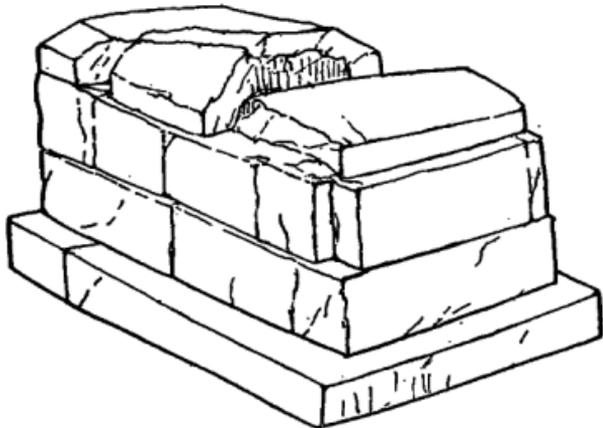
1 H.M.普尔热瓦斯基，同前书，第67页。

① 1俄里合1.0668公里。——译者

现手法显出更多的概括性和程式化，其年代大概要古老得多。而留在乌苏里斯克城的这个石龟则雕刻得比较细致，保存状况也完好得多。

这个象征永恒的石龟匍伏在用同一块花岗石凿成的矮台座上。厚重的头部向前伸出，微微翘起。龟头上雕出了眼、鼻和嘴的形状，粗短的四足和肥厚的腹部雕刻细致，富有实感。龟甲上布满了浮雕的六角纹，巧妙地模拟出龟甲的自然形态，当中凿有承受石碑的槽沟，把龟甲分为两半。龟甲的前部有一个颇深的缺口，由此伸出龟颈；缺口两侧向前鼓出成弧形，盖住龟的两肩。

龟背上的石碑是用白色而略带蓝色的、大理石状的石灰石做成的。碑文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看不到了，两面都已经被磨光。石碑在尼科尔斯克村的木结构旧教堂的钟楼下放置了很长时间，以后被移到石教堂门前的台阶上，至今仍在那里。碑额有浅浮雕的蛟龙图和象形字铭文。据中国官员吴大澂学者考释，碑文为“大金开府仪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但据 B. 米哈



图七十五 乌苏里斯克出土的十二—十三世纪石棺。

Ф. Ф. 布谢发掘，现存滨海地志博物馆。

伊洛夫斯基的考释，碑文是“大金国总长官特等公爵金源郡王完颜公光辉功勋的纪念碑”。¹总之，两种考释都说明它是金帝国完颜氏的一个亲王的墓碑，可见墓主人是出身于对金国的勃兴起了最大作用的那个氏族。

II. 卡法罗夫曾有一则记载，说是在尼科尔斯克村附近偶然地发现了一块金代的墓碑，他所指的应当就是这个。在距离尼科尔斯克不远的另一个地方，还发现一群人物和动物的石像，也是和墓葬有关的，而且看来也是属于女真时期。

关于这一群石像，洛巴金写道：“在距离驻有军队的城堡约二俄里的地方，发现野绵羊石像两座，人物石像四座，都是用淡玫瑰色的粗粒花岗石雕成的。这种肉色花岗石的成分，即长石、灰绿色云母和烟晶，由于年深日久，已被严重风化；羊的嘴脸像是被人打掉了，而不是自然剥落的。在石刻的整个底部，凿有一道断续的凹槽，深度为 0.75 ——一俄寸。

“只有一座人像还保存有头部，其余的想必是被打掉了。有些雕像刻着浮雕的长袍，衣裾下方有两俄寸宽的开叉，下摆距脚下三俄寸半。所有石像的四周都挖有小沟，如附图所示。沟深约半俄尺，宽约二俄尺，只是被草丛掩盖，很不容易发觉。圆圈A和A标示两块圆形高地，其一径长三俄丈，上有一坑，可能是不久前挖成的。

“这里的地势坎坷不平，有的地方隆起一些土丘。遍地野草从

1 Ф. Ф. 布谢、Л. А. 克罗波特金，同前书，第20页。

B. 格鲁兹多夫斯基：《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博物馆目录》，载《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通报》，第XI卷，1907年，第115页。〔译注：吴大澂《皇华纪程》中关于这个碑文有以下记载：“接俄官廓米萨尔来信，因前赠篆文孝经为该国学院布席（按：即Ф. Ф. 布谢）所见，欢喜赞叹，致俄布席来书，并寄双城子碑额照本一纸，文曰：‘大金开府仅同三司金源郡明毅王完颜公神道碑’。篆书，五行二十字。首一字‘大’字仅有一直，隐约可辨。考《盛京通志》，金臣封金源郡王者二，一为娄室，完颜部人；一为完颜昂。惟娄室温庄毅，与碑不符。曷不载温。惜无《金史》可考，不知其碑文尚可读否。”〕



图七十六 乌苏里斯克出土的公鸡画像砖。A. 3. 费多罗夫发现。

生，草丛里平放着石羊，在积雪下面隐约可见，一部分已经下陷，和泥土牢牢地冻结在一起，以至陪我来的农民用铁杠都无法把它们翻过来。除上述两座石羊和四座石人外，这里原先还有两座石熊，现已移到尼科尔斯克村一所农舍下面。²¹

在古代中国，达官贵人尤其是皇帝的墓地上，常有石狮和石人之类的雕像。鄂尔浑突厥的坟墓附近也有这样的石像。在邻近的北满，也发现了墓上雕像，这是地理上最靠近乌苏里斯克石像的一群，这些雕像也是属于女真时期，即金代。²

据布谢和克罗波特金的资料，乌苏里斯克城附近的石像都是在一条由公墓教堂向西伸展的古道近旁。这些石像放在一个巨冢上。在此以南不远处，还有另一座巨冢。有可能石龟也是属于这

1 A. И. 洛巴金，同 358 页注 1。

2 B. C. 斯塔里科夫：《哈尔滨近郊金墓的初次发现》，载《满洲国科学研究所通报》，第 4 卷，第 3 期，第 429—436 页，1940 年 6 月。

B. C. 斯塔里科夫：《冲河河谷考古学考察的结果》，载《哈尔滨探险家与民族学家协会通报》，第 3 期，考古，哈尔滨，1946 年，第 27 页。

一群造像的。如果吴大澂的考释正确的话，那么这条古道就是碑额铭文中所说的道路。



还有一件发现物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这就是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协会写给彼得堡考古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说的那一件：“在一个农民家里，发现一块石头被用来铺砌冰窖入口的台阶。这是一块残石碑；碑上有几个汉字，虽已被皮靴底磨损，但仍清晰可辨。石头现已收藏；碑文已有拓本，并有拓本照片（随函附上照片）。为了把每一笔划拍得更加清晰，采用两面照明的办法，拍摄了两次。照片

图七十七 乌苏里斯克发现的官吏雕像。片已分送给中国和彼得堡的许多汉学家，其中包括B. П. 瓦西利耶夫院士。根据舍维列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二先生考释的碑文可知，这块石碑是满洲人的金朝（公元1114^①—1234年）为了纪念各个城邑采用中国的国家法典而树立的，这些城邑的土垣和濠沟至今仍保存完好。²¹

乌苏里斯克城郊第三号大古城的遗址，位于绥芬河的对岸，即右岸。这里耸立着一座山岗，叫作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临绥芬河的几面山坡都很陡峭，但在山顶上却有一片宽阔的缓坡地，竟容下了整个城市。象这样便于筑城又能凭险据守的地方，真是不可多

1 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列宁格勒），第50号，1887年。

① 应为1115。——译者

得。乌苏里边疆区早期的研究者们，从洛巴金起，目睹克拉斯诺亚罗夫山岗上的种种古代防御构筑，都曾一再惊叹不止。从乌苏里斯克城那边一眼就能远眺横跨山岗的土垣露出高大的墙顶。

一登上山岗就能看到，城墙依着山势蜿蜒起伏，连绵数公里。

城垣的高度到今天仍有三——四米，有的地方竟达五米。城垣由山岗的北坡即绥芬河上的断壁处开始垒筑。这里的墙垣已经严重地坍塌破坏，只保留了局部，但是现在也还可以看出，即使在这个最难以攀登的地段，在几乎是陡直的临河峭壁上，城



图七十八 克拉斯诺亚罗夫山古城平面图。

寨的建筑者仍然认真地加以筑垒。城垣延伸至东面便向内收缩，绕过一片深陷的小谷，把这片小谷“隔到了”城外。古城的东门就开设在这个弧形的弯曲处。

然后，城垣转向最陡峻的山坡，这时城垣从一道变成了平行的三道，其间掘有深沟。由此处起，城垣蜿蜒地跨过或绕过洼地的上沿，一直延伸到一个悬崖为止，因为到了这里显然已用不着城墙了。从古城最南端的角上开始，城墙又继续伸延，横贯这个高地的整个缓坡，形成一个弧形；再顺着宽广低平的山谷边缘西行，直达陡峻的绥芬河岸。这一段城垣有相当一部分是双重的，其间隔着濠沟；城垣开有三个豁口，大概是城门。其中一个豁口的里面筑有

一道横垣，既可封锁出口，又能诱歼敌军。

总之，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的古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宏大城寨：据 A. 3. 费多罗夫目测，城内面积约达二百俄亩。

整个古城是一群复杂的、可能分属不同时代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明显地分为三部分：

1. 双联的内城。由相邻的两个环以土垣的地段组成。土垣已经严重塌毁，因此，这可能是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最古老的建筑物。

2. 由厚大的城墙形成的大城。高地基本上都圈在城内。

3. 城寨的东南部。它紧挨着山坡上最为陡峭最难攀登的地段。有一道高墙把它同古城其他部分隔开。



图七十九 克拉斯诺亚罗夫山出土的瓦房顶。

上述第三部分的防御设施尤其严密，显然是古城的最重要部分。它的中心点是环有围墙的山岬状的狭长高地，以及与这块高地相连的一块大坪，大坪周围也有墙垣，至今尚保存完好。从远处就能看到，这个狭窄的高地上有几层梯田状的土台，各层土台之间隔着阶坎和横垣，后者是墙壁的遗迹。古时在这些土台上无疑有许多房屋。

这里有好些地方都是一揭开表土层就能发现瓦片。有时瓦片的排列竟是出奇地整齐，这是古代屋顶的遗迹。在瓦砾

堆中,有的地方还残存着装饰屋顶四角的怪兽形象。瓦砾层下面,露出一些经过打凿的大石块,这是房屋立柱的础石。

在两个土台上进行的发掘,揭示出富有特征的古代大殿式建筑遗迹。

在一号发掘区,发现三座房屋的屋顶遗迹,这些房屋栉比鳞次地排成一列,地面都很平整。两面筑有护墙,残高一米。

其中两座房屋地势较高,建在同一个平面上。

因为这些房屋是建在山坡上的,所以为了建造第二号房屋,特地用粘土并掺入尖角的砂石块筑成台基。随着坡势的下降,台基逐渐加厚。自上而下数,第一号建筑的瓦屋顶已毁坏不堪。第二号建筑的屋顶保存得较好。有些地方还有完整的瓦在地上整齐地排列着,不同程度地保留着盖住屋顶时的原样。还有一块方形的大石板,是原先的柱础。它的位置在房屋的一角,这想必是原来的位置。这个部位还出有长方形的灰砖。第三号建筑物的屋顶遗迹是在比前两座(一号、二号)低二十五——三十厘米的地面上出土的。由此可见,这一群房屋是分别建在两个阶上的。在下阶建筑物南缘的正中,对称地放置着两块石碑。它们原先无疑是竖立在房屋门前的。两块石碑的上部都呈半圆形,碑的两面及两侧已经打平,但都留有打凿的深槽,其中一面的深槽组成杉叶纹,另一面则是横贯石碑的平行线。顺山坡再往下行,有一处遗址,看来是一座盖有瓦顶的大门。屋瓦呈富有特征的蓝灰色,背面下部有布纹。瓦的形状是槽形(半筒形)。檐瓦的滴水往往饰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复杂花纹。

有好几处瓦砾堆出有灰陶龙头残件,这是鸱吻和垂兽一类的装饰。

在二号发掘区也发现了保存极好的瓦屋顶遗迹,以及若干排列有序的平整石板,它们是房屋木柱的础石。

这些建筑物的营造法式纯粹是中国式的。据研究唐代建筑的专家梁思成说,中国建筑风格的特点是,先用承重立柱做成木构房架,包括柱上结构,然后砌墙、安装门窗。有了这种房架,屋墙就可以根据季节的需要而拆掉或砌上。“从新疆到日本,从黑龙江到越南,在这片广大地区内,几千年来人们就是建造和居住具有这种建筑风格的房屋。”¹

这种建筑物的结构和外貌的决定性因素是柱式,它由承重部分和被承部分组成,前者即系木柱,后者则是柱上结构,包括阑额、斗拱和飞檐。

柱上结构中最富有特征的部分,是奇妙而夺目的斗拱。它是用各种形状的条木巧妙地交错叠垒起来的。这种斗拱的作用是把望板、屋檐和瓦顶的重量都集中到立柱的上端。²

我们在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发现的几座大殿式房屋想必就是这种形制的建筑:单薄的墙壁(窗户大概是有棊格的,冬天糊上半透明的窗纸);竖立在础石上的列柱;华丽的斗拱;美观的瓦顶;别致的飞檐;龙头形状的鸱吻和垂兽。

由此可见,整个居址的中心部分显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即在古城东南部筑有高大土墙的范围內。这里曾耸立着一群宫殿建筑和庙宇,四周环以高大的围墙。

也可以设想,这里如果不是一座皇帝的子城,至少也是郡王的子城,即筑有宫殿和寺庙的内城。唐代中国的长安都城,宁古塔附近的渤海国京城,或是后来的北京,都有这样的子城。

克拉斯诺亚罗夫山子城的建筑术带有中国高度文化的明显烙印。在当时,这是必然的现象,因为在唐代和宋代,光辉灿烂的中国是远东所有邻国的楷模和师表。不仅在满洲,而且在朝鲜和日

1 梁思成:《唐代建筑》,载《中国建设》杂志俄文版,1952年,第一期。

2 同上。

本,人们都曾向中国人学习,模仿中国式样营造宫室和寺庙。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克拉斯诺亚罗夫山“禁城”的整个平面布局却有一个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它表明该城既区别于东北的城市,又不同于中国唐宋城市。如上所述,在渤海京城宁古塔和唐代京城长安,整个城市是坐落在一块平坦的地面上,平面呈规则的长方形。笔直的街道自东而西、自南而北地纵横交错,把城市划分成棋盘式的方形街坊。

在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整个古城的平面布局却是服从于高地的自然地势。

此外,在这座推测为“禁城”的内部,全部房屋都不是建筑在平地上,而是在山坡上专门开出的梯田式阶地上。这样,这座古城的平面设计便反映了远东部落自身的传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独创性。

关于贵族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况,可以根据在山坡下部、上述大殿式建筑以东发现的遗迹来加以判断。这里有一些常见的梯田式阶地,阶沿可能曾以沙岩石板及石块垒砌加固。在最低的一块台地上,发现一些遗迹,看来是残存的房屋墙基,用平整的石块砌成。此外,还有炕的遗迹——烘暖的烟道。住所的平面当是方形的。屋顶不是瓦顶,很可能是用禾秸或草苫盖的,因为住所里连一块瓦片也没有见到。

在住所内部的不同地点,出土了一些轮制陶器的碎片、公元十一——十三世纪的中国钱币,还有铁器:甲片一块,箭镞三件,厚而窄的树叶形有筒矛头一件。

很可能这是一个战士的住所,箭镞和矛即是他的武器。

值得注意的是,A. 3. 费多罗夫及其同事们在古城里发现有些陶器同中国缫丝用的容器相似。他还指出,目前被植物学家视为野生植物的滨海桑树(*morus alba*),可能是渤海人及女真人栽

培的。¹

克拉斯诺亚罗夫山上这座巨大古城的防御设施足以对付长期的围困,进行长期的防守。城内好些地方,目前还保存着古代的水池和水源,在城垣上,特别是北段和南段,至今仍堆着供抛石机发射的大大小的玄武岩石弹。石弹显然是堆积在受威胁最大的地点,这些地方设置着城防的重点工事,停放着抛石机。П.卡法罗夫认为,克拉斯诺亚罗夫古城应是属于中古时代的高丽人,是公元十二世纪初高丽人同女真人作战的“最前哨”。²但是,这里出土的宋钱,特别是女真钱币,却说明这个论点未必可靠。在滨海的其他地方,同克拉斯诺亚罗夫古城的形制相似的古代城寨,还有几十处,其中有些的规模也相当大。

有的城寨建造在河谷内平坦而开阔的地方,但大部分却是坐落在山岗的顶部。河谷内的城寨大多数呈大致规则的长方形或方形。例如在楚古耶夫卡地方的两座古城就是这个形状。这里出有一枚1161—1190年^①世宗皇帝时期的女真钱币,还有1102—1106年徽宗皇帝时期的宋钱。济木河及乌拉河畔的古代城堡也是这种形状。³

这些古城的城垣都是土筑的,两面包以天然的圆石或石块。城垣有好些地段筑成不大的半圆形马面,原先当是敌楼,或者是木构敌楼的台基。乌拉河畔索延索的房子旁边的古城,城垣的马面分为大小两种类型。

据 Ф.Ф.布谢的测量,大型的马面宽一俄丈半,向城外突出二

1 A.3. 费多罗夫,同356页注2,第22页。

2 П.卡法罗夫,同前书,第95页。

3 Л.И.伊凡耶夫:《滨海边疆区楚古耶夫卡村的古迹》,载《苏联考古学》,第XV期,1951年,第296—298页,图a、б。

④ B.沙夫库诺夫:《滨海边疆区新发现的中世纪钱币》,载《东方古钱学》,第X卷,1955年,第96页。

① 应为1161—1189年。——译者

俄丈；小型马面宽度同上，突出一俄丈。马面的顶部高出于城垣之上。

这类城寨差不多都有城门豁口，一般是每边一个。豁口上筑有「」字形的瓮城或更加复杂的工事。“瓮城高度或与城垣相同，或低于城垣，与主城垣相交成直角或略偏成钝角，另一端则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道路沿着主城垣进入这条通道，抵达对面的瓮城墙，然后向侧面急转弯，通过城门的狭窄豁口进入城内。”¹

这些城寨的护城濠一般比较简单，不过是一道较深较宽的水沟而已；堆筑城垣、修造土墙的泥土可能就是从这里掘取的。“但是永备工事和主堡附近的护城濠则修建成一种极有威力的工事。”据Ф. Ф. 布谢观察，在城垣脚下有时挖有一道专为弓箭手预备的小堑濠，外侧有土筑的胸墙作掩护，再往外才是护城濠。据他说，乌拉河谷中三道沟村下水方向十俄里处的古城建有极完备的防御工事。在其他地方，或只有一部分工事，或规模甚小。许多城寨在主城垣范围内，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四边形场地，四面也环有土垣。“按照今天仍然存在的中国惯例”，这就是城寨的指挥官居住的地方。²

除了土筑的防御工事以外，古城里当初也有过木构的工事，很可能是用埋在地上的直立圆木或木杆构成的栅栏。中国史书中经常提到这类木栅，特别是В. П. 瓦西利耶夫在描写1615年满洲人征服南乌苏里边疆区叶赫部人的时候，曾不时提到这类工事。³据俄国官员报导，十七世纪的阿穆尔河诸部落——达斡尔人和久切尔人仍有木构的墙垣和敌楼。

综观滨海各河谷古城的资料，可以总括地说，这些古城在当时

1 Ф. Ф. 布谢：《勒富河、刀毕河和乌拉河河谷的古代遗迹》，第12—13页。

2 同上。

3 同上。〔译注：参见清代魏源《圣武记·开国龙兴记一、二》。满人征叶赫部人，始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获胜。〕

都是相当宏伟而牢固的城寨，足以防御敌军使用弓箭乃至抛石机的冲击和围攻。

山地城寨在滨海各地都有发现。在乌拉河、刀毕河、勒富河峡谷中，这类城寨往往密集成群。Φ.Φ. 布谢对这些城寨作过记载。

我们且以麦河河谷石灰岗(或称鸽岗)上的古城为例。这是一座优质白色石灰岩形成的高岗，山上风景如画，古代居民利用山顶上朝南倾斜的大坪建筑了这个城寨。

山岗的南边和西边是悬崖断壁和麦河的河床，因而是不可攀登的，它的北边以及东边一部分建有很厚的城垣。山岗北面的城墙有两重，是用天然石块认真拼对而垒成的。这两重城墙构成互相衔接的内外两个弧圈。城垣上加筑了几个敌楼，现在尚残留着楼基的圆形平台。各平台之间相距六十——七十米。平台直径四·五——五米。两重墙垣之间的空隙内有一条道路，这是一条死胡同，大概是为了诱歼敌军而设下的圈套。古城的防御体系除了城垣之外，还有两条濠沟，自南而北穿过山坪。

这座古城的特点是山坪的斜坡上有五层梯田式的阶地，阶壁特地用巨石垒筑加固。阶地平均宽度为五米。古城的总面积约为250×400米；城垣长度分别为425及400米。

有一层阶地现在已被开辟为菜园，在这里采集到一些中古时期的轮制灰陶片。

在切尔尼戈夫卡村地区内的“山庄”新村附近，也有一座古城，它同样是很有代表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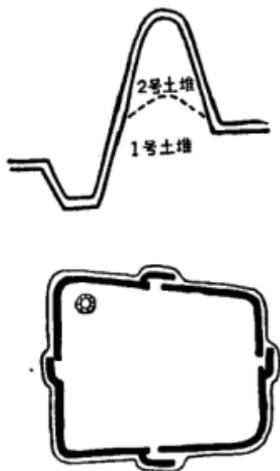
在“山庄”新村的东面，耸立着一座有三个顶峰的山岗，岗上风景优美，长满了茂密的柞树林。其中一个山峰四周围绕着非常清晰的土垣遗迹。这是一道异常狭窄而陡直的土垣，有的地方高度达到二·五——三米，它把一块向西倾斜的地面围在城圈里面，而今这块地面已有一部分变成了菜园。城内没有发现住房或其他营

造物的明显遗迹。

古城平面的轮廓与山岗的地形相一致，接近于不规则的多角形。城垣各转角处外侧有马面，显然与敌楼的位置相应。古城北角有一个清晰可见的凹处，象是横沟或堑濠，宽二米，长十米，深约一米半。

高地的西坡相当平缓，便于攀登。这是古城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段，所以也就用土垣防卫得特别严密。古城东面是无法接近的。高地的东坡又高又陡，只有一条路可以攀登，这是给攻城者设下的圈套。这一段城垣差不多也是陡直的。

“山庄”古城的出色特点是从山下通往城内的道路至今仍保存完好。道路共有两条。第一条从西面即小河方面通向城寨。它沿着山坡平缓地逶迤而上。在古城的入口即



图八十 楚古耶夫卡古城平面图及剖面图(依凡耶夫绘图)。



图八十一 什科托沃村古城的石垣。

城垣的缺口处，筑有卫护城门的防御工事。这是用土垣构成的四角形瓮城。如果敌军企图通过城门冲进城里，就会

落入瓮城的圈套。

城垣北段也有一个瓮城。这里有一条道路沿缓坡下行。由于山坡的地势所决定，沿这条路登山的人必然要走到城墙根下，守城者的擂石和箭矢就会朝他们头顶上倾泻下来。两条道路的宽度约为一·五——二米，路面平坦。古城内没有翻耕为菜园的地方长满了栲树和柞树；灌木和野葡萄四处丛生。

在城圈里已经开垦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些灰陶片，其中有一件是形制特异的、饰有方格印纹的残陶器。古城内还出有玄武岩石臼两件，体积颇大。其中一件用长方形石块打成，长约四十厘米、厚约三十厘米，臼槽呈圆锥形，宽约二十五厘米，深约三十厘米，是凿成的。另一个石臼体积差不多相同，臼槽也相同，用一块长圆锥形大石块凿成。出土物还有小型的铁器，如钉、尖状器（可能是箭头），以及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国钱币三枚。据当地居民说，早先，每年翻耕菜地时都曾发现许多中国钱币，可是都把它当成废物扔掉了。

Э. В. 沙夫库诺夫对古城的地面作了仔细的观察，发现了几枚宋朝的中国钱币：一枚是神宗皇帝（在位时间为 1068—1086 年^①）时的元丰通宝（1078—1085 年），另一枚是神宗皇帝时的熙宁元宝（1068—1077 年），还有一枚是真宗皇帝（在位时间为 991—1023 年^②）时的咸平元宝（998—1003 年）。¹

除了古城即设防居址的遗迹外，还有不设防的村落遗址，即农舍和耕地的遗存。例如奥西诺夫卡村附近的“粮食沟”地方的居址即是一例。这个山沟在村西五——六公里，距南边的大路一公里半。这是一个相当宽阔的山谷，两面有缓坡，谷中保留着两个小

1 Э. В. 沙夫库诺夫，同 370 页注 3, 96 页。

① 应为 1068—1085 年。——译者

② 应为 998—1022 年。——译者

湖。据当地的老年人说,这些小湖从前较宽较深,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山泉,泉水流经安德里希纳谷。

在一个小湖附近,有一座环有矮垣的建筑物遗址。垣高约八十厘米。垣内的平台高出地表五十厘米。平台的轮廓接近于四边形。为了弄清平台的性质,开掘了一个探坑。发现有中古时代的灰色陶器,包括一些陶器的口沿。还出土了一块瓷器残片。距矮垣二米的地方,在表土层下发现了一堆抹有粘土的石块,石块下出有陶片。这可能是炕的遗迹。

沿山坡上行,在一块耕地里采集到许多容器标本,其中有陶片一块(带有象形字的款识)、瓷片一块;另有骨片二块、铁刀一把、残生铁锅一件、车轂一件。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枚咸平年间(998—1003年)的中国钱币,钱上铸有“咸平通宝”四字。

这个地方很适宜于经营农业和畜牧;湖边的低洼地可以种植水稻。

在奥西诺夫卡河畔的选矿厂附近,也发现了一个中古时代的居住遗址。起初仅在几个长满野草的小土堆中发现一些遗迹。有些地方摆着一些烧过的大石块,大概是火炕遗存。于是在一个略高于周围地面的长方形土台上,开掘了一个小探坑,发现表土层下有一个淡灰色的粘土平台,上面有几处火烧的痕迹。平台上出有一块中古时代的灰陶片,是口沿残部,唇外侈。

在这一地层以下,有一个灰坑,坑壁陡直,清晰可辨。看来,这是灶址。另外,在平台上自南而北开掘了一个 6×2 米的探沟。发现在十二厘米厚的表土层下,有一层灰白色的粘土,里面杂有小块的红烧土。这是房子的居住面。这里出有一件轮制粗灰陶器的碎片和一块板岩制品的残件。

作为物质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女真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小村落

中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而那些皇帝却依靠他们的劳动,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争,建造奢华的宫殿和寺庙。

女真人以后的远东(十四——十六世纪)

综观文字史料的记载和考古研究的成果,可以总括地说,女真国家金帝国时期是满洲及与之相邻的我国远东各地的经济、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发展史上急速高涨的时期。

在女真时期,农业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农业村落和军事行政中心到这时已密如蛛网,不仅遍布于东北的肥沃平原,而且深入到滨海甚至阿穆尔河流域的林区及山区。

在阿穆尔河流域,当地居民(即那乃人和乌里奇人)在传说中说是“哈”民族遗留下来的那些高度的中古文化遗迹,大部分是属于这个时期的。这个传说中的民族很可能就是女真人。

钱币的大量流通反映着商业和交换的发达;滨海和邻近的东北出土的中古时代钱币,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女真时期。

女真人克服了古代部落的分散性之后,便建立了灵活而又牢固的国家机构,组织了采用当时先进技术的强大军队,这些都明显地表现出女真人的组织才干。

女真人不仅恢复了我国远东诸满语部落自身的国家组织,而且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它摧毁了契丹人的国家“大辽”,并且占据了中国的很大一部分土地。女真人迅速地吸取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创制了自己的拼音文字,编印了本国的和翻译的文献,制定了自己的法律。

不久前还不大开化的女真人,在开头几次打败契丹人之后,就在许多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差不多赶上了自恃文化优越的宋代中国人的水平。

然而,这种繁荣局面不久就为衰落所取代。起初是不大显著

的、缓慢的衰微，但愈到后来，颓势就愈烈。

衰颓的渊源首先是女真贵族对其他民族的节节胜利的战争，先是对契丹人、唐古特人的战争，其后是对中国本身的战争。这一点，不管乍一看来多么奇怪，但却是事实。

这些战争使金国的版图在中国固有土地上不断扩大，使它的军事政治的力量不断增强，金国也愈来愈有光彩，可是到了后来，所有这些却导致了一种状况，即在本国内，同金国皇帝治下的中国臣民相比较，女真人的比例是愈来愈小了。

同时，被女真人征服的部落和民族对奴役者的憎恨也愈来愈强烈。形势就象干柴烈火一样，一触即燃。契丹人对女真人尤其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因为他们本是东北和蒙古的主宰者，而今却被女真人破灭和奴役。

正如 B. II. 瓦西利耶夫所说，契丹人“不能容忍女真人享有荣耀而自己却遭受奴役。在灭亡金朝的事业中，契丹人是成吉思汗热心的谋士”。¹

的确，契丹族出身的金国官员和将领投降过来，便成为蒙古人灭金战争中最亲近的谋士，成吉思家族最初几代可汗的著名谋士耶律楚材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史书对他的活动作了十分详尽的记述。

这些文官武将纷纷叛金投蒙，其中有一个人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试图在女真人的后方即辽东重建契丹人自己的国家。

这个人就是耶律留哥，他于 1210 年在隆安集结了一支军队，自称都元帅，后又称王。耶律留哥占据辽东以后，便请求成吉思汗承认他为藩臣。²

1 B. II. 瓦西利耶夫，同 261 页注 2，第 141 页。

2 同上，第 149—150 页。（译注：事在金至宁元年（1213 年），见《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卷十八、宋宁宗嘉定六年》。）

尤其危险的是女真人本身特别是上层统治者的中国化过程，这些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中国的习尚、生活方式甚至世界观。

然而最危险的还不在于日常生活上一般的中国化，而是在于另一些更加深刻的演变，它们摇撼着女真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从内部侵蚀他们的国家。

如同当年的契丹人一样，女真人成为他们统治下的部落和民族的压迫者之后，不仅被新的文化和新的世界观逐渐渗透，而且还逐渐接受新型的社会关系。随着阶级关系的发展和贫富不均现象的深化，新的世界观早已取代了往昔部落的统一意志和氏族的团结精神。

那些最有远见的女真国务活动家明确地意识到了金国及其社会面临的这种危险，他们看到，女真人的力量如何日见衰微，女真人如何一天天地溶化在大量的中国居民中，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如何排斥着女真人的旧俗和当年与契丹压迫者斗争中产生的古老的民族精神。乌禄(世宗)的活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他为了防止民族意识的衰退和女真国家组织的瓦解，曾花费了多少精力。

尽管如此，假如没有遭到象蒙古入侵这种外来的毁灭性打击，女真国家无疑是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的。

蒙古侵略者奴役了亚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和民族，并且在罕见的短期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世界性国家，而他们的最初的和最残酷的打击正是落在金帝国的头上。

前后几十年之内，蒙古人以其固有的疯狂性和残暴性年复一年地进行着灭亡金帝国的战斗。

蒙古侵略者之所以必须消灭金帝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金帝国背后就是辽阔的中国，必须穿过女真的土地才能到达中国。这不仅是一条夺取中国财富的道路，而且是建立世界帝国的道路。

照蒙古皇帝自己的想法，只有占据了中国，才能成为天下的真

正统治者。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征服女真人。

蒙古人费了很大气力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艰苦的、耗损精力的战争持续了三十年，前后经历了两个皇帝在位时期。这场战争是蒙古帝国的奠基者铁木真发动的，而由窝阔台结束。

战争既使蒙古人本身感到非常紧张，更使女真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城邑和村镇被毁灭，农田里杂木丛生。金国在血海和烈火中灭亡了；大量的女真人因抗蒙而横遭杀戮或被掳为奴。余下的人逃出沦亡的中心城市，流落四方。

随着金国的灭亡，女真人的民族文化也泯灭无闻了。

幸存的与女真人有亲属关系的北方部落复又成为互不相属的部落。他们彼此隔绝，保留着氏族的旧俗，到了后来，竟连当年存在过一个由生女真建立的强盛国家这件事，也忘得一干二净。

滨海及其附近的我国远东各地区此后的历史，所知极少。

中国史书载道，在华北，方圆几千里之内的居民都被斩尽杀绝了。见于元朝地理志的已不再是繁荣的城市和村镇，而主要是渤海和辽(契丹)金(女真)城市的废墟。中国东部领域的首府沈阳烧成了一片瓦砾。

自忽必烈开始的蒙古历代皇帝，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不得不在早先被烧掠一空的地区，例如在当年曾是人烟稠密的扶余故地，重新设置居住中心。¹

1292年，忽必烈迁徙乃蛮三百户、女真一千九百户^①到扶余故地。还有近千户迁徙到荒芜的哈斯罕地方^②。1295年，在肇州也建立了这样的移民区，共迁去乃颜不鲁古赤即捕杀黑貂的猎户

1 同上，第19页。（译注：见《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沈阳路、开元路条下。）

① 应为190户，据《元史一百卷·兵志三》。——译者

② 哈斯罕即合苏款或曷苏馆，见《满洲源流考卷十一·疆域四、辽东北地界》。——

二百二十户，水达达八十户，归附蒙古的女真人三百户。

原先在金朝时期，这一带曾有许多城市，可是元朝的地理志关于这些地方的记载却仅仅提到合兰、水达达等地，土地辽阔，人烟稀少，居民疏落。

有些地方，女真人仍象先前一样定居在村落和城邑里，从事农业并饲养家畜。

他们的北邻水达达当时还处在远为低下的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上。据元朝地理志记载，他们“各仍旧俗，无市井城廓，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又说，政府“设官牧民”，但是不干预他们的生活，而是“随俗而治”。¹

蒙古的几代皇帝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以抚镇这些居民——被征服的女真人的后裔以及远东地区逐水草而居的水达达人。

元朝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新朝廷明朝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本国势力的措施。

十五世纪上半叶，明朝皇帝多次向南派遣庞大的远征舰队到印度群岛。他们也企图在北方，即在与中国为邻的远东北部地区，沿太平洋海岸和阿穆尔河流域建立据点。

他们设置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派遣官员收取岁贡，贡品有兽皮和东方极为名贵的猎禽海东青。

明朝的行政机关立足最巩固的地方是沃沮故地，即滨海南部和东北北部。朝廷还一再试图向北方继续深入，直到阿穆尔河下游“吉列迷”即基里亚克人和“苦夷”即阿依努人的居住地区。

1404年^①，阿穆尔河诸部落的首领们来朝，于是被任命为当地的军事长官。其后于1409年，在吉列迷(基里亚克)的地域设置了

1 同 379 页注 1，第 22 页。(译注：见《元史卷五九·地理志·沈阳路》。)

① 事在 1403 年(明永乐元年)。——译者

奴儿干都司。

1411年，朝廷下令造船，并派兵沿松花江顺流而下，进入那乃-果尔特人的祖先的居住地区，去招抚土著居民服从明朝的统治。

明朝的士兵看来曾驶抵阿穆尔河，在一段时间内降服了元置合兰府的居民，当地氏族的首领还被任命为掌管一定地段的官长。明朝的史书还记载了宦官亦失哈先后于1414、1428、1433—1434年三次赴阿穆尔河下游之行。^①关于亦失哈这几次远行，1857年璦琿条约之后，俄国旅行家们在特林石崖（位于阿穆尔河下游，距海一百公里）上发现的一些出色的碑文有详细的记述。¹在特林石崖上，除了碑文之外，还保存了一座中国式建筑物的遗迹，其墙壁是用火候极高的黑色砖块砌造的，屋顶上覆盖着大型的筒瓦。

据特林碑文记述，亦失哈于1413年率领一支一千余人的队伍，乘船二十五艘来到奴儿干地方，在这支队伍里除了士兵外，有千户、镇抚、百户（大部分是蒙古人）、医士、监造、书吏、雕塑匠、铁匠、砖瓦窑匠、泥瓦匠。

碑文说，奴儿干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居民只知道养狗和猎鹿。他们食鱼、肉，穿兽皮衣服。

亦失哈以酒饭和中国菜饌宴请当地居民，赠以中国制造的衣服器用，对土著首领授予“牌子”（代表权力的签子）、旌节、官印以及钞币。1413年秋，在满泾站附近的一座秀丽的高山上（特林石

1 П. С. 波波夫:《关于特林文物》，载《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通报》，第XVI卷，圣彼得堡，1906年。

A. M.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文学史讲座》，第III卷，1908年，第70—75页。

① 据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1期），亦失哈到奴儿干地方先后共十次，即1409年、1411年、1413年、1415—1420年（两次）、1425年、1426年、1428年、1430年、1432年。——译者

崖),修筑了一座观音堂,称为永宁寺^①。

寺庙旁边竖起一块石碑,碑文是用汉文、藏文、蒙文和女真文镌刻的,记述了亦失哈远征和建寺的事迹,并且连篇累牍地称颂明朝皇帝,吹捧他对待各族臣民的政策。

根据碑文的形象语言,起初,奴儿千人“老幼,远近济济争趋”该寺,因为他们把它视为防病的威灵,相信建寺之后即“永无厉疫”。

但是,尽管明朝政府十分注意北方诸部落而付出了巨额费用,当亦失哈于1433—1434年间又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

亦失哈同都指挥康政率官军二千人乘大船五十艘来到阿穆尔河下游,他在特林石崖上所见到的只有被土著人拆毁的永宁寺遗址。

这时奴儿千人害怕得发抖,以为明朝的使者会追究拆毁寺庙的罪责而下令处死他们。可是亦失哈却认为更好的办法还是请土著人喝酒并重修庙宇,在庙里重新塑了一尊胜过以前的佛像。

然而,一切也就到此为止了。^②

虽然明朝历代皇帝力图把北方的远东各部落纳入自己的封建国家组织的轨道,他们终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阿穆尔河下游的居民对明朝的归附始终停留在名义上,而到了后来,在十七世纪

^① 据永乐11年(1413年)《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云:“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奥氏说此事在1413年,是错误的,应为1411年。

碑记云:“十一年秋,卜奴儿干西,有站满径,站之左,山高而秀丽。先是,已建观音堂于其上,今造寺塑佛,形势优雅,粲然可观。”奥氏说观音堂即是永宁寺,也是错误的(见《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钟民岩等:《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记校释》)。——译者

^② 重建永宁寺在1432年(宣德七年)夏。《重建永宁寺记》碑文说,该寺重建后,“华丽典雅,优胜于先,国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谢曰:‘我等臣服,永无疑矣。’”奥氏歪曲了原意。——译者

初，中国的统治权转入了新兴的满洲(大清)朝廷的手里。满洲征服者主要忙于中国的内政和在蒙古的用兵，比以前更少关心北方的情况。北方诸部落事实上自外于满洲朝廷，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同中国人的关系仅限于进贡和贸易交往。阿穆尔河诸部落把贡品送到宁古塔交纳，而东部边界的诸部落则到盛京纳贡。为了鼓励进贡者，满洲官员每逢纳贡时就设盛宴招待，奖赏衣帽和器用。北方各部落运来貂皮以交换中国货物。他们特别需要的是铁器，尤其是铁锅。起先一口锅的价值等于锅内能盛得下的貂皮张数；到了后来，一张貂皮竟能换取两口铁锅。

在满人兴起的前后，在乌苏里江两岸居住着木伦诸部落，并且曾有一座设防的中国城市，于1611年被满洲人攻取。在伊曼河边当时居住着“欺牙喀喇”或“恰克拉”人，就是现代乌德盖人中的甲卡拉族。恰克拉男人有文面的习惯，以捕貂为生。他们夏天吃鱼，冬季以兽肉为食，用兽皮缝制衣服。

松花江和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居民当时被称为剃发黑斤(赫哲或果尔特)，分为六个氏族(喀喇)。沿阿穆尔河往东北顺流下行，居住着十个不剃发的黑斤氏族(那乃人)。¹当地居民养狗，穿鱼皮和兽皮衣服，鼻穿金环以为装饰。

这些阿穆尔河部落没有文字、笔墨，用各种布条打结记事。

在东海岸的极东北部，居住着奇勒尔诸部落，他们的习俗与恰克拉人相似。²至今在阿穆尔河流域的乌里奇人和那乃人中，仍有

1 那乃族的这种区分，即分为上游的剃发那乃和下游的不剃发那乃两支，在阿穆尔河沿岸一直保存到二十世纪。不剃发的一支称为恩嘎特库(“未剪的”)，剃发的一支称为果尔得赫(“剪了的”)。由此产生了“那特基”和“果尔特”的名称(Л. Я. 施捷恩别格，同前书，第531页)。

A. M. 佐洛塔列夫：《乌里奇人的氏族制度和宗教》，哈巴罗夫斯克，1939年。

2 H. B. 克尤涅尔：《关于北方民族的中国史料》，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第98期，东方学部分，第1册，1949年，第97—100页。(译注：见《辽海丛书》第七集——清代林借撰：《全辽备考》上卷22页。)

若干奇勒氏族存在。

在阿穆尔河大森林深处以及更远的地方，住有一些畜鹿部落，他们是埃文尼人和鄂温克人的祖先。

在鄂霍次克海沿岸，定居着科里亚克人的祖先；在堪察加则有阿依努人和伊特里门人；在楚科奇半岛，东起阿纳德尔河西至科累马河口，定居着楚克奇人及爱斯基摩人；楚科奇半岛的内陆则是驯鹿的楚克奇人及科里亚克人的游牧地区。

亚洲极东北部的所有这些部落，既不同于他们的南方邻人即阿穆尔河的居民，也区别于雅库特人、埃文尼人和鄂温克人，当时他们依然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水平上。

直到第一批俄国军人和开发者的队伍到了远东，这种状况才告结束。

这些俄国人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开辟道路，建造高大的房屋和教堂，修筑城上的木构望楼，甚至开发了过去满洲官员和商人从未到过的阿穆尔河最下游，即那乃人和基里亚克人的地方。勇敢的新土地发现者的航船沿着亚洲这条大河驶向太平洋，迎着太阳前进。

诚然，奴役中国的满洲封建主企图摧毁阿穆尔河沿岸最初的俄国居民点，阻止新土地发现者的东进。但是，在短暂的中止之后，这种推进又以加倍的力量展开了。俄国人东面到达了萨哈林，南面到达了图们江。

远东居民的历史命运从此与俄罗斯国家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正是俄罗斯人面临着把这片富饶的、被历史遗忘了的疆土从千百年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任务。

远东历史上的新时代开始了。

作者、著作译名对照表

- Andersson J.G.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 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 安特生 J.G.: 黄土的子孙——史前期中国之研究。
- Andersson J.G.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安特生 J.G.: 中国的一种早期文化。
- Andersson J.G. Prehistoric Sites in Honan. 安特生 J.G.: 河南的史前遗址。
- Andersson J.G.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安特生 J.G.: 中国人史前期之研究。
- André Leroi-Gourhan. Archæologie du Pacifique-Nord. Matériaux pour l'étude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peuples riverains d'Asie et d'Amérique. Paris, 1946. 安德烈·勒鲁瓦-古兰: 北太平洋的考古研究——亚美二洲太平洋沿岸民族关系研究资料, 巴黎, 1946。
- Beardsley K.K. Japan before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比尔兹利 K.K.: 史前的日本——考古资料的研究。
- Bengt Anell.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Fishing in the Southern Seas. 本特·阿内尔: 南太平洋渔业史研究。
- Bishop C.W. Long-House and Dragon Boats. 怀履光: 长屋与龙船。
- Bylin-Althin M. The Sites of Ch'i Chia P'ing and Lo Han Táng in Kansu. 拜林-阿尔丁 M.: 甘肃齐家坪与罗汉堂遗址。
- Collins, Henry B. Eskimo Archaeology and its Rearing on the problem of Man's Antiquity in America. 科林斯, 亨利 B.: 爱斯基摩的考古研究及其对美洲人类古代问题的影响。
- Collins H.B. Archaeology of St. Lawrence island, Alaska. 科林斯 H.B.: 阿拉斯加圣劳伦斯岛的考古研究。
- Collins H.B. Outline of Eskimo Prehistory. 科林斯 H.B.: 爱斯基摩史前学纲要。
- Creel H.G.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 1948. 克里尔 H.G.: 中国早期文化之研究, 1948。
- De-Groot, J.J.M. Die Hunnen der vorchristlichen Zeit. 德-格罗特, J.J. M.: 公元前的匈奴人。
- Eberhard W. Chinas Geschichte. Bern, 1948. 埃贝哈德 W.: 中国史, 伯尔尼, 1948。
- Eberhard W. Earl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A New Working Hypotesis. 埃贝哈德 W.: 中国早期文化及其发展(一种新的假说)。
- Eberhard W. 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 Leiden-Peking, 1942. 埃贝哈德

- W.: 古代中国的本地文化, 莱登-北京, 1942。
- Elsdom Best. The Maori. 埃尔斯多姆·贝斯特: 毛利人。
- Groot G.J. The Prehistory of Japan. New-York, 1951. 格罗奥特 G.J.: 日本史前学, 纽约, 1951。
- Gutorm Gjessing. Circumpolar Stone Age. 古托姆·杰辛: 极圈的石器时代。
- Jochelson W. Histor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the Aleut. Washington, 1953. 约赫利森 W.: 阿留申群岛的历史、民族学与考古学, 华盛顿, 1953。
- Howard A. Maccord. Contributions to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Honshu, part II. Ogawara Pit-house Culture. 霍华德·A·麦科德: 本州北部考古研究, 第二册, 冈原地穴式住房文化。
- John Storck and Walter Darwin. A History of Milling Flour for Man's Bread. Teague, 1952. 约翰·斯托克、沃尔特·达尔文: 磨面的历史, 蒂格, 1952。
- Laufer B. The Decorative Art of the Amur tribes. 劳费尔 B.: 阿穆尔部落的装饰艺术。
- Laufer B. 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London, 1912. 劳费尔 B.: 玉器——中国考古学与宗教之研究, 伦敦, 1912。
- Licent E. Les Collections Néolithiques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桑志华: 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所藏的新石器。
- Mackay F. Bead Making in Ancient Sind. 马凯 F.: 古代信德的制珠业。
- Marget Bylin. Notes sur quelques objets neolithiques trouvés a Formose. 马赫·比兰: 论福摩萨发现的若干新石器时代器物。
- Maringer J. 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Mongolia. 马林格 J.: 蒙古史前期研究。
- Maringer J. A Core and Flake Industry of Palaeolithic Type from Central Japan. 马林格 J.: 日本中部旧石器类型的石核与打片技术。
- Maringer J. Einige faustkeilartige Geräte von Gongenyama (Japan) und die Frage des Japanischen Paläolithikums. 马林格 J.: 日本权现山发现的梨状工具及日本旧石器问题。
- Maringer J.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in Japan. 马林格 J.: 日本的旧石器时代。
- Maringer J. Some Stone Tools of Early Hoabinien Type from Central Japan. 马林格 J.: 日本中部发现的早期和平类型的若干石器。
- Menghin O. Zur Steenzeit Ostasiens. 门京 O.: 东亚的石器时代。
- Movius H.Z. Jr.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莫维乌斯 H.Z. Jr.: 南亚东亚的早期人类和更新世地层。
- Munro N.G. Prehistoric Japan. Yokohama, 1911. 芒罗 N.G.: 史前日本, 横浜, 1911。
- Nelson N.C. Notes on 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Asia and America. 纳尔逊 N.C.: 论亚美二洲的文化关系。
- Nelson N.C. Prehistory Archaeology of the Gobi Desert. 纳尔逊 N.C.: 戈

壁滩的史前考古。

Ohyama Kashiwa. Yayoi-Kultur. Eine prähistorische Kultur der Japanischen Inseln. Yüбилeumsband herausgegeben vo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 Theil 1, Tokyo, 1933. 柏小山: 弥生文化——日本列岛的一种史前文化, 德国亚洲自然及民族学会出版(纪念版), 第 I 卷, 东京, 1933。

Pei Wen-chung. On a Mesolithic Industry of the Cave of the Gwangsi. 裴文中: 广西洞穴内之中石器时代文化。

Pei Wen-chung. Palaeolithic Industries in China. 裴文中: 中国旧石器文化。

Pei Wen-Chung. T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couthien. 裴文中: 周口店山顶洞的石器。

Phillips, W.I. Maori Houses and Foodstores. Wellington (N.Z.), 1952. 菲利普斯, W.I.: 毛里人的房子和食物贮藏所, 惠灵顿, 1952。

Plath, Johann Heinrich. Die Bewokner der Mandschurei, Gottingen, 1830.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 满洲的居民, 哥廷根, 1830。

Ponosov V.V. Stone Implements from Kuhsiangtun. 波诺索夫 B.B.: 顾乡屯出土的石器。

Ridder J. Edward.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e-pottered Culture of Japan. 里德·J·爱德华: 日本陶器前文化的再认识。

Schnell. Prehistoric Finds from the Island World of the Far East. 施内尔: 远东岛屿世界的史前遗存。

Starikov V.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the Kin Empire near Harbin. 斯塔里科夫 B.C.: 哈尔滨近郊金墓的初次发现。

P. Teilhard de Shardin. On the Presumable Existence of a World-wide Subarctic Sheet of Human Culture at Dawn of the Neolithic. 德日进: 新石器时代黎明期亚美二洲人类文化之关系。

P. Teilhard de Shardin and C.C. Young. On Some Neolithic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德日进、杨钟健: 中国西部及蒙古、新疆几个新石器(或旧石器)之发现。

Te Rangi Hiroa. The Coming of Maori. Wellington-New Seeland, 1950. 特·兰吉·海罗阿: 毛里人的到来, 新西兰-惠灵顿, 1950。

Te Rangi Hiroa. Samoan Material Culture. 特·兰吉·海罗阿: 萨摩阿的物质文化。

R. Torii. Etudes archaeologiques et ethnologiques. Les Ainos des Ileses Kouriles. 鸟居龙藏: 千岛群岛阿依努人的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

R. Torii. Populations prehistoriques de la Mandchourie Meridionale. 鸟居龙藏: 南满史前居民。

Wendell Oswalt. Alaskan Pottery: a Classific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温德尔·奥斯瓦特: 阿拉斯加陶器的分类与历史的复原。

Wendell Oswalt. Northeast Asian and Alaskan Pottery relationships. 温德尔·

奥斯瓦特: 北亚与阿拉斯加陶器的关系。

A. Karl Wittfogel and Fêng Chia-cheng.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魏特夫、冯家升: 辽代社会史。

Yochelson W. The Koryak. Part 2.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Organisation.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约赫利森 W.: 科里亚克人, 第 2 部, 物质文化与社会组织——杰塞普北太平洋考察队的收获。

Альфтан Н. Заметки о рисунках на скалах по рр. Уссури и Бикину. 阿里夫坦 Н.: 记乌苏里江和比金河沿岸的岩画。

Альфтан Н. Общий очерк движения пяти охотничьих команд 2-й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стрелковой бригады 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阿里夫坦 Н.: 东西伯利亚步兵第二旅五个狩猎队踏察乌苏里边疆区概况。

Арсеньев В. К.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скопки на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Песча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ные В.К. Арсеньевым в 1921 г. 阿尔谢尼耶夫 В.К.: 1921 年 В.К. 阿尔谢尼耶夫在沙磧半岛的考古发掘。

Арсеньев В.К. Ледниковый период и первобы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阿尔谢尼耶夫 В.К.: 东西伯利亚的冰川时期与原始居民。

Арсеньев В.К.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зучению древн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阿尔谢尼耶夫 В.К.: 乌苏里边疆区上古史研究资料。

Арсеньев В.К. 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и Маньчжурии. 阿尔谢尼耶夫 В.К.: 乌苏里边疆区与满洲的古代遗存。

Бичурин И. 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 СПб., 1829. 比丘林 И.: 成吉思汗早期四汗史, 圣彼得堡, 1829。

Бичурин И.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比丘林 И.: 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

И. Бичури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II, 1842, с. II. И. 比丘林: 中华帝国统计资料, II, 1842, 第 II 辑。

Буссе Ф.Ф. Остатки древности в долинах Лефу, Даубихе и Улахе. 布谢 ф.ф.: 勒富河、刀毕河和乌拉河河谷的古代遗迹。

Буссе ф.ф. и Кропоткин Л.А. Остатки древностей в Амурском крае. 布谢 ф.ф.、克罗波特金 Л.А.: 阿穆尔边疆区的古迹。

Васильев В.П.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т X до XIII века,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о киданях, чжурчженях и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ах. СПб., 1857. 瓦西利耶夫 В.П.: 十至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地区的历史与古迹 (附录有关契丹、女真和蒙古鞑靼的中国文献的译文), 圣彼得堡, 1857。

Васильев В.П. 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и Минь. СПб., 1863. 瓦西利耶夫 В.П.: 元明两代满族资料, 圣彼得堡, 1863。

Ганешин Г. С. и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

- никах Приморья и их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значении. 加涅申 Г.С.,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关于滨海的若干考古遗存及其在地质学上的意义。
-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 С.: 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
- Глуздовский В. Каталог музея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格鲁兹多夫斯基 В.: 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学会博物馆目录。
- Горский В. 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е дел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дома. 哥尔斯基 В.: 满洲朝廷的开端与初期业绩。
-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В. 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по данным археологии. 格列宾希科夫 А.В.: 关于阿穆尔边疆区历史的考古学研究。
-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В. Маньчжуры, их язык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格列宾希科夫 А.В.: 满族及其语言文字。
- Грязнов М.Б. Древняя бронза Минусинских степей. 格里亚兹诺夫 М.Б.: 米努辛斯克诸草原古代青铜器。
- Дарвин Чарлз.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вокруг света на корабле «Бигль», М., 1953. 达尔文 Ch.: 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 莫斯科, 1953. 本书中译本: 周邦立译, 同名, 科学出版社, 1957年9月。
- Забелина Н.Н. Раскопк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г. Уссурийске (1954 г.). 扎别林娜 Н.Н.: 远东考古队在乌苏里斯克市内的发掘(1954年)。
- Захаров И. Полный русско-маньчжур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75. 扎哈罗夫 И.: 俄满大辞典, 圣彼得堡, 1875。
- Золотарев А.М. Родовой строй и религия ульчей. 佐洛塔列夫 А.М.: 乌里奇人的氏族制度和宗教。
- Елисеев А.В.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на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叶里谢耶夫 А.В.: 远东纪行。
- Иваньев Л.Н. Древности села Чугуевки в Приморском крае. 伊凡耶夫 Л.Н.: 滨海边疆区楚古耶夫卡村的古迹。
- Иохельсон В. Древние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дземные жилища племен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й Америки. 约赫利森 W.: 东北亚和西北美诸部落古代与现代地下住所。
- Кафаров П.И. (архимандрит Палладий). Этнограф.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Письма арх. Палладия из г.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 и с. Никольского. 卡法罗夫 П.И. (帕拉季掌院): 南乌苏里边疆区的民族学考察(帕拉季掌院从符拉迪沃斯托市和尼科利斯克村发出的信件)。
- Киселев С.В. Монголия в древности. 吉谢列夫 С.В.: 古代的蒙古。
- Крашенинников С. Описание земли Камчатки, М.-Л., 1949. 克拉舍宁尼科夫 С.: 堪察加见闻,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9。
- Кухонные остатки, найденные на берегу Амурского залива, близ устья р. Сидеми. 阿穆尔湾沿岸锡迭米河河口附近的炊爨遗迹。

- Кюнер Н.В. Китайские известия о народах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61. 克尤涅尔 Н.В.: 关于南西伯利亚、亚洲中部和远东诸民族的中国文献, 莫斯科, 1961。
- Кюнер Н.В. Китай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о народах Севера. 克尤涅尔 Н.В.: 关于北方民族的中国史料。
- Лев Д.Н. Новые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мчатки. 列夫 Д.Н.: 在堪察加新发现的考古遗存。
- Лопатин. И. А. Гольды амурские, уссурийские и сунгарийские. Опыт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洛巴金 И.А.: 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果尔特人的民族学研究。
- Лопатин И.А. Некоторые сведения о 49 древних урочищах в Амурской стране. 洛巴金 И. А.: 阿穆尔地区四十九个古代遗址的若干资料。
- Лопатин И.А. Обзор южной части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за р. Суйфуном. 洛巴金 И.А.: 东西伯利亚滨海州绥芬河以东南部地区概况。
- Лян Сы-чэн. Архитектура танской эпохи. 梁思成: 唐代建筑。
- Макаров В.С. Описание коллекции, собранной Л. М. Яковлевым на стоянках между разъездами Чэн-гаоци и Чэн. 马卡罗夫 В.С.: Л.М. 雅科夫列夫在城高子车站与城车站之间遗址所获发现物描述。
- Маргаритов В.П. Кухонные остатки, найденные на берегу Амурского залива близ р. Сидеми. Изд. Общ. изуч.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1887. 马尔加里托夫 В.П.: 阿穆尔湾海岸锡迭米河河口附近的炊爨遗迹, 阿穆尔边疆区学会出版, 1887。
- З.Н. Матвеев. Бохай. З.Н. 马特维耶夫: 渤海。
- Миддендорф А.Ф.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север и восток Сибири. СПб. 1878. 米登多夫 А.Ф.: 西伯利亚北部与东部游记, 圣彼得堡, 1878。
-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й Н. М. Сочинения. 米克卢霍-马克莱全集。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долине Ангары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55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а на сессии отдел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и пленуме ИИМК,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итогам арх. иссл. 1955г., М.-Л., 1956.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1955年在安加拉河谷和远东的考古学研究——在史学部会议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上总结 1955年考古学研究的报告提纲,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6。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Приморье в 1953 г.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1953年滨海的考古研究。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на сессии отдел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и пленуме ИИМК,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арх. и этн. иссл. 1953 г., М., 1954.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远东的考古学研究——在史学部会议上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上关于1953年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的报告提纲, 莫斯科, 1954。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бот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1954 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на сессии отдел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и пленуме ИИМК и сессии ученого совета ИЭ АН СССР,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итогам арх. и этн. иссл. 1954 г., М., 1955.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 П.: 1954年在远东的考古工作——在苏联科学院史学部会议、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全体会议和民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上总结 1954 年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工作的报告提纲,莫斯科, 1955.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К вопросу о древнейшем населении япон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и его культуре.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论日本列岛的远古居民及其文化。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по древн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нголии (Рец. на книгу J. Maringer. 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Mongolia).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内蒙古古史新资料(译马林格著《蒙古史前期研究》)。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Олений камень с р. Иволги.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伊伏尔加河的鹿石。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О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м заселении человеком внутренней части чукот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论人类之最初入居楚科奇半岛腹地。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Ларичев В.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Приморья.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拉里切夫 В.Е.: 滨海的古代文化遗存。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Неолит и бронзовый век Прибайкалья.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18,43, 1950, 1955.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贝加尔湖沿岸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第 18、43, 1950, 1955。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Племена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I тысячелетии до н.э.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公元前第一千年西伯利亚与远东诸部落。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Прошлое Якутии до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я к Рус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雅库特并入俄国前的历史。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У исто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远东各民族文化的渊源。
-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Эпоха первобытно-общинного стро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ии. 奥克拉德尼科夫 А.П. 布里亚特-蒙古地域的原始公社制时代。
- Ланов В.А. Япон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сношениях с королевством Бохай. 帕诺夫 В.А.: 日本与渤海王国交往的文书。
- Петрунь В.Ф.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озрасте речных террас Южного Приморья (находка каменных орудий на побережье Японского моря). 彼特隆 В. Ф.: 关于滨海南部沿河阶地的年代问题(日本海沿岸发现的石器)。
- Позднеев А.М.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波兹德涅耶夫 А.М.: 蒙古文学史讲座。

- Позднеев Дм.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еверной Японии и ее отношений к материкам Азии и России. Том второй,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Отношения к народам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данные по истории Мацумазэского клана. Токио, 1909. 波茲德涅耶夫, Дм.: 日本北部的历史及其同亚洲大陆、俄国之关系的研究资料, 第2卷第1册, 同满洲诸民族的关系及松前部族史资料, 东京, 1909.
- Поляков И. С. Отчет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 острове Сахалине, в Южно-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и в Японии. 波利亚科夫 И.С.: 库页岛、南乌苏里边疆区和日本考察报告。
- Поносов В.В. Д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из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г. Харбина. 波诺索夫 В. В.: 哈尔滨市郊出土的史前雕像。
- Попов П.С. О тыр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波波夫 П.С.: 关于特林文物。
-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Н.И. Веселовского к «Комментариию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а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Китаю». Н. И. 维谢洛夫斯基: «卡卡罗夫学院对马可波罗华北之行的注释»前言。
-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М.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ссурийском крае, 1867—1869, М., 1937. 普尔热瓦尔斯基 Н.М.: 1867—1869年在乌苏里边疆区的旅行, 莫斯科, 1937.
- Разин А.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разведка на берегу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залива. 拉津 А.И.: 乌苏里湾沿岸的考古调查。
- Разин А.И. Материалы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мысловых моллюска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 способы лова некоторых съедобных моллюсков. 拉津 А.И.: 若干可食贝类的资料, 若干可食贝类捕捞的地区和方法。
- Разин А.И.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стоянок каменного века на берегу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залива. 拉津 А.И.: 乌苏里湾沿岸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
- Рашид-ад-дин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 I, кн. 2, М.-Л., 1952. 拉施特: 史集, 第I卷, 第二部,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2.
- Руденко С.И. Древняя культура Берингова моря и эскимос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М.-Л., 1947. 鲁金科 С.И.: 白令海古代文化与爱斯基摩问题,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7.
- Сосновский Г.П. К истории добычи олова на востоке СССР. 索斯诺夫斯基 Р.П.: 关于苏联东部地区的锡矿开采史。
- Сосновский Г. П. Плигочные могилы Забайкалья. 索斯诺夫斯基 Г.П.: 外贝加尔的石坟墓。
-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Описание перва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ия,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 же состоит Кига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Казань, 1910. 斯帕法里 Н. Г.: 亚洲与中国, 喀山, 1910.
- Стариков В.С. Результаты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долине р. Цунхэ. 斯塔里科夫 В.С.: 冲河河谷考古学考察的结果。
- Таранец А. О костях рыб, найденных в кухонных остатках племени илоу.

- 塔拉涅茨 А.: 关于挹婁部落炊爨遗迹中发现的鱼骨。
-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В.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далекое прошлое. Заметки археолога. 托马舍夫斯基 В.В.: 探索遥远的过去——一个考古学家的笔记。
- Федоров А.З. 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 о раскопках,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в г. Никольске-Уссурийском на площади у Горнизонного сада (26 мая по 26 июля 1916). 费多罗夫 А.З.: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驻军花园内发掘简报(1916年5月26日—7月26日)。
- Федоров А.З. 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в городе Никольске-Уссурийском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Никольск-Уссурийский, 1916. 费多罗夫 А.З.: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城及其近郊的古代遗存, 尼科尔斯克-乌苏里斯克, 1916。
- Чебоксаров Н.Н. К вопросу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китайцев. 切鲍克萨罗夫 Н.Н.: 关于中国人的起源问题。
- Шавкунов Э.В. Из истор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охай (Дипломная работа), Л., 1955. 沙夫库诺夫 Э.В.: 渤海国史(毕业论文), 列宁格勒, 1955。
- Шавкунов Э.В. Новые находк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монет в Приморском крае. 沙夫库诺夫 Э.В.: 滨海边疆区新发现的中世纪钱币。
- Шавкунов Э.В. Клад чжурчженских зеркал (рукопись) 沙夫库诺夫 Э.В.: 女真镜窖藏(手稿)。
- Шренк Л.И. Об инородцах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Том второй.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главные условия и явления внешнего быта, СПб., 1899. 什连克 Л.И.: 论阿穆尔边疆区的异族人, 第2卷, 民族学部分, 上半部: 生活的主要条件和现象, 圣彼得堡, 1899。
- Штернберг Л.И. Гиляки. 施捷恩别格 Л.И.: 基里亚克人。
- Янковский М.И. Кухонные остатки и каменные орудия, найденные на берегу Амурского залива. 扬科夫斯基 М.И.: 阿穆尔湾沿岸发现的炊爨遗迹和石器。

杂志、期刊译名对照表

- Acta Arctica 北极学报
American Antiquity 美洲的古代
American Museum Novitates 美洲博物馆简报
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Smiths. Inst., 1937, Washington. 史密森协会评议委员会年报, 1937, 华盛顿。
Anthropos 人类学
Antiquity 古代
Artibus Asiae 亚洲艺术
Bernice P. Bishop Museum 伯尼斯 P. 毕晓普博物馆馆刊
Bull. Geol. Society of China 中国地质学会志
Bull.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Harbin. 哈尔滨科学研究所通报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nchoukuo. 满洲国科学研究所通报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中国地质调查所通报
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 I th., Berlin und Leipzig, 1921.
有关亚洲史的中国文献, 第 I 卷, 柏林-莱比锡, 1921。
Early Man 早期人类
Far Eastern Quarterly 远东季刊
Festschrift Publication d'hommage offerte au P. W. Schmidt. Wien, 1928. 史密特纪念文集, 维也纳, 1928。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
Journal Coll. Sci. Imp. Univ. Tokyo. 东京帝国大学科学院杂志
Man 人类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Mus. of Nat. History. 美国民族史博物馆通报
Memoirs of the Polinesia Society. 玻里尼西亚学会通报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远东古物馆馆刊
Palaeontologia Sinica N.S.D. 《中国古生物志》新丁种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皮博迪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论文集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美国哲学学会通报
Publication du Musée Hoang ho pai ho de Tien Tsin. 天津黄河白河博物馆馆刊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
Smithsonian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史密森杂集
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西南人类学杂志
Studia Ethnographica Upsaliensia 乌普萨拉地区民族学研究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W.-S. 美国哲学学会会报, 新辑

Архив ДВФАН 科学院远东分院档案

Архив ИИМК АН СССР (Ленинград) 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档案(列宁格勒)

Архив Приморского филиала (Всесоюзн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ва. (全苏)地理学会滨海分会档案

Вестник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илиала АН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院报

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 古代史通报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газета. «符拉迪沃斯托克报»

Гиляки, орочи, гольды, негидальцы, айны.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Сборник). Хабаровск, 1933. 基里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阿依努人的研究与资料(文集), 哈巴罗夫斯克 1933。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Ежегодник Русского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ва. 俄国人类学会年鉴

Записк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科学院院报

Записки Вост. отдела Русск. археол. об-ва. 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通报

Записки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阿穆尔边疆区研究会通报

Записк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Записки Харб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ей и этнографов. 哈尔滨探险家与民族学家协会通报

Изв. АН СССР 苏联科学院通报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东方研究所通报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сиб. отдела РГО. 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Известия Всесоюзного географ. об-ва. 全苏地理学会通报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 географ. об-ва, т. 38, 1902, СПб., 1905. 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第38卷, 1902, 圣彼得堡, 1905。

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й АССР, том первый, Улан-Удэ, 1951. 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史, 第1卷, 乌兰-乌德, 1951。

История Якутии. 雅库特史

Китай «中国建设»杂志, 俄文版。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ССР. 苏联考古学资料与研究

-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геологии и полезным ископаемым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ГЕИ (Всесоюзного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новая серия, Геология и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质与矿物资料, 全苏地质学会资料新辑, 地质与矿物。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史纲
- По следам древних культур. От Волги до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Сб. 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古代文化遗迹, 文集。
- Приамур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阿穆尔地区通报
-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до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обществ. 资本主义前社会史问题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работ пржевальцев, Харбин, 1942. 普尔热瓦斯基学会科学著作集, 哈尔滨, 1942。
-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苏联考古学
-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иморье 苏维埃滨海
-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苏联民族学
- Сообще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филиала АН СССР (ДФФ АН) 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通报
- Труд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国立远东大学著作集
- Труды отдела истории первобыт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Гос. Эрмитажа. 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原始文化史部著作集
- Труды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 об-ва. 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地区分会著作集
-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усской дух.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 北京俄国布道团成员著作集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ГУ. 列宁格勒大学学报
- Фонд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考古委员会底案
- Фонды сектора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ДВФАН. 科学院远东分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室底案
- Эпиграфика Востока 东方古钱学
- Юбилейный сборник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6. 阿穆尔边疆区研究学会纪念文集,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16年。